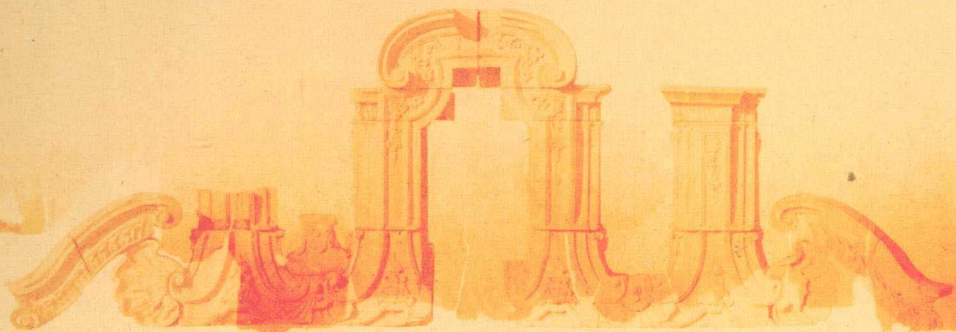




圆 明 园 丛 书
圆 明 园 劫 难 记 忆 译 丛



译丛主编：[法] 伯纳·布立赛 王道成 陈名杰 徐忠良

Narrative of the North China campaign
of 1860; Containing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Chinese Character

1860年华北战役纪要

中 西 書 局



上架建议 历史/回忆录

ISBN 978-7-5475-019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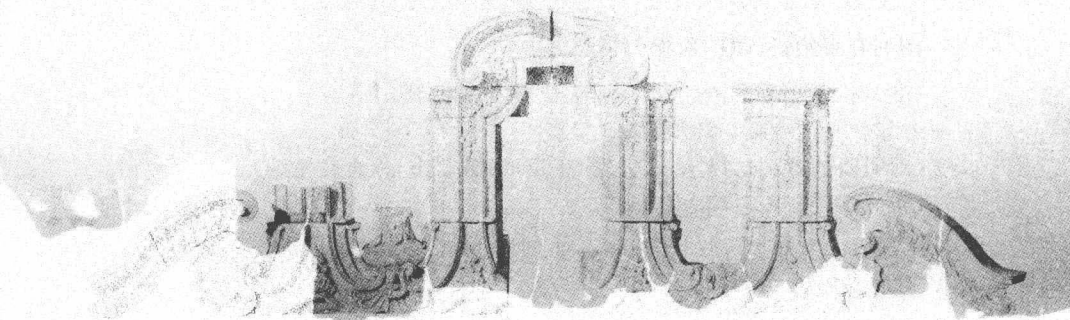


9 787547 501962 >

定价：32.00元



圆 明 园 丛 书
圆 明 园 劫 难 记 忆 译 丛



译丛主编：[法] 伯纳·布立赛 王道成 陈名杰 徐忠良

ROBERTOR SWINHOE

[英] 斯温霍 著

邹文华 译

中 西 書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860 年华北战役纪要/(英)斯温霍著;邹文华译.

—上海:中西书局,2011.1(2011.3重印)

(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布立赛,王道成,陈名杰,徐忠良主编)

ISBN 978-7-5475-0196-2

I. ①1… II. ①斯…②邹… III. ①八国联军—侵华—史料

IV. ①K255.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9154 号

圆 明 园 丛 书

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

1860 年华北战役纪要

[英]斯温霍 著

邹文华 译

责任编辑 利春蓉

封面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www.shwenyi.com)
中西书局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20002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0196-2/K·042

定 价 32.00 元

出版前言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闯进北京，劫掠并焚毁了凝聚着中国人民无限智慧、创造、心血和五千年农耕文明集大成的皇家御苑——圆明园。这是中国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空前的文化浩劫。150年来，圆明园成为了中国人心中一个永远的伤痛！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经过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六帝150多年的精心营建，占地350公顷，建成了200多座精美的中国式宫殿和园林，楼塔宫阙，金碧辉煌。园中除了中式宫殿和园林之外，还有乾隆十二年到二十四年（1747—1759）间，由法国传教士王致诚、蒋友仁和著名宫廷画师、建筑家意大利人郎世宁等设计建造的西洋楼。王致诚在乾隆八年（1743）11月1日写回法国的长信中对圆明园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述和夸赞，称其为“万园之园”、“绝美之园”。这封信及其内容，对18世纪欧洲大陆卓兴中国园林之风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法国建筑学家邱治平在《圆明园》一书中对圆明园的价值作过一番相当精到的评论，他说：“圆明园堪为世界奇迹之一。众多宫阙屋宇由大理石和贵重木材建成，金碧辉煌，是装饰稀世奇丽的艺术瑰宝。殿堂宅院宏伟幽深，理政御寝厅室典雅，各大书库藏卷浩繁，显示出

天朝治国气派。由于能工巧匠大师们的才华，圆明园不只是离宫御园，也是博物馆，是建筑博物馆，园林艺术博物馆；更因其收藏罕见的珍品和典籍，可称为文化艺术博物馆。”布立赛先生则用更易为人们理解的比喻作了评价：其价值远远超过现在法国的罗浮宫、凡尔赛宫和法国国家图书馆总和。可就是这样一座其中也包含着法国人、意大利人智慧而设计建造的圆明园，却毁在了欧洲强盗之手。

远在万里之外的英吉利、法兰西两国，为何要派遣“远征军”征战中国，劫掠并焚毁早已被欧洲人推崇为人间仙境的圆明园？联军多少人马？海军、陆军、骑兵怎么组成？使用什么样的武器装备？两军如何协调？深入中国的联军后勤保障如何保证？战争期间，外交谈判情况如何？战争经过怎样？在英法军人眼中的清朝政府、清军部队、中国民众是怎样的状态？等等，这些情况，在中文的历史记载中只有泛泛的语句、概括性的言辞。因此，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只告诉我们是英法联军在 1860 年劫掠和焚烧了圆明园这样一个概念性的结论。前面所说的一系列问题，没人能够解答。因而有无数的国人甚至是非常有名望的专家学者都误认劫掠和焚毁圆明园的是八国联军。就这样，英法联军侵华战争的一系列细节、过程……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淡去了，国人的记忆也就模糊了……

2000 年 10 月，一位来中国旅游的法国历史学家、著名记者伯纳·布立赛先生在参观了颐和园后，来到了圆明园。圆明园里的一片废墟、苍凉空地，深深地震动了这位法国学者。2003 年，布立赛先生在法国峭岩出版社出版了《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揭开了被西方主流社会刻意掩盖了 140 多年的历史真相。在西方世界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据了解，到 2010 年 6 月，法文版《1860：

《圆明园大劫难》已经累计销售2万册。2005年9月，因法国《欧洲时报》的支持和推荐，浙江古籍出版社在“中法文化年”期间出版了中文版《1860：圆明园大劫难》，引起了国人的巨大关注。在与圆明园渊源甚深的达园宾馆举行的中文版出版座谈会上，布立赛先生表达了他对中国、中国文化深厚的爱，展现了他无尽的中国情结，并对英法联军的反人类、反文明暴行表示强烈谴责。他说：“必须毫不含糊地指出，1860年对华‘远征’，是殖民战争，更确切地说，是帝国主义征战，与19世纪帝国主义掠夺完全一脉相承。”“1860年英法对华‘远征’，尽管军事上和外交上有所成功，但却以最惨重的方式告终，即劫掠焚毁圆明园。罪过、罪行、罪孽，永远抹不掉！在到处都注重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这些罪恶不只是在中国人心中永远抹不掉，在所有人类记忆中都永难磨灭。”布立赛先生在会上表示，希望和中国的学者开展学术交流，愿意把他撰写《1860：圆明园大劫难》所依据的英法联军将军、医生、翻译、外交官、士兵等人的回忆录等原始资料提供给中国学者研究。今天，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套译丛就是由中西书局和布立赛先生、著名圆明园历史研究专家王道成教授、圆明园管理处主任陈名杰博士从150多种两国战争亲历者的回忆录中精选的15种亲历记录：英军7种，法军8种，外加《枫丹白露城堡：欧仁妮皇后的中国博物馆》图册。

中西书局立足“中”“西”二字，非常关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观念差异和交流、摩擦、争吵、战争等各种形态，十分重视本译丛的编选、翻译、编辑、审校和出版工作，特别约请著名翻译家许钧和王大智、汪洪章、应远马等先生承担翻译重任。

这些图书，对于中国近代史来说，是异常珍贵和重要的。因为它们是在战争结束后的1860—1875年间出版的战争回

忆录，比如联军统帅英国将军格兰特就是在 1875 年 7 月审定回忆录书稿校样后去世的。有的是亲笔撰写，有的是根据战场日记整理，有的是口述记录，较为真实可信，且叙述细致、丰富。布立赛先生在《1860：圆明园大劫难·前言》中说：“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它们构成了丰富、生动、真实和珍贵的史料来源。尽管这些记叙，有时要加以鉴别，甚至进行纠正。这毕竟是胜利者写成的历史，还得看看战败者所写的历史。”诚然，这 15 部回忆录，不仅有表达人类正义，回国后真诚悔恨，认为战争可耻的——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历史记录，但更多的是为侵略战争辩护的言论，对侵略战争的美化，对清朝政府、清朝军队、中国民众的丑化等。如法军上校杜潘说，联军占领天津后，当地“居民都能够理解我们远征的目的——我们来到中国不是为了大肆破坏这个国家，而只是为了帮助解决他们和政府之间的政治分歧”。又如葛罗在回忆录中记述联军的共同说法：联军并没有像恭亲王所说的那样洗劫了这座宫殿，只是根据战争法，分享了战斗胜利所带来的战利品。夏宫后来遭到洗劫并被部分烧毁，那是无处不在的中国盗匪所为。此外，也有对中国与英法文明差异和观念差异造成冲突的非常详尽的客观记录。在记叙中，不仅存在着史实的误差，也存在着观点上的问题。比如，法军首先进攻并抢劫圆明园，但举火焚烧圆明园的是由米启尔将军率领的英军第一师。这个观点，中文史料也有相同记载，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和布立赛先生都已采信，也已被一些中国学者采纳，并在其著作中作出表述。但是，译丛中的多部回忆录都记载了这样的事实：法军虽然反对焚烧圆明园，但他们主张应当焚烧紫禁城。因此，英法侵略军的罪孽是同等深重的，恐怕并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我们希望中外学者依据中文、英文、法文，以及俄文、日文等相关文种

的史料记载和历史事实，对英法各自的历史罪孽、历史责任进行认真的研究，作出客观和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抢劫已然可恶，焚烧罪孽更深！又比如，说中国古代的蒙昧时代在 9600 万年之前；将钦差大臣所携关防误认为是皇帝玉玺；在引用清朝官员给皇帝的奏章时，将其他清朝官员误认为早已革职查办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另外，还有不少将地名、人名拼写错误，如将同仁堂误为同济堂等等。这些误差和错误的存在，深刻表明了，当时的英法对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很不了解，存在很多的误区。为了完整地向学界呈现回忆录的原始状态，提供回忆录记载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在翻译、编辑过程中，我们严格遵循存真原则，照实翻译，照实编辑，照实出版，希望专家和读者朋友们注意辨别，并注意对于美化侵略战争、丑化中国的言论，带着一种批判的态度看待史料。

圆明园管理处陈名杰主任十分重视圆明园史料研究，积极支持并承担了全部出版经费，资助中西书局选编、翻译、出版《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供专家学者和各界读者了解这一段惨痛历史。相信此译丛的出版和其他圆明园研究成果的刊布，有利于圆明园管理处查找寻访圆明园流散文物的线索，推进圆明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浙江大学历史系郑德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王道成教授、南京大学研究生院许钧教授帮助审核译稿，纠正了一些译稿中存在的人名、地名、典章制度等方面的错误。值此译丛正式付梓之际，谨向圆明园管理处及陈名杰主任和三位教授表示崇高敬意和诚挚感谢。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使人们更好地面向未来。我们推出《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纪念圆明园罹难 150 周年，还原历

史真相和历史细节，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警醒世人，勿忘历史，勿忘国耻，反思历史，祈福未来，为共建人类和谐未来而努力。

中西书局

2010年9月28日

序 一

在法国，我们称之为记忆的责任。

这意味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府，所必须承担的在过去岁月中给他人带来的战争损失、迫害与痛苦。

有一个实例，在 1995 年，希拉克先生担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期间，为法国政府于 1940 年至 1944 年期间对境内犹太人实行的残酷迫害作了恳挚的坦承与道歉。而我，作为当时的政府总理，同样坚信我们负有这种不容推卸的责任。

今年 10 月，中国圆明园管理处等机构将举办圆明园劫难 150 周年纪念活动。

我非常愿意加入这场盛大庄严的纪念活动中，悼念遭受当年英法联军铁蹄践踏的那段岁月，谴责英法联军当年对中国人民和人类文明犯下的野蛮罪行。尽管当时的法国军队并没有直接参与对圆明园的实际纵火行为，但历史事实是，我们确实派出了 8000 人的远征军，并首先开始了对圆明园的攻击和洗劫，而且对这片古老的土地有所图谋。

我们都清楚地明白这次卑劣的掠夺行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不可磨灭的惨痛记忆。援引法国文学巨匠维克多·雨果那封著名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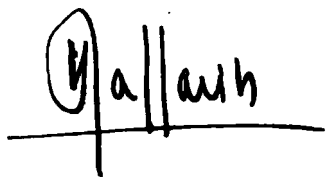
件：“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然而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

如何面对谴责，特别是这种在全中华民族面前犯下的可耻罪行，如何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尤其当法国作家伯纳·布立赛先生的著作《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在中国翻译出版之后，这应当是英法两国有识之士深思反省的重大问题。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全力支持中西书局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的翻译出版计划。这套丛书精选了法英两国亲历 1860 年远征中国的一些重要军官、外交官、翻译官、神甫、医官等人士所撰写的回忆录。

这套丛书的出版必将填补某些历史上的空白，并提醒我们牢记记忆的责任。

藉此机会，以戴高乐将军倡议的法中人民友谊的名义，向中国人民表达我的敬意，并衷心希望我们可以一同分享美好的未来。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Chirac", with a horizontal line underneath.

让-皮埃尔·拉法兰
法国前总理 现任参议员
巴黎 2010 年 7 月

序 二

今年2月初，我意外地收到上海中西书局的来函，信中提出希望翻译出版一套由当年参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联军官兵撰写的战争回忆录。

2010年10月18日，将是北京圆明园罹难150周年纪念日。

本人所著《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于2003年末在巴黎出版。经由徐忠良先生的倾力相助，该书的中文版于2005年夏天在中国顺利出版发行。在他的建议下，我在该书附录的150余种参考书目中精心挑选出一批较为重要的书稿，撰写者包括当年亲历战争的著名军官、外交官、翻译官、记者、军医等等。

这套丛书中首先当推法军首领库赞·蒙托邦将军所著的《蒙托邦征战中国回忆录》。因其在1860年9月21日率军攻占八里桥时的卓越表现，蒙托邦将军被拿破仑三世授予“八里桥伯爵”之爵位。但由于种种因素困扰，此书在其完成70年后，也就是1932年，才由蒙托邦将军之孙付梓刊行。

此时蒙托邦将军过世已久，在书的前言中他提到：“曾经多少次我提起笔想把当年的人和事记述下来，在已经出版的有关此次远征的书籍中，我发现了一些有意或无意地对这次远征行动的曲解，

每当此时，我就更急于将自己的写作计划付诸实施。”这段文字没有注明日期，但应当是写于他临终之前。作为远征活动的幸存者，他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这本回忆录的出版。但最终，八里桥伯爵也未能如愿。

人们不禁怀疑其中的隐情。当年，对于他率领法军抢劫圆明园的行为，舆论界始终毁誉参半，批评之声不绝于耳。甚至于他的儿子(1889年去世)，也无法做出是否要坚持出版这本回忆录的决定，想必，他是害怕面对种种批评的声音。

丛书也收录了葛罗男爵的《黄皮书日记》，他是当年随联军远征的法国全权特使。黄皮书(等同于英国的蓝皮书)汇集了当年的外交事务信函往来，内容涉及中法两国在1860年间的谈判。需要指出的是，葛罗男爵是一位极其坦诚的人，性格温和沉着，并与中国清朝的钦差大臣恭亲王相处融洽——这与他的英国同行、傲慢的额尔金勋爵有着天壤之别。

此外，作为英法联军的翻译，年轻的埃利松伯爵也从另一角度见证了这次远征行动。他的行文生动活泼，诙谐风趣，披露了远征行动中大量的细节与内幕，他笔下对圆明园的描写尤为出色。但由于此书字里行间对英国同盟军做了非常不客气的叙述，出于外交上的考虑，这本《翻译官手记》推迟到1886年才得以在巴黎出版。

杜潘中校(即瓦兰·保罗的化名)堪称名副其实的暴徒，他从北京圆明园掠回了大批的艺术珍品，并于1862年在德鲁欧饭店大肆拍卖。然而他的这本《远征中国》却是一份相当珍贵的历史资料。这本书详细描述了当年英法联军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以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疯狂抢劫圆明园的可耻行径。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对此并无丝毫羞耻之心。

海军上尉帕吕在《远征中国纪行》中以一个海军军官独有的视角

展现了这次军事活动。如果当年没有海军的从旁协助，这次远征行动只能是空中楼阁，根本无法实现。在法国，他以一名爱国者以及极端民族主义者著称。

此外，贝齐亚上尉的《中国之役：1859—1861》是相当重要的，事实上，正是他以一种异于大多数盟军战友的口吻，首次使用了“劫掠”一词，将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所作所定性为犯罪行为。

作为随军医官，阿道尔夫·阿尔芒著有《出征中国和交趾支那来信》，他通过大量的信件，试图以一个科学家的角度，描述陌生的异国世界，此书内容的有趣之处远非其简单的书名所能体现。

布隆戴尔将军并没有随远征军前往中国，他留守在巴黎的战争指挥部，以监督军队的军事行动。他的法语书名同帕吕的如出一辙，内容也均出自官方的书面报告。尽管如此，这本书对国家军事行动的部署和考虑仍有着相当重要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枫丹白露城堡：欧仁妮皇后的中国博物馆》一书汇集了大批被法军从北京圆明园掠回国内，并奉献给当时拿破仑三世皇后欧仁妮的艺术品。这批珍贵的历史文物如今被展示在枫丹白露城堡的一个侧殿，距巴黎约一个小时的车程。

此类作品众多，我尽量从中选出最具历史价值的，最富教益意义的文稿，并努力避免内容上的重复。其实还有很多较好的文稿，出于种种原因未能收录在内，尤其是吕西·阿尔芒的《远征途中的私人信件》、弗达比翁的《中国的战争》、远征行动结束后病逝于中国天津的柯利诺将军所写的《回忆录》，以及夏西隆、莫特雷西、盖互雷、拉弗雷的手记，等等。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此套丛书未能收录诺戈尼的《中国战事记忆》一书，该书已经绝版，或许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还能觅到它的踪迹。远征结束后，随军官员约翰·路易·德·诺戈尼带着大批令人

瞠目的赃物回到法国，并对这种偷盗行为百般辩解，声称他是向北京的中国军人以及商贩购买的！为此，他还编写了一本图册目录。对这部分内容，中国的读者也许有较大的兴趣，从中可以了解当年被英法联军夺走的文物细目。也许将来某日，我们可以看到此书的出版……

伯纳·布立赛

巴黎 2010 年 9 月 19 日

序 三

咸丰十年（1860）十月，英法联军抢劫和焚毁圆明园，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惨痛的文化劫难。但是，西方的学者不愿意正视历史，竭力掩盖事实真相；而中国的学者，由于缺乏有关的史料，特别是英法联军方面的史料，无法对侵略者的罪行进行充分的揭露。140多年过去了，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没有关于这场文化浩劫的论著问世。

2000年10月，法国历史学家、著名记者伯纳·布立赛先生来到了圆明园遗址，一代名园的残垣废墟及其悲惨命运深深地打动了。他为英法侵略者的暴行感到愤怒，也为身为法国人而深感羞愧。回到巴黎，他想更多地了解圆明园的历史，在查阅图书资料的过程中，他发现有关圆明园的书籍很少，更没有一部关于圆明园的专著。于是，他决定写一部论述圆明园的史书。他多方搜集当时亲历这场侵华战争的将军、士兵、外交官、翻译官以及随军的医生、牧师、记者等留下的文字记录，进行深入研究，并多次到中国考察收集资料。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写成了一部全面反映这场文化浩劫的力作——《1860：圆明园大劫难》。

《1860：圆明园大劫难》法文版出版后，在法国学术界和人民群

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法国《欧洲时报》认为，该书是伯纳·布立赛先生在研究了大量史料并十余次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以客观公正的眼光，揭露和批判了1860年英法联军抢劫和焚毁圆明园的罪恶行径，值得向中国读者推荐。他们购买了该书中文版的版权并无偿提供给浙江古籍出版社使用，并帮助组织专家进行翻译，以最快的速度将它出版。

2005年8月31日，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法国《欧洲时报》、浙江古籍出版社在北京皇家大饭店隆重举行《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文版首发式。我应邀参加，见到了伯纳·布立赛先生，并得到了由他签名的赠书。

2005年9月5日，我参加了中国圆明园学会、浙江古籍出版社在北京达园宾馆联合举办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文版出版座谈会。与会的中国专家学者对伯纳·布立赛先生直面历史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学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伯纳·布立赛先生在发言中表示，愿意将他手上所有有关圆明园的书籍和资料提供给中国的专家学者，由中国的专家学者从中国的角度再写一部关于圆明园的史书。先生的慷慨，使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但是，英文、法文的书籍和资料，能够阅读的人不多，影响有限。翻译出版，工作量很大，而且不会像畅销书那样得到高额的回报。在注重经济效益的今天，谁愿意为一座早已成为一片废墟的皇家御苑作出牺牲呢？

但是，社会总是要发展的。伯纳·布立赛先生已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后面的路，有识之士会继续走下去的。为了表示感谢，我将由我主编的一部近一百万字的关于圆明园的大型资料汇编《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1999年8月，北京出版社出版）赠给了伯纳·布立赛先生。

2005年10月，我收到了徐忠良先生寄来的《圆明园图书系列计

划》，其国外部分就列入了《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附录的 150 多种英文、法文图书目录，准备选择其中“有价值且不雷同的予以翻译出版”，希望我帮助筛选。读了这个计划，我对徐忠良先生的见识和魄力深感钦佩。身为清史研究工作者，对于如此盛举，岂能置身事外？就我所知，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2007 年，是圆明园建园 300 周年。这年 4 月，徐忠良先生来到北京，约我主编一部反映 1980 年以来关于如何对待圆明园遗址的争论情况的书。篇幅与《1860：圆明园大劫难》相当，装帧风格也与之相似，书名定为《圆明园重建大争辩》。我 5 月交稿，10 月 17 日晚，徐忠良先生就将还带着油墨芳香的《圆明园重建大争辩》200 本，送到定于 10 月 18 日上午开幕的纪念圆明园建园 30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场了。

后来，徐忠良先生调到上海中西书局工作，我担心计划会因此搁浅。2009 年 9 月，我看到了由徐忠良先生拟定的《圆明园图书出版合作方案》，提出备选图书 14 种，准备将其中的 10 种翻译出版，以纪念圆明园罹劫 150 周年。2010 年 6 月，我因公到上海调研，见到了徐忠良先生并看到了刚刚制定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出版方案。列入方案的图书，英文 7 种，法文 9 种，其中两种是伯纳·布立赛先生审阅备选书目后增加的。16 种原著，均由伯纳·布立赛先生提供。期待已久的这套历史亲历记忆译丛终于可以得见了。

《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在纪念圆明园罹劫 150 周年之际出版是很有意义的。法国前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在为伯纳·布立赛先生《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中说：“在法国，我们有我们所称的‘记忆责任’，这意味着必须承认和不忘记过去的错误与罪行，不论它们是他人还是自己所犯的。但愿布立赛此作有助于此种‘记忆责任’，并让人们憎恨战争这一苦难之源。”

《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就是中法两国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践行“记忆责任”的结晶。它不仅可以推动有关圆明园历史的研究，提高人们对圆明园的认识，而且可以推动中法文化交流甚至中西文化交流。遗憾的是，当今世界具有这种认识的人不多。如果“记忆责任”也成为普世价值，世界和平还会远吗？

王道成

2010年8月12日于北京

序 四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由圆明、长春、绮春三园组成，统称圆明园。占地 352 公顷(5280 亩)，其中水面面积约 140 公顷(2100 亩)，有园林风景 100 余处，建筑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是清朝六代皇帝在 150 余年间倾心经营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汇集了全国各地尤其是江南地区的胜景特点，融中国古代造园艺术之精华，以园中有园的艺术手法，将诗情画意融化于千变万化的景象之中。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朝皇帝，都曾长年居住在圆明园优游享乐，并于此举行朝会，处理政事，它与紫禁城(故宫)同为当时的全国政治中心，被清帝特称为“御园”。圆明园的南部为朝廷区，是皇帝处理政务之所。值得一提的是，圆明园中还建有西式园林景区——占地 100 多亩的西洋楼。那是法国传教士王致诚、蒋友仁和意大利建筑师、宫廷画师郎世宁等人按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建筑风格设计建造的，最有名的“大水法”，主体是一座西洋喷泉，还有海晏堂、谐奇趣、方外观、黄花阵等著名建筑。总之，圆明园继承了中国几千年优秀造园艺术传统，既有宫廷建筑的雍容华贵，又有江南水乡园林的委婉多姿，同时，又吸取了欧洲的园林建筑形式，把不同风格的景观融为一体，在整体布局上使人感

到和谐完美。

圆明园不仅以园林著称，也是一座收藏极为丰富的皇家博物馆。园内各殿堂内陈设有难以计数的紫檀木家具，收藏有许多国内外稀世文物。园内珍藏有《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荟要》、《淳化阁帖》等珍贵图书文献。文源阁是全国四大皇家藏书楼之一。圆明园，曾以其宏大的地域规模、杰出的营造技艺、精美的建筑景群、丰富的文化收藏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内涵而享誉世界，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和“万园之园”。曾对 18 世纪中叶欧洲兴起的中国园林热潮，起过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然而，就是这样一座凝结着人类智慧结晶的世界名园却惨遭英法联军野蛮的劫掠焚毁，最终沦为一片废墟！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惨痛劫难，更是人类文明史的空前浩劫。同时，又是中西方两个不同文明的一种激烈碰撞，给中华民族留下痛彻心肺的残酷记忆。圆明园犹如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史册，具有撼人心魄的价值，成为中国人心永远伤痛，也成为了中华志士仁人雪耻奋起的警世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对圆明园遗址的保护。早在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曾明确指出：圆明园遗址要保护好，地不要拨出去，帝国主义把它烧毁，以后有条件可以修复。各级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为积极保护圆明园遗址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1976 年，中共海淀区委、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圆明园管理处。1980 年 8 月，全国著名的建筑、园林、文物、美术专家发出《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并发起成立中国圆明园学会。1983 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正式确定将圆明园遗址整修为遗址公园。1988 年 1 月，圆明园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 年 6 月，圆明园又成为全国 100 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2000 年和 2001 年，《圆明园遗

址公园规划》分别获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批复同意。经过历届党委、政府和圆明园管理处长期不懈的努力，遗址的保护整修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已初步形成绮春园、长春园、福海、九州四大景区，既有浩瀚的大型水面，又有亲切可人的湖泊，更有山水环绕的河溪，保持了水体的天然风韵，又按原有的植物配置，形成了以松、竹、荷、柳为主题的植物景观。近年来，又陆续完成了含经堂遗址的全面考古发掘和遗址保护工程、圆明园唯一残存古建筑——正觉寺修缮主体工程、西部九州景区的保护展示等工作。至此，已经有三分之二的圆明园遗址向社会公众开放。

圆明园管理处作为圆明园遗址的日常管理机构，既是遗址的保护者、整修者，也是圆明园的研究机构和圆明园流散文物的积极寻访者及圆明园历史文化的宣传者。圆明园管理处充分认识到圆明园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多重意义：它不仅具有园林艺术、建筑艺术、历史文化价值，更寄托了全世界华人的一种特殊情感。长期以来，圆明园管理处非常关注圆明园的历史、建筑、园林、文物等基础研究工作，积极支持专家学者开展各方面的研究、考察和学术成果的出版工作，并与专家学者和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电视台、网络媒体结下深厚的友谊。这套由上海中西书局推出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就是圆明园管理处新近支持和合作出版的重要研究史料，并以之纪念圆明园罹劫 150 周年。

中西书局的徐忠良先生，作为中国圆明园学会的学术委员，自 2005 年在浙江古籍出版社工作期间组织翻译出版法国历史学家、著名记者伯纳·布立赛先生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以来，积极关注圆明园，研究圆明园，先后组织出版了著名圆明园历史学家王道成教授主编的《圆明园重建大争辩》和著名建筑学家郭黛姮教授撰著的《乾隆御品圆明园》、《圆明园样式雷研究》等重要图书。他调到上

海中西书局工作后，紧紧抓住纪念圆明园罹劫 150 周年的历史时机，又与布立赛、王道成先生和圆明园管理处以及即将成立的圆明园研究院联手，精心编选英法联军将军、外交官、翻译官、一线指挥官、医官、牧师等关键人物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在英法出版的战争回忆录 16 种，予以公开出版，力求为圆明园研究提供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为寻访圆明园流散文物提供非常重要的线索。

多年来，圆明园管理处积极关注圆明园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积极关注圆明园流散文物的寻访、回归和修复，致力于圆明园遗址的考古、整修和基础研究成果的展览展示。如 2009 年圆明园管理处发起组织的赴美寻访圆明园流散文物信息工作，就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果：发现 400 多张文物照片，寻访到一些圆明园文物，带回一批中西文的圆明园研究资料。2010 年 10 月，正值各界圆明园罹劫 150 周年纪念活动之际，原流散在北京地区，现已回归圆明园内的珍贵石刻文物首次集中向游人开放；持续修复了半年之久的 150 件圆明园文物也第一次向世人展示；我国古代建筑科技史上成就卓著的杰出代表——样式雷图档，真实再现了圆明园的建造史；法中友好协会将向圆明园管理处捐赠第一位痛斥英法联军恶行的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先生的雕像；同时，我们将举办大型主题纪念晚会，通过“文明的对话：梦回圆明”、“世纪的交响：沧桑巨变”、“盛世的复兴：和谐起航”三个篇章来表现圆明园 300 年的沧桑巨变，展示和谐盛世给圆明园带来的勃勃生机；将邀请法国历史学家布立赛和著名近代史学家汪荣祖先生在圆明园遗址前对话圆明园；我们还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一起举办了“勿忘国耻、励志腾飞——中国航天成就展”等活动。

诚如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先生、历史学家布立赛、王道成先生的

序言和中西书局的出版前言所言，我们几方面倾注巨大心力和财力，精心组织编选、翻译和出版的这套第二次鸦片战争亲历者在1860—1932年间或亲笔撰写、或根据战场日记整理、或根据口述记忆笔录的亲历回忆录，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牢记历史教训，还原历史细节，追寻历史真相，实践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先生提出的“记忆责任”；是为了进一步反思历史，倡导和平，营造一个“勿忘历史、倡导和平、憧憬未来”的文化环境；是为了倡导中西文化交流，消除文化理念差异造成的误解，弘扬“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坚决避免圆明园悲剧的重演。

圆明园管理处 陈名杰

2010年10月3日

作 者 序

阅读游记时，我总希望作者能更详尽地描述一切小事情的细节，而不只是对那些明显的事情大费笔墨。虽然这些小细节本身看似无足轻重，却往往能让人把整个事件串联起来，弄清楚大事件发生的原委。在本书中，我尽量做到这一点。不过，有的读者也许会觉得这些细节枯燥乏味。当然，也有读者会感激这些真实而完整的描写。

一直以来，我都希望能结合自己的经验写一部著作，完整地记述这次战役。我认为，最好的方式是按时间顺序来叙述每件事。因为无论删掉哪部分，都会有损记叙的流畅性。

在描述不同事件时，我常常穿插一些奇闻轶事，尽量使描述更加生动。这些轶事奇闻有的是从远征参与者那里听来的，有的是通过与途经之地的居民聊天听到的。

每写完一章书稿，我都原样寄回家。这是最后一章了，但因工作需要，我不能离开中国，因此无法回国亲自将作品交给出版社。有关文字上的错误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原谅。不过，我相信这样的错误和不足并不多，而且无足轻重。

有一点需要声明，在本书中我引用了一些印刷的官方文件或公

开出版的报刊上登载过的有关景色和环境的描写。不过，在所有引用部分我都标明了出处。

1861 年 6 月 17 日于厦门

目 录

出版前言 / 1

序一 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 / 7

序二 伯纳·布立赛 / 9

序三 王道成 / 13

序四 陈名杰 / 17

作者序 / 1

第 1 章

远征准备——广东苦力——华人中间流传的
荒诞谣言——苦力队的衣着——维多利亚不宜居
住的原因——九龙半岛——联军占据舟山岛——
获取运输船的困难——英法运输船事故——自香
港启程——南日群岛——抵大连湾 / 1

第 2 章

大连湾——桑普森顶峰——游历当地村
庄——勘察队——坚固的中国城——辽东方
言——英军登陆——中国人吊丧——旁遮普士兵
和苦力队的掠夺——当地村庄之特征——寻找失
踪军官——米切尔少将和他的参谋部——额尔金

勋爵的到来 / 8

第3章

参观奥丁湾——中国的野味——巴斯达小湾——露宿奥丁湾——军需站——精明的伙食供应商——中国的牲口商——一天的交易——参观锦州城——当地人的敌意——在奥丁湾检阅骑兵队——中国人的贪婪——再次登船——离开大连湾——武力分配——谣传——发给士兵的备忘录 / 20

第4章

水龙卷——第2旅登陆——有如阿可拉剧院的北塘地形——沉闷的露营之夜——第2师登陆——北塘村的景象——劫掠——联军军营——奢华的中国住宅——当地人的悲惨境况——几个要塞的方位——法国军需站——武力侦察——与清兵交锋——一个中国男人的冒险经历 / 34

第5章

进军北塘——与敌军相遇——战斗命令——阿姆斯特朗大炮的威力——清军骑兵的猛攻——攻打顽固的敌营——清兵的勇猛——伤员——敌营一瞥——新河——夜间警报——间谍——塘沽事件——敌军逃散——清军炮兵——军营——大沽要塞——当地代表团——会见恒福——交换俘

虏——中国人对这场战争的看法 / 51

第 6 章

攻打大沽要塞计划——英法将军的分歧——
搭建浮桥——接近要塞——进攻前夜——进军要
塞——进攻之描述——无条件投降——伤亡人
数——清军勇士——大沽要塞之描述——中国伤
员——人种差异——受伤的卖饼伙计 / 71

第 7 章

白河入海口——抵达天津——指派人员视察
夺取的要塞——僧格林沁总部——滑稽的一
幕——沼泽地的居住者——赶集——饶舌的中国
男人——中国的交通工具——大部队前进——驻
营地——中国的村庄 / 86

第 8 章

僧格林沁的策略——天津之描述——科学代
表团——“自己的通讯记者”——中国人的狡
诈——联军行进——地形勘察部——俄国公
使——乡村之描述——杨村——免战白旗 / 106

第 9 章

中国供给委员会——掠夺——露营河
务——谈判——通州会议——设置圈套——中
国逃亡者——清廷间谍——不祥的探险——喇嘛之

墓——中国式猎狐——“黑人王子”——战争的
喧嚣——马头村约定——侦察通州——沃克上校
的勇气——巴夏礼先生的记述 / 123

第 10 章

张家湾镇——肆意破坏财产——被抛弃的中
国女人——从张家湾挺进——再遇清军——龙骑
队的勇猛冲锋——与敌军的多次冲突——运粮漕
河——广东苦力的流氓习气——皇族的纪念
碑——援军赶到 / 138

第 11 章

执拗的清官——旁遮普的信使——恭亲王的
照会——联军挺进——巴夏礼先生的来信——中
国的伊斯兰教徒——露营——清兵逃跑——中国
人的谎言——法军向圆明园挺进——神圣的葬
礼——当地人的友好——圆明园外景——皇宫太
监——圆明园之描述——罕见的掠夺——圆明园
/ 154

第 12 章

巴夏礼和罗亨利两位领事获释——圆明园大
劫掠——英国人对圆明园的洗劫——发现机密文
件——准备进攻北京——安定门投降——释放其
余人质——复仇的心情——遇害人质的葬礼——
额尔金勋爵摧毁圆明园的理由——火烧圆明

园——圆明园及周边环境的总体描述 / 172

第 13 章

额尔金勋爵致恭亲王的信——进攻北京的准备——中国叛军的靠近——城墙周围的侦察——签订条约——通州——奇怪的捕鱼方式——北京之描述——“天坛和地坛”——喇嘛寺——“转经筒”——中国的宗教——北京城的交通工具——中国的单峰骆驼——放鹰狩猎——资源与出产——耕作——北京居民的贫穷——被忽略的教育 / 191

第 14 章

宣布和平——劫掠者——汤普森医生之死——公告——广东苦力——第 2 师撤退——女王的公使——中国陷入混乱——寒冷季节——剩余部队撤离——军队登船——寒冷加剧——战争结果——中国人的自负——快速传递的消息——我们与中国未来的关系——中国的现状——结语 / 212

第 1 章

远征准备——广东苦力——华人中间流传的荒诞谣言——苦力队的衣着——维多利亚不宜居住的原因——九龙半岛——联军占据舟山岛——获取运输船的困难——英法运输船事故——自香港启程——南日群岛——抵大连湾

我获得三个月的假期，便离开厦门，徜徉在广州狭窄的街道上，欣赏雕梁画栋的古老衙门、寺庙和宝塔，尽情享受在那里的时光。一天早上，我接到通知，普鲁斯先生任命我暂时担任霍普·格兰特爵士的翻译官。因此，我乘坐第一班船前往香港。在那里，华北远征的准备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大量船只被租用。军队几乎每天随船到来，士兵挤满了街道，弄得街上仿佛人人皆兵。大批广东苦力被招募，组成苦力队，负责运送部队的军需辎重，此事由坦普尔少校主办。这些广东苦力每个月能领到九美元的丰厚报酬，外加两套衣服和口粮。尽管报酬丰厚，英勇的少校却招不到足够的人手，而招来的又都是一些不良之徒。原来，华人中间流传着一个荒诞的谣言，说是一打仗英国人就会叫华人冲在前面当炮灰，而英军则可以安稳地躲在后面朝敌人开炮，自己则毫发不伤。无论我们

怎么解释，都无法说服这些冥顽不灵的当地人。大多数人都都不相信，我们雇这些苦力只是想让他们做脚夫。被招募来的这帮乌合之众穿着统一的制服，由海军各团委派的军官掌管。他们经常会被拉出来操练，操练时每人肩膀上扛着一根竹扁担。这些更加让当地老百姓深信，“苦力”或“脚夫”这个词只是一个障眼法，用来掩盖英国人的真实目的，即被招募的苦力是去当兵打仗的。说起苦力队的真正用途，除了其中的成员大都是一些社会渣滓之外，其他并不重要。不过，这次招募苦力让香港居民得到的实际益处不可胜数。因为，港岛较为偏僻的地区偷盗团伙猖獗，他们经常打劫居民（包括外国人和当地人），伤害无辜。经过苦力招募，岛上居民立刻轻松地摆脱了他们。一位在殖民地定居已久的绅士告诉我，远征部队离港之后，偷盗事件在这个岛上几乎再没发生过。

在英国人看来，苦力队的制服有点滑稽。他们一律穿着长袍，套着短上衣，却光着脚。上衣的胸前和背后都画着大黑圈，上面印着各自的登记号和连队番号，一条黑线将这两个数字分开。那缠着猪尾巴似的长发辮的脑袋上戴着锥形斗笠，斗笠的正面赫然写着“C.C.C.”字母，即广东苦力队的英文缩写。负责指挥这支怪物队伍的军官大都是从皇家海军陆战队抽调出来的，不过也有一些是从这支队伍中选出来的上士。只要看裤腿两侧的两条窄长白条，就能一眼认出负责该队伍的英国军官。会讲几句英文、层次较高的苦力都被提升为准下士、下士和上士，负责管理他们的同乡。这些被挑选出来的人，根据级别的高低，分别在各自松松垮垮的衣袖上戴着绣有一根、两根、三根白条的三角形袖章。

我属于厦门领事馆，因此必须返回那里接受任命。这个程序费时不多，没过几天，我又回到了香港。我去军事秘书处报到，他立即替我订了一张船票，让我乘坐“闪电”号蒸汽运输船随行，并叫

我去拜访部队军需主任，说他会给我一个钟形帐篷和一些必要的建议。钟形帐篷我按时领到了，至于建议，似乎没什么必要。我登上了那艘蒸汽船，将行李安置妥当，准备即刻启程。

不过，随远征部队去华北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几个月发生的一些事件。

香港的维多利亚港素有世界上最不宜居住地区之一的恶名。紧贴港后巍峨耸立的石头山，将徐徐吹来的南风死死挡在港岛外。夏季，烈日当空，酷暑难耐，即使太阳落山之后，空气中弥漫的那股腾腾热气还久久滞留，数小时都不消散。倘若雷雨过后阳光重现，空气中便很快蒸发出令人窒息的湿气，肮脏的水蒸气悬浮在半山腰数日，丝毫不受习习凉风的影响。因此，数年来，居住在这里的英国人一直觊觎对面的九龙半岛，认为那个地方应该成为英国领地，允许商人们去那里建造别墅。这样，他们在香港账房里度过闷热的白天之后，就可以去九龙享受凉爽的晚风。可是，眼下军队快速集结香港，当局必须在岸上找个地方安置他们。北上进程必定会有延误，让部队滞留在香港港口的船舶上肯定是不可取的。九龙半岛上南风徐徐，大片的沙滩具有双重功效。来自印度的骑兵队的马儿，经过海上长途航行后也可以在这片沙滩上舒展一下腿脚。况且，法国人非常需要这样一个地方，对九龙垂涎已久。在这块繁荣富饶的殖民地上，若有一位如此危险的邻居住在一箭之遥的地方，是对大英帝国利益最大的威胁。仅凭这一事实，也足以加速英国政府攫取九龙的行动。因此，3月，广州领事巴夏礼先生收到指令，与两广总督安排租借尖沙咀，即九龙半岛之事宜。第44团团长麦克马洪则受命指挥特遣部队直接占领九龙半岛。

就在此时，谣言四起，说是法国人打算占据舟山岛。还有人断言，法国人的野心不仅于此，他们甚至觊觎台湾岛。不过，当我们

接到英法已经共同占领舟山岛的通知时，一切谣言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占领行动于4月21日实施。军舰和运输船已转移到了舟山港口。同一天的中午时分，格兰特将军的一个代表团和两位海军上将，在一支全副武装的海军卫队的护卫之下进入了定海府。他们未遇任何抵抗，长驱直入中国军事指挥官的官邸。满清官员发觉抵抗无益，便答应了联军的条件，并参加了当晚在将军乘坐的战船——“格拉纳达”号上举行的会议。占领定海府的方式与当年占领广州差不多。也就是说，部队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外交官则协助满清政府官员安抚当地百姓。从舟山岛的中心位置来看，舟山岛整体环境优越，是军队补给站的理想基地。这里临近陆地，很容易获取大量新鲜的出产。征战北方一旦给养不足，这里可以给军需处提供物质保障，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第99团、皇家海军陆战队的右翼、皇家工兵连和罗顿少校率领的炮兵排炮组在第99团上校里夫斯旅长的指挥下随后登陆。第67团留在船上待命，直到大家都接到北上命令方可动身。只留下第99团的三个连占据舟山。霍普·格兰特爵士及其参谋部将领之后去了圣地普陀岛——佛教僧侣和信徒们最喜欢的地方，这个地方因其异常优美的环境而著称。将军本想把闻名遐迩的普陀寺改造成一家综合医院供士兵使用，不过他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

运输仍然是一个困难问题。辎重队要想有效地开展工作，就必须拥有大量可运输军需辎重的牲口。于是，军队开始在厦门、广州、马尼拉等地到处搜罗马匹，为这些最没用的畜生付出的高昂代价令人咋舌。不过，为了感谢厦门的英国领事从当地送来的110匹马，在此我必须补充一句，厦门送来的马匹最棒。军队还派遣专员到日本去购买马匹。

正当部队准备出发之际，皇家舰队的蒸汽运输船“援助”号惨

遭不幸。它在离岸五十码左右的地方向前行驶，触到一块暗礁沉没了。据说，船上至少有价值一万英镑的军用储备被毁或损坏。法国人更加不幸，继漂亮的蒸汽运输船“伊塞尔”号在厦门港附近触礁沉没之后，另一艘运输船“快帆皇后”号又在澳门岸边起火失事，船载的法军所有冬衣及六百吨煤炭尽数焚毁。

“究竟是战是和？”每个人都想知道，但没有人知道答案。最后通牒已由上海道台呈递北京政府，答复由广州的叶（名琛）转交西马廉上将，笔调有些傲慢无礼，大意是他们希望对一些条款进行磋商。至少，听说是这样的。无论清廷作何答复，都不能让英法政府满意。仍然没有公开宣战。一切都取决于额尔金勋爵以及他将给出的建议。就在这种怀疑和不确定的情况下，北上的命令终于下达了。接到命令时，我们都欢欣鼓舞，因为大家都厌倦躺在香港口岸、暴晒在6月的骄阳下无所事事的生活。

6月9日，“闪电”号绕道至香港岛另一面的深水湾，拖带“天狼星”号后沿海岸前行。“天狼星”号上承载了帕特尔准将和55名女王卫队龙骑兵及他们的坐骑。与我同船的人大都是格兰特将军参谋部的军官，因为“格拉纳达”号装不下他们。我们是一个奇怪的群体：彼此间有一种陌生英国人之间经常存在的厌恶感，但同时每个人又都非常清楚各自的职务和位置。总之，我们之间有种不愉快的感觉。

海面风平浪静，航海生活单调乏味。6月11日，我们的注意力才被转移。这一天，海面被一层铁锈色的雾霭笼罩，成群结队的小型大西洋鼠海豚不时浮出海面，欢快地游向南方。水手告诉我们，铁锈色的雾霭和大西洋鼠海豚的去向表明要从背面吹来大风。果然，这股暴风第二天就袭击了我们。海面上的“铁锈”飘过头顶时，我们忍不住用水桶装了一点倒在甲板上。原来，这铁锈由无数

的细小微生物组成，形成两头尖尖的微型蠕虫状，不过蠕虫们几乎没有活动的迹象。此外，有一些呈微小动物的模样——烟灰色的小发球——后面带有尾巴样的附属物，与微型子弹一般大。

风越刮越猛，拖着“天狼星”号前行艰难，于是船长作出明智决策，去南日群岛避风处躲避。我们发现，另外几艘北上的船只也停靠在那里。我们在这个令人愉快的停泊点一直逗留到 16 日。因为我们经常上岸闲逛，所以对这个地方作点评论，也许读者不会认为毫无干系，毕竟这个地方人迹稀少，所以鲜为人知。

与我们停靠在一起的船只上有些锡克骑兵，因此必须派这些印度马夫上岸寻找马料。正如大家预料的，这些“贵族”没什么教养，分不清你的和我的，因此对于他们偷盗当地人的新鲜出产或是打伤当地人的悲惨故事，我们一点也不奇怪。但是，当地人看见他们那个一直冷清的港口突然停靠了这么多的船只，感到非常害怕。从群岛的地理位置来看，他们的恐惧让我们对原先的计划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设想。

南日岛是南日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坐落在台湾海峡的中国海岸，离兴化城不远。我们停靠在南日岛的南面。岛屿周长约 12 海里，一条淤泥沟渠差不多将其一分为二。岛屿与一片沙滩相接，岛上的石头山隐匿于大海。岛屿两面是连绵起伏的群山，山体大部分都由被分化的灰白色花岗岩构成，石头中间偶尔出现一些黏土，与对面中国海岸的地貌一样。岛上的自然植被非常稀少，除了隐匿在半山腰山缝里的几棵矮桃树和野生梨树外，岛上几乎没有一棵树木。为数不多的可用之地被当地人用来种植农作物。沙质的土壤在恶臭粪肥的改善下倒也生长出水稻、落花生和一些其他作物，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即使对中国海岸不太了解的人也能看出，当地人并不靠这些农作物维持生计。他们表面上是渔民，实际上却

是海盗。我很少见过比他们更肮脏、更邋遢的人种。他们方言中的一些词语听起来跟厦门话很像，但大部分都不同，可能更接近兴化话。不过，我们还是设法让他们听懂了我们的中文。

6月16日，大风减弱，我们重新起航。

为了赶上先头部队，我们卸下拖在后面的“天狼星”号，以大约十海里的加速度向行驶。我们行驶到看不见陆地的海域时，突然看见一只赤背小鸠鸽正跟着船在空中飞翔。它绕着我们的船飞翔，又立即飞到后面去追逐我们的航迹，直至从我们的视野消失。几分钟后，它又飞回来，立刻赶超我们，在船头上空掠过，随即又消失在远处。这只小鸠鸽就这样飞来飞去，足有二三十次之多，直至最后完全消失。如果说我们以每小时十海里的速度航行，这只小鸠鸽要用多快的速度才能赶上我们呢？况且，在这许多次迅速而又疲倦的飞翔之后，它仍然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力气飞回岸上，不需片刻的歇息，多么令人惊叹！

6月21日傍晚，我们抵达大连湾，这其中没有什么值得叙述的事件。已有许多船只齐聚此地，消息传开后，很快就会有许多人来拜访和探询我们。大连湾的新鲜空气实在令人心旷神怡，与我们刚刚离开的那个“蒸汽熔炉”完全不同。然而，部队急需饮用水。我们只发现为数极少的几条溪流，而且附近村庄里水井少得可怜。刚刚登陆的几支军队，在皇家工兵连军官的指挥下立即动手挖井。每天都有许多船只抵达，如果不能立即解决饮用水供应问题，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已迫不及待要上岸了，因为我很想了解当地人的生活。我曾听说这一带的老百姓大都是满族人，而非汉民。

第 2 章

大连湾——桑普森顶峰——游历当地村庄——勘察队——坚固的中国城——辽东方言——英军登陆——中国人吊丧——旁遮普士兵和苦力队的掠夺——当地村庄之特征——寻找失踪军官——米切尔少将和他的参谋部——额尔金勋爵的到来

大连湾，被选定为英国远征军溯白河进京之前的一个集合点。这个地名只在某张耶稣会传教士的地图上出现过，至于它是怎么被用来称呼辽东半岛最南端这个美丽的海湾，至今仍是一个谜。当地人迄今为止对此也是一无所知，每当我跟他们谈起这个话题，他们都会爆发出阵阵大笑。有些人把这个词解释为“连在一起的许多海湾”，而有些人则把它解释为“环绕海湾”。至于中国人到底明不明白这个名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并不重要。值得一提的是，大连湾是一个可以停泊大量船只的良港。它面朝东南方向，南北海岸线约九海里，东西海岸线约十三海里。入口处约十二海里宽，点缀着三个小岛。刮东南风的季节，这些小岛能有效地牵制翻滚的怒浪。海湾两岸地貌凹凸不平，形成许多小型的附属港湾。以提供船只泊位的多少及适合远征军登陆位置好坏的标准来看，最重要的附属港当属

位于东南面的维多利亚湾、并排坐落在东北面的横湾及珍珠湾、距南面几英里处的奥丁湾，以及位于珍珠湾及奥丁湾之间的巴斯达小湾。西面和东北角的陆地成一个缓坡延伸至大海，海岸的其余部分大都是陡峭的岩石地带。大连湾由两个长形半岛构成，这两个岛向两侧延伸至海港入口处又会聚起来。海岸上的岩石主要由分层石灰岩组成，用地质学家的术语来说，属于“变形地层”，石灰岩上到处可见大块的石英石。平原地带的村庄里或周围有零星可见的小树，除此之外，没有树木生长，但小山却显得郁郁葱葱。我攀登到半山腰，不小心踩到一株可爱的石竹花，一伸手又抓住了一枝开满大花朵的蔷薇藤，鲜艳的色彩让人赏心悦目，甜美的芳香沁人心脾。我禁不住欢呼：“这真是一个让植物学家开心的地方！”我终于爬上山顶，自豪地俯视山下懒洋洋沉睡的漂亮船队。海湾的水面风平浪静，波澜不惊，偶尔有几只小船急速来往，除此之外，没有一丝生命的气息。从海湾背水侧溪谷的灌木丛中传来布谷鸟温柔的鸣叫，那叫声如此熟悉，令我想起了童年的时光。我不禁开始思考此次远征的目的。我的祖国被羞辱，荣誉受损，为此那些飘扬的桅杆雄赳赳前来复仇。想到未来将发生的事，我忐忑不安。突然，“扑棱”一声有东西从我身旁掠过，打断了我的白日梦。原来，一群觅食归来的野鸽打破了我的孤寂——这是天色已晚的迹象。太阳已经下山了，雨燕在我头顶上空盘旋，发出焦虑不安的尖叫，似乎在说：“是到了收起你冒犯的脚步，给我们在岩石缝里留出一块清静之地的的时候了。”

坐落在东北方向的一块平原上，矗立着一座巍峨的高山，海拔约两千多英尺，超越群山之巅，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座山被命名为“桑普森峰”，不过它的中文名字叫“大黑山”。

三位将军中，至今只有约翰·米切尔少将到了大连湾。我是第

一个抵达该地的随军翻译，因此我去拜访了将军，为他提供帮助。我们在小山上和几乎没有人烟的村落里漫步，以此自娱。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做伴，翻过一座小山。我们正要从另一面下山时，看见一只猪正在山下一块隐蔽的地里偷吃庄稼。它独自在远离村庄的地方，加之猪毛甚长，根据这些事实我们断定，那是一只野猪幼崽。我们悄悄地走下山，不过那小家伙已经发现我们，跑到半山腰，躺在一块凸起的大岩石下舒服地伸起懒腰。我们俩商量如何捕获它，最后决定，由我悄悄地走过去给它一枪，因为当时只有我随身带着枪。可是，这畜生太狡猾，还没等我们拐弯，它就跑了。回去时我们经过一个小村庄，村庄里的房屋脏兮兮的。不过，从远处看，散落在村里的几棵树倒是给村庄增色不少。一个邋遢的村民站在一间茅舍前，他不是满人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汉人。我跟他搭话，对我能够讲一口流利的“天朝”话，他非常惊讶，说了几句表达惊奇的话后，他就开始抱怨，说是有脱离队伍的士兵闯进他的房子，把他收藏的珍贵瓷器全部砸得粉碎。我问他，是否能够指认搞破坏的那些人。可是，他说不能，因为当时他不在家。于是，我告诉他，我们刚才在山上看见那只野猪。他笑了，说那是他养的家猪，因为听到从船上传来的枪声跑出去了，还没有回家。我不太相信他的话，不过后来我发现这一带的猪都长着长长的毛，看上去好像是被驯化了一半的野猪。听我们的海军说，在满洲里的海岸上，经常能看见野猪群。

6月27日，我被邀请陪同格雷特黑德少校率领的一支勘察队前去海湾的源头。我们由两名军官指挥的第31团50名士兵护卫，乘坐皇家海军舰队“坚定”号中的三只小艇，早上6点钟左右出发。清晨的海面浓雾弥漫。不过，在我们快要靠近狭窄的港湾入口时，缓缓升起的太阳驱散了迷雾。勘察队就在此处抛锚。入口左岸矗立

着一块大岩石，岩石的顶部平坦光滑。我们爬上这块岩石，其他人忙着执行此次航行任务，我便在岩石上四处溜达。岩石面向大海的一面嶙峋陡峭，与正对面一箭之遥的高山一样险峻。这些岩石的裂缝和凸缘，为许多经常出没于石头山的鸟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一群寒鸦已经在这个得天独厚的地方安了家。我们站在山顶观看脚下有趣的风景。约六十英尺以下，汹涌的海浪时起时伏，顽皮地拍打着岩石山脚，白腹寒鸦紧张忙碌地为雏鸟喂食。雏鸟不断地发出尖叫，快要长大的幼鸟则不顾危险冲到凸缘边上，迫不及待地地上前迎接母鸟衔来的那一口食物。它们很快就发觉了我们，鸟巢里一阵恐慌：母鸟冲出鸟巢，聚成一群，在我们头顶上方盘旋，发出谴责的叫声。岩鸽也在对岸被海水冲刷成黝黑的岩石洞里找到了住所，因为我们看见从附近飞来的岩鸽快速飞过我们身旁，消失在一个石灰石大山洞漆黑的深处。

从大岩石上下来，我们登上船继续航行到海湾的源头，在一块紧连着泥滩的沙滩上了岸。附近几个村庄的村民立即簇拥在我们四周，确定他们没有恶意后，我们走进村子，前往一座小山。站在这座山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四面城墙环绕、约有七千居民的锦州城。可是自从我们的船只抵达大连湾之后，锦州城里的人口大大增加，因为许多村民出于恐惧而逃往那里躲避。有人告诉我们，城墙的高度相当于16门大炮的长度，由副都统率领的官兵把守。地方行政官是一个巡抚。锦州城静静地坐落在气势恢弘的直隶湾沿岸，繁盛的草木让这座城市显得相当漂亮。这里的村庄都以屯（或称前哨）的形式编排，有需要的时候，所有村民都可以充当士兵，在村长的指挥下组队。毫无疑问，这是为了抵御多年来一直在中国海域作恶多端的倭寇。不过，自从倭寇被赶走，不再到处侵袭百姓，这一带的中国人就不再害怕来自海盗的袭击了。尽管如此，他们的

“黄铜武器”还没有“束之高阁”留作纪念，因为我们在许多人家发现长矛，虽然都已经锈迹斑斑，但是一旦刺入你的胸膛，它就不再是一个好玩的东西了。每当问及他们用这些长矛做什么时，老百姓总是说，他们用长矛来赶杀那些偷吃家禽的野狼。

辽东省分三个辖区，由三座带护城墙的大城管辖，这三座城分别是金州、开州和锦州。按条约《天津条约》规定开放的牛庄港口就坐落在金州城。大连湾所在的整个小半岛上的居民都是从山东和山西移居过来的，从村子的大小和村子周围树木的高度来看，我们估计这些移民到这里的时间不会超过一百年。那些据说一直居住在这个省的游牧部落——满族人，可能在内地也能找到，不过从当地居民口中，我们打听不到任何关于他们的消息。大连人的普通话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而且经常使用晦涩难懂的词语。然而，有个翻译官居然认为，这个地方令人头痛的方言是最标准的普通话。为了证实他的观点，他第一次带几个朋友上岸时，走到一个村民跟前，用他一直引以为豪的、优美的北京腔对这个村民长篇大论了一番。这个村民非常认真地聆听，最后摆了摆手喊道：“不懂。”到现在，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不懂”的意思就是“我不明白”。这个翻译非常尴尬，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把怨气都撒在那个不幸的村民身上，说人家是个笨蛋。

我们尽力说服村民把他们的新鲜出产卖给我们，但他们非常胆怯，害怕这样做会被杀头。他们总是指指城镇方向，然后用手指划过喉咙，做抹脖子状。然而，万能的金钱确实是一个具有诱惑力的东西。我们回到船上，便发现有人拿来一些上好的供应品等着我们。

28日，我高兴地得知，格兰特将军派我去第2师将军罗伯特·拿皮尔少将的参谋部。第二天，“英培拉特莱兹”号安排好了我的

岗位之后，便起航横渡奥丁湾，到那里去接将军上船，随后又去横湾。第2师大部分的船只都停泊在那里。横湾有一片上好的斜面海滩，可供部队登陆，但是这里很难找到饮用水。因此，有人建议第2师的一部分船只在这里登陆，其余的到远处的珍珠湾登陆。但是，这个安排操作起来非常困难，所以霍普·格兰特爵士最后决定，第2师全部都在珍珠湾登陆。

米切尔将军率领的第1师于同一时间在对面的维多利亚湾开始登陆。骑兵旅和炮兵连在克罗夫顿旅长的指挥下，从奥丁湾登陆，那里山上的小溪流可提供丰富的水源。拿皮尔将军也开始率领他的部下登陆。他认为上岸后需要翻译官，所以命我在他登陆之前的几天先上岸，这样我也许还能派得上用场。

与此相反，霍普·格兰特爵士和他的参谋部一直待在停靠维多利亚湾的“格拉纳达”号上。每天，有一艘小蒸汽船从那里来往于各个海湾之间，向部队各个分支传达将军的命令。海军总部也设在维多利亚湾，这样海军司令贺布上将^①就有机会向舰队传达他的命令。琼斯上将——乘坐皇家海军舰队“因佩里尤斯”号——将他的营帐驻扎在巴斯达湾不远处，辎重队的马匹在那里能找到一个阴凉的歇息地，实际上那个地方不大，只是因为有几个池塘而受欢迎。

第2师的驻营地在一块开阔的平地上，附近有几间闲置的房屋。我非常幸运，从村长那里租到了一间，并于7月7日入住。这间房屋原来的主人是一个蓝布染匠，因害怕远征军，逃跑了，丢下那些装满靛脚子的大染缸，任由进入这房子的人处置。几个厨房用的大水罐，在门口一字排开，里面也都装着半罐的液体染料。房屋非常简陋，只有两个房间。大的那一间似乎一直有人居住，它一定像童

① 贺布当时任少将之职，但本书原文为上将。下同。——编者著

谣里补鞋匠的货摊一样，可以满足染布匠的许多需求。隔壁那间摇摇欲坠的小房间里存放着两口大棺材——那是它的主要功能。也许染布匠当初打算，等老天爷来向他讨债时——每个人都欠的债——他可以用其中的一口存放自己的尸骨，而另一口留给妻子。这一带的山上长满了一种靛色植物，但是这些染料却是从南方买来的。

我们想租用村长自己的住宅给苦力队居住，但他说暂时不能租给我们，他的兄弟住在里面，他因抽大烟已经奄奄一息了，最好等他的兄弟死了再说，到时候他会帮我们安排妥当。当天下午，村长的兄弟死了，而且已经入殓。家里的人都穿上白色的丧服，围住遗体撕心裂肺地痛哭。村长一见我们，就抹着眼泪走出来，开始跟我讨价还价，想要一点木材。不过，最后他觉得结果不满意，便回到他原来的位置，重新给死者吊丧，眼泪又哗哗地从他的脸上留下来。死者是一个秀才，依照他的身份，家里人给他戴了一顶官帽。他们为死者烧了一辆纸做的马车和几匹纸马，用它来接死者的灵魂回老家，空中劈里啪啦的爆竹声是用来驱赶死者的魂魄，以免祸害活人。

最后，我们终于拿到了这间房子的租约，同时还在第 17 旁遮普团驻营附近租了一间房屋给他们作医院。军需处已经找到了仓库，待将军登陆时，一切都已就绪。然而，我们很难从当地人那里获取新鲜物资。起初，还能买到许多家禽，可是后来只有零零星星的牛和羊送过来。原来，奥丁湾军营购买老百姓的东西出价比我们高得多。村民们为卖个好价钱，都绕过我们的营地把家禽拉到那边去了。

将军把他的帐篷扎在半山腰的一个中心位置，站在那里可以把整个师的情况尽收眼底。

被提名为宪兵司令的第 3 团上尉孔和我住在一起。苦力队和旁遮普士兵是经常被人投诉的对象。他们到处抢劫，不过一些有益的

惩罚加上严格的管理很快就让他们服帖了。尽管当地人给我们提供新鲜出产的速度迟缓，但他们很快发现英国士兵找不到水喝。不过，还好，没过几天，就有人把水拿到军营里来兜售。我们贴出中文告示，警告当地人，但是毫无成效。宪兵中士手中的藤条是唯一有效的解决办法。

苦力队的成员大都吸鸦片上瘾，这成了另一投诉的主题。毫无疑问，指挥苦力队的年轻军官已经听说鸦片对军纪会产生非常有害的影响，而且会让人精疲力竭，所以他们觉得有责任要求将军禁止这东西在苦力队里自由流通。他们希望我能够立即制止当地人把鸦片运入军营，可是不幸，禁令完全被忽视。鸦片以某种方式在苦力之间流通。有时候，你会看见他们整天躺在营地里吸食鸦片。我们的人，就像许多其他好心的慈善家一样，已经忘记了他们嗜食鸦片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很难改掉。一旦没有了鸦片，不但不能让这些人精神抖擞地去干活儿，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适得其反：长期抽鸦片的人一旦停止就会慢慢消瘦，最后死去。

既然部队都已经登陆了，一切进展顺利，那我们就离开营地一会儿，随便到附近某个村子里去散散步。我爬上一个小山坡，看见远处的一个小村庄。村里一排排的小屋依偎在一行行的柳树和榆树中间，多么漂亮，多么温馨啊！村庄周围是麦田和玉米地，郁郁葱葱，生机盎然。放眼向海边望去，一片漂亮的牧场映入眼帘，一群牛正静静地牧场吃草，牛群中间还夹杂着几匹马和几只绵羊。通往村子的大路上，几头高大的牛拉着一辆装满高粱秆子的大车慵懒地往前走着。我几乎能够想象出，赶车人快要回到自己幸福的家园时，幸福地哼着小调的样子。

现在，我们再靠近村庄一点。牛车晃晃悠悠地撑着两个轮子笨拙地往前走，我立即赶上它。拉车的牛高大瘦弱，辛苦的劳作

已使它们疲惫不堪。赶车人长着一张扁平的大脸，双眼斜视，盯着我们，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我用尽量标准的中文问他村庄叫什么名字。他摆了摆手，朝营地方向指了指，等于说，“你们没有权利超越界限走到这里来”。我们没理会他，走进村子。村里的大道尽管修得不太好却非常宽敞，路上的车辙让道路看起来很亲切，可是道路两旁的房舍破旧不堪。用石头和泥巴搭建起来的房屋看起来非常牢固，房顶上铺着用泥巴和碎草糊住的高粱秆子。每幢房屋前都有一个脏兮兮的院子，院子被简陋的石头墙围着。说是石头墙，其实只是一些石块堆在一起，并没有经过垒砌。大部分人家的院子里都堆着奇臭无比的污粪，生猪和家禽满屋子乱跑。不过，也有几个稍微有点修养的村民家的院子是小花园，其中家养的蜀葵是里面最珍贵的花。看看那些衣冠不整的邋遢妇人，穿着蓝色棉布的短袍子，头发蓬乱着，跣着小脚朝远处蹒跚而去，听见我们的村民朋友叫她们为“娘儿们”时，你一定会很惊讶。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穿着蓝色大褂，手里拿了个烟斗，冲我们微笑。走，我们过去跟他聊聊，顺便瞧瞧他家里的境况。他家的房屋有两道门，外面一道只是一扇屏风，用来抵挡夏天烈日的照射。里面那道是一扇折叠门，门的每一片折页是靠门轴而不是合叶连起来的，密封性非常差。所以，它实际上只是个摆设，根本抵御不了冬天的寒冷。窗户都是木制的框架，糊着窗纸。窗户横切成两半，上半部分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用一根棍子撑着打开。屋里铺了地板，墙壁糊了墙纸，但都被烟熏得灰暗。屋子一边有个2.5英尺高的泥巴台子，占了房间四分之一的面积，墙上的灰尘就是从那儿来的。因为泥巴台子下面放着一只火炉，供房间取暖用，火炉上有个出口通往房间，弄得房间里乌烟瘴气。不过，即使是在最体面的人家家里，有一点烟也算不了什么。房间里摆放着几

张笨重的桌子和椅子，样式过时，非常难看。屋子一个角落里堆着生稻谷，另一个角落则堆着一捆捆的大蒜。墙上贴着红纸，纸上写着祈求四季长春、家庭康乐幸福之类的祝福语。我们的这位中国朋友点燃了他的长烟斗，自己吸了几口之后，递给我，让我尝尝。我谢过他之后，点了一根雪茄。转身离开时，我不禁感谢上苍，让我拥有一个与这个中国人不同的国籍。

7月12日，我被叫去陪同将军属下的两位军官寻找拉姆斯登和戈登上尉的下落（前者是第2师军需处总军需官，后者属于马德拉斯工兵连）。从维多利亚湾过来的途中，他们俩乘的船翻了，恐怕已经溺水了。我们刚出发就听说拉姆斯登上尉在海里游了几个小时后获救了。但是，大家仍然非常担心戈登上尉的安危。我们看见拉姆斯登上尉得到精心的照顾并被送回营地，便继续出入不同的海湾，寻找另一位失踪军官的下落，并宣布凡找到这位军官的人，无论死活，都会给予犒赏。我们到维多利亚湾军营附近搜寻时，已经2点多了。我们已经行驶了三十多英里的路程。但是，由于马儿上岸的时间不长，还不适应长途跋涉。我们每到一个村庄都向村民问同一个问题，因此直到半夜才抵达第1师的驻扎地。尽管已经很晚了，但是参谋部的几个人还是前来迎接我们，并且听到另一个上尉还活着的好消息。我们都很累，所以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他们提供的住宿。第二天一整天我们都在第1师，所以有足够的时间到处看看。米切尔将军和他的参谋部都驻扎在一块围起来的空地上，营地在一些高大茂盛树木的庇荫之下。他们所有人都混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从他们彼此之间的友好交谈和将军对手下军官的包容，很容易看出，在这样的时刻，将军喜欢手下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家长而非一位严厉的指挥官。士兵都驻扎在空旷的田野，大风刮起的尘土飞进他们的钟形睡袋，让他们非常不舒服。树篱中间有一条宽敞的大

路，随军专业摄影师毕托在路上的一个大土堆上搭起了舒服的营帐。搭建在大路两旁的是宪兵司令的帐篷。随军翻译官吉布森先生住在一个中国人的房子里，和将军一起用餐。这边的村民似乎比我们那边的村民更胆小，不敢给他们供应新鲜物资。所以，这边军队的物资，主要靠驻扎在奥丁湾的军需处供给。这边的村民甚至还带有一点敌意。有一次，步兵连的几个军官闲逛到一个非常偏僻的村庄，当地老百姓居然敲锣打鼓地跑出来，拿着长矛把他们赶走了。第二天，将军派了一小队士兵，缴了他们的锣鼓，并警告他们放规矩一点儿，否则他们会受到更糟糕的待遇。

我们待在维多利亚湾期间，一位曾企图杀害海军上尉哈德森和“列文”号炮舰副船长的海军陆战队员，在那艘炮舰的横桅上送了命。

休整一天之后，我们骑马回到了自己在珍珠湾的营地。

拿破尔将军派人来叫我，他很不安，因为听说军需处无法给士兵供应新鲜蔬菜，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军营边界地之外开设一个集市，如果我能为那边去看看是否一切进展顺利，他将非常感激。我立即动身去了现场。我们在那个地方建了一个外驻警戒哨，负责管理集市上的事务。将军派了一个负责集市的中士和一个宪兵中士协助我。很快就有大量的蔬菜流入集市，事实上，最后多到军需处都不知道如何处理那些蔬菜了。集市离营地大概两英里，不过它完全符合我的要求，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在空闲的时间拿着枪去打鸟儿，或者到附近去寻找一些植物。集市上总是可以买到家禽、鸡蛋、牛，有时候也有羊，所以每天的生活里都不缺少讨价还价的事儿。

6月29日，额尔金勋爵抵达上海，听取并回复了商人们的请愿书。之后，他便乘“翡洛翠”号赶往大连湾，并于7月9日抵达。

他的鼻孔里呼出战神的气息，为此全军都非常高兴。第二天，总指挥官霍普·格兰特爵士乘“格拉纳达”号去芝罘岛参观法军的营地，并与蒙托邦将军共商即将到来的战争大计。

第 3 章

参观奥丁湾——中国的野味——巴斯达小湾——露宿奥丁湾——军需站——精明的伙食供应商——中国的牲口商——一天的交易——参观锦州城——当地人的敌意——在奥丁湾检阅骑兵团——中国人的贪婪——再次登船——离开大连湾——武力分配——谣传——发给士兵的备忘录

奥丁湾和巴斯达小湾这两个地方我还没有去过，而军队很快就要上船起航，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了。因此，在一个晴朗的下午，我让两位好心的中士看管集市，自己扛上枪，沿着山上一条蜿蜒的小道出发，放弃了通往平原村庄的偏僻小道。这些山上，就如我之前描述的一样，没有一棵树木，而且野味少得可怜，可能压根儿就没有——至少我没有看见过。有人曾在这一带打过几只野兔，他们还给我看过其中的一只。我看到的那只野兔，除了耳朵稍微大一点儿、长一点儿之外，跟普通的中国野兔没有什么区别。我独自翻山越岭，走到一个拐角处，突然惊起一只大雕枭。它立即扇动翅膀，向山谷缓缓滑翔而去。最后，我走进蜿蜒在群山之间的一条长山谷，发觉野兔的足迹，便沿着足迹一路追踪，巴斯达小湾突然映

入眼帘。我必须承认，那真是一处美丽的风景。群山之间空隙狭窄，山谷里长满了低矮的柳树和截头木，越过这些树木就能看见山脚下锥形的帐篷顶，营火中飘出来的青灰色烟雾卷曲成漂亮无比的螺旋线缭绕上升至山腰。远处深蓝色的海湾水面停泊着战舰和运输船。没有任何东西打扰这梦幻般的景色，只有成千上万的喃喃之语随柔和的微风飘入耳内。这景色，仿佛不是真实的，而是一幅立体的山水画。

我离开这个美丽的地方，继续翻越山谷，来到面对奥丁湾的平原。军队的营地就在这里。我和一个勇敢的龙骑兵搭话，问他军需处在哪里。他重复了一遍我的问话，好像不太明白，随即指了一个地方，等我走到之后，才发现那是一个集市。我四周看了看，发现一个手上戴着羊羔皮手套的龙骑兵军官正在帐篷前看书。我走过去，向他打听军需处的位置。他指给我一排房子，“军需处”几个白色大字赫然写在这排房子的后面。房前的院子里和房子里面都堆满了供给大部队的必需品。军需官塞尔旺达斯先生与他的翻译官——宁波领事阿代金斯先生——住在其中一间屋子里。这两位军官通过共同的努力，成功地为整个部队提供新鲜物资。毫无疑问，他们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塞尔旺达斯先生的精明能干。他总能把足够的现款弄到手，这样，他就能向当地老百姓证明，自己是个说话算话的人。他制定的价格比老百姓之间的交易价高出许多，但是比岸边那些地区的价格要低。他通过高价把老百姓吸引到他的营地，从而为军队提供新鲜食物。然而，其他的军需官认为，当地老百姓漫天要价，拒绝支付，以为这样是节约，实质上这样让政府开销更大了。因为物资缺乏，政府不得不派人到舟山和上海去收购牲畜。其中，大多数的牛不是死在途中，就是瘦成皮包骨，最后充其量只能做韧牛肉。阿代金斯先生竭尽所能派人到附近村庄里四处收购家

畜，他的付出得到了丰硕的回报。一头头的牲畜——通常是以 190 头为交易数量——被赶到军需处门口来卖，真是让人开心。交易的任务便落在翻译官和屠夫身上。后者的工作就是估算平均每头牛大概能出产多少斤牛肉，而前者的工作就是砍价。通常，牛肉的价格每磅不到 5 便士。绵羊和山羊是 2.5 美元，或者，绵羊每头价格为 12 先令 6 便士，而山羊是 1 美元，或每头 5 先令。购买这些送过来的牲畜时，讨价还价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常要花上整整一天。这里的牛比中国南方的小黄牛肥壮多了，有些大牛能产出五六百磅牛肉。绵羊则与上海买到的一样，鼻子高高，毛发粗糙，尾巴宽大。这里山羊的大小适中，只是背上长出来的羊毛长长地耷拉在身体两边。牲畜的价格一旦敲定，就会写在一张纸条上递给主人，拿到纸条的主户便站到一旁，让位给下一个人。待所有牲口成交之后，每人手里的纸条都要交上去，军需官再按上面的金额付给他们现金。集市上的家禽和蔬菜，在军营的伙食管理员和船员中间非常畅销。

克罗夫顿准将的营帐驻扎在一间寺庙里，散落在香炉顶上和佛像脚下的纸张和公文包显得有些奇怪。神像是用粗制滥造的木头和泥巴铸成的，上面抹着油漆，与中国南方的神像相比，做工上差很多。

奥丁湾营地的几位军官带着一名翻译前去锦州城参观，结果城门紧闭，一些手持火绳枪的官兵在城墙上奔跑。他们几个人要求进城，但遭到拒绝。随即城里派了一个头衔很低的官员出来，问他们有什么需要，他们说只是想进城看看，这个官员便领他们几个人来到城墙外的一间屋子里，用茶水和糕点盛情款待。几天过后，这位官员回访。他乘坐一辆乡村封闭式的二轮马车，带了几个仆人前来，都没佩带武器。假使将军当初捍卫我们进入锦州城的权利，那

将大大有利于我们与当地老百姓之间的交易，因为当地百姓总是担心我们撤离之后的情况。与清廷官员见几次面，给他们施加一点压力，可能会让事态有不同的发展。然而，总司令官有不同的想法。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对待当地百姓，我们都是以礼相待，有些情况下甚至非常客气。然而，我们的人逛到离军营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当地人就很有可能用石头砸或者用武力威胁他，而且这些粗鲁的乡民根本不理睬我们好意的声明。中国人对于他们自己政府官员的欺压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对他们冷酷一点，效果反而更好，客气只会被他们视作软弱。

来奥丁湾卖东西的人通常都是从内陆远道而来的，大多数都是男人。他们不仅面临着被政府官员压榨的可能性，而且途中经过一些村庄时，仗势欺人的村长还会敲诈他们；而一些游手好闲的人，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躲在他们路过的地方，抢劫他们的财物。因此，为了避免成为这些人的猎物，他们通常都绕远道回家。

7月13日，“福尔班”号载着法国海陆军总司令到了大连湾。同一天，在额尔金勋爵和霍普·格兰特爵士的陪同下，法军总司令在奥丁湾检阅了骑兵队。法国军官坦言，他们非常高兴看到国王卫队龙骑兵、费恩和普罗宾率领的骁勇的骑兵们。当天晚上，“福尔班”号便起航去了芝罘岛，额尔金勋爵乘坐“翡洛翠”号一同前往。

总司令建议将奥丁湾作为部队的物资补给站，因此，奥丁军营开始匆匆进行土木工事。以下是留守奥丁湾后备部队的详细名单：第99团，包括19名官员和579名士兵；第19旁遮普团，包括8名英国军官、10名旁遮普军官和453名士兵；6门大炮，100名炮兵。

我在奥丁湾过了一夜，第二天便回到了第2师的营地。我离开本部营地的时间虽然不长，大家却很想念我这个翻译。将军有几件事情要我去解决，宪兵司令的警卫室里关了满屋子的中国囚犯。

我们重新登船起航的时间迫近了。总司令视察了每个军营，觉得士兵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非常好。逗留在这个舒适的海滨期间，骑兵和军官们的坐骑也都长得膘肥体壮。法国军队登船准备有些滞后，不过他们已经敲定了进入直隶湾的日子。我们召集了各村的乡绅，通知他们军队要离开了，对于军队给老百姓的农作物造成的损失，他们可以索赔。我师拿皮尔将军把这事儿交给我处理。因此，一群村民把我团团围起来。我陪他们到几块地里去考察了一下，让他们估算大概的损失。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提出他们的要求，待所有数据写到纸上，我才发现村民索赔的数量达到七百美元之多。我把这份材料交给将军，说这些村民上报的损失数字高得有些荒唐，根本就是漫天要价，建议将军最好最快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给他们。一方面，我们对他们已经很客气，对于他们卖的任何东西都给出很高的价钱，所以他们不应该再指望其他的补偿。另一方面，对于损失的庄稼无论我们补偿多少，清廷官员很快就会从那些无所不在的探子或是从那些不满者的嘴里获悉，村民们得到的钱最终大部分还是会被夺走。可是不行！英国政府的政策就是要对人客气，避免压迫弱势群体。就这样，那些受到损失的可怜老百姓维护了他们的权利。因此，将军命令总军需官按数目将赔偿金发给每位村民。索赔要求被认真审核之后，最后支付给那些土地持有人 207 美元。我们把钱按数送到他们的手里时，每个人的眼睛都发出亮光！有位饱经沧桑的白发老人，得知他可以得到 70 美元的补偿金时，激动得身体发抖，差点站立不稳。我听说，维多利亚湾的老百姓收敛得多，只要了 180 美元的补偿金。这真是不可思议，因为那边对庄稼和房屋造成的损失，比我们这个安静的地方要严重得多。

7 月 24 日黎明前，我师开始登船，登船行动有条不紊地进行了一整天。将军和锡克骑兵的坐骑用带防水隔板的豪华运马船装载，

而拉军需辎重的小马和驴子则用随便能找到的船只运输。水手们把这些畜生拉上船的一幕真是滑稽可笑。他们先是用绳子套住马儿的脖子，把马拉到船边，之后便揪着它们的耳朵让它们走上船去。这时候，有的马儿会堵在前面不肯上船，而有的则吓得紧紧夹着尾巴，直到最后才不情愿地踏上船。因担心到白河后运输工具短缺，将军下令让每位军官自己掏钱购置驮畜。这些驮畜也占了需要装船牲畜中的一大部分。我买了一匹强悍的小马拉行李，又买了一匹当坐骑。就在这时，我听说，尽管翻译官属于部队参谋部，但他们不是“骑马的”官员。或者说，由于没有出台普通的随军翻译人员的相关管理办法，所以给翻译官配马的事暂不作考虑。当然，当军官们在马背上需要翻译官的服务时，他们自然会给他配上坐骑。不过，我费了很大的周折才将我的那两匹马安然无恙地弄上了皇家海军舰队“冒险”号。这生机勃勃的登船场面一直持续到太阳快要落山才结束。所有的人手都安置妥当，只剩下我、军务局长和宪兵司令三个人。我们四周转了转，看看是不是一切都清空了，有没有脱离队伍的士兵留下，随后我们深情地告别了大连湾。

“英培拉特莱兹”号上非常拥挤，因此我被分派到另一艘船上。结果，我发现军官里面只有我没有船舱，就连跟人共享的份儿都没有。我向总军需官抗议，结果他答复说不小心把我给忘了。可是这有什么关系？这种不舒服几天就会过去的，然后就——只是我比别人提前体验到罢了。

20日，霍普·格兰特爵士和贺布上将回到大连湾。他们抵达后几小时，皇家海军舰队的“亚克托安”号和“巡洋舰”号以及两艘炮舰驶向海面，目的地不详。不过，我们大家都猜测，他们可能是去北直隶湾的开路队，因为与这支队伍同行的有去年侦察过这一带海岸的皇家工兵费希尔少校。

25 日，船只按各自所属的师部形成船队等待出发。26 日，所有船只都开动了，朝海峡方向缓缓驶去。当天下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在地平线上的法国舰队也正缓慢地朝同一目的地驶去。根据分发到每艘船上的一份平版印刷的计划书上的内容，我们的船只必须在离海岸大约二十海里的地方按队形抛锚。有几艘军舰就地抛锚作为指位器，军舰后面的船只必须排成许多个队伍。

现在，一些读者可能很想知道，远征队的兵力分配情况以及所用船只的名称和数量，在此，我将我师军务局长给我的一份详细名单列出，以飨读者。

远征军兵力分布表

军团名称	详细情况				舰船名称
	军官 人数	士兵 人数	马匹 数量	跟班 人数	
第 1 师——第 1 旅					
第 1 皇家团……	29	541	4	27	“麦克达夫”号
皇家海军舰队第 31 团……	12	380	2	30	“乌格蒙特”号
……	8	300	3	12	“澳大利亚人”号
……	10	293	3	10	“亚美尼亚人”号
卢迪阿纳锡克兵团	6	300	1	33	“季诺碧亚”号
……	4	330	1	30	“伊斯肯德尔沙阿”号
第 1 师——第 2 旅					
女王卫队第 2 团	23	475	……	……	皇家海军舰队“伍尔坎”号
……	4	150	……	……	“援助”号、“激励”号及“悉尼”号
皇家海军舰队第 60 团	15	409	2	……	“阿尔弗雷德”号
……	14	364	2	……	“无敌”号
第 15 旁遮普团	7	619	2	79	“本廷克”号
……	6	210	1	27	“坎宁子爵”号
……	2	100	1	……	“英培拉特莱兹”号
巴里中校皇家炮兵连	7	220	195	100	“先锋”号
德斯伯勒上尉皇家炮兵连	4	100	70	47	“柯钦王”号
……	4	97	65	50	“黑海”号

(续表)

军团名称	详细情况				舰船名称
	军官 人数	士兵 人数	马匹 数量	跟班 人数	
费希尔少校工兵连	2	94	“冒险”号
第 8 工兵团的一半	2	46	皇家海军舰队“伍尔坎”号
第 2 师——第 3 旅					
皇家第 3 团	11	390	3	“迈尔斯·巴顿”号
.....	9	376	2	“克莱尔伯爵”号
.....	7	50	1	“若开”号
皇家海军舰队第 44 团	10	344	2	38	“运动员”号
.....	7	318	2	39	“约克”号
.....	8	218	1	20	“先驱者”号
第 8 旁遮普团	6	266	2	21	“达尔豪西”号
.....	8	267	21	“明登”号
.....	6	250	21	“旁遮普”号
第 2 师——第 4 旅					
皇家海军舰队第 99 团	12	314	3	“沃尔墨城堡”号
.....	9	325	2	“奥克塔维亚”号
.....	9	260	2	“火星”号
皇家海军舰队第 67 团	17	448	2	“塔斯马尼亚”号
.....	10	242	3	“克雷西”号
.....	2	62	“珍珠”号及“侦察”号
第 19 旁遮普团	9	464	3	78	“博斯普鲁斯”号
.....	5	197	30	“柏灵顿”号
莫布雷上尉皇家炮兵连	2	79	50	30	“朱莱卡”号
.....	2	74	50	30	“浦那城”号
.....	2	71	50	32	“伊丽莎白”号
高文上尉皇家炮兵连	3	85	49	94	“英国国旗”号
.....	3	86	51	50	“马尔顿”号
.....	3	71	50	26	“玛丽·谢泼德”号
格雷汉姆少校皇家工兵连	4	90	2	2	“若开”号
骑兵旅					
(国王)第 1 龙骑卫队	4	55	64	66	“天狼星”号

(续表)

军团名称	详细情况				船舰名称
	军官 人数	士兵 人数	马匹 数量	跟班 人数	
.....	4	71	82	116	“弗兰克·弗林特”号
.....	4	63	61	“三山”号
普罗宾锡克骑兵团	3	63	52	68	“安夫人”号
.....	1	53	51	50	“特雷纳”号
.....	1	50	54	53	“布兰登”号
.....	1	52	52	54	“玛蒂尔达公主”号
.....	3	66	70	71	“海洋之家”号
.....	5	63	78	86	“英格兰女王”号
.....	2	53	55	64	“猎手”号
.....	2	54	54	80	“柬埔寨”号
费恩骑兵团	3	62	69	78	“沃蒂根”号
.....	3	92	95	123	“艾迪斯·摩尔”号
.....	2	69	67	74	“达特茅斯”号
.....	1	69	69	93	“克拉伦登”号
.....	5	60	72	108	“丹尼尔·兰金”号
密尔沃德中尉炮兵连预 备力量	7	220	145	34	“东方女王”号
炮台位置的兵力	9	280	4	“商人”号
马德拉斯工兵连	8	236	2	38	“政治家”号
野战炮连	7	168	39	46	“密歇根”号
.....	3	51	21	“柏灵顿”号
罗顿炮兵连	6	130	“冒险”号

船只抛锚后，拿皮尔将军受命前往“格拉纳达”号上开会，不过此次会议内容没有公开。停靠在我们附近的是美国军舰“哈特福德”号，美国大使华若翰就在船上，此外还有几艘俄国战舰。

30日，船队朝陆地方向开近了一些，离海岸不到五海里的距离。这一带地势非常平坦，除了远处隐约可见的几个土丘之外，什么也没有。我们得知，那些土丘就是被大肆吹嘘的大沽要塞。军队

要作好第二天登陆的准备。我们接到通知，可在北塘附近的某个地方顺利登陆，准备强行攻克大沽要塞，并在北塘村建立一个军队补给站。31日早晨，灰蒙蒙的天空飞着濛濛细雨，海面波涛汹涌，因此攻打计划被推迟。接着又发生了许多令人兴奋的事情，许多原因导致攻打计划一再拖延。原因之一是清朝皇帝给将军送来信函，告知将军有四万清兵正在北塘要塞等候我们。此外，北塘和天津之间还驻扎了一支二十万人的军队，因此他建议，倘若将军珍惜自己和将士们的生命就赶快离开。这个消息让几位将军非常惊讶，令他们犹豫不决。当然，那都是一派胡言，我在这里说出来只是举一个例子，证实那些不可靠的谣言已经在军营里散布开了。

由皇家工兵费希尔少校率领的一支皇家士兵，在美国国旗的保护下乘坐皇家海军舰队的一艘战舰已经进入白河，他们回来报告说，大沽要塞的形势跟去年差不多。他们的船靠近要塞时，躲在炮眼后面的官兵将炮对准他们，但是没有开火。皇家海军舰队的“巡洋舰”号沿北塘河朝北推进，经过两岸的要塞，但是没有人朝他们开炮。返回时，他们发现这条河的入口处无人把守，要塞后面也是敞开的，但是在北塘村外的平原上驻扎了大批中国官兵。我军在要塞南面朝海那边不到一海里处，找到一个可以让部队登陆的地方，但需要踏过淤泥。

将军起草并下令颁发了一份军队登陆顺序备忘录。为了让读者了解登陆实际操作中的困难，并让大家对每个旅的人数和武力分配有所了解，我把将军颁发的登陆命令在此完整呈现。

.....

总部，蒸汽船“格拉纳达”号，
北直隶湾，1860年7月29日

总备忘录

部队将于当月 31 日按以下安排开始登陆。

登陆时，每人只能随身携带三天的干粮、56 发弹药、大衣、饭盒、水壶(装满水的)、帆布背包。且当天应穿棉布裤子、夏季上衣、绒线袜，戴上柳条安全帽。

乘炮舰靠岸者需将大衣叠起来与饭盒绑在一起背在身上。

乘坐普通军舰者需将大衣叠起来与饭盒绑在一起，但不用背在身上。

必须牢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登陆，士兵都必须快速有序地形成队列。因此，军官应提醒手下的士兵(军官自己也应以身作则)下船时不要拥挤，以免引起混乱，匆匆忙忙把弹药弄湿。应该清楚地告诉士兵，他们的弹药和火枪必须保持干燥。

每艘船上都载着士兵及负责管理这些士兵的军官，因此应该尽可能让指挥的军官及其副官首先登陆。

各部队按以下顺序登陆，必须声明，士兵只听从军官的命令。

8 月 1 日——第 1 师第 2 旅以及下列炮兵连将在下面通知的地点登陆，请在当月 31 日的白天作好下船准备：

军团名称	人数	马匹	炮	船只
第 2 团	400	2	……	“博斯普鲁斯”号
……	220	1	……	“柏灵顿”号
第 60 来复枪团	424	2	……	“阿尔弗雷德”号
……	378	2	……	“无敌”号
第 15 旁遮普团	626	3	……	“本廷克”号
……	216	1	……	“坎宁子爵”号
……	102	1	……	“先驱者”号
德斯伯勒炮兵连	55	40	8	“柯钦王”号
……	55	40	3	“黑海”号
罗顿炮兵连	50	……	火箭炮	“商人”号
费希尔皇家工兵团	94	……	……	“若开”号
浮桥				

8月2日——第1师第1旅紧随其后下船登陆。

军团名称	人数	马匹	炮	船只
第1团	569	4	……	“麦克达夫”号
第31团	392	3	……	“乌格蒙特”号
……	308	4	……	“澳大利亚人”号
……	303	3	……	“火星”号
巴里炮兵团	110	80	6	“先锋”号
第8工兵团的一半	50	……	……	“若开”号

德斯伯勒和巴里炮兵团剩余的马匹和士兵登陆时间将另行通知。

第2旅不可携带行李和帐篷登陆。

待第1师第2旅带着担架及担架搬运工和备用弹药下船后，苦力队立即登陆。

骑 兵 旅

军团名称	人数	马匹	炮	船只
国王龙骑兵卫队	59	66	……	“天狼星”号
……	77	82	……	“弗兰克·弗林特”号
……	66	64	……	“三山”号
……	62	65	……	“东方帝国”号
……	68	68	……	“哈里·摩尔”号
普罗宾锡克骑兵团	51	55	……	“安夫人”号
……	51	58	……	“法兰西”号
……	51	53	……	“布兰登”号
……	50	52	……	“玛蒂尔达公主”号
……	74	77	……	“海洋之家”号
……	76	90	……	“英格兰女王”号
……	49	52	……	“猎手”号
……	54	58	……	“柬埔寨”号
费恩骑兵团	67	71	……	“沃蒂根”号
……	101	104	……	“艾迪斯·摩尔”号
……	60	63	……	“达特茅斯”号
……	58	60	……	“克拉伦登”号
……	77	85	……	“丹尼尔·兰金”号
米尔沃德中尉皇家炮兵连	201	118	6	“东方女王”号

第 2 师

军团名称	人数	马匹	炮	船 只
第 3 皇家团	408	2	……	“迈尔斯·巴顿”号
……	405	3	……	“克莱尔伯爵”号
第 44 团	353	2	……	“运动员”号
……	316	1	……	“约克”号
……	286	1	……	“英培拉特莱兹”号
第 8 旁遮普团	270	1	……	“达尔豪西”号
……	262	2	……	“明登”号
……	268	1	……	“旁遮普”号
第 67 团	538	4	……	“塔斯马尼亚”号
……	272	……	……	“克雷西”号
莫布雷上尉皇家炮兵团	60	56	2	“朱莱卡”号
……	67	54	2	“浦那城”号
……	68	57	2	“伊丽莎白”号
高文上尉皇家炮兵连	97	73	2	“英国国旗”号
……	80	74	2	“马尔顿”号
……	66	40	2	“玛丽·谢泼德”号
格雷汉姆少校皇家工兵连	88	5	……	“英培拉特莱兹”号
皇家海军陆战队	246	2	……	“冒险”号
马德拉斯工兵连	251	1	……	“政治家”号
野战炮连	219	38	20	“密歇根”号

军队总部所配苦力(100人)乘坐“威妮弗蕾德”号。

第 1 师所配苦力乘坐的船只及人员分配：“麦克达夫”号(50人)、“乌格蒙特”号(100人)、“澳大利亚人”号(100人)、“火星”号(100人)、“博斯普鲁斯”号(100人)、“无敌”号(100人)及“马拉巴”号(50人)。

第 2 师所配苦力乘坐的船只及人员分配：“约克”号(100人)、“运动员”号(100人)、“克莱尔伯爵”号(100人)、“塔斯马尼亚”号(100人)、“克雷西”号(100人)、“马拉巴”号(90人)。

切记，所有士兵的东西必须在登陆之前妥善安放在船上，出发

时船长务必确保船上所有东西都安置妥当。每艘船上留出一名无其他任务的军官和几名士兵负责此事。

受将军委托颁发此令。

副总军需官

(签名)肯尼思·麦肯齐

第 4 章

水龙卷——第 2 旅登陆——有如阿可拉剧院的北塘地形——沉闷的露营之夜——第 2 师登陆——北塘村的景象——劫掠——联军军营——奢华的中国住宅——当地人的悲惨境况——几个要塞的方位——法国军需站——武力侦察——与清兵交锋——一个中国男人的冒险经历

第 2 旅的登陆日期最后确定在 8 月 1 日。登陆前夕，天空乌云密布，一阵倾盆大雨骤然打落在船上，看样子，次日的天气恐怕也会同样糟糕。正当我们懒洋洋地在甲板上闲逛，抱怨这糟糕的天气时，突然看见约两海里之外的地方，一支蒸汽柱从墨黑的乌云中降下，与海面相接，形成水手们所说的水龙卷。起初，蒸汽柱好像一条尾巴，从天空的黑暗迷雾中落下，尾巴渐渐拉长到海面。海面立即骚动不安，海水绕着汽柱急速旋转摇摆，直冲云霄。随后，我们看见一个白色窟窿沿汽柱的中心往上直冲，海水似乎在汽柱之上翻腾。水龙卷来回摇摆了一段时间后，弯曲成一条弧线，时而隐没不现，时而漆黑一团，最后终于脱离了空中的水蒸气，被聚集的海水抛落至海面，落到了原来的水平面。几只小鸟（黄胸鹀）停在桅杆

上，一只聒噪的知了落在甲板上，显然是被风从岸上刮来的。

8月1日的黎明终于到来。虽然天空下着倾盆大雨，偶尔还夹着阵阵大风，海面却风平浪静。我们都起床了，焦急地期待观看队伍登陆。我前文已经提过，探险队由第2旅组成。霍普·格兰特爵士阁下和米切尔将军带着他们各自的参谋部作为该旅登陆的先锋。法军第一批登陆的是101团和102团、轻步兵、部分骑兵（骑坐在从日本买来的可怜的小马上）和几门膛线炮。早上9点，信号发出，指示小船停靠在不同的运输船旁。大约中午时分，每艘小船都按分配的数量装上了士兵，一切就绪，准备出发。“科罗曼德尔”号载着霍普·格兰特爵士和贺布上将在前面开路。甲板上堆满红夹克和军服装备的炮舰，拖着满载士兵的六艘汽艇有序地紧随其后。其次便是“列文”号、“杰纳斯”号、“克劳”号、“山鹬”号、“德雷克”号、“警戒”号、“哈沃克”号、“弗雷斯特”号、“袋貂”号、“坚定”号、“忠诚”号、“巴特勒”号、“巴斯达”号、“火焰”号、“巨人”号及“迅猛”号。琼斯上将断后，横越浅滩时，“雷纳”号、“猎兔犬”号和“斑鸠”号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法国小舰队的表现不如我们。他们的炮舰拖带的小艇数量比我们的多得多，甚至还拖了一些小型中国式平底帆船，每艘小艇上都挤满了人。其中，一艘白色的小型蒸汽船向后退，出现了一幅滑稽可笑的画面。

因我隶属第2师，不在与第2旅随行的少数几个幸运者之列，故此，有关登陆的景象，我认为最好引用《泰晤士报》记者的描述，并附上取自其他目击者叙述中的一些评论。

“大沽要塞坐落在左舷后部三海里处，看上去阴沉而危险，但是除了飘扬在最大炮台上的清兵旗帜外，没有一丝生命的气息。我们后面是英法联军的舰队，遥遥领先的则是贺布上将的蓝色旗帜，

飘扬在驶往北塘的‘科罗曼德尔’号上。下午2点后，炮舰立即停泊在离要塞约2000码的地方。要塞所有的炮眼都被隐藏起来，未见士兵。要塞离白河入口约三海里，控制着河道，大沽镇坐落在要塞的正后方。在通往大沽的一条堤道上，出现一支满清骑兵，但是他们的将领未作任何交流。另有一些当地居民沿着堤道匆匆赶路，其中有两个有身份的人，坐着轿子，由几个骑士护卫。下午3点，将军们决定先让400人登陆，一半英国人，一半法国人，对这条路进行侦察。”英军部分由先遣部队的第2团(女王卫队)抽调出来的人组成，几艘小船立即朝泥滩缓缓驶去。小船很快搁浅，船上的人跳进及腰深的泥水里。一上岸，便有一片烂泥滩延伸到两岸，我们就从这片泥滩跋涉过去。软乎乎、黏糊糊、滑溜溜的泥巴深及脚踝，我们在这个烂泥滩上挣扎了整整四分之三英里，才来到一块硬泥滩上，显然这块泥滩在涨潮时被海水淹没了。几乎每个人都脱掉了下面的衣服，一位英勇的准将脱得只剩下一件衬衣，带着他的部下在泥滩上跋涉。侦察部队刚刚顺利登陆，清兵就沿堤道撤退了。因此，将军们下令其余兵力立即下船上岸。下午5点，所有兵力都安全登陆，敌人未放一炮。

“军队面临的是一副前所未有的绝望景象。到处是烂泥和水，可是‘没有一滴水可以喝’。随处可见的苦咸水根本不能饮用，可是无法找到水井或泉水。地面上分布着盐丘和丛林，为火枪手们提供了极佳的隐蔽处，但既没有一棵树木也没有一幢建筑物。

“联军总司令们已经安排好了，我们的部队占领右边的位置——离小镇最近——而法军则占领英军的左侧地带。然而，军队一登陆，一名法军上校在热情的驱使下，带着轻步兵急忙往前冲，占领了入口附近的堤道，即分配给英军的地方。霍普·格兰特爵士立即阻止了他的士兵，并通知了蒙托邦将军。法国将军二话没说，

立即派他的副官施密茨上校召回这个团，命令他们沿着堤道前往正确的位置。英国军队这才往前进，来复枪团走在右边，第15旁遮普团走中间，女王卫队第2团走在左边。可是，通往堤道的去路被一条40英尺宽的深水沟挡住了，潮水从中流过。将士们果断地跳进水沟，半个身子都陷进了肮脏不堪、恶臭无比的烂泥中。大家都奋勇前进，没多久整个部队都来到了路面上。太阳很快落山，站在堤道上，夕阳离沼泽地只有6英尺高。我们对那个地方进行了勘察。右边是小镇，大路的尽头有一扇木门。在木门前几英尺处，河道被凿成二三十英尺宽，这样潮水就可以流往另一边。深水沟上面架着一座木桥。100名来复枪手和100名法军未放一枪立即占领了木桥和小镇大门。前面的地势与我们后面的地势一模一样——到处都是微咸的湿地——左边约六英里可见到一排树木和一些房子，那就是‘阿可拉’的位置所在，一片广袤的沼泽地，上面只有一条堤道通过。任何一个果断的敌人都会不顾一切地占领这个地方。大家竭力劝说霍普·格兰特爵士立即占领这个小镇，但是他坚定而委婉地拒绝了。夜幕降临，很快就要进入深夜了，而‘黑夜带来良策，光明引发战争’。将军对要塞的兵力情况一无所知，因此，让他的部队天黑之后待在一个中国小镇狭窄的街巷上是非常鲁莽的举措，况且黑暗中根本无法维持军纪，所以会让当地老百姓陷入被抢劫的恐惧中。因此，将军最后安排，炮舰在第二天凌晨4点发起进攻。整个部队就在堤道上的烂泥里露营，等待天亮。”

与此同时，第1师的翻译官吉普森先生进了村子，发现村里老百姓非常友好，他们领他到了一个可以观看要塞的最佳位置。要塞似乎根本无人把守，而且村民们也肯定地告诉他，要塞早就被遗弃了。吉普森先生立即汇报了情况，随后巴夏礼先生和总军需官副助理威廉姆斯上尉带着几个来复枪手前来，抓了几个老百姓作人质，

由士兵看管；巴夏礼先生和上尉则陪同吉普森先生和那几个报告消息的中国人一起穿过村子来到南要塞。老百姓似乎有点害怕，很担心自己的命运，但是他们并没有受到骚扰。他们进入要塞，看见四个人正躺在草席上睡觉，显然是留在那里巡夜的岗哨，因为他们身上并没有士兵的标记。炮眼后面架着几门大炮，都是用皮条绑起来的木头仿制品。村民警告大家，地底下挖了壕沟，并带他们看了掩埋火药弹的地点。巴夏礼先生一行人立即返回，向将军们汇报了情况。地面到处湿漉漉、脏兮兮的，士兵们就躺在这个泥泞的堤道上睡觉。寂静的夜空清澈透亮，明亮的月光静静地洒落在他们身上，照亮了他们可怜而不适的状况。晚上，几个满清骑兵来到离来复枪团岗哨几码的地方，结果我军以子弹“问候”他们，并将其中一人击落马下。黎明时分，将军们穿过村子，视察了南面的要塞。工兵们开始动手挖壕沟，一共挖了四个。挖出来的土被小心地堆成一个三十英尺大的圆圈，每个圆圈间隔六七英尺。八英寸长的弹片装满了火药和子弹，放在锡盒子里，再用保险丝将锡盒子和引爆装置连接起来。陷阱里安放了燧石和钢制枪机，燧石和钢制枪机又被绑在一些结实的小绳子上。所有的东西都被草席盖着，草席上面堆上一层薄薄的土，好让它看上去跟周围的地面一样。谁一旦掉进这些陷阱就会立即跌落在引爆装置上，至于它到底会不会引爆，大家的意见还未统一。

将军们在要塞周围视察之后，命令军队进驻小镇。

现在，我们再回到“英培拉特莱兹”号来，即第2师将军和他的参谋部一直乘坐的那艘蒸汽船。就在第2旅开始登陆的第二天，一艘中国的平底帆船在海面上行驶，离我们的船队非常近。拿破尔将军派我去追它，查明它的目的和去向。船靠近时，我用中文朝船上的人喊话，结果甲板上一个男人站起来，朝我挥手，用英语喊

道：“不，不是！”上船后，我才弄明白，原来这艘船是替直隶总督给美国大使送信的。船上的人都声称，他们刚从北塘来，不知道联军登陆的事情，对要塞的情况也一无所知。事实上，他们编造出各种各样的谎言来搪塞，只是不愿直接拒绝向我们提供任何对他们雇主有害的情报。

8月4日，拿皮尔将军接到指示让他和参谋部登陆。他收拾了一些必需品，换乘了来自加尔加答的小蒸汽船“漠河”号，并向北塘河口开进。我们匆匆横越浅滩时，潮水已经退下一半，船未触到河床。要塞前三英里处，只有一望无垠的软泥滩，一些海鸥、杓鹬和小燕鸥在上面觅食。北塘村面积最大的部分坐落在南岸靠近要塞后方，但是在对面北要塞的后方也有一些房屋。当地只有一个登陆点，我们已经让给了法国军队。在皇家海军舰队“珍珠”号船长博莱斯上尉的监督下，工兵和水手开始动手搭建四座木头桥墩，编号为1至4。他们为拿皮尔将军和他的参谋预留了一座寺庙，我们踩着村子小巷道上深及脚踝的垃圾和泥土，才找到那个地方。

北塘是一个普通的村庄。村里的房屋造得很牢固，泥巴和碎草砌成的墙壁建在房屋地基和外墙之间长出来约一英尺长的芦苇层上，大概是为了保护房子免受当地盐质土壤的有害侵蚀。灯芯草做成的茅草屋顶上盖着厚厚一层泥浆，泥浆里夹杂着一些碎草。庙宇及有钱人家的房子都盖着瓦顶。村里道路狭窄，道路两旁都是臭水沟。一些人家的院子里零星长着一两棵病恹恹的小树，半死不活的样子。然而，正是因为这些小树，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北塘村看上去像是一个朴素而富裕的村庄。哎！一阵大雨过后，这个地方就面目全非了！泥浆从屋顶奔流而下，地面坚硬的道路即刻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臭水沟，水沟里的烂泥深及膝盖。我们住在这个可恶的村庄期间，老天爷几乎天天赏给我们雨水。因此，这个肮脏的地方让

我们的人叫苦不迭。放眼望去，映入眼帘的全是泥潭，树木或草叶也无法改变这幅景象。到处都是盐水池，有时候里面还零星长着有害的海藻，或是绿茎盐水草。村子的背水侧，一条泥沟把村子的一部分包围起来，泥沟上搭着一座桥，一条主干道经由此桥横越泥沟，一直延伸至北塘村外，与一条堤道相接；穿过一扇门，堤道延伸至南面白河方向。士兵们就是在这条堤道上，度过了第一个晚上。

北塘村如今由英法两军共同占有。法国军队占据村里离要塞最近的部分，位于通往堤道的主干道左面。英国军队占据村子其余的地盘。米切尔将军住在一座庙宇里，拿皮尔将军住另一座庙宇，霍普·格兰特爵士和参谋部则驻扎在要塞里。虽然这个地方前三天已经被占领了，但是许多房子仍无人居住。我们经常遇见一些游手好闲的人——其中大部分都是法国人或是广东苦力——手里拿着大棍子，冲进屋子到处搜索抢夺，将那些他们不想带走的东西，残酷地摧毁。仍然逗留在村里的几个村民，眼巴巴地看着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财物被毁于一旦，或许他们的希望也被永远地摧毁了。有些人自杀了，其中有男有女。但是，大多数人都悄悄地逃到邻近的几个村里去了。我们还看见，许多人用袋子把那些被毁物品的碎片背走。不过，我难过地告诉大家，即使这样，那些可怜的人也不能平安无事地过去。只要他们走到村外空旷的地方，就会被巡逻的士兵围堵，这些士兵专门在那里守候他们。他们必须打开包裹，让士兵检查里面的东西才可以安然无恙地离开。霍普·格兰特爵士已颁发禁令，严禁士兵掠夺。许多可怜的家伙，因为拿了一些小东西而被无情地鞭打。来复枪团的两个士兵因为赶了一头猪回来而被鞭打，可是法国士兵整天都在赶这些“不洁”的动物回家煮着吃。士兵们屯扎在不同的房子里，谁又能阻止他们“善用”那房子里面的

东西呢？况且，那些负责阻止抢劫的宪兵中士们比任何人抢的东西都多——我敢负责任地这样说。如果你想买点当地的珍稀物品，私下里问问那些先生，保证能从他们那儿弄到手。当然，用这种方式占用村民的房子，夺取他们的财物，对他们确实有些残忍，毕竟他们对我们没有任何敌意，也未作任何抵抗。可是显然，联军这样做，纯粹是出于迫不得已。在这种天气里来到这样一个村庄，军队必须有个藏身之处，必须建立一个物资供应站。因此，村民要怪只能怪他们的统治者没有及时警告他们离开这个无人保卫的弃城。如果是他们不听警告的话，那只能怪他们愚昧固执，不知道在联军船只登陆之初转移家里的重要物品和金银细软，因为站在村里的空地上完全可以清楚地看见联军的船只登陆。当然，谁都会忍不住同情他们的悲惨命运，并为促使将军占领这个村庄的迫切需要感到悲哀。然而，哪一国的战争带来的毁灭不是同时交织着罪恶与无辜呢？——再说，像中国这样一个胆小而被满清践踏的民族又岂能豁免呢？所幸的是，大部分妇女都被转移出去了，所以强奸事件几乎没发生。

第一批登陆部队占用的房子，大部分都完好无损，因为它们在被抢夺者还没来得及下手之前就已经被占领了。但是，那些无人居住的房子被抢夺和破坏后的样子非常可怕。箱子被撬开，里面的东西乱七八糟地躺在瓷器、旧书、字画等物品的残骸中。因此，后来登陆的士兵只能住进这样的房子。他们进去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拾屋里被砸碎的东西，把它们扔到外面的路上，使本来肮脏不堪的道路上又多了一些危险的东西。村里的道路上除了泥潭和污物，到处都是死猫、死狗。

宪兵司令征用的房子是我见过的最整洁漂亮的屋子。前面的房间是敞开的商店或仓库，屋子前有一个院子。院子的两侧和后面各

有一间屋子。房屋的主人就住在后面那间屋子里，屋里的摆设很精致，当然家具都是真正的中国风格。房间两边摆着几个大柜子，几乎要抵到天花板的大柜子是用仔细抛光的木头制作的，上面安着铜锁和铜铰链。大炕，几乎占了每个房间的一半，炕上铺着席子和枕头，炕的一边放着一个木制大衣柜。房间的墙壁和天花板上贴着精心设计的剪纸。墙上还挂着画儿、广东制造的镜子和写在红色印花纸上的中文箴言。金漆的广口瓶和其他装饰品安放在房间的不同位置，窄窄的窗棂上像往常一样贴着窗纸，挂着薄纱做的窗帘，每个窗户的中间都装有一块窗格玻璃。穿过卧室，又有一个院子，房间的分布跟先前的一样。从房间里摆设的物品来看，这些房间显然是这户人家的女眷住的。另外有一座更大的房子，院落和房间的结构和这座差不多，也是一个富商人家的，被来复枪第 60 团的部分士兵占用了。刚进屋时，他们发现两个穿着得体的漂亮闺女在一个房间里悲伤地哭泣。她们的亲人跑了，留下她俩任由新来的占领者处置。当然，她们受到了善待，最后被送到安全地带。

在北塘村外，过了那条沟往北走，有一块干燥的硬质土地，上面零星盖着一些房子，另一条泥沟将这些房子和那块软质泥滩分隔开来。当地那些饿得半死的可怜百姓聚集到这块泥滩的尽头乞讨食物。我们有时候会去跟这些无家可归的可怜虫拉拉家常，并且力所能及地给他们一定的帮助。有时候，他们会带给我们一些苹果和桃子作为回报，感谢我们对他们的关心。

将军们急于了解这一带的路况信息以及每年在这个季节的天气状况。因此，跟那些乞讨者进行礼貌的寒暄之后，我们常常会跟他们聊起这些话题，但是由于害怕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他们很少给出满意的答案。他们恳切祈求我们允许他们进村取一些留在房子里但我们的士兵没有机会碰到的东西，比如腌菜和咸

鱼。如果他们未经允许进村，肯定会被赶出来。因为军官们本能地担心这些人不值得信赖，很容易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发生偷盗事件。因此，我把他们聚集起来，让他们跟着我。我知道有一间房屋的院子里放了很多咸鱼，决定领他们去。我身后跟着这帮衣衫褴褛、头发蓬乱的群众，正当我们经过一条狭窄的道路时，一个士兵手持一根长矛出现在屋顶。“别动，先生！”他向我喊道，“等我把这个插到后院再说。”我警告他不要胡来，便带村民进屋去拿咸鱼。臭烘烘的咸鱼看一眼都会令人作呕，可这些可怜的村民光着膀子拼命伸手抓起坛子里的咸鱼往袋子里装，那副样子是多么贪婪啊！此后，我又陪他们一起出去，直到他们远离村子。还有一次，我和另一个军官站在这个乞讨的地方，看见两个男人背着包袱，扶着两个老妇人，正艰难地横穿泥巴沟。就在这时，两个法国人手拿木棍冲向他们，逼他们打开包袱，检查里面的东西。我们走过去，强烈要求放了这些可怜的人，并帮助他们走到泥沟对岸。两个老妇人，一个八十岁，另一个已经九十岁，眼睛已经看不见东西了，基本上走不动。我们帮忙把她俩放在两个男人的背上，她们低声向我们道谢。看着他们安全地跨过泥沟，我们转身进村去巡逻。在泥沟附近的另一个地方，我们看见岸上一群士兵中间起了骚动，一个物体漂在泥沟的泥巴和脏物之下。站在旁边的几个法国人异常兴奋，抓住几个在旁边看热闹的当地人，让他们沿岸到泥沟里把东西捞起来。原来是一位跳进臭水沟自寻短见的当地妇女，她被捞起来时的样子非常可怕。她还没死，很快就坐了起来，开始谈论“魔鬼恐吓她”的故事。我们找来一点水，把她洗干净，从附近的房子里找了几件旧衣服给她穿上，然后让她的几个老乡把她抬到泥沟对岸去。不过，我担心，他们没走多远就会把她扔在沼泽地里，不管她死活。

4日，皇家炮兵团高文上尉发现一坛子火药，里面还有一根点着的缓燃引信。将军立即下令把这个发现告诉大家，而且警告部队要小心提防一些欺诈行为。此外，法国人猜想有人在水里投毒，因为他们有个士兵口吐白沫死掉了。因此，法国人把仍然逗留在村里的人全部抓起来，关在一个院子里。这件事发生之前的两天，我遇到一位持有法军通行证的当地有识之士，他给了我一些重要的情报，并绘制了一张清兵营地通道图。法军占用了他的房子，当时他还被允许住在自己房子的一个小角落里。我希望能再见他一面，便去他的住处找他。可是有人告诉我，他当天早上已经离开了，在离开的前一晚，他哭了整整一夜。我立即猜想，他也在那些被法国人逮捕的不幸者之列。于是，我去探视那些俘虏。他们都坐在院子里，一脸痛苦的表情，可是我的朋友不在里面。他们领来一个人给我看，说他就是那个投毒的人，本来要被绞死的。但是，经过调查，没有获得确凿的证据，因此这个人被宣告无罪释放。其余的俘虏也都被带到将军的营帐，去面见将军，每人领了一件中式外衣后，被送到河对面释放了。

我们在岸上已经待了好几天，还没有参观过要塞。所以，如果读者们愿意，我们现在就去看看那些要塞的防御工事。我们走在泥泞的小道上，挤过跑向四面八方执行任务的英法士兵和黑人，超过用竹扁担挑着各种军需用品的苦力队，来到环绕南面要塞的壕沟。通往要塞大门的道路在一座小桥之上，我们就从这条道进入要塞。要塞里面的景象真是令人惊叹！要塞的地面完全浸在水中。右边驻扎着普罗宾率领的锡克骑兵和他们高大的阿拉伯战马。马儿拴在一排排的小木桩上，站在齐蹄深的烂泥里。锡克骑兵人手一把的长矛枪插在各自的坐骑旁，长矛顶部装饰着色彩鲜艳的流苏。骑兵们被编成几组，有些在闲聊，有些做别的事情来打发时间。跑前跑后的

印度挑水工和马夫中间，点缀着一两个穿着所属军团制服的英国或法国士兵，形成一幅滑稽而混乱的画面。左边是英法两军司令和参谋部的总部营地，营地左边堡垒上的小旗帜自豪地飘扬在司令的营帐之上，而右边的堡垒则插着三色旗。

再往右驻扎着几支法国军队，营帐前面拴着几匹羸弱瘦小的马，最左边有几间破屋子。这个要塞里有两个堡垒，被一道波浪形的幕墙连接起来。每个堡垒上有三个炮眼，但幕墙上有四个。在北面堡垒那边，还有一个炮位，上面架着一门大炮，控制河流的拐弯处。南面堡垒那边，设有另外两个炮位，可能是用来对准联军第一次登陆的地点；这两个炮位对仅持有火枪并在烂泥中困难前行的军队构成巨大的威胁。胸墙约 16 英尺高，11 英尺厚，而堡垒则有 30 英尺高。要塞后面被一堵锯齿状的围墙围起来，这堵围墙对攻击力量可稍作抵抗。要塞内部用一块块厚厚的木料建成，木料上糊着用泥巴和亚麻或碎草做的混凝土，与村里房屋屋顶的用料极为相似。炮眼上都设有活动防盾，在必要时用绳子和滑轮装置将它们放下挡在大炮前面。北岸要塞的结构跟这里差不多，但是只能安放 11 门大炮。联军所获的相关文件上记载，整个要塞的全部驻军有 327 人。但是，我们得知，这些士兵都从要塞撤走去增援大沽炮台了。我们已经听说了许多有关僧格林沁部队力量的传闻。村里人都声称对此不了解，不过他们说，他一到此地，就有传言说“僧”（中国人就这样称呼他的）亲王此次率领了从全国各地招募来的两万人马，另外还有四万满族旗兵及 48 位清廷王公的家臣。

费恩率领的锡克骑兵驻扎在华若翰先生与清政府签订中美条约的房子里。这幢房子应该算是这一带最体面的，是从清廷某位身居高位的文官之子手里租来的。据说，他对外国人非常友好，为了取悦美国“蛮夷”，他主动将房子拱手让给军需官。对这个文官之子

的慷慨，清政府非常恼怒，对他处以罚金，并把他父亲贬到最低的官职。

村里最显眼的房子中有一家当铺，当铺的大门前挂了一条漆成绿色的木制雕龙。这里住着第 15 旁遮普团，我猜测，那帮人肯定在这个房子里狠狠捞了一把，因为屋里存有大量的丝绸及珍贵的皮毛大衣。房间摆放着许多竹制的货盘，货盘上面堆放着一层层物品。所有物品都按顺序仔细地标了号，摆放整齐。自从部队开始登陆，我们的军需处管理就很出色，因此军队的状况欣欣向荣，对村里那些臭烘烘的脏东西都不屑一顾。不过，法军军需处却无法担当这样的赞誉。可怜的法国士兵被迫到街头巷尾和臭水沟里去寻找生猪，但是这些猪也管不了几天。他们只好转而去捕捉村里的猫和狗来吃。所以，经常能看见一群法国士兵在要塞那边的烂泥里追捕狗，无论这些可怜的动物逃到哪里都难逃厄运。有一次，一个法国士兵拖着一条死狗走在村子里，有人问他要干什么，他答道：“当然是煮来吃啦！”“什么，你们吃狗肉？”问话者非常惊讶。“我想应该是的，”士兵反驳道，“我倒希望天天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呢！”一个法国人居然能坐在他的“狗汤”或者“猫汤”面前郑重其事地热情呼喊“皇帝万岁！”仿佛他们的皇帝（拿破仑三世）是这顿美餐的佐料一般。

霍普·格兰特爵士乘坐“格拉纳达”号沿河道走了一趟，去看看是否有其他的方法抵达白河要塞，结果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烂泥巴，只得返回营帐。8月3日，他派了一个侦察兵沿堤道进行勘察。凌晨4点，法军在柯利诺将军的指挥下，带头率领一千人马，以及两门带三条捣杵的来复线野战炮和一个工兵连前进。英军从第2团、第60团及第15旁遮普团中抽调出一千人马，由萨顿准将指挥，紧随法军。堤道延伸至约三英里之外，两岸除了水和泥巴，什

么也没有。之后，我们来到路旁的一座小寺庙，这里就是敌军进攻我们的最前哨。几个清军哨兵在半英里以外的堤道上看见我们，立即从一座桥上仓皇而逃，加入他们的大部队。敌军大部队驻扎在离桥约半英里处的空房子里，大概三百人左右。敌人待法军过了桥才用火绳枪和重火枪朝他们开火。法国将军立即下令部署，命令士兵跳进泥沟，沿着泥沟两岸，以这一带到处可见的圆锥形墓丘为掩护，继续前进。清兵撤到房子后面，紧接着出现了一支约两千人马的满清骑兵，左右包抄而来，对两侧前进的法国士兵构成严重威胁。法国将军下令将两门大炮抬到前线，朝房子开火，迫使敌人又一次撤退。联军继续前进。联军按各军团梯次编排成两个纵队，法军在道路的右侧，英军在左侧。这里的道路地面土质坚硬，泥泞不堪，路面覆盖着一块块绿色盐土植物和坑坑洼洼的水沟。这时，马路对面出现一个牢固的大营地，营地四面围着锯齿状的矮墙。英军在左侧受到一大队满清骑兵的威胁，第2团派出两支散兵队伍前去迎战。队伍一直向前，直到被一摊水挡住去路，他们就在水坑处朝敌人开火，迫使敌人撤退。散兵队伍立即被召回。这时，敌人毫不懈怠，继续在远处以火力猛攻。不过，由于距离太远，发射出来的弹药到达联军这里时已经失去效能，基本上伤不了人。联军随后又向前推进了1200码才停止前进。第2团又派散兵队上阵，但这次很快就被击退，敌人的火力仍然猛烈。指挥官命令士兵卧倒，并派人去北塘请示下一步的命令，究竟是前进还是撤退。霍普·格兰特和蒙托邦两位将军亲自前来视察战况，并决定撤退，原因是联军没有骑兵。正当部队往回撤退时，德斯伯勒皇家炮兵团飞快地冲上来，穿过泥沟分散到四处。他们昨晚刚刚登陆，虽然他们从北塘的污泥浊水中神速赶来，但是状态看上去不错。六匹马儿拉一辆炮车，尽管炮车的轮子一半都陷入了淤泥，但马儿并不感到吃力。敌

军肯定是在一个海拔很高的地方朝我们开火，因为我军三名受伤的士兵和法军六名受伤的士兵及一名军官，都是被高空坠落下来的金属重物砸伤的，而不是被枪炮的爆发性冲击力击伤的。联军撤退，清兵没有追赶。他们把联军的撤退视作自己的胜利，因为我们后来听说，他们将此次交锋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奏折禀告了北京。此后，他们的胆子更大，甚至以惊人的勇气靠近我们的前哨，有几个清兵甚至走到离前哨仅几百码的地方，挥舞手中的剑，做各种各样古怪的动作。所以，先不从侦察的有效结果来看，仅从对这个地区的了解，让敌人低估我们的力量对我们更有利，我们的阿姆斯特朗炮更容易发挥作用。

在北塘，每家每户都有水缸储存的水，因为在最近的地区找不到水。这些所谓的存水实际上是融化了的冰。当地人在冬天把冰块储存在密封的坛子里，留到来年的夏天使用。当然，北塘全部的存水也不够联军使用。因此，联军派一艘炮舰沿河去寻找饮用水，但是受到几伙清兵的多次袭击。最后，贺布上将派他的翻译官莫里森先生乘坐“小猎犬”号前去清兵营地谈判，告诉清兵首领，如果他们不对我们开火，我们也会停战。莫里森先生勇敢地走进敌营，要求见他们的首领。他传达了海军司令的意思后，对方立即在此事上表示了理解。然后，翻译官给了这些清兵一些印有中国字的免战白旗，向他们解释了其中的含义，并且告诉他们尊重免战白旗是我们的传统，希望他们也会如此。接受他们的感谢之后，他便返回军营。我们这一友好举动可能让恒福——该地统治者——认为我们是被那天火力侦察的清兵们的英勇吓怕了，因此他立即发函给特命全权特使。但是，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明智地决定，在我们受损的荣誉得到补偿之前，拒绝与清廷进行任何谈判。联军的旗帜仍然高昂地飘扬在大沽高地的微风中。

第 67 团的兰普瑞医生——他在广州学了一点中文口语——带了一个人来找我。此人鬼鬼祟祟地在村口闲逛时被逮住了。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跟我讲述自己感人而有趣的遭遇，似乎成千上万人的悲伤故事和不幸遭遇都是因北塘这个大村子被联军占据而引起的。他原本是白河左岸新河以北军粮城的村民，就是美国人从北塘去北京途经的第一个村子。他从小学习四书五经和中国的伦理道德。父亲去世那年，他成了家，并开了一家初学私塾。他的妻子为他生了很多孩子，所以他觉得，仅凭自己辛苦所得的那点微薄薪俸很难养活自己和家人。于是，他把妻儿托付给住在同村的老丈人，只身前往北塘去赚钱。在北塘，他当郎中给人看病，同时又倒卖船舶用具。凭借给那些前来求医者开具的药方，他幸运地在当地赢得了良好声誉。两年后，他的经济状况得到大大的改善，还有余钱寄回家。他在北塘继续享受婚姻带给他的赐福，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的船队就到了北塘，军队残忍地从手无寸铁的村民手中夺走了整个村子。

我们的船队在海湾开始聚集时，就有传言说夷匪可能会在北塘登陆，但是他希望这种事情不会发生，便愚蠢地一拖再拖没有逃离村子。他心里盘算，倘若像其他聪明的人那样，把家里的东西和金银细软都搬走，可结果联军根本就不在这里登陆，那么搬家产生的费用不就是一笔无谓的浪费吗？于是，他决定听天由命。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命运怎样对待了他。联军登陆的当晚，他站在家门口，一个外国士兵向他讨水喝，他转身进屋正要去取水，这个士兵一把抓住他的后颈，把他踢出屋子。就在他吓得瘫倒在地的妻子和浑身哆嗦的老母眼皮底下，士兵将他家所有的银两、多年来省吃俭用留下来的财物顷刻间洗劫一空。抢劫者拿着钱扬长而去，没过多久又有人来通知他，要征用他的房子。他简直被逼到绝望的境地，

不过他很快就恢复过来，去安慰妻子和母亲，并带着她们和孩子们前往宁车沽，沿河而上约五英里之外的一个地方。他的妻子和母亲边走边哭，老太太甚至说要跳进河里一死了之。他是个孝子，紧紧拽着母亲的手一直不肯松开。到了宁车沽，他雇了一辆农用马车载着他和家人回老家去。车夫开价要 28 个铜板的现金，他软磨硬泡，最后终于讲到 25 个铜板，可就是这点钱让他到哪里去找啊？他身无分文，也没有朋友可以接济他。正在踌躇该如何是好的时候，他突然记起来，妻子手上还戴着一个玉镯子。他立即拿着玉镯子去当铺换了一千个铜板的现金，付了车夫的钱，其余的留给家人。他自己则回到了北塘村，想看看能不能从以前的房子里捞回几件衣物或者其他的生活用品。可是岗哨不让他过去，但他不死心仍在村口转悠，就这样落到了兰普瑞医生手里。讲完他的遭遇，这个可怜的人悲伤过度，瘫倒在地。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帮我们画出了这一带的地图。拿皮尔将军决定留他在第 2 师做向导。起初，他恳求将军放他回家，但是后来便高兴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而且还因他身为中国人能待在英国军队里这种特殊待遇而沾沾自喜。

部队决定第二天(8 月 12 日)离开北塘，去看看清兵究竟铸造了怎样的铜墙铁壁，他们的骑兵又将怎样抵抗国王龙骑卫队和费恩与普罗宾的黑人士兵。

第 5 章

进军北塘——与敌军相遇——战斗命令——阿姆斯特朗大炮的威力——清军骑兵的猛攻——攻打顽固的敌营——清兵的勇猛——伤员——敌营一瞥——新河——夜间警报——间谍——塘沽事件——敌军逃散——清军炮兵——军营——大沽要塞——当地代表团——会见恒福——交换俘虏——中国人对这场战争的看法

8月12日，天还未亮，在“村里的公鸡还未第二次打鸣”之前，整个北塘村就响起了一片嘈杂声，士兵们都起床了。拉特克利夫以司令副官助理的身份来到罗伯特·拿皮尔将军跟前，向第2师英勇的将军报告“他的朋友都起床了，已整装待发”。第1师和法军打算沿堤道前进，占领敌人牢固的前沿阵地。分配给第2师的任务是，在离第1师和法军几百码的地方带着骑兵一起从右边前进，穿过沼泽地，切断敌人朝天津方向撤退的道路，迫使他们到大沽要塞寻求庇护。在我们登陆之后才从大连湾赶来的第99团留下来占领北塘村，保护储备物资。另外，从各团抽调出来的四十名士兵和一位军官留守，照看将士们留下来的所有行李物品。不幸的士兵们穿过泥潭的那一幕景象真是可怕，不断有士兵脱离前进的队

伍，到一些坟头上歇息。有些人，特别是旁遮普士兵觉得他们的靴子碍手碍脚，索性脱下来扔掉，卷起裤管，勇敢前进。整个部队无精打采的样子实在令人悲伤。炮车深深地陷入泥淖，大家都非常担心无法把它们弄出来。不过，炮兵们竭尽全力，排除万难，始终坚守岗位，跟着前进队伍。看见骑兵的马匹驮着沉重的军需用品在齐膝深的泥淖中艰难地跋涉，也同样令人痛苦。沼泽地似乎漫无边际，不过大约走了四英里，我们来到了一块硬地，并看见一大队满清骑兵向我们冲来，企图阻止我们前进。敌人突然出现在面前，立即让筋疲力尽的士兵们精神抖擞起来，每个人都迅速恢复了自己的敏捷。先头部队凌晨4点从北塘出发，由于道路上黏糊糊的深水烂泥，他们的行军非常艰难。此前，部队花了两天工夫奋力抢修道路，但仍无济于事，所以后续部队直到晚上7点半才全部撤离北塘村。部队艰辛地跋涉了两个小时，才走完前两公里的路程，此时部队必须稍作停留，这样在黏糊糊的地面上艰难前进的后方部队才有时间向先头部队靠拢，因为将军意识到，他很容易受到来自北面和前面的敌人的攻击。联军直接进攻在堤道上的敌营，而敌人在营地和新河入口的火力都非常猛烈，将军见状，命令部队直接朝敌人开进，占据他们侧面的位置，威胁他们的撤离路线。三门阿姆斯特朗炮和米尔沃德炮兵连的一半士兵被调往前线，由第3团的两个连分别在两侧和大炮后面掩护。其余的步兵被派到邻近的纵队，带着另外三门阿姆斯特朗炮和一门罗顿火箭炮保护他们的左侧，斯特灵炮兵团在右侧，骑兵团则守卫在右后方，伺机而动。苦力队挑着备用的弹药、医用担架等军需用品，由第67团左翼部队保护，走在最后面。满清骑兵阵势浩大，在我们前面约两千码之处形成一堵坚固的人墙，远处的骑兵被放大，仿佛是驾着巨型坐骑的巨人武士。将军下令，在前面开路的阿姆斯特朗大炮继续向前开进，以1500码

的射程朝敌军开炮。一块块弹片在顽固的敌人脑袋上空炸开，但是敌人毫不退缩，致命的炮弹炸开的缺口被他们迅速填补，人墙维持了好几分钟。后方许多无所事事的人，跑到前线来观看阿姆斯特朗炮的威力。大家看到炮弹一次次射中骑兵构成的人墙非常高兴。清廷骑兵站在那么远的地方，勇敢地朝我们开枪，可是他们落后的火枪没有一点作用。最后，敌军开始移动，一部分人朝右，一部分向左，显然想包围我们。我军部署在右侧的骑兵早就跃跃欲试想跟清兵较量一番，他们立即冲向敌人前去迎战。不过，令他们非常失望，清兵在冲锋之前，犹豫了几分钟，最后在斯特灵炮兵团的猛烈攻击下四散而逃，炮兵团对他们继续穷追猛打。左路清兵一直向“坚守我军左前线的第3团开进，显然他们毫不畏惧米尔沃德的两门大炮的火力、前方卫兵的来复枪和罗顿火箭炮的火力。他们冲到离我们不到450码的地方，面对可以让全世界任何一支军队都害怕的火力，丝毫没有退缩，坚持了很长时间”（摘自拿皮尔将军的快信）。朝我们纵队平行方向飞奔而去的一队清兵，突然改变前进方向，朝第4旅冲去。在这紧要关头，我迅速从马上跃下，与我师的军医官一起，坐在一座坟墓上，静观其变。这时，我们看见敌军正朝我们这个方向冲来。苦力队中间出现一片恐慌。苦力们吓得赶紧躲到第67团和海军陆战队的后面挤作一团。里夫斯准将立即命令海军陆战队组成一个方阵。军医官是一个大胖子，像只云雀般立即从坟头跳起来，放开手里的缰绳，一边拼命朝海军方阵跑去，一边冲我喊要是想活命就赶快跟上。我从来没上过战场，看见一位老从军者吓成这样，很自然被他的情绪感染。但是，我不想就这样轻易放弃我花重金买来的坐骑，于是我拽着缰绳，想带着这只畜生一起走进方队。然而，这匹从大连湾买来的小马难以驾驭，不愿被我拉到一群士兵中间去。因此，我越是用力拽它，它越是往后退。这时

候，敌人已经飞快地冲过来，准将下令朝他们开火。劈里啪啦的枪声让我的小马惊慌失措，它开始到处乱踢，完全打乱了我们这侧方阵的秩序。几位海军战士用枪头轻轻地戳了它几下，他们宁愿让它腾出空间也不要它在此处捣乱。眼看拿这只畜生没辙，我只好放开缰绳。它发出欢快的嘶鸣，和医生的小马一道朝敌军方向奔逃而去。毫无疑问，敌人立即将两匹小马保护起来，把它们牵走，当作那天的战利品去向天津方面请赏去了。清兵射过来的炮弹落在地面上，打出来一个个坑，有的炮弹从我们头上呼啸而过，但是没有人员伤亡。然而，我方的火力紧紧咬住他们，让他们没有机会靠得太近，从而威胁我们。他们犹豫片刻，便撤退了。我军第1师和法军开始轰炸位于左侧的敌营，因为从他们那个方向传来的重炮轰炸声传入我们的耳朵，清廷骑兵向四面八方四散而逃（摘自约翰·米切尔将军的快信）。

在米切尔将军的率领下，第1师在上午10点左右撤离北塘，沿堤道朝新河方向的敌营长驱直入。由斯特夫利准将指挥队伍前进，一同前进的还有他指挥的第1步兵旅，以及一个皇家工兵团，一门阿姆斯特朗大炮，一千名法国步兵，和一门法国大炮。紧随其后的是拖着两门9磅炮和一门火箭炮的第2旅和法军的主力纵队。一到敌军的第二个岗哨——离他们的营地约九百码左右——第1皇家团的散兵便被派到左边，第31团的部分散兵被派到右边。不久后，巴里中尉炮兵团的阿姆斯特朗大炮和马丁炮兵团的9磅大炮（都由德斯伯勒指挥）以大约八百码的射程朝敌营开火。此外，左边还架有一门法国大炮，同时还有法国和英国的火箭炮各一门。

连续开炮25分钟后，敌方骑兵向其营地左面撤退。于是，大炮推进到约五百码的射程朝敌人所在的位置开火，攻击目标仍是敌方骑兵——他们正朝右撤离。两门阿姆斯特朗大炮的火力立即驱散了

敌方骑兵。几分钟后，我军继续前进。敌人很快弃营逃跑。斯特灵手下分派给骑兵旅的一半炮兵，因行走在黏糊糊的地面上而跟不上骑兵，所以由麦克格雷格上尉指挥的费恩骑兵团中的三十人护卫前行。由一百名清兵组成的一支小分队冲向大炮，他们来得如此之快，上尉根本没有时间命令手下士兵迎战。不过，所幸一小队锡克骑兵在他们英勇的指挥官率领下迅速制止了攻击者，将他们击退。不过，可怜的麦克格雷格脸颊和肩部严重受伤，一个清兵在离他几码的地方朝他开枪，火枪把他的脸熏得黑不溜秋。这期间，我们的骑兵也没有闲着，可是他们的坐骑太疲劳，根本赶不上清兵膘肥体壮的战马。尽管如此，我师几个散兵正好赶来，结果敌军损失惨重。第1师和法军此时已经占领了敌人控制的从北塘去新河营地的通道，我师几个散兵对那些朝大沽要塞方向撤退的清兵进行了最后的射击。我们继续向新河前面的一块围有栅栏的平原推进，途中到处可见身体被炸碎或是缺胳膊少腿的清兵，他们都处在垂死的痛苦之中。

部队路过时，这此景象在不同的人身上产生了不同的效果。仔细观察之下，挺有意思的。中国苦力通常会跑上前去，把他们已死或将死的同胞的身体翻过来，指着他们的脸哈哈大笑，或是把他们的口袋翻个底朝天。英国士兵却总是惊叹：“可怜的野蛮人！他们一点也不了解我们的实力，不过他们都是非常勇敢的伙计。”军官们则指着强壮的尸体感叹：“哎！他们只是缺乏正当的操练和一位勇敢的将领，否则他们一定是优秀的士兵。”军医官则会蹲下来，伸手戳戳死者的伤口，然后从伤口中取出一块弹片，评论道：“阿姆斯特朗真是威力无比！”然而，对于一个不习惯“大炮狂野的呼啸”和“垂死者的呻吟”的人来说，眼前这一幕幕的景象恶心得令人发抖。可是，在场者的兴奋富有极强的感染力，很快便将人性中仅存的善良感淹没。于是，我也跟着其他人一起狂呼：“野蛮人，

他们活该！他们咎由自取，这都是因为他们去年在要塞使诈、口是心非带来的后果。”

一名真正的蒙古士兵躺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他的一条腿已经分飞两处，显然是被同一块弹片炸到了。一块尖角的金属片（每个弹片里装有42个这种金属片）将他的大腿劈成两半，另一块金属片将同一条腿膝盖以下的部分砍掉了，还有一块金属片打在他厚厚的鞋底上。他立即被抬上担架，有人给他灌了白兰地和水。这个可怜的家伙疼得左右翻滚，痛苦不堪。他戴着一个蓝色顶珠，五品官衔的标志。他很不愿意跟我们说话，也不想跟我們有任何关系。正当他躺在那里痛苦万分之际，我们那位从北塘抓来的向导走到他身边，嘲讽似的问他，清兵现在是否相信联军野战炮所向披靡。就在大约一个多小时的过程中，几位本性善良的医生替他做了截肢手术，但是手术后没多久他就死了。

火力侦察那天，清兵认为他们取得了胜利，正是这次胜利让他们表现出惊人的勇气。我军的战斗力完全靠炮兵支撑，而他们那六七千骑兵大都带着弓箭和长矛，只有少数士兵使用火枪。可是，他们却如拿破仑将军所说“顽强抵抗直到最后”。起初，他们表现得很乐观。然而，这样一个羸弱之师何以抵抗一万名装备精良、受过严格训练的英国士兵，何况还有五千名法国援军？因此，我们的损失很小——牺牲了两名锡克士兵，另有一些人负伤。邻近平原方圆几英里的土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当地士兵的尸体。这表明，他们当天运气不佳。敌方的损失估计是一百至五百人不等。但是，由于受伤的士兵被他们撤退的战友抬离战场，许多伤员被担架抬到河对岸去了，因此对敌方的损失只能进行大致的猜测。第2师在新河前面那块围起来的平原上滞留了近两小时，最后接到命令，士兵们自行安排就地过夜。就这样，没有营帐，没有被褥，只有口袋里剩下

的那一点点干粮。在这样的环境下，在沼泽地允许的条件下，我们尽量让自己快活。我们右边是一片圆形带防护沟的营地，四面被泥巴墙围起来。围墙内有一排泥巴小屋，小屋中间留出一块空地，不过此时空地都被水淹没了。小屋里存放着一些衣物、一串串的铜钱、锈迹斑斑的长矛、刀剑、弓箭以及其他中国武器，还有几盘中国的美味佳肴。但是，每间小屋看上去都像是一个狗窝而不是人住的地方。不过，有些士兵肯定具有文学才能，因为屋里偶尔可见一些用汉文、蒙文和满文写的文章。与此同时，这些文章也表明不同种族的人曾经混住在一起，在这个小屋里一起嬉闹、生活过。我们在附近另一个带围墙的场地内发现两百多匹毛发浓密的蒙古马，瘦骨嶙峋，显然已经饿得半死了。一头外形酷似单峰骆驼、样子笨拙的畜生，被从鼻孔里穿出来的绳子绑在一根柱子上，个子远远高出其他马儿。它的毛发已经落光，全身沾满了泥巴，一副痛苦的表情。如果这些可怜的畜生没被好好喂养，那完全是因为主人的粗心大意，因为村子附近就有一个巨大的干草垛。这个干草垛正好用来喂养征战者饥饿的战马。

正当我努力地分散自己对中国伤员的注意力时，普罗宾少校叫我陪他到不远处去看一个落马的清兵。我走过去，看见一个着实可怜的家伙。这个可怜的人跪在泥巴里，浑身血渍，肮脏不堪。他的一只手被一块破布绑在手腕上，两条腿都断了，后脑勺被马刀砍开了一个大口子，可以看见跳动的脑浆。尽管伤成这样，这个不幸的可怜人还有意识，还能说话。将军命我向他提几个问题，问问他当天敌人军队的力量及其他一些问题。这个痛苦的人恳求我们立即杀了他，解除他的痛苦。我拒绝再用任何问题折磨他。我们知道他很快就会得到解脱，便离开了。几小时后，他死了。

与此同时，几位将军站在第1师驻营地的城墙上，勘察他们所

在的位置。在大沽方向约三英里处，出现了另外一个壕沟防护的营地，环抱着塘沽村。一条凸起的堤道通往那里，堤道两边都是水沟。左边是沼泽地，和我们路过的那些地方一样。右边是平原，平原上有数不清的水沟和溪流。炮兵不适应这一带的地形，而且经过一早上的艰苦行军，士兵们已经非常疲劳，因此，霍普·格兰特爵士决定推迟进攻计划。但是，蒙托邦将军不满足于早上那点“孩子的小把戏”，希望立即进攻塘沽村，如果可能的话，再向要塞推进。因此，蒙托邦将军率领法国士兵出发了，我军派第60来复枪团和第15旁遮普团支援，法军用膛线加农大炮以1800码的射程朝敌人开火。中国军队猛力反击，法军司令玩了大概一小时，就回来了。之后，他也下定决心要让军队在新河附近过夜。

一个温暖宜人的傍晚很快就被潮湿的黑夜取代。幸好，我师好心的首席军医官汤普森医生借给我一条毯子。我把自己裹起来，全然不顾空气里的湿气和地面上的潮气，舒舒服服地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阳光灿烂。我们坐在坟头——这些坟墓的斜坡在晚上就是我们的高枕——喝可可饮料，温暖的阳光很快驱散了我们骨头里的寒气。我们朝新河方向闲逛。新河村坐落在一条狭窄的运河岸边，更确切地说，那是从半英里外的白河分流出来的一条水沟，流经一片果园。几艘小渔船搁浅在这条水沟的淤泥里，上面挤满了从村里来的男女老少。一条宽敞的马路从新河通往天津，马路两边各有一条水渠。可是，左右两岸的景色真是天壤之别！左边，一眼望不到边的沼泽地，沿着流经村子的那条河流一直延伸到北塘，沼泽地里零星点缀着锥形的坟墓。而在白河这边，两岸都是篱笆围起来的果园，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从北塘那一望无垠、寸草不生的沼泽地到眼前这枝叶繁茂的景色，真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变化！我们走进果园，在那令人愉快的曲径中一阵狂欢。果园里种着

西瓜、桃子、灯笼果，还有各种各样的蔬菜。随后我们穿过村子，村里的大道是一条蜿蜒漫长的商业街。街道两边的房子都有人闯进去过，里面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村里的人大都逃走了，留下来的只有一些最穷的村民。尽管将军特意嘱咐士兵不得在镇上扎营，老百姓还是惶恐不安。

我们还参观了敌人设在去北塘路上的防御工事，也就是第1师和法军轰炸的地方。构成这个防御工事的只是一面长长的墙，锯齿状的拱形墙在道路两边延伸，道路从要塞的正中穿过。四周散布着几间拱顶泥巴小屋，是给清兵居住的。一个搭建在柱子上的蓝色大布篷竖立在小屋中间，可能是供骑兵将领或是僧格林沁本人居住的。泥巴小屋是用一捆捆的长芦苇搭建的，芦苇被折成一个半圆，两头插入地面，构成一个屋顶，屋顶上盖有一层用泥巴和碎草和成的涂层。屋子的前后都用泥巴和芦苇封起来，屋子后面留出一个方形的洞作窗户，前面留出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椭圆形的洞作门，每个洞里都装了木头框架。那个用作窗户的木框架上糊了一层纸，而那个作门的则用泥巴和灯芯草遮着，其他的泥巴房子都是类似的结构。敌人没有在这个地方安放大炮，墙内也似乎根本没有驻兵。这样看来，在新河夺取的两个敌营只不过是敌军骑兵的岗哨而已。

将军已传令到北塘，让他们把士兵的行李全部运到前线。傍晚之前，每个士兵都搭起了自己的帐篷。13日晚，我们驻扎在沉闷的平原上。正当我们躺在营帐里时，营地上空拉响了两次警报。第一次发生在我们右边的岗哨，他们看见一队骑马的人，疑似满清骑兵，便朝这些人开火了。我师所有人立即起床，将军命令所有士兵集合。我们对敌人的偷袭早就作好了充分的准备，黑夜中一场混战如弦上之箭。旅参谋长骑马过去，结果发现岗哨那边已经形成一个方阵并且非常恐慌。敌人——究竟是不是敌人还有待考证——再三

思虑，撤退了。大家在夜晚的寒风中冷得瑟瑟发抖，半小时之后，警戒撤销，所有人都回营休息。然而，我们晚上的睡眠注定又一次被打断。回营不到一小时，一头可恶的骡子挣脱缰绳，在营地里一边四处乱跑，一边发出尖锐的嘶鸣。在晚上最安静的时刻，没听惯这种四脚杂种动物叫声的人，势必会被惊醒。因此，在死一般沉寂的夜晚，从恐慌中恢复过来的士兵们被这声音吓到了。有人喊说，清兵在我军营地奔跑叫喊。这一喊叫立即使军营陷入巨大的恐慌。士兵们又一次紧急集合，军官们都拿着手枪，蓄势待发。旅参谋长又一次被派去探查实情，他回来报告说这次警报是假的，并警告大家不要被这种幼稚的东西吓倒。所有人又像之前一样撤退了，并且决定不是真正有必要的时候，绝不起来了。前一天，有个清兵间谍骑马去我们的一个岗哨时被俘虏了。也许，这件事让大家怀疑敌人会在晚上偷袭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俘虏是一个中年男子，长着一副典型中国人的脸孔，穿着一件脏兮兮的普通中式长袍和短夹克。他头上戴着一顶帽子，形状有点像满族人的冬帽，但是帽顶装饰的不是红缨，而是两条猫尾巴。猫尾巴一头粘在帽顶上，一头指向后面，就像普通满清骑兵的徽章。他佩带着一柄生锈的箭和一支长矛，坐在一个木制的马鞍上，马鞍两边用皮带系着两个大大的圆底铁马镫。马鞍用两条窄窄的皮肚带绑在小马背上，一条绕在马儿的肚子上，另一条绑在马儿前腿的后面。马儿的笼头也是皮的，笼头用平头钉粗略地钉在一起，撑着一个坚硬的铁嚼子，铁嚼子由一根缰绳控制，缰绳上缠着一层布。他骑的马是一匹强壮的小雌马，与舍得兰群岛一带的马种非常相似。从他说话时频繁使用犬状文字（因为他一个汉字都不会讲）来看，我明白这个骑兵是蒙古人。因此，我们从他身上毫无收获，最后把他当俘虏移交给宪兵。宪兵下士把马儿的缰绳交给手下一位士兵，把这个蒙古人从另外两个人身

边带走时，用讽刺的语气嘀咕：“没问题，可是难道这些人也是我们的敌人吗？”

天刚破晓不久，将军的副官就来通知我们，凌晨5点部队开始前进。由于第1师准备在当天早上对塘沽发起进攻，所以第2师要留在塘沽与新河之间，作为后备力量，以备不时之需。我不需要执行特殊任务，所以便赶在从新河出发的部队前面，尽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了解事态的发展详情。我在前文已经提过，从新河到塘沽之间有一条堤道，约三英里长。堤道左边的土地是一片广袤的沼泽地，而右边则是一片地势低洼的潮湿平原，平原上沟壑交错，不过我们的工兵连已经在沟壑上搭建好了桥梁。一排延伸到塘沽方向的果园横亘在平原与河流之间。塘沽地区的防御工事就是一面三英里长的半圆形、呈锯齿状的防护墙，护墙两端都建在河岸上。联军从堤道右边进攻塘沽，英军在右路靠近河道，法军靠近马路。巴里的阿姆斯特朗大炮和德斯伯勒的9磅炮架起，从最右边射击。米尔沃德的阿姆斯特朗炮和高文的大炮则从中间开火。进攻的前一晚，联军在离防护墙不到七百码的地方已经挖好了战壕，用以掩护步枪手。前线大炮由两百支步枪掩护，按战斗顺序部署，由里戈少校指挥。几个皇家团和第31团跟在步枪手后面，其次是女王卫队、第60来复枪团和第15旁遮普团。在新河往南约一英里处，河道突然拐向南面，然后又迂回到北面，依着塘沽向前流去。清军在河道第一个拐弯处设了一个炮台，不断骚扰前进纵队的侧翼。巴里受命调出两门阿姆斯特朗炮去摧毁敌人的大炮，但是射程只有250码，射击不见成效。于是又选派了德斯伯勒的三门24磅大炮取代阿姆斯特朗炮，他们很快有效地阻止了敌人的骚扰。敌人另一个炮台设在河段下游，朝我军开火。此外，河面上还停着一些小帆船，也不停地狙击我方部队。消灭这些力量的任务落在部分英勇的海军手里，

他们很快就完成了使命。“切萨皮克”号上几位军官带着二十位士兵乘了一艘小帆船渡过河，打哑了炮台里的大炮，放火烧掉了那些令人讨厌的小帆船。原来，敌人的炮台上有两门 12 磅和五门 6 磅的铁炮。一些满清骑兵出现在拐角处，我军勇敢的水手们用手枪跟敌人火拼了一番才得以脱身，回到对岸。在短兵相接之中，一位水手被子弹打穿了胳膊。与此同时，部队继续前进，大炮以八百码的射程向敌人用壕沟防护的营地开火。中国军队用火枪和一些重型大炮进行顽强的抵抗，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段时间。然而，敌人要对付英法联军的 42 门大炮，所以战斗很快就分出了胜负。没多久，战斗中断了，我军立即乘机向前推进，重新向敌人发起了致命的攻击。最后，中国的大炮都被摧毁了。约翰·米切尔将军命令步兵团开赴前线，立即从壕沟上的一道拦截流水的堤坝上冲进要塞。清兵跳过防护墙，穿过空地慌忙逃往村里，步枪手冲在最前面，追击逃跑的清兵。同时，火箭炮在逃兵们头上呼啸而过，划出优美的弧线，吓得他们惊慌失措，不由得加快了脚下的速度。逃兵们沿着堤道，跑到河边，从一座往大沽去的浮桥上过河，然后跑到河道下游一个很远的村子里。像往常一样，法国人立即宣称是他们最先冲进要塞的，而且蒙托邦将军还奖励了第一个进入要塞的法国人。可是，当法国大炮还在轰炸这个地方时，我们的部队肯定已经在要塞里面了。部队拥挤在堤坝上，我挤到他们前面，看见在护墙和村子之间围着一大片空地，空地上都是泥巴和盐水池，跟北塘差不多。护墙脚下有一排排用泥巴建的小屋，在要塞入口和村子之间竖立着一座稍大点的方形小木屋，显然是敌军将领的居所。大炮周围横七竖八地躺着中国士兵的尸首，有的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护墙没为清兵炮手提供多大的保护，但是他们在阿姆斯特朗大炮致命的火力面前，怎么能坚持这么长时间？真是令人惊讶。不过，我在多个炮

位看见，不幸的炮兵们的大腿被绑在炮上。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这的确是我几个军官亲眼目睹的，这些可怜的已死或垂死的受害者被绑在用来对抗我们的武器上。所有阵亡的中国士兵外衣的胸前和背后都印着圆形的白色徽章，徽章上刻着的汉字代表他们属于直隶总督营，他们的腰带上挂着的木牌子上刻有同样的汉字以及代表他们在部队的等级头衔的数字。大筐大筐备用的火药和大小不一的炮弹放在大炮旁边，还有许多小瓶装的点火药、炮臼和一卷卷已经点燃过的引信。

整面护墙下共架有 45 门大炮，其中 16 门是铜炮，其余的都是铁炮。铜炮的口径为 4、6 至 24 磅不一，大都做工精致，而多数铁炮很小。每位将军对驻扎在要塞的中国军队数量估计都不一样，大概是两千到六千左右，但是他们损失的兵力很难准确估算。大炮周围和战壕四周的壕沟里尸体不计其数，还有许多人逃到村子里死了，更不用说被小帆船或被撤退的士兵运走的人数。我们在一排封闭的小屋里找到一些木鞍和中式马具，足以用来装备大量的士兵，但没有发现骑兵。尽管敌军火力猛烈，但我方伤亡甚少，真是奇妙。没有人牺牲，仅有三位英国炮兵和十几个法国炮兵负伤。另外，米切尔将军的坐骑在他眼皮底下被击毙。我立即赶往塘沽村，掠夺已经开始了。成群结队的法国士兵手持刺刀，在街上横冲直撞，闯入民宅，四处劫掠。第 1 师和法军推迟了大约一天的时间，才回到他们原来驻扎在新河和塘沽之间那块平原上的营地，而拿破尔将军率领的部队则受命驻扎在刚占领的村子里。副总军需官立即投入工作，将房屋划分给不同的军团或个人，行李很快就运来了，大家都能在新的营地舒舒服服待着了。村里大部分的屋子里都有一些物资储备和水，甚至有些屋里还留有热茶，这说明房屋的主人刚离开不久。街上到处是猪。一部分人被派去街上抓猪，很快所有可

怜的猪都被屠杀了。士兵们非常喜欢这种狂热的行动，对这些游戏的牺牲品毫不留情。因此，被杀死的猪远远超出整个部队一个星期的量。多余的死猪便留在屠杀地点。天气炎热，死猪的尸体很快腐烂，看了令人作呕。拿皮尔将军和他的参谋部住在村里河道旁的大寺庙里，名叫“三官庙”，即三个官员的意思。从那里过一座木桥就可以来到壕沟对岸。沿着河流拐弯处有一条马路（河流从这里突然朝南面拐弯离开村子），通往约六百码之外的一处要塞门口。站在门口，越过要塞的围墙，可以看见一条马路穿过一大片淤泥滩，马路通到约两英里外的一小片牢固的建筑物。这片建筑物对面就是长期落后的大沽村，在大沽村中心有一座两层高的大宝塔，那就是僧格林沁军队的总部。再往前走就是阴森而险恶的要塞，上面飘扬着无数挑衅的战旗。霍普·格兰特爵士不急于推进他的胜利之师，也不打算以牺牲许多士兵的代价立即占领那些难以对付的要塞。像任何谨慎的苏格兰人一样，他宁愿等待时机，等进行充分的火力侦察、重型大炮架好、其他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才会让中国人见识我们的厉害。摆在他眼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需要扎实的工程学知识，那么除了他可信的战友拿皮尔将军之外——将军曾是孟加拉国工兵连一位杰出的、技术精湛的军官——还有谁能胜任呢？出于这个原因，为夺取大沽要塞所做的一切必要准备工作便由第2师专门负责。我们都觉得，这事儿得让我们在塘沽待上一段时间，所以大家都努力寻找机会自我放松。第3团的两个连被派去守卫通往大沽的各个入口，由英勇的萨金特上校负责。他曾参加过1842年的对华战争，丰富的经验可确保他更好完成在这一战役上的重要任务。

我们夺取塘沽后不久，敌人便放弃了前文提到的通往北方要塞路上的一个小营地，通过浮桥过河，溜之大吉。敌人过河后毁掉了浮桥，撤掉了停靠在大沽码头的所有船只。要塞上架着的一门大

炮——在大沽村的角落与河段的底端交叉的位置——不时朝街上开火骚扰我军，所幸未造成任何损失。反复几次之后，中国人觉得没趣，便放弃了攻击。结果，为搬回那件新的战利品，我们累得半死。

安排好士兵的起居饮食之后，拿皮尔将军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村里受伤的百姓。将军命令专门腾出一些小屋来报答这些人，并且为他们指派了一位军医官。随后，几支小分队被派去全村搜寻受伤村民，以及那些因年长、行动不便或其他原因仍然滞留在村里的人。因此，短时间内村里所有无助和贫困的人都被带到我们这里，再见多识广或看见过更脏东西的人，都没有见过像这些村民的人——女人，有老有少，有美有丑；儿童；各种体态、身高和年龄的男人们，有些男人受了严重的伤，脸上露出挣扎在死亡边缘时的痛苦表情，非常可怕。但是，所有人都跪在地上哭，吓得全身发抖。下午，有人看见从远处一个营地出来几个骑马的人，这些人立即被一阵枪林弹雨挡住去路，最后他们亮出白旗才得以通过。原来，这群人是一个头戴白色顶珠和孔雀花翎的六品小官的护卫队，此人替当地统治者(恒福)给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送来两封信。骑马护卫在约三百码之外的地方停下，下了马。那位官员和陪同他的几个大沽乡绅——他们都穿着体面的白色夏布长袍——走上前来，到屋里跟我和几位军官会面。萨金特上校和我一起走出去，上校接过信件，但是拒绝给他们出具“信函收讫”的书面证据。为了这份证据，那位官员向上校苦苦哀求。

村里的乡绅走过来，开始劝说，抱怨说他们的政府和我们之间存在误解，而他们却成了无辜的受害者。他们问我，在我们的愤怒发泄在大沽百姓身上之前，有没有和解的希望。我告诉他们，如果村民持中立的态度，我敢保证他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我们反对的只是统治者而非被统治者，况且我们的目的只是想打击一下那边几

门大炮的嚣张气焰。既然他们对自己可能遭受的痛苦这样担心，那么他们一定很同情我们手里那些无家可归的可怜同胞，一定愿意立即接管这些人以表达他们的同情心。他们回答说，如果还有村民在我们手里，他们当然非常愿意让这些人得到照顾。因此，在将军在首肯下，我回屋把所有未受伤的村民带到外面。那些行动便利的村民得知可以离开非常高兴，一出门便匆匆地走开了。其中，有一个又矮又胖的老妇人，她那已成年的闺女扭伤了一条腿，躺在担架上。这个做娘的甚至连句“再见”都没跟女儿说，就匆匆地离开了。那个可怜的闺女(说实话她长得相当漂亮)在她身后喊道：“噢，娘！娘！别把我丢在这儿等死啊。”但这位无情的母亲对女儿的呼喊充耳不闻。我试图安慰这个可怜的姑娘，可她已经伤心透顶。我用什么办法都安慰不了她，便打发了两个壮实的老乡，趁她躺在担架上时把她抬出去。还有一个瘦小的老太太，老得快要进棺材了，什么都需要别人照顾。她躺在那儿，对身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还有一个胖乎乎的小孩儿，刚刚蹒跚学步，但无人认领。我们把这一老一小连同其他人，总共三十人左右，都交给那个官员。该官员询问每个人，在大沽是否有亲朋可以投靠。除了老太太和小男孩之外，其他人都说有。实际上，这两个都是孩子，也就是说，都不具备说话的能力。官员使劲摇晃那个老家伙，但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便转身看着我，脸上带着做作的笑容。“您让我拿这个什么也不知道的老家伙怎么办呢？”“让我们看到她得到照顾，”我答道，“她是你们的同胞啊。”他耸了耸肩说道：“我可养不起她，我看，也没人愿意养。你们还是自己照顾她吧。”说完这些话，他急忙转身离开，背后跟着身穿长袍的头面人物。衣衫褴褛的群众也尾随这些头面人物离开了，只留下老妇人和小男孩。我追过去，喊道：“如果你们不要这个老人，那必须把这个孩子带走。”官员停下脚

步，命人把孩子抱过去。他们没走多远，就把小家伙扔在泥滩上不管了。萨金特上校强忍怒气，狠狠地挤出一句“畜生”，立即叫一个士兵把可怜的小男孩抱回来。这样，小男孩和老太太又回到了他们先前待过的收容所。

我们的两位全权特使没有答复那两封来信，第二天又出现了一面免战白旗，以及更多的信件。仍然没有答复。第三天，对方又送来一面免战白旗和更多的信件，并正式宣告，他们抓了我军几个战俘，不过会立即归还我们。他们果然说话算话，很快便释放了我军第3团的一个中士和一个马德拉斯工兵。两个士兵都遭受了敌人的折磨，受了很多苦，没法站立。两人的手腕和脚踝都被捆绑他们的绳子勒伤，非常可怕。那位中士回来后经常说疯话，显然已经被逼疯了。

第二天，额尔金勋爵写了一封信交给巴夏礼，让他带些人和一面免战白旗前往大沽对面的营地。他们站在河岸，挥动手中的白旗，很快有一艘小船向他们驶来。他们一到对岸，就被带去见直隶总督恒福，并跟他进行会谈。会谈过程中，双方达成协议，清军用他们俘虏的几个广东苦力来交换我们手里的一些伤残人员。恒福称，朝廷专员正在前来与联军和谈的途中。他竭尽全力想让我们承诺，在额尔金勋爵答应与他们会谈之前，我军不再进攻他们。出于这个原因，中方急于劝解我们交换俘虏。当天下午，13名苦力回到我军营地，我们手里那些受伤的百姓也交到那个粗暴的“白顶珠”手里了。看到那些广东苦力憔悴的面容和他们身上溃烂的伤口，令人心酸。其中有个不幸的伙计脑袋被打破了，一个穿红夹克的人立即把他背进营。可怜的人，脑壳上撕开了一条很深的裂缝，可以看到里面的脑浆，裂缝四周爬满了蛆，令人恶心。这些受伤的苦力一瘸一拐地走在营地时，士兵们纷纷谴责敌人的残忍。但是，大家都纳闷，他们没有受到更悲惨的遭遇。我们都知道中国政府对

叛军有多么残忍，他们绝不会对广东苦力另眼相待。他们坚信这些广东苦力是我们军队一支重要的力量，但是这次他们没有按照惯例对叛军格杀勿论。那么，唯一能解释这次反常现象的就是，清政府希望能通过对苦力们手下留情一事来减轻我们内心的愤怒。

根据我们从不同人那里听到的叙述推测，清军俘获外国士兵和广东苦力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在战斗打响的第一天，离开北塘时，第44团的一位中士、第3团的一个老兵和两个马德拉斯工兵负责看管由16名苦力运送的部队的掺水烈酒。出发时，他们还跟在大部队后头，但可能是因为脚酸或口渴，便坐下来歇息，结果睡着了。醒来后，他们找不着去路，正在这时远处来了几个骑兵，他们误以为是锡克骑兵就朝那些人走去。结果，那几个人是满清骑兵，其中有两个人骑马冲过来，我军士兵立即朝他俩开火。这两个人返回大部队，又带了两个人冲上前来。看见大队骑兵朝他们冲过来，第3团的老兵朝他的战友大喊：“哈！伙计们，我们很快就会知道那个大‘秘密’啦。”说完，他和两个马德拉斯工兵向冲上来的敌人开枪。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这个老兵牺牲了。两个苦力受了重伤，另一个苦力逃跑了。其他人都被俘虏，送往天津。在去天津的途中，清兵杀害了一个马德拉斯工兵。据苦力所说，清兵是在一座寺庙或是“两根柱子”（不管多大的寺庙前面都竖着两根柱子）前将那个工兵杀害的。中士和活下来的工兵乘同一辆马车，而苦力们被另外两三辆马车拉走。他们被当作战犯在天津示众，并遭到毒打。苦力们的发辫都被剪掉了，没过多久这些人又都被带回大沽，他们就是在大沽被释放的。

我军在新河和塘沽一些官邸发现了中国政府的信函和其他文件，这些东西向我们揭示了中国政府在与我们的关系问题上的一系列想法。其中有一份是“北京军机处”下达给统军大臣僧格林沁和

直隶总督恒福的上谕，日期是1860年3月27日，另附普鲁斯先生在上海给清政府下达的最后通牒以及报纸的一些摘要。谕令对“夷寇”的“反判”言辞进行批评，又称已命军机大臣照会何（桂清）转复“夷人”。谕令又提及夷船正在大沽附近勘察，欲寻登陆地点，遂引用报纸新闻，与钦差大臣何桂清奏折所述相同，英法增兵三万人侵入中国欲夺要塞，此事在“夷国”下议院引起轩然大波，这些内容在何桂清的奏折中也有提及。上谕内容如下：“……然卜鲁斯与布尔布隆，狼狈为奸，其情凶狡，所言添兵及登岸攻我炮台之后，亦不可不防。着僧格林沁、恒福，相度形势，妥为布置……原折及所呈新闻纸，着抄给阅看。俄酋伊格纳提业福……有兵船数只……现在海口设防……勿得在海口逗留，致多不便……”^①僧格林沁和恒福对上述谕令的回复大意是，夷寇不敢冒险再次正面攻打要塞，但很有可能在未设防守的北塘登陆。即使夷兵冒险越过盐滩，北塘后路布置的马队各营骁勇善战，切断三万夷兵并非难事。倘若夷兵幸而越过新河，必再遭上年重创。他们转而又写道，报纸吹嘘的夷兵力量或再次攻打要塞的消息不足信，其目的只是虚张声势，借机恐吓皇帝臣民，同时用以掩盖夷寇自上年受创之后的怯懦与恐惧，若“本年果欲增兵报复，上海必不稍露风声”^②。

人们不禁要问，清政府官员如此漠视外国政治事务，他们是如何获悉英国下议院就远征中国所发生的辩论，又是如何得知报纸上发表的新闻呢？然而，大沽战败（1858年）后，我们并没有求和。这肯定让在北方港口与我们的人直接打交道的官员们心惊胆战。他们知道，外国人一旦发起脾气来就像豪猪一样不好惹，而且他们察

^① 参见《第二次鸦片战争（四）》，1978年版，第318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323页。——译者注

觉，五个开放口岸都没有立即准备行动的迹象。于是，他们便向在外国机构里工作的收账员或是老师打听这方面的消息。毫无疑问，这些人便向他们的雇主打听，并获得必要的细节。当问及蛮夷在开放口岸的行动时，这些消息自然就被反馈到北京，从而让内阁获悉。因此，便颁布了上文提到的给恒福和僧格林沁的谕令。

在欧洲人开设的商行里工作的中国职员大都具备英文读写能力，不过高水平的人为数不多。清政府经常雇用这些人搜集一些能为他们对外关系提供线索的消息。由于这些人总是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贿赂，因此很难保持沉默，哪怕纯粹是生意上的事情也是如此。

另一封信函中统兵大臣告知直隶总督，他在火力侦察那天成功击退夷兵，并说他担心恒福为安抚夷人而采取的外交计划可能导致战场上的惨败。恒福复函说，他并不希望利用外交来干涉统兵大臣的计划，而且他相信统兵大臣会尽最大的努力保护新河和塘沽地区，因为这些地方是保护要塞的关键地点。在信函结束之前，恒福告示凡俘获敌兵首领和士兵者可获重金悬赏，也许他希望用这些俘虏作为迫使敌人接受条件的筹码。他还专门下令捕获额尔金勋爵，因为这个企图一旦得逞，就意味着战争将立即终止。

第 6 章

攻打大沽要塞计划——英法将军的分歧——搭建浮桥——接近要塞——进攻前夜——进军要塞——进攻之描述——无条件投降——伤亡人数——清军勇士——大沽要塞之描述——中国伤员——人种差异——受伤的卖饼伙计

迄今为止，忠实的读者已随我们到过优美的大连湾，在那儿度过短暂而精彩的营地生活；去过一望无垠的北塘泥滩，见过当地痛苦和颓废的景象；还经历了在新河和塘沽打的两场小胜仗。不过，最精彩的景象——大沽之战——留待本章叙述。此次战役中，敌人尽管在数量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然而高贵的英国子孙在他们同盟国英勇的支持下征服了敌人，打击了敌人傲慢无礼的嚣张气焰，勇敢地挽回了祖国受损的荣誉，一雪去年战败之耻。

8月14日，塘沽落入我军之手，罗伯特·拿破尔将军之师驻扎在该地，为夺取大沽要塞作前期准备。但是，联军遇到进攻路线的难题。我军对敌人进行了火力侦察，并向中国俘虏询问了道路情况，之后联军两位总指挥官举行了磋商会谈。可是，联军阵营却出现了分歧！霍普·格兰特爵士持一个观点，法军司令却持另一个观

点。问题是，通过预期的胜利希望达到什么目的？只是希望以最小的损失占领要塞获得进入河道的权利，还是不惜一切代价将僧格林沁部队一网打尽，消灭这方面对我们的不利因素，以此让中国政府臣服在我们脚下？霍普·格兰特爵士的策略倾向前者，而蒙托邦将军则偏向后者。他的计划是，联军过河后一起进攻南岸要塞，切断敌人往天津方向撤退的后路。因左侧是海面与河道，清兵势必投降或被歼灭。倘若清兵过河试图从北面逃跑，我们的骑兵可以围堵。这样确实可以打击僧格林沁及其同党的嚣张气焰，但是我方的损失无疑将是惨重的。南岸要塞有三座炮台，且架有多门大炮，因此比攻打其他炮台艰难得多。况且，该要塞具有地理上的优势，后面有一条通道可穿过狭长的塘沽村。村子一头临河而建，另一头则被一面五英里长的护墙环绕，护墙紧连要塞的围墙。我军久经沙场的司令一眼就看出，北岸要塞是控制所有要塞的关卡，因此消灭北岸要塞是夺取其他要塞的关键一步。再者，北岸要塞的防守远不及其他要塞，攻打起来易如反掌。其三，攻打该要塞对我方造成的损失远远小于法军的攻打计划。我们需要确保的主要目标就是占领要塞，控制河道。倘若僧格林沁受惊，带大部队逃跑——他很有可能会这么做——我们给他的教训也足以让他今生难忘，而且他今后再也没有勇气与我们对决沙场。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征服这个国家，只是为我们与当局政府谈判开辟道路，同时以牺牲更少的生命为代价，牟取更大的利益。当时，部队上下普遍都是这种想法和说法。霍普·格兰特爵士目标非常明确，决定按照他的原计划执行。蒙托邦将军最后也勉强予以支持，不过他声明，一旦进攻失败，后果由格兰特将军独自承担，与他无关。攻占北岸要塞的当天，战斗非常激烈，加农大炮不停地空中咆哮，可是有人却看见一位法国军官正骑着马悠闲散步。那人问他怎么没参加激烈的战斗，他回答道：“啊！

先生，今天只不过是打小闹，明天你会看到更精彩的。”然而，我们都知道，明天再也不会到来。

我们发现，利用轮船过河速度缓慢且过程漫长，必须找到其他方法过河。河面上仅有一座浮桥设在于家堡，前文已提及，这座桥在塘沽陷落当天已被敌人摧毁。因此，我们必须在河面上搭建一座类似的通道。有人建议，将新河附近的一个点作为工程地点。绳子、支柱以及其他材料都从北塘运来，木材只能在新河和塘沽一带寻找。我们在塘沽筑坝拦水的水沟里，找到许多像游艇一样的平底大型船只，这些都可以派上用场。海军把船运到河道上时受到敌人的炮火攻击，不过现在这些船只已得到修补和复位。14日上午，海军成功地打哑了敌人的大炮。为了摧毁敌人的炮火，巴里的两门阿姆斯特朗重炮立即被调往塘沽村角，很快清除了敌人制造的障碍。船只被安全运送到河面，搭桥工程顺利开展。现在的任务就是在河对岸选择一个地点作为浮桥终点。18日，法军工兵连的莱维上校带领三百人马到南岸去执行这项任务。此处的河道不到两百码宽，河对岸有几间房屋坐落在果园之中，果园当中有一条两旁插着树篱的马路，迂回曲折的马路通向连接大沽和天津的大路。莱维上校一行沿这条马路前进，遭到埋伏在果园两边的清兵攻击。法军立即遣散兵迎战，将敌军从埋伏地赶跑。这队人马继续前行，来到一个矮树丛。他们在那里开辟道路时，看见一个清兵营地，大约有两三百名士兵把守。他们立即英勇地攻占了那个营地，结果发现进入了敌人的老巢，骑兵从四面八方涌来。他们向蒙托邦将军请求支援，蒙将军立即回应了他们，派出部队和大炮前去增援，使队伍人数增加到一千四百人左右。这样，法军成功地在对岸建立起浮桥的另一个端点。法军在英军之先获得南岸要塞这个立足点。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法国人才据理力争要从南面进攻大沽主炮台，因为在

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占据主动地位。

19日，法军司令也送了一面免战白旗去拜访大沽的官员，至于这次会晤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拿皮尔将军之师进驻塘沽之后，除了执行其他任务外，还要计划进军大沽的路线。我们不打算走那条从塘沽要塞口延伸至邻村等地的现成堤道，而是在村里锯齿状的泥墙上开了一个缺口，打开了一条离河道更远、但更直接的道路。我们在村子与这面墙之间的几条沟渠上搭好了通道，在泥巴路面上铺了一层灯芯草以加固地面，然后在墙壁四周的壕沟上搭起通道，其他的准备工作也都做好了，可以朝进攻目标迈进。19日，皇家工兵连和马德拉斯工兵连继续在马路上开展他们的工程。傍晚时分，拿皮尔将军让我陪他到施工地去，向当地人打听通往要塞的最佳路线、哪里沟渠最少、这些沟渠的深度、沟渠涨潮退潮的时间等等。三个当地人，牵着两只膘肥体壮的骡子，被我们俘虏关在离要塞不远的一个小屋里。这几个人是从附近盐场里抓来的，他们全然不顾附近的敌军，继续在盐田里干活。他们穿着肮脏的衣服，脸上露出贫穷和饥饿的表情，虽然害怕得浑身哆嗦，却一直对我们撒谎，告诉我们那些沟渠是专门为运输盐而挖凿的，与要塞的防御毫无关系。他们都是塘沽村的穷人，靠制盐谋生，几乎没有离开过干活儿的地方，根本不了解塘沽和北岸要塞之间的沟渠状况，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信息。他们说，在我们占领塘沽之前，有清兵从要塞出来横穿整个地区。但是，自从塘沽被占领之后，再也没有看见清兵在要塞出没。将军让我威胁他们，如果不把自己知道的都说出来就要坐牢，但我们还是没有从他们口中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消息。我们悄悄将这三个人交给一个卫兵，让他把他们押回塘沽村。第67团的杂役，在皇家工兵连的指挥下干了一整晚的活儿。接下来的准备工作，可以在第二天晚上顺

利完成，因此 21 日清晨 6 点被定为“开战大典”的时间。

20 日晚上，睡觉的时间，皇家工兵连的格拉汉姆少校和巴夏礼先生在第 67 团的护卫下前往要塞。在离北岸要塞约一千码的地方，护卫队停下来，少校和巴夏礼先生手持免战白旗走近要塞围墙，要求与指挥官讲几句话。那位指挥官从炮眼里探出头来问他们有何贵干。他们回答说前来提出讲和条件。对此，那位官员表现得傲慢无礼，他说不会接受任何条件，如果联军想夺取要塞，最好放马过去。就在进行短暂的言语交流期间，格拉汉姆少校看了看四周，记下了要塞的兵力和地势。这一行人返回军营，不久敌人就从北面两个要塞朝正在施工的工兵开火了。架在附近给予支援的米尔沃德炮兵连的阿姆斯特朗重炮立即进行反击，两军交锋将近一个小时才结束，工兵们又像先前一样开始施工。敌人还是不停地在附近朝工兵们射击，但除了打破第 67 团的几个水壶之外，没有造成其他损失。

终于等到了战斗打响的前一晚，我们感觉战斗会在翌日打响。然而，大家内心并非没有挣扎过。大家心里清楚，这些可怜的家伙此刻欢声笑语、高谈阔论地调侃即将开始的战争，然而许多人可能再也看不到 22 日的太阳。所有人看上去都很兴奋，但你能看出他们心里的不安。大家都想用调侃、欢笑来掩饰他们真实的想法，因为诗人约瑟夫·艾迪生教导过我们——

迈向恐怖，死亡让最勇敢的心战栗。

然而，跳跃的胸膛无需挣扎，

对荣耀的渴望超越对生命的热爱。

庸俗的恐惧控制不了英国人的心，

高贵复仇的热望和灵魂的骄傲。

不要理睬仇敌，朝他的地盘开进，
消灭他的兵士，俘虏他的将领。
尽管眼前是沼泽和洪水，
那也不会是他们害怕前进的理由。
沼泽和洪水也无法阻拦大英勇士的脚步。

当晚的前半夜，除了偶尔听见睡觉的鼾声之外，平静而祥和，可是不到半夜，炮火声就不时地响起，惊醒了军营里不安的酣睡者，过早地让他们开始在心里思考第二天的战斗。然而，这些炮声说明了敌人心中更大的不安。尽管在黑夜中，他们仍然察觉到我们疲惫的工兵正在推进他们的工程。敌人偶尔会扔出一个闪光弹，试图看清楚我们的位置。工兵一见闪光弹，就卧倒，但对于第 67 团年轻的新兵来说，很难激励他们继续工作。对于工兵连的将领来说，那真是一个考验耐力的夜晚。但是他们都保持非常好的精神状态，尽最大的努力去给手下的士兵打气。他们的努力最终获得了成功，因为在东方吐白之前他们就已经完成了工程。

大炮的配置情况如下：一门六磅 24 磅法国大炮、一门八英寸口径的英国大炮和两门阿姆斯特朗重炮防守南岸要塞的内部，以防敌人攻击我军右路。两门阿姆斯特朗重炮和两门 9 磅大炮设在塘沽村的一个营地里，保护河对岸法军的右翼。三门八英寸口径的迫击炮架在中路，射程为六百码。左后路架有一门阿姆斯特朗重炮、两门 32 磅大炮和两门八英寸口径的榴弹炮，所有大炮都受命向我们正在进攻的要塞开火。除此以外，两门 9 磅、四门 24 磅的榴弹炮及剩下的两门阿姆斯特朗重炮和一门火箭炮都以八百码左右的射程架在要塞前面的空地上。进攻的前一晚，八根烟柱熏黑了海面上空，这宣布四艘英国炮舰和四艘法国炮舰将要抵达白河沙洲，准备

趁第二天的早潮驶入河面，炮轰河流下游的南岸要塞。执行此次任务的英国炮舰分别是“两面神”号、“德莱克”号、“克劳”号及“伍德科克”号。

21日清晨，天刚破晓，被告知进攻详细计划的英军便离开了营地——营地设在塘沽和北要塞之间的一块泥滩上（到北要塞的总路程还不到四英里）——朝进攻目标前进。这支部队集结了2500名战士，其中包括麦克马洪中校率领的第44团侧翼和托马斯中校率领的第67团侧翼，以及这两个团的其他侧翼掩护力量和由加斯科因中校率领的皇家海军陆战队。特拉弗斯中校率领的皇家海军陆战队特遣部队负责搬运浮桥供部队渡过沟渠，格拉汉姆少尉率领他的皇家工兵团指挥进攻。以上所有部队总指挥由里夫斯准将担任。

英军出发一段时间之后，法军才从塘沽出发。法军由一千名轻步兵组成，携带六门12磅膛线加农炮，由柯利诺将军指挥。

天一亮，敌人看见正在前进的进攻部队，立即从要塞的四面八方朝联军开火，战斗打响了。早晨6点半，北岸要塞上游的一个弹药库爆炸，可怕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像地震一般。要塞附近几英里的地面都发生了震颤，塘沽村里的流浪汉还以为是大型烟花爆竹展示呢。几分钟后，北岸要塞下游又发生了一次类似的爆炸，这都是停在河口的炮舰所为。

“野战炮都推进到离要塞500码之处，加强了它们的力量。要塞的火力几乎已经完全停止，要塞入口附近已经打开了一个突破口，部分士兵已经冲到离要塞三十码的地方，用步枪朝敌人开火。法国轻步兵进攻右侧，英国士兵进攻左侧。

“我们的大炮火力被迫减少，敌人从掩护物后面冲上来，用步枪向我们的士兵发起猛烈攻击。

“法军在柯利诺将军的指挥下迅速向临河阵地推进，英勇地渡

过沟渠湿地，占据了城墙与外壕之间的狭道，试图从这里越过城墙，但由于中国军队的猛烈反击，他们没有成功。

“工兵们铺设浮桥的尝试也失败了，抬着浮桥的 15 个士兵立即被敌人击退，其中一座浮桥被毁。

“在这个关键时刻，为能快速打开一个缺口，罗伯特·拿皮尔将军命令高文上尉调配两门榴弹炮前往离要塞入口五十码处，诺克斯上校率领的第 67 团总部侧翼部队赶来增援时，我们的轰炸力量已经打开了一个可容一人通过的缺口。诺克斯分队有一部分从法军架的桥上走过来，有一部分直接从河里游过来，他们行成一个纵队英勇地朝前推进。罗杰中尉、第 44 团、伯斯林中尉及第 67 团最先冲进要塞，他们帮助钱伯勒少尉一起抬着第 67 团的战旗，钱伯勒少尉在 67 团老兵莱恩的协助下先将战旗插在城墙缺口，之后他又最先爬上护墙把战旗插在上面。与此同时，法军也冲进了要塞，中国守军被迫节节后退，只能从对面的炮眼里胡乱地开炮。

“当初那些阻止我们前进的障碍物，如今也阻碍了敌人撤退。除了两条水渠和两道竹子尖桩做的围栏之外，还要经过一片沼泽湿地与另外一条沟渠才到河岸。

“轰炸队从护墙上向敌人开了致命的一炮，高文上尉的榴弹炮转移到要塞左面，又给他们补了一炮。

“要塞外面的空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敌人的伤亡士兵。三个中国士兵被尖桩刺穿。几个士兵逃到北岸要塞外围，借着要塞炮火的掩护撤退，但是我们的阿姆斯特朗重炮给予了有效的还击。”

以上内容均摘自霍普·格兰特爵士给军事部的汇报。不过，假如读者想了解高贵的英国子孙在战斗中的个人英勇事迹，我推荐你们去看 1860 年 11 月 3 日发行的《泰晤士报》，报纸上有此次战役的专题报道，文章对战斗描写得非常精彩。

战斗停止后不久，敌人降下了南岸要塞护墙上的旗帜，用白旗取而代之。大家都以为敌方想和解，于是英法两军司令各派一位将领随巴夏礼先生前去询问敌人的和解条件。僧格林沁参谋部的英文翻译官接见了几位将领（这个翻译官是一个傲慢的上海人，曾经在上海一家美国公司做翻译）。此人拿出来一封信，信上的内容大意是，由于联军已经占领了一个要塞，中国军队将从河口撤离，允许联军进入河道，溯河北上至天津进行和谈。我们的人看完将信揉成一团，一把扔在送信者的脸上，并且威胁他说，下午2点之前，如果其他要塞的清兵不肯无条件投降的话，联军将开进河道轰炸要塞。

被乌云笼罩了整整一个上午的天空，此刻变得昏暗而阴沉。还没到指定的时间点，天就下起了倾盆大雨，干硬的泥滩变成了一个满是泥泞的沼泽地。尽管如此，第3团和第8旁遮普团已经接到从塘沽出发的命令，下午2点准时进攻北岸要塞下游的炮台。两门8英寸口径的大炮对准要塞，但由于道路情况非常恶劣，无法将另一门攻城加农炮运过来，因此只好利用刚占领的要塞护墙上的几门大炮对准要攻击的目标。

北岸要塞下游有两面护墙，与北岸要塞上游相比，上面安置的大炮更多。英法士兵斗志昂扬地冲向要塞，准备全力以赴投身于即将开始的战斗中，可是让我们惊讶的是，联军未放一枪，敌人就自动地打开了要塞的大门！

大约两千名守军乖乖投降了，像一群绵羊般被押送到了河对岸。

南岸要塞再一次降下战旗，代之以免战白旗，巴夏礼先生和其他人再一次来到河对岸。傍晚时分，我们看见敌人正在撤出南岸要塞，同时三百名英法士兵过河占领了南岸要塞。晚上，巴夏礼先生

返回军营，带来消息说，敌人答应从白河两岸直到天津整个区域都无条件投降。就这样，华北之战的第一阶段暂时结束，缴获了敌人架在大沽要塞的大炮，洗刷了联军在远东被玷污的荣耀。

两军激烈交锋期间，塘沽村里所有房屋顶上都挤满了旁观者和不参与作战的人员。拿皮尔将军入住的寺庙很荣幸，额尔金勋爵和他的参谋、《泰晤士报》的专栏记者及其他杰出的人物都站在上面。大家正忙着用望远镜和其他光学工具，观看联军攻打北岸要塞护墙以及一小队英雄冲锋陷阵的场面。这时，敌人架在塘沽河段尽头的一门大炮朝塘沽村开火，不时有炮弹从我们上空呼啸而过。最后，设在护墙入口的两门阿姆斯特朗重炮和两门9磅大炮成功地击退他们，炮弹落在敌人身边的泥滩里，溅得炮手们满身泥巴，他们这才彻底放弃了对我们的攻击。幸好敌人的射程很远，我方无任何人员伤亡。

苦力用担架抬着伤员经过我们身边，那一幕真是让人难受。大家都非常焦虑，急切想知道担架上躺的是不是自己的朋友或战友。医疗部迅速采取措施抢救战场上的伤员，为此他们值得大家的称赞，其中应该特别表扬参谋部的外科助理医生格雷先生。他积极执行任务，只要发现一个伤员，就立即带着助手和苦力跑到前线，小心地将伤员转移后方。我们可怜的同胞，尽管大多数时间都是疼痛难忍的，但看到大家及时地给予他们慰藉时，似乎又对战场上的遭遇感到暗暗欣喜。一想到每个人都在为国尽忠，他们便忘记了自己身上的剧痛。我军将领中有大量伤亡，其中22位军官伤势严重。法军的伤亡人数大约是130人，其中有几位军官在战场上牺牲。敌军的损失更为严重，要塞的里里外外到处躺着敌军的尸首。他们的伤亡人数不下两千，或许更多。此外，指挥要塞的敌军将领被皇家海军陆战队的普林上尉用连发左轮手枪击毙。这个将领的官帽上装

饰着赤珠和孔雀羽毛，那位英勇的军官把这顶官帽当战利品保存起来了。另一位敌军指挥官也失踪了，有中国人传言，那位官员自杀了。毋庸置疑，战斗中清兵表现英勇，朝我们的进攻部队扔下各种各样讨厌的炸弹。我军冲进要塞后，遇到层层阻挠。不过，我不禁在想，敌人的勇敢大都出于环境的特殊性。把我们堵在要塞外面，就是把自己关在里面，然后掉进一个完美的陷阱，永无逃脱的希望。因此，他们只好竭尽全力把进攻者挡在外面。可是，联军一旦进入了要塞，这些中国守兵也就不指望从士气高涨的联军手里捡回命来了。他们别无选择，只得决一死战。所以，用个小小的比喻来说，这些人就像家里的老鼠般，一有逃脱的机会，就会抓住不放。可是，如果一旦被猎犬堵在陷阱里，它们就会竭尽全力咬住对方咽喉，给对方带来致命的伤害。

尽管清兵拥有强大的力量和重型武器，然而北岸要塞下游守军的顺从行为以及南岸要塞无条件投降的举止，充分体现了这个民族与生俱来的怯懦。

然而，联军中的广东苦力们英勇无畏的表现却搏得大家的称赞。他们似乎很享受战争带来的乐趣，只要炮火击中目标，无论是敌人遭到致命的打击还是我军不幸的士兵被击倒，他们都会欢呼喝彩。法军雇佣的苦力在前线表现得更为英勇，他们站在深及颈项的沟渠里，脑袋顶着梯子，让法国士兵从上面踩过去。可能有人会说，当中国人有机会证明他们的勇气时，他们也毫不怯懦。但是，不要忘记，苦力队的成员曾经大部分都是小偷或海盗，已经在众多流血事件中变得冷漠了，实际上他们大都是靠这样的流血事件维持生计。他们在每场战斗中见证了我军的力量优势及士兵的勇气与决心，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他们先前的那种顾虑。如今他们完全相信，只要他们好好表现，就能够赚到每个中国人骨子里渴望的

“万能的”金钱。他们更加清楚，任何退缩或贪图享乐的心思，都有可能给他们带来耻辱甚至杀身之祸。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他们的处境也是一个令人绝望的陷阱。因此，他们都很聪明，竭力赢取雇主的好感，而且也得逞了，因为当天将军额外奖励每个上前线的苦力一个月的工钱。多位军官都认为，如果给予适当的训练和引导，中国人都是绝对优秀的士兵。对此我不否认。众所周知，在利益的驱使下，多少亚洲人以及那些天生胆小的种族如孟加拉国人和土耳其人都变成了亡命之徒。不过，我个人更倾向于这样的观点，中国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为聚敛财富而不惜牺牲任何道德伦理原则，完全无视儒家思想的教义。这种习惯是中国人成为好士兵无法克服的障碍。若非如此，他们不会一直持有如此现实的想法，为了搜寻财物，将每个城镇里的东西都摧毁。至于那些被定罪的中国犯人对死亡愚昧的漠视，通常也是因监狱里执行的饥饿体制导致的，或因他们个人吸食过量的鸦片，已经对死亡失去了感觉，这些不能作为证实他们勇气的证据。另一方面，担心将来在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民族中得到报复也是威吓勇敢灵魂的一方面。可是，对于一个不期待未来的人而言，思想的空白通常会产生更坏的影响。然而，大多数中国人都相信灵魂是脱离肉身的，认为一个人暴死或斩首而死，这个人的灵魂便得不到安息，因此亲戚们不会向这个人的遗体告别，也不会参加他的葬礼。跟我们一样，暴死也是中国人所恐惧的。然而，不同的是，我们拥有一个信念，相信我们是正义之师，相信上帝的宽容。况且，中国人还缺乏欧洲人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勇气和热爱冒险的精神。

现在，我们再看看同盟兄弟一致认为从水路无法攻克的大沽要塞，这些要塞从陆路几乎都无法接近，除非是在干旱的季节。要塞建在一个被水冲积起来的泥堆上，侧面与河道相接，从河口一直向

北延伸约六七英里。河流方向迂回曲折，从塘沽朝正南方向流出一英里左右。河道拐向东面，绕着对岸的塘沽村流经约一英里的路程，突然又拐向北面，流出约一英里半的路程，这才拐向东南，一直流进大海。河道下游的北要塞坐落在最后一段的河岸上，离大海约一英里；而上游的北要塞，即联军攻克的要塞，坐落在河岸同侧再往北的一英里左右处。在这个要塞差不多正对面的地方、几乎迎着河流方向的位置就是控制整条河道、海拔最高的南岸要塞。南岸稍微往下游去的方向，坐落着最大、最难以攻克的要塞——大沽主炮台——去年，贺布将军率兵攻打该要塞时，敌人凭借要塞的地理优势，杀害了我们许多英勇的海军。在这个炮台的南面，离海不远的地方坐落着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要塞。所有堡垒的建筑原理相同，十分牢固，滨海地段都造有设置重武器的胸墙，墙上架着大炮，每门大炮隐藏在可移动的掩护体之后。最北面的炮台及最后一个炮台上各设有一个堡垒，北面第二个炮台上有两个，南面最大的炮台上三个。每个堡垒上都架着大口径的大炮，其中许多大炮都是从1859年我军在那场奸诈的战斗中被击沉的炮舰上拿来的。后来，这些大炮都被运回到我军后方阵地。炮台背面都造有护墙，由大炮和舷炮防守。堡垒高出地平面约三十英尺，通过一个斜坡可以爬上去。炮台的墙壁都是用厚原木建造的，木墙外面裹了一层用泥巴和亚麻或碎草搅拌而成的涂层。除了胸墙上搭建的炮位形成的军营外，还有一些用泥巴和草或是木材造的半圆顶小木屋错落有致地分散在炮台四周，但是其建筑风格与北塘、新河和塘沽的堡垒风格非常相似。一堆堆不同尺寸的弹药、一框框的火药和火枪子弹散落在大炮四周。还有许多装满弹药的弹片，用一种奇怪的人造导火索连接起来。机关枪、火绳枪、弓箭、自动石弓、矛、长枪等武器都乱七八糟地扔在地上。在这些武器中，有几个木制的滚轴，一英尺

长，直径六英寸，上面插满了长钉。毫无疑问，那是用来攻击我军进攻部队的武器。每个炮台的通道四周都有两三条壕沟和木桩做的栅栏，而城墙与外围壕沟之间的狭道上满是铁蒺藜。这些木桩的厚度和高度从一英尺到三英尺不等，每条栅栏大概 15 英尺宽。在木桩和壕沟之外，整个要塞被一个铁丝网围着。

要塞被占领后不久，所有受伤的中国士兵都被集中安置在南岸要塞里面的一间小屋里。我们的伤员接受了为他们准备好的先进医疗诊治和精心的照顾之后，被小心地转移到了医用轮船上。那些中国伤员很快就被转移到塘沽村一个更大的军营。在这个临时的中国医院里，虽然大部分士兵都痛得打滚，但是我们仍然见识了蒙古种族下属不同分支民族的伟大人性，足以获得人种学家的赞扬。有的人用中国北方不同地区的方言发泄自己的感受；有的人用蒙古语短促的喉音或是用更为明亮的满族语悲叹。大炕上并排躺着的这些伤员代表着中国的三个民族，这点绝对不会错，因为他们的方言说明了他们所属的民族。但是，一旦语言上的差别消失，我敢打赌，最有成就的人相学者也很难分清他们究竟是哪个民族的。

与福建人或上海本地人相比，广东人的面容有所不同。广东人身上的特征非常明显，比我们所见骨骼粗大的华北人，或僧格林沁从蒙古和满洲集结起来用以对抗我军的士兵们身上的任何差异标记都更具特色。但是，不管来自哪个地区，所有中国人都是深黄色的皮肤，相貌丑陋，都是一样的肮脏恶臭。一个中国小伙子身上有九处刺伤。“啊，先生！”医院的外科大夫对我说，“这真是个勇敢的家伙，身上受了这么多伤都没有倒下。”我暗自思忖，这人身上伤口的数量和受伤的程度恰恰说明了一个相反的事实。因此，我转身问他，那些伤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告诉我，他原本是个卖饼的伙计，在我们发起进攻的前一晚进入要塞，向清兵兜售饼子，之后清

兵便扣押了他。21日，战斗一打响，他便躲进要塞里面的一间小屋，藏在一块垫子下面。我们的士兵进入要塞，一部分士兵冲进小屋，用刺刀戳他藏身的那块垫子。但是，他没有出声，于是士兵们离开了。可是，没多久，又冲进来一群士兵，又跟刚才那群士兵一样戳他藏身的垫子。如此反复多次，这个可怜的销售伙计终于忍不住，暴露了他的藏身处，被联军士兵粗暴地揪了出来。他吓得全身发抖，以为没命了。不过，没想到，鬼子大发慈悲，不但没有把他就地处决，反而友好地将他保护起来。

占领大沽要塞几天后，拿破尔将军检阅了他的师团，公开而坦诚地向那些在最后的进攻中积极主动协助他的将士致谢，表扬了士兵们表现出的坚韧和英勇的品德，最后祝贺大家成功地恢复了我军被玷污的荣誉。

第 7 章

……请领我进入你的城，

我要用橄榄枝作刀剑；

让战争孕育和平；让和平中断战争；彼此团结，彼此依附。

——《雅典的泰门》

白河入海口——抵达天津——指派人员视察夺取的要塞——僧格林沁总部——滑稽的一幕——沼泽地的居住者——赶集——饶舌的中国男人——中国的交通工具——大部队前进——驻营地——中国的村庄

占领大沽后，炮舰开始清理河道入口。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因为把守河口的一些障碍物大都是经过敌人精心设计的。首先，必须移开一排沉重的尖铁桩，每个铁桩有几吨重，尖尖的头牢牢地埋在烂泥下面。然后，是一个漂浮在水面上的陶制水罐大拦障，紧跟在大拦障后面的又是一排铁桩。后面是停靠在河流对岸的一排船，船上装着易燃材料。最后一个障碍物又是一个大拦障。在

退潮的浅滩处露出两个小船体，上面桅杆和齿轮都被拆除了，那是在去年那场劫难中被摧毁的两艘炮舰，“李”号和“普罗旺”号。但是，另外一艘失踪的战船“鸬鹚”号未见踪影。通道一打开，贺布上将就乘船进入河道。第二天，他与巴夏礼先生一道乘上他的蒸汽补给船“克罗蒙德尔”号，在五艘炮舰的护航下，开往天津。河道两岸的老百姓都跑出来观看路过的舰队，丝毫没有敌意，他们反而尽力为船队前进提供便利。船队路过位于双港的要塞，发现敌人已经丢弃要塞逃跑了。傍晚，舰队在天津南面十英里左右的地方抛锚。当晚，天津城有名望的商人代表团拜见了将军。我们从他们口中得知，为了保卫天津城，僧格林沁最近放弃的大范围防御工事都已经被人遗弃了，这个地方没有任何阻止联军胜利之师前进的意图。他们还告诉将军，22日晚上，有人看见僧格林沁带着几个满脸灰土的跟班骑马路过天津，避开闹市，绕道而行。第二天早晨，炮舰队继续向前推进，在天津南面的各个要塞上留了一小支海军驻守，随后继续北上，停在天津城门前。直隶总督恒福应邀来到“克罗蒙德尔”号，与他随行的还有恒祺和文俊两位钦差大臣。他们受皇帝委派，前来陪同额尔金勋爵进京。他们被告知，天津必须由联军掌控，但当地官员可继续他们的职务，百姓也会受到保护。与此同时，一小队海军陆战队的士兵被遣上岸，占领天津城的东门，让英法两国的旗帜在城门上飘扬，并在城门口拱道的两旁张贴告示，向百姓宣告他们的情况的变化。此后，巴夏礼先生与由天津富商组成的供给委员会——他们先前为僧格林沁的部队提供食物供给——达成了协议，为我们即将进城的士兵提供食物。

骑兵旅很快接到命令开往天津。他们于25日从新河出发，威妥玛先生担任他们的随同翻译。他们沿白河北岸前行，第二天抵达天津，经过架在北塘河与运河交汇点河段上的浮桥渡过白河，来到

城内。据他们说，城内道路比较宽敞，总体情况不错。途经的唯一重要村庄就是军粮城，坐落在新河以北六至八英里左右的位置。那一带，除了河岸上的一些果园外，就是一成不变的咸水湖，偶尔出现几个尖头坟墓给视野带来一点变化。

25日，额尔金勋爵也乘“格拉纳达”号前往天津，他一上岸就将其总部搬到一所奢华的住宅内。这座住宅建在河边，是一户韩姓富商的房子。直隶总督立即前来拜谒勋爵，并告知勋爵，皇帝指定他和桂良一起(他曾在1858年代表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在天津与勋爵议定和约。

现在，我请读者们暂离这些外交事件，跟我回军营去。23日，英法工兵授命前去勘察刚占领的要塞，清点我们在大沽缴获的大炮数量和尺寸，好在联军之间进行分配，三分之二归英军，三分之一归法军。摩根先生和我被派去作这支工兵小分队的陪同翻译。因此，我们在塘沽坐上一艘炮舰，沿河道朝白河南岸新河对面的一个名叫大梁子的小村庄开进。我们一上岸就发现这个小村庄的房子都被遗弃了，由几个法国士兵负责看守。他们带我们穿过村庄外围的果园，给我们看缴获的几门重要大炮。其中有一门大炮的口径非常大，架在屋顶上。其他几门都是小尺寸的炮，隐藏在一间小屋后面，小屋破旧的泥巴墙上挖了几个洞，炮筒从墙上的洞里穿出来，形成了一个临时的炮台。离开这个村庄后，我们立即走过一片方圆三英里左右的半干泥滩，来到环绕长条形的大沽村庄后面的一面护墙，护墙连接着大沽村和南大要塞。一名法国的陆军上校骑马赶上我们，问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兵团陪同，以防遇到滞留在这面长形护墙周围的中国残余兵力。我们谢过他，告诉他一点也不担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非常肯定，任何拿饷粮的士兵都不会在将领逃跑的情况下还长时间留在此地，这不是中国人的作风。一条壕沟挡住了

通往护墙的去路，我们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搭了一座桥过去。正如所料，这个地方已经被遗弃。还有一些村民留在此地，这些人都尽力向我们表示友好之感。

摆在我们前面的任务冗长而单调，我们还没完成一半的任务，天就黑了。工兵队分成两组，一组负责勘察右边的护墙，另一组负责勘察沿河的防御工事。两组人员说好，太阳下山时在村子中央一座两层的宝塔前集合。这座宝塔一般被称作“谭家衙门”，但是中国人把它叫做“海神庙”，僧格林沁曾经驻扎在此地。离此地不远处有一座火药制造工厂和一个锻造车间，在这个地方，僧亲王的能工巧匠们锻造出各种各样的铁链和铁钩，用作河口障碍物的原料。

海神庙的两侧都是简易小屋，用以安置统军大臣的清兵卫士和家丁，后面是一排仓库和办公室。在仓库里面，除了普通中国武器之外，我们还找到许多铁蒺藜和一些木头雕刻的、上了色的人偶，这些人偶用来替代当地士兵。人偶的胳膊和腿是靠铰链活动的，每个人偶下面都钉着一个大木钉，以便将人偶固定在要塞的墙壁上，好吓走那些可怜无知的夷兵。这些人偶的模样令人发笑，有的一副颐指气使的模样，却又表现出一副随时听候命令的神态。一个房顶上标着“亲王书房”，但是除了一些没什么用的旧报纸和几份旧文件之外，里面什么也没有。一得知我们打算在那里过夜，村民立即为我们准备了许多食物，足够我们晚餐用，我们尽情享用了。不过，我们没有享受多久，就听见有炮舰在村外鸣炮，提醒我们必须返回军营过夜。细心的将军有一个错误观念，认为我们都不知道照顾好自己。因此，我们不得不返回军营，第二天早晨重新乘船来到南要塞，又开始辛勤的劳作。检查要塞占用了我们一整天的时间。这一次，我们得到许可在大沽过夜，所以太阳快落山时我们又回到了海神庙。

这附近唯一的绿色景点就是在这个神圣寺庙的高墙内，在宝塔四周的花园里：几株枣树枝叶繁茂，还未成熟的果子垂挂在树枝上。几株用格子架支撑的葡萄藤形成了一个用叶子盖起来的凉亭，不过没有给酒神献上累累的硕果。中国的“枣”，被盎格鲁—印第安人称为 Bier，是一种圆柱形果子，大约一英寸半长，直径为四分之三英寸左右。成熟后，果子从浅绿色变成淡黄色，晒干后又变成了鲜艳的栗棕色。果子里面有一颗两头尖尖、身子长长的籽，或叫核。新鲜时，果实坚硬而味微甘。但是，在糖水里煮过后晾干便制成了美味的干货，中国人称其为“蜜枣”，而在中国居住的欧洲人则称之为“上海枣”。结出这种果子的树，树叶窄小，属落叶乔木。花朵形状微小，颜色淡黄。尽管花园不大，但在傍晚时分聚集在此处的鸟，无论数量还是种类都多得令人称奇：包括三种京燕、夜莺、黄鹌鹑、金丝雀、鹁鹑和麻雀。所有的鸟儿都忙碌着，要在太阳隐退最后一道光线、迫使它们归巢之前寻觅最后一口食物。鸟儿归巢，我们知道天色渐晚，便打发几个人与烹饪部门的人一道，前去寻找一个晚上歇脚的地方。在这个两层宝塔的二楼，堆满了样子丑陋的大佛像，这些佛像给我们提供了厚厚的木板，让我们不至于躺在瓦片上过夜。我们从僧格林沁的库房里找到几捆干草，很快就铺成了软绵绵的垫子。不过，垫子上空有数不清的蚊子飞舞，垫子下面是垃圾和虫子，对于那些在奢侈环境中长大的人而言，这个地方确实一点也不受人欢迎；可是，对一个疲惫的人而言，这些又有何妨呢？村民给我们送来一只绵羊、几只家禽和一些大米，让我们自己享用，并且承诺第二天早晨会再来。天刚亮，我正准备下楼，因为担心把战友吵醒，所以我尽量放轻脚步。我走到楼梯口，遇见一个老人，他带了几条鱼来卖给我们。他爬上楼梯，在大家放拖鞋的地方露出脑袋，大声喊道：“大王们，起床了！我带了几条鱼来！”

那真是滑稽的一幕，即使最严肃的人见了都会忍俊不禁。一边是老人的脑袋在地板上面出现，脸上带着敬畏的表情；另一边，是“大王们”在肮脏污秽的环境里酣睡的样子。

这天早晨，我们搜到一个弹药库，里面存放着大量的火药、弹药、硫磺和硝石。这个弹药库建在一个小岛上，四面都有沟渠环绕。我们得知，其中有几个弹药库在20日晚上被炸毁，我们当时听见大沽方向有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就是从这里传来的。在那个不祥的夜晚，几乎每分钟都有火花闪烁，那些微弱的火花构成了远处地平线上片状闪电的画面。其中有一个弹药库爆炸时的受伤者被送到我们医院来抢救，他的皮肤几乎被完全烧毁，血肉模糊，无法辨认其脸部特征。有几个伤员还躺在其中几间房子的周围，许多腐烂的尸体臭气熏天，住在隔壁麻木的居民却对此视而不见。他们已经习惯了那种臭味，再说这些死人或伤员又不是他们的亲戚朋友，与他们何干呢？我们完成任务后便来到河对岸。不计其数的尸体漂浮在河面上，不禁让人想起了孟加拉国胡格利河道上时常发生的类似景象。不过，白河上没有飞来啄食腐烂尸体的秃鹰。我们总共登记的大炮数量有五六百门，其中五十门左右是铜炮，大部分都是大口径炮。

塘沽和北塘之间主要由平坦的泥滩、以及因偶发的洪水冲积起来的淤泥构成，泥滩上交错着咸水沽和壕沟，为大量的野生鸟类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好去处。这个季节，正值鸟儿从满洲里和东北亚其他不适合居住的地区往南迁徙。此外，这两个村庄之间还有一个浅浅的入海口，潮涨潮落为那些喜爱沙滩的鸟类带来了丰富的食物，同时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安静的避风港，可以躲避肆虐海面的飓风。在离海岸更远的内陆地带，覆盖在硬质地面上低矮的芦苇和大蔓草给无数野兔提供了藏身之处，经常会有野兔出现在脚边然后又迅速

跑远。长满灯芯草的湿地和沼泽地——灯芯草也生长在硬质土壤上——却是涉禽类和鹈类的天堂。独自出去走走，你就会知道，在这个季节有多少动物聚集此地。此外，这一带的天空中盘旋着如此多的老鹰和鹈，也足以说明这点。无论是对狩猎者还是自然学家而言，这块平原都蕴含着无穷的乐趣。有些普通读者可能会认为，只有空中鹈、丘鹈、野鸭和野鹅才是水鸟，或是把珣鸟看作是“散布在石南树丛，发出狂野噪音”的小鸟——对于这些读者，我在这块沼泽地看到的鸟类名单就没有什么作用了。所以，我会保留有关这个主题的文章，另行发表，希望对那些热爱自然的人士有所启发。

第三团的士兵留下来看守大沽要塞，其余的部队授命开往天津。第1师29日出发，第2师在两天后才动身。28日，我陪同罗伯特·拿皮尔将军参谋部的一位军官再次来到对面的大沽村，调查附近的路况，顺便弄几辆马车拉将军的行李。我们检查了村子和赴津大道之间的一个清兵岗哨亭，里面没有大炮，也没有任何其他武器，只有满屋子的尘土、垃圾和昆虫。几个衣衫褴褛的村民正把留在屋里的几个脏垫子和木头往外搬。沿着赴津大道前行，在离大沽村约两英里半的地方，我们看见路边有一间泥巴房子，向路人出售茶点和香烟。我的同伴爬上屋顶，把路上的行人车辆一一记下，我则站在路旁和行人聊天。一队队的当地人赶往南要塞，每个人肩上都扛着一根扁担，扁担一端或是两端挂着篮子，篮子里装着水果和蔬菜，或是家禽和野鸭，因为要塞门口已经形成了一个集市。新鲜的西瓜披着绿色的外衣，长着黄色或粉色的多汁瓜瓤。有不同形状的南瓜、卷心菜、洋葱和大蒜。也有红红的苹果，不过很可惜，味道却不敢恭维。还有梨、桃子、大杏子、味道甘美的大葡萄、长圆柱形的麝香葡萄和甜甜的小粒撒克逊葡萄。前来市场上兜售的村民一路小跑从我身旁路过，我看见这些水果诱人地摆在他们的篮子

里。提着空篮子的人，把一串串的铜钱搭在肩膀上，彼此询问对方卖出的好价钱，有说有笑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无疑，这些老百姓又恢复了信心。相貌丑陋的年轻姑娘又乘着马车回到村子——这个前不久让她们带着恐慌离开的地方——事态的转变让她们放心；显然，与吝啬、好似强盗般的清兵相比，她们更喜欢有钱的洋鬼子。我与一位长相温和、体态肥胖的老者攀谈起来。“啊！这次贵国好好教训了那些官兵一次。”老者说。“什么？你好像很高兴。”我答道。“高兴！我当然高兴了，”他说，“官兵欺压百姓，全国的百姓叫苦不迭。为了把你们赶出国门，官府强逼百姓修建要塞，这些不都是官府的所作所为吗？我们深信，你们来此的目的只是通商，而且这对两国都有利！可是，这些满人，靠背信弃义的手段攫取政权，他们自然会嫉妒其他国家的发展，因为他们总是疑神疑鬼，认为其他国家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利用同样卑劣的欺诈手段，夺走他们所获取的东西。”

“这么说，你自己不是满人？”“应该这么说吧。他们是来自蒙古蛮荒之地一个肮脏恶劣的游牧部落，喜欢压迫老百姓，掠夺老百姓拥有的一切财物。说实话，去年我们看见贵国的战船败退时，对事态的发展感到非常担心。我们非常害怕你们会折回对可怜的老百姓实施报复，其实当老百姓得知你们前来和谈，大家都不愿意去架炮，导致你们身处险境而被击退。”

“可是，要塞被占领后，对在我们手里所受到的待遇你们不是既欣慰又失望？”“确实如此，不过更为惊奇你们的宽宏大量，你们不仅释放了从要塞俘获的士兵，还照顾落在你们手里的敌军伤员。如果消息没错的话，听说你们对待清兵伤员比他们自己人还要好。”“这就是我们西方国家的一贯做法。”“这里不是如此。满清对待俘虏的一贯做法就是折磨和杀害。大部分留在大沽的村民都站在

屋顶上看到了战斗的过程，贵国军队在炮火下前进时的场面令我们惊奇。没有一个人掉队，或是远远地停下来，不像我们的士兵。你们的人完全不顾炮火的轰炸，英勇完成使命。这么英勇的部队最终肯定能征服世界。”我试图向他解释，士兵们勇敢的行为都得归功于严格的军纪，但是他没给我插话的机会，他接着又说：“清兵对此次战败感到非常羞耻，据说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弹药库意外爆炸，又正好是在要塞里面，所以炸死了许多守备军。还听说，清军的一门大炮打死了你们两百多名士兵，但是你们的人数众多，以致他们无法抵抗。”

我告诉他，我们全部的伤亡人数也只是比那个数字高一点点。我方牺牲的人数也相对较少，相反，战场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两千多名清兵的尸体恰恰说明了他们惨重的损失。他回答说，他不能确定到底哪一方的话可信，但至少他可以祝贺我们那天战斗胜利。他保证自己这番话说出了全村百姓的心声，并感谢我们对他们的包容，但是希望既然我们已经在战场上取胜，就会维持我们的统治权，占领这个得来不易的地区。

这个汉人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直到我的同伴从屋顶上下来，走到我们身边才打断了他的话。我们抓了一辆路过的马车，乘车回到村里。我毫不隐讳地将这番话告诉了我的同伴，因为这说明当地老百姓对打胜仗的联军的态度，而且我与当地百姓的聊天过程中，听到过许多类似的话。我们向人打听，来到一个马料补给站，在那里发现三辆马车。我们命令那些马车准备好，我的同伴必须立即赶回塘沽，我便主动送他们过了通往新河的浮桥。正当我在马料补给站周围等他们的时候，住在附近的一位老者前来请我光临他的寒舍，好使他的屋子蓬荜生辉。我接受了他客气的邀请，跟他一块儿抽烟喝茶，谈论中国的政治。他问我，将军是否反对村里的女人回

来。我告诉他，肯定不会。只要老百姓都表现出和平的倾向，我们的当局就会关照士兵，不许对百姓实施任何暴力行为。这位老者过于客气，所以等马车弄好准备出发时，我非常高兴。我们的读者可能对这一带使用的交通工具感兴趣，再加上他们曾用这种交通工具庄重地载着美国大使进入中国京城，所以这里我有必要对它们进行简要评述。

那么，请大家想象一下，一个狭窄的盒子，上面有一个拱顶，前面用帘子挡着，放在没有弹性的矮轮子上。盒子里面的地板是木条做的，既没有凸起的座位也没有任何类型的靠垫。盒子两边各有一根轴伸出来，在两根轴之间，套着一只小马驹或是骡子，轴的末端套着另一匹马，两只牲口一前一后，但是用同一根长绳子系在车轴上。所有的马具都是用粗糙的皮革、铜制马嚼子和铁环组成。赶车的人通常是坐在马车旁，或是坐在车厢右边，双腿放在车轴之间，手里拿着一根长棍，棍子末端绑着一根细细的软绳。现在，读者应该对这个地区简陋的乡村马车有了一个认识。但是，私人的全套马车外面都裹了一层粗布，有时候马车里面也铺了粗布，并且有一个蓝色的遮阳篷从车顶上吊下来。第一个问题是，马车上没有梯子，怎么进去呢？车夫让我伸出胳膊，双手悬空吊着，而他则从后面把我推上车。上车后，我盘腿坐在车里，两只手扶着车厢的两边，好让身体保持平衡。就这样，我们出发前往浮桥，但是地面不太平坦，我还没准备好，一只车轮已经陷进车辙，“砰”的一声我的脑袋撞到车厢上了。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另外一只轮子也陷入车辙了，“啪”，我头盖骨的另一侧又撞上。我非常恼火，试图弯着一点腰，但那个姿势很不舒服。于是，我又试着斜躺在车厢里，可是车厢的木板硬得惊人。我不由得想起了可怜的威妥玛先生和他的参谋，他们一定被那不得不忍受的痛苦折磨得不轻。想象一下乘坐这

种交通工具从北塘去远在一百六十英里之外的北京！最后，我下了车，两条腿在车轴上摇摆，有时候车夫也会这样，万一遇到深沟时可从车上跳下来。这个姿势感觉倒不错。在这一带，经常能看见几个女人带着两三个孩子挤在马车里面，身材魁梧的一家之主则坐在前面，车夫就坐在车轴上。她们要忍受怎样的折磨啊！为这种野蛮发明而沾沾自喜的中国人骄傲地无视所有的不适，反而给其他国家的人贴上“蛮夷”的标签，真是荒唐可笑！我突然异想天开，倘若把我引见给发明这马车的人，我将喜不自胜。不过，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因为，如果去问我们的汉学家，他可能会告诉我，这个发明人生活在公元前几千年。这种装备陈旧的马车又给无数的证据增加了一条，证明当其他国家还在森林里漫游时，中国的文明程度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但是，当欧洲人开始发展他们的文明时，中国创造天才的脚步却停滞不前。

不过，就此打住吧，这种陈腐的讨论在此显得太深奥。我们终于来到了浮桥对面的小村庄“小梁子”的果园和篱笆墙下。从已经到河对面的法国士兵和轻步兵的人群中挤过去速度很慢，我们刚走到浮桥的桥头，正准备过河，负责此处的海军将领却让我停下马车，因为他要打开浮桥，让英国和法国的两艘炮舰通过，前往天津。英国人立即驶过浮桥，可是那艘笨拙的法国小炮舰“加农伊尔”号的头部比它的尾部高出水面两倍。在水流湍急的情况下，它的船舵失控，冲向缺口的左侧，撞断了浮桥的厚木板，导致浮在上面的一艘大船下沉。接下来的一幕便是：不懂一句法语的英国人和不懂一句英文的法国人，都用自己的母语大声喊叫臭骂，完全不理解对方的意思。我策马离开，将马车停在一个安全的角落，让人守着，然后乘船来到驻扎在新河附近的第1师军营。到那里，我听说浮桥要到半夜才能通行。类似的灾祸发生不止三次了，因为这一河

段的水流很急，驶过浮桥缺口时，哪怕是最容易操控的船只都需要小心行驶。米切尔将军热忱地邀请我留下来和他及参谋们一起吃饭，所以我回到桥边时已经晚上9点多了。浮桥已经修好，但是第1师的炮兵团已经开始过河了，所以我只好等他们全部过去后才动身。拉运炮车和货车的马儿身上的马具都卸下来了，一群广东苦力牵着它们从河岸上用木材搭建的小斜坡上跑下来。这样，轻便马车就可以利用冲力轻松地往前走，直到对岸的上坡路。因搭建浮桥用的木材太薄太窄，重型货运马车经过桥面时，木板翘起来，仿佛波涛汹涌的海面，必须重新整理才能让下一辆马车通过。北岸的一小段浮桥是法国工兵搭建的，他们搭建的质量要比我们的工兵和水手搭建的好得多。不过，有一点不要忘记，我们用的材料是上等的。货运马车一过河就要拉上对岸的斜坡，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大家用楔子和杠杆又是吆喝又是喊叫，才慢慢地将马车弄上斜坡。整整花了三个小时，第1师的炮兵团才全部过河，接着又有几个法国炮兵要过河，刚才他们一直被堵在南岸，对英军过桥时的笨拙与缓慢颇有怨言。他们用六匹马拉着轻得多的货车在桥面上小跑来到河对面。他们轻轻松松地过河了，可是第一辆货车差点没有爬上对岸的斜坡。最后，终于轮到我过河了，我赶紧让车夫套好马，安全地来到河对面，在月光下欢快地驾着马车，一路上的岗哨士兵非常惊讶，大约凌晨2点我才抵达塘沽。

29日，第1师撤掉了他们的军营，渡过河开始朝天津前进。第2师接到命令在两天后启程，第三团留守要塞。听说我们要走了，许多塘沽的村民聚到村里，急于了解我们启程的确切时间。他们担心，我们离开时，邻村的强盗们会乘机混进来，把房子里仅有的东西抢走。由于我们规定，在我们占用村子期间，房子的住户不得进入村内，因此他们特别希望我们也能禁止小偷进入村里——经常有

人发现这些人背着一袋袋从村里偷来的粟米或咸鱼。岗哨有令，中国人不得进入村口，这一点不假。但是，对于那些从村子前面的河里游过来或从后面的护墙爬进来的流浪汉们，我们毫无办法。于是，几个有名望的村民请求，允许每户人家派一个人留守在自己的房子里以防小偷入内，但是他们的请求未被应允，因为他们留在村里的那些人很可能跟其他人一样也是惯偷，好乘此机会偷窃我们的行李。而他们的物品属于战争物资，他们必须等待时机。

然而，拿皮尔将军出于好心让我向他们承诺，辎重队宣布不能用来拉运车辆的废弃马匹都留给村民，作为对他们损失的一个小小补偿。可是，后来发现大部分的马匹都处于这种状态，所以辎重队和军需处对这一承诺提出异议，因此这个承诺直到部队从北京撤回之后，才得以兑现。这些可怜的畜生因长期劳累和饥饿瘦得没有恢复的希望，其中九十匹被击毙，留下来的一百五十匹在未来的两个月内也不可能劳作。但是，因草料便宜，所以暂时喂养这些牲口给它们一个复原的机会，总比把它们扔给那些贫困的村民要强。辎重队这样考虑，将军只好听从他们的劝告取消承诺。不过，我必须承认，这让我无比尴尬，因为已经承诺要给村民这个礼物，而且也集合了村里有名望的人前来领取，可此刻我却必须告诉他们，将军重新考虑了他的承诺，希望保留这些马匹直到把仗打完。

8月31日，下午4点，我师撤出塘沽，在浮桥附近搭建帐篷露营，以便第二天早上立即过河。空中乌云密布，好像要下雨的样子。因此，大家都开始动手挖壕沟保护帐篷，做好防雨工作。第二天早上，天蒙蒙亮，军号吹响了，大家立即起床，收好帐篷和行李，把它们安放在马车或马背上。全师队伍立即有条不紊地走上摇摇晃晃的浮桥来到对岸的果园里，并按命令在那里停下，搭建帐篷。在河岸上几座房子和花园之外，有一大片草坪向南延伸，连接

着从大沽通往天津的大道，道路另一侧是沼泽地。我师大部分士兵都驻扎在这块大平原上，只有一小部分幸运的人得到许可驻扎在果园里。最好的一块地当然是选出来给将军驻营了。执行任务回来，太阳还没下山，躺在新鲜的草地上让身子下面的小草作靠垫，看着悬挂在头顶上的果树枝随微风摇摆，或是拿着枪漫步在果园里树叶庇荫下的幽径上，在一个全新的地方去研究变化无穷的自然的面孔，真是乐趣无穷。可是，作为一名随军翻译，没有多少时间去研究大自然。每到一个新的驻营地，他都要去与当地百姓会谈，试着安抚他们，让他们不要害怕，劝诱他们开市供应物资。接下来，他要去村里找一些适合哨兵用的警卫房，而且每个村子都必须安排哨兵站岗。这之后，他要随时待命，在发生争端或骚乱时充当翻译——士兵和当地百姓之间经常会发生一些争端。一旦露营开始，军需处又需要他的服务，他就好像是军需处成员一般被差使。一天长途跋涉行军之后，部队其他人都可以舒舒服服地在温柔的睡神怀里静静休息，可翻译官的工作却刚刚开始，整个过程都伴随着忙碌和痛苦。然而，战斗一打响，总指挥将军却无情地否认翻译官们是骑马的将领，下令不给他们配马。一到驻营地，我立即被派去小梁子村，在河岸往北约四分之三英里的地方。手持长棍的旁遮普士兵出现在村里，已经引起当地老百姓的恐慌，村民们向我描述，称这些人是穿着白袍子的鬼。这个小村庄里只有一些脏兮兮的泥巴屋子，根本称不上是一个村庄。很明显，法国人已经将这个地方置于自己的保护下，因为在村里稍微好一点的房子门口大部分都贴着一张红纸，上面都有法语题字，比如“军需处”。有一句显然是某个搞恶作剧的人写的，内容是这样的：“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但是很可惜，法国！签约地不在这里。”村民跟往常一样穿得邋邋肮肮，但是非常恐惧，他们想方设法来博取我们的好感。他们欣然答应，

会尽力把新鲜蔬菜带到我指定的集市上去。不过，他们的供应量很少，因为菜园经常被驻扎在附近的法国士兵掠夺。我跟村民们说，要派一个卫兵来看守他们的菜园以免个别士兵前去掠夺，他们对我们的周到考虑非常满意，立即准备了一间屋子充当守卫室。傍晚，我沿着河岸散步。这条河的河床是黏土形成的，但是往下游流去的河水将大量的泥巴带入河流，一部分泥巴沿着长满灯芯草的河岸堆积起来。由于泥沙太多，刚舀起来的水不能饮用，必须用一小块明矾净化，泥沙沉到杯底，上面的水才会变成干净无色的液体。这一带的中国人都熟知明矾的这个特性，在大部分人的家中都能找到这种矿物质。阿伯特先生是海军陆战队的牧师，暂时隶属我师。他每次去军营里转悠时，口袋里都会装满明矾，用这个魔术——士兵们这样称呼，因为他们觉得明矾的化学特征神秘而又无法解释——净化士兵们饮用的脏水以此俘获他们单纯的心。河岸上有一座航行灯塔，紧挨灯塔的是一条壕沟和一面篱笆墙，其后才是被篱笆墙和壕沟隔开的一块块果园、菜园和玉米地，里面相间排列着一些小房子。来自华南的许多冬鸟此刻正在白河夏季舒适的阳光下欢鸣。沿河岸漫步时我听到节奏一致的脚步声，仿佛某个军团走在木地板上的声音，转眼朝浮桥方向望去，看见第99团的红色军装。他们当天从北塘一路赶来，与我们一道前往天津。战士们因一整天的长途跋涉而疲惫不堪，需要一天的休整。再加上将军希望在我们出发之前，第1师已经走远了，因此将军下令第二天继续休整。但是，下午我和军需处一位军官被派到下一个驻营地去收集物资，以备第二天到达那里的部队之需。将军从米尔沃德炮兵团要了一匹马给我，因此带着四名勤务兵于下午3点出发，我们很快就在这一带策马前进。我们经过小梁子村，走了一段远离河岸的小路，才来到了塘沽和天津之间的大道。我们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行，这一带的地势仍然

以沼泽和湿地为主，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水鸟。我们经过时，鹈鸟惊叫一声飞走了，苍鹭悄悄地躲在芦苇丛中冷眼盯着我们。燕鸥和白颊鸥则盘旋在半空嘲弄我们，它们仿佛觉得这样才可以阻止我们对它们的嘲弄。

我们路过的第一个村庄叫“黄家村”，村里有一些破旧矮小的泥巴房子。道路又把我们带到一个更大、更繁荣的村庄，村里有一条名叫“新城”的长街，即“新的城市”。村里的庙宇和一些上等的房子都是砖瓦结构。再走几英里，我们来到一个名叫“洋槐”的小地方。最后，我们到达目的地“葛沽”。全程约九公里。可能是第 1 师留了话，说我们可能很快就会抵达，因为一大群衣着体面的村民在等我们的到来。我们一提出要见村长，他们就领我们到一座大庙宇，将我们安排在隔壁几个大房间里，并把我们的马儿牵到院子里去喂草料。村里的乡绅立即来侍候我们。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一行人是第 2 师的先行人员，前来此地安排第二天军队的接待事宜。他们带我们到一块平原——大约离村子有四分之三英里的路程——并告诉我们第 1 师之前就是在此地扎营的。我们指明了草料和食物储存的地方和开设集市的地点之后就回到了寺庙。“葛沽”是一个富裕的大村庄，这里的村民看上去要比其他地方的人干净。但是，村里的道路狭窄、曲折、肮脏不堪。主干道是用一座木桥搭成的，横跨一条从河道分流出来的沟渠，村子就坐落在河岸上。寺庙为我们准备好了晚餐，一个多话的老头被派来侍候我们。从职业上来说，这个人是个厨师。他又矮又胖，眼神古怪，光着膀子出现在我们面前。只要我们一有吩咐，他就会转过身大声地复述一遍，仿佛在向另一个在场听候吩咐的仆人传话。可是，房间里除了我们只有他一个人。但是，他把我们的话重复一遍之后，立即出去就能拿来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发现这个古怪的人似乎想方设法让我们

相信，有无数个仆人在等候我们的召唤和吩咐。我们想要一些水洗洗手，于是告诉这个老头。他立即转过身，用整个屋子都能听见的声音喊道：“王爷们要一点水洗手。”说完，他立即悄悄地走出去把水端来。我们被人服侍完后，村里的乡绅前来拜访。从这些人身上，就能看出当地人富裕的样子。尽管他们都是大嗓门，但行为举止还是体现了许多中国人谦恭的礼节。但是，中国的社会还是让欧洲人觉得格格不入，因为中国人身上有许多令人反感的习惯。譬如，他们抽着丝毫没有香味、闻起来却令人作呕的烟斗，期间还总是频繁地吐痰。我们得知，前来拜访我们的这群人是从事华北舢板生意的富商。由于政府没有指定官员来控制这个兴盛的大村庄，他们便自发组织了一个保护性商会。他们希望通过付出一定的代价，为我们提供部队所需的一切物资，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招致我们不满，好让我们路过村子时不打扰他们。那天晚上，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安排第二天的军需物资，等事情全部安排妥当，我们都累得仰面朝天，躺在大炕上，似乎给我们的朋友一个无声的暗示：这个晚上过得真快。他们立即毕恭毕敬地起身，叫下人给我们拿来枕头和被子，连声说“请，请”，之后便离开了。

第二天凌晨，我们便来到驻扎营地，监督物资储存工作。几小时后，我师总军需官，在各团军需主任的陪同下前来统计每个团将要占用的营地面积。不久后，我们便听见大部队前进的脚步声，第99团红色的军装也从狭窄的村口进入我们的视野。接下来便是往常那些忙碌的工作，我在前文已经叙述了。选作营地的地面低洼潮湿，所以，将军明智地挑选了那条高出地面的马路作为自己和参谋部的营地。马路非常宽敞，扎在两旁的帐篷不会影响马车的通行和日常的交通。马路两侧分别连着一口水渠，左侧是我们的营地，右侧是一片片玉米地，地里一些矮小的树下搭建着几间泥巴小屋。因

为白天太热，罗伯特·拿皮尔将军叫人在水渠上放了一架梯子，他离开自己的帐篷，只身来到小屋旁凉爽的树阴下。正当将军在行军疲劳后进行午休之际，村里的几位乡绅前来拜访。一个上海人也来拜见将军，他有几艘舢板船泊在河口要前往天津海口。他请求将军给他写一封信给海军上将，允许他的船只离开河面。将军礼貌地接待这些来访者，互相寒暄之后，按那个上海人的要求替他写了信。随后，我们雇了一艘舢板船把一些生病的士兵运到大沽。另外又雇了几艘大船把那些脚受伤的士兵的行李运往天津，这些士兵在短途行军期间因背负除他们自己的装备以外的重负而使双脚严重受伤。

下午，军需官温菲尔德先生和我又像先前一样被派往下一个营地。那条高出地面的马路继续朝西经过一片广阔的沼泽湿地，最后来到“咸水沽”村，村子得名是因其坐落在河道的最高点，也就是咸水潮汐流水到达的地方。这个村子也与河道相连，实际上河流离开葛沽村后就偏向道路右侧，流经很长一段距离后又拐回到这个地点。虽然这个村里的人大部分也都做舢板船生意，但村里都是泥巴房子，丝毫看不出富裕的样子。我们骑马穿过咸水沽村，看见一片更肥沃的土地。越往前走，随风摇摆的高粱和玉米占地面积就越大，最后我们来到一座漂亮的柳树林。树林中有一排干净的房屋，其中有一座房屋上标明是“白塘口”的入口。我们鲁莽地骑马进入村子，要求会见村长。一位穿着整洁的年轻人说自己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并把我們领到一个公共会堂。其实，就是一间地面铺了地板、整洁干净的小房间，墙面上挂着几幅用奇怪的红纸写的谚语和格言，闪闪发光。我们要求前往第1师扎营的地点，这位年轻人叫来一辆马车，他自己爬上马车——一条华丽里裤的腿吊在外面——赶车走我们前面，让我们骑马紧随其后。我们离开村子走了大约半英里的路程，到了构成“双港”河段防御工事的五个小要塞，如今

这些要塞都被覆盖了。这个村子坐落在比这几个要塞更远的地方，要经过架在河面上的一座木桥才能到达。“双港”或是双江，因该村位于河道角落而得此名，河流同时在此地向左右分流，因此出现了双河的局面。对于我们的出现，白塘口的村民要比葛沽的村民更害怕。我们进村时，几个女人徘徊在路上，带着女人的好奇心想看看“夷兵”的样子，走在我们前面穿着长里裤的朋友朝她们高声呵斥，让她们赶快跑开躲起来。事后，我责备他这样做有失礼节。他告诉我，他并不是想故意失礼，相反，他担心几个没有礼貌的弱女子出现在我们通行的大道上，有损我们的雅兴。晚上，天下雨了。第二天早晨，我们到达驻营地时地面又湿又滑。一切安排妥当后，部队仍未到，我们开始有点不耐烦，便骑马前去迎接。可是，走到咸水沽还不见行军部队的踪影。我让温菲尔德先生回去，继续准备军用物资，自己则从这里继续往前骑，还没赶到营地就碰上几个锡克骑兵（他们是将军的勤务兵），给我带来一封信，询问路面状况。我继续前行，结果发现部队还停在原地，行军被推迟到我作答之后。葛沽一带的雨势更猛，搭建帐篷的地面已经彻底地变成了一块沼泽地。将军急于离开此地，立即下令拆除帐篷。与往常一样，军需官很难劝服村民为部队提供物资，因此我赶回去得非常及时。

我们很快又开始行军了，傍晚之前抵达了要塞，全程约 11 英里。要塞后面的空地被大片的高粱地侵占，因此有些士兵被分派去要塞扎营。我们下一次行军的目的地就是天津，那里已经安排好一切来接待我师部队。这次我们不需要先行一步。

第二天凌晨 4 点，军号吹响了“起床号”。帐篷都被拆除，一小时后我们又开始行军。此后，我们途径的村子更多，也更加繁荣，总行军路程大约十英里。由于前面不需要我的服务了，之前将军替我借的那匹马也被收回去了。这一段路程我只得步行。

一路上，我们途经惠津、青塘和土城。到最后一个村子时，将军下令部队停止前行，先行军官骑马到总部去接受我们驻营地的命令。我们的部队在炽热的太阳下滞留了两个小时，非常无聊。大家都要发疯了。最后，军号终于吹响了。我们继续前行途径梁家苑和马家口。然后，道路偏向左边，我们的部队则在乡间小路上前行，经过一望无垠高过人头的玉米地和高粱地，最后终于到达天津城外的大草坪，还看见远处先行部队的帐篷。我师的士兵们都开始欢呼。大家很快就逃避了烈日的炙烤，躺在帐篷里面，嘴里有一口没一口地呷着“丘比特”送给我们的冰凉饮料或者吸着用杂草制成的香烟，一面凝视无数的燕子在头顶上空的气流里玩耍，一面拍打着令人讨厌的苍蝇——数不清的苍蝇不停地飞到我们脸上来，让我们帐篷里面变得一片漆黑。

第 8 章

……难道你不是，
在你君主的名下，企图卑鄙地掩盖一个谎言？……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个拙劣的计谋太脆弱。

* * * * *

倘若我的决心动摇，
就会使他们更加坚强，让他们如命运般坚不可摧。
这便促成了唯一的动机，
激励他们发起战争，带来毁灭。

——《坦克雷德和西吉斯蒙达》

僧格林沁的策略——天津之描述——科学代表团——“自己的
通讯记者”——中国人的狡诈——联军行进——地形勘察部——俄
国公使——乡村之描述——杨村——免战白旗

我在前文提过，通往天津的水路被敌军设在白河两岸的小要塞
截断，要塞在天津城南约两英里处。要塞两边的陆地上建有一面带

有雄渫的长长的围墙，城墙呈半圆形，将小镇、镇郊和毗邻的一小块平原围起来，直到城市的背面内陆才又被河道分开。围墙的总长度估计有 15 英里，由神枪手把守，这可能会给联军的前进造成巨大的干扰。这面泥巴墙是新造的，并且已经被弃用了，不过据我们所知，这面墙建到现在这个高度只花了 15 便士。要塞里有近期被人占用的迹象，但墙上没有架炮的标记，只是被加高成一个怪物的样子，显然是用来吓唬远处的人，或许企图吓退轻装上阵的士兵。中国人普遍认为，我们是一个擅长海上作战的民族，只会搬弄船上的大炮，而不太擅长使用野战炮。然而，在海岸上尝到了我们阿姆斯特朗大炮的威力后，清兵改变了看法，将原本用来对付我们海军的要塞拱手相让。

僧格林沁是一个技艺精湛的工程师，他用巧妙的方式建造了要塞，使其从海路无法攻破。作为一名统军大臣，他即使错误地估算了敌人，也无可指责。迄今，他只对付了我们的海军，但是他的表现证明自己完全胜任皇帝交给他的任务。而且，从他所用的人力和物力来看，他确实创造了奇迹。然而，当他发现与之对抗的是一支强大的陆军和先进的野战炮时，他知道自己估计错了，他的敌人与预期的完全不同。出于谨慎考虑——任何处在类似窘迫境地的人都有可能这样——他决定，先让胜利了的联军大规模地前进到他们想去的地方，然后请求外交援助以拖延联军大部队前进，诱骗他们只派小部分人带着外国特使卫兵的炫目头衔前去京城，这样他便有时间撤退，在北京附近设立最后一站。他希望在那里重整旗鼓，让手下士兵在战场上迎接一小群敌人的高级士兵，以人数上压倒性的优势将敌人轻易俘获。

毫无疑问，这就是僧格林沁的策略。因此，军营里流传一个有趣的故事，说僧亲王是皇家海军陆战队里的一名爱尔兰逃兵，他的

原名是萨姆·柯林森，而他的策略非常具有爱尔兰血统的特征。不过，站在中立者角度来看，清军司令的最后一个智谋值得大加赞赏。从过去几个星期血的教训中，他深知，用他的部队与我们全部的兵力冒险进行公平抗衡是极不理智的。因此，他决定借助外交援助使用欺诈手段，一举粉碎我们的部队，恢复他自己的声誉。在两支渴望议和的军队之间发生这种行为，我们可能会加以批判，然而我们都知道战争中兵不厌诈。

中国政府认为，我们此次远征的目的是要从他们手里夺走这个国家，或许有人会质疑这种想法；但是，所有人都非常清楚，我们要羞辱他们。他们发现自己实力太弱无法依靠军事力量来抵抗我们，所以使诈，假装答应我们的一切条件，希望以换约为借口，诱骗我们的特使只带一千名卫兵进京，让他们掉进僧格林沁设计的陷阱里去。大部分从印度来的军官深谙亚洲政治中的欺诈，听说让联军两位全权特使将大部队留在天津只带一小队卫兵进京的消息，他们都板着脸，建议大家小心。确实，知道这个消息的当地人虽然对我们都客客气气，但偶尔也会露出一些迹象，认为我们此次远征可能会毫无收获，或者我们的胜利也只是暂时的。

天津城外的营地生活单调且不舒适。我们扎营在城东一块大草坪上，但钟形帐篷对肆意横扫的热风丝毫不起作用。为了躲避中午的炎热，我必须每天去左面一英里半的海光寺或去小镇的街上打发时光，倘若没有这些闲暇，我早就没命了。不过，士兵们很幸运，他们的帐篷很快就被通风的印度大帐篷取代，而且部队采用了一切手段来确保他们的健康。这里茶叶又多又便宜，其他的供应物资也是如此，军营附近开设了一个上好的集市。一头活羊只要十二先令六便士就能买到，水牛根据大小不同，价格每头可达到五英镑。但是，这两种肉的零售价格都很低——羊肉四便士一磅而牛肉只需三

便士。不过，即使这个价格也比镇里本地集市上的价格高得多。在这个炎热的季节，无论对当地人还是欧洲人而言，最有意义的奢侈品就是冰，为此整天都有小贩前来军营兜售冰块。但是对中国人而言，冰块是用来躺的。他们把冰块敲碎撒在炕上，铺上席子，然后立即脱下衣服光着膀子躺在席子上。他们躺在凉爽的炕上午休，直到正午的炎热逐渐消散。这样放松之后，人们才得以重新恢复体力。虽然中午的天气炎热，让人无精打采——这点与中国南方地区很相似。但是，晚上的天气凉爽，睡觉时简直都要盖被子。俗话说，入乡随俗，一个人长期待在天气炎热的地方，他就适应了炎热的天气，耐受炎热的能力也更强。然而，中国人——无论北方人还是南方人——都很怕热；事实上，几乎和新到的欧洲人一样怕热。即使是在大沽要塞，四面被泥滩和盐田环绕，也能找到大量的冰块，似乎僧格林沁自己也认为，它对保持士兵们的健康很有必要。

联军胜利和即将挺进天津的消息一传开，城里许多居民逃走了。但是，我们进城时，发现城里的街道与中国小镇普通的拥挤大道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小摊小贩继续着往日的欢乐，下层社会的人穿着臭烘烘的破衣衫在街上彼此讥笑、抱怨和指责，却依然快乐。然而，稍微体面点儿的居民则穿着蓝色长袍，有时看见他们聚成一群，脸上露出焦虑和不快的表情，街道两旁的大商店都紧闭店门。我们到达水边时，聚集的群众开始增多，到韩府附近的人也越来越多，快要容纳不下了。这些人无所事事，懒洋洋地看着岗哨或是盯着来来往往的外国人。做玉米生意的富商姓韩，他的大宅院被简便地分成不同院落，有两个门道通往河滩或是河岸。稍微高一些的门道通向两个房间，其中一间被额尔金勋爵和他的参谋占用，另一间被霍普·格兰特爵士和参谋部占用。低一些的门就是通往法军司令部的入口。这些独立的套房中，每一间都被分成两至三个小房间，

由一系列的花园和走廊连接起来，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迷宫。有些房间铺着木地板并安了玻璃窗，带有雕花柱子和幔帐；有些花园里装饰着假山和花圃。不过，这是当地的建筑风格和炫耀财富的方式。毫无疑问，这是城里最好的房子。我们最高当局选这个地方作为他们的总部，有损他们在当地人眼里的尊严。营地附近的海光寺——我在前文已经解释过的——就是 1858 年签订条约时，清政府准备用于接待我国公使的地方。这是一座饱经岁月、规模宏大的庙宇，但是风格和普通寺庙没有区别。寺庙里的房间如今成了军需处的宿营地。

在与韩府只有几户相隔的河岸上有一座房子，里面住着法国的“科学代表团”，因为门廊上赫然贴着这几个大字。我为自己的发现感到欣喜，但同时也深感受伤。法国政府走在我们前面，把科学研究与现代战争联系起来。我立即前去拜访这个学术团队，想弄清楚他们的特殊任务目标。然而，令我惊讶的是，整幢房子里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告诉我，他被指派为这个代表团的带头人，但由于组织内部的某些错误，代表团里其他的成员至今还未出现。这位先生还告诉我，他在此次远征中的特殊任务就是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但是，正当我准备离开时，他说了一句话，让我有些怀疑这个科学代表团的带头人能否完成任务。他的大意是，三个月前他刚刚学习了中文口语，现在可以讲一口流利的中文，而且他深信再通过三个月的学习，就能完全掌握中文的书面语言了。可是，这位政治经济学大师当着我的面，跟一个中国人说话时暴露了他真正的语言水平，否则我怎敢质疑他的豪言壮语？

听说法军营地里有一位动物学家时，我也同样吃了一惊，准备接下来前去拜访他。这位先生是一位业余的动物学家，他获准在战争期间与法军随行。伊尔先生是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居住者。住在

当地期间，他密切关注北非的动物物种，这成了近年来吸引许多积极进取的自然学家从我们的岛屿前往北非海岸的主要原因。

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但非常热衷于自己的爱好，完全不顾各种衰老的迹象，即人类的天敌——岁月——在人身上留下来的痕迹。住在芝罘——法军的集合点——期间，他已经仔细地整理过山东海角的动物特性，但是长期露营在外加之随后的大沽战役让他不幸患上风湿病卧床不起，因此自在北塘登陆之后，他的工作几乎没有进展。他是“地形勘察局”的嘉宾成员，与另一位杰出的业余科学家——《箴言报》的记者一起住在法军军营里。伊尔先抱怨他受到法军士兵的粗鲁对待，他们把他视作一个爱管闲事的闯入者；他还告诉我，他的许多贵重的自然史方面的插图作品都因士兵们的粗心而惨遭不幸。当他指责他们的行为时，他们辩解说：“我们是军人，不携带行李。”

因此，我们可以得知，法军阵营中只有一位是拿薪水的科学家，而且他还是一位政治经济学家。但是，我们的政府也够丢人的，我们的阵营里一个科学家都没有。我们的政府总是从实用主义原则出发，将科学研究完全变成私人的兴趣爱好。加尔加答一位著名而博学的动物学家布莱斯先生向大不列颠提供他三十年含辛茹苦研究的亚洲动物特性，以代表大英政府为华北战役涂抹上科学的色彩，可是我们吝啬的政府毫不犹豫地作出决定，拒绝了一个如此高尚的提议。倘若不是某些人被自己的爱好驱使，利用闲暇时间去获取自然历史中的重要资料——这些资料往往构成一个国家地理中最重要的部分，那么因我们的军队在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所取得的成功而得到的良机就会完全失去。

新闻记者们的表现要更好一些，因为除了《泰晤士报》敏捷的专栏记者、使馆的客人鲍白先生之外，军营里还有幸收留了《北华捷

报》和《中国邮报》的两位编辑。两位编辑先生都是出于热爱冒险的精神和党性的原因随军前来，其中一个大体上是亲英派而另一个是亲华派，但是两个人都渴望目睹公平战斗。这两位先生中，有一位先生人见人敬，此人不仅华发早生，而且还是那种少有的典型的英国绅士，因此经常被错认为是额尔金勋爵，有时的情景非常可笑。部队在新河露宿的第二天早晨，这位先生静静地坐在一个干草堆上，享受着清晨太阳带来的怡人的阳光，一位随军牧师走到他跟前，脱下帽子问道：“勋爵，您要来一杯巧克力吗？”对方客气地拒绝了牧师的好意，牧师走开了，暗自庆幸有这么一个开心的机会让他向勋爵表示一点点关心。一次类似但更加可笑的情况在天津还发生过。俄国公使一听说我们已经向天津前进，就到天津来与我们会合，他下榻在城后街的一座房子里，并派了一位哥萨克卫兵守在房子门口。我们的编辑朋友就住在这位公使隔壁的一间屋子里，有一天他正沿着街道静静地散步，这时那个卫兵看见他，以为这位衣着朴素、看起来令人敬重的绅士肯定就是额尔金勋爵，于是他立即冲进守卫室，踢醒昏昏欲睡的同伴，让他们出来拥抱我们的朋友——他一言不发地接受了他们的问候，内心却感到烦恼，因为他被迫领受本来要给一位大人物的荣誉。因此，为了避开多事的哨兵，回去的时候，他从后面一条胡同走了。

如今，除留守大沽要塞的一小队人马和被派往上海的第44团外，部队的所有人马都聚集在天津城墙下。要塞失陷后不久，有消息称，我军在上海的驻地受南京叛军一支大部队的威胁，因此第44团被立即派往上海。大连湾的奥丁海湾就此放弃，因为在战场上能够获得丰富的物资供应，所以就不需要用那里作军需储备地，这样第19旁遮普士兵和皇家炮兵团的余兵便受命赶赴前线。有消息称，中国的和谈代表同意了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提出的全部条件，条

约将在几天后签署，之后联军的两特使就可以带着他们的两千卫兵进京更换 1858 年签订的条约。实际上，我们提出的条件一点也不过分。除了最后通牒中的条件外，清政府还应开放天津作为与外国通商的口岸，向英国赔款 800 万两白银（相当于 275 万的英国货币），所赔款项付清之后，部队才从大沽要塞撤出。赔款中的一半用以弥补广州战争的损失，另一半用来支付这次战争的开销。法国人索要的赔款额度和我们一样，但是他们在广州的损失还不到 200 万，而他们准备为此次远征所花的费用也远远不如我们多。

听到这个小道消息之后，所有人都以为战争结束了，不久之后军营就可以拆除了。确实，在香港服务了多年的第 1 皇家团已经接到命令，准备立即撤离此地前往英国，因为该团的士兵有十分之一病死。许多军官也公开拍卖了他们的马具和一些重行李。可是，就在 9 月 6 日那天，消息如一声惊雷般传来，巴夏礼和威妥玛两位领事前去会见桂良和恒福，安排第二天签署条约的事宜，结果邀请这两位中国特使出示他们的委任状时发现他们的权限不够，无权签署条约。他们撒了一个厚颜无耻的谎言，并希望翻译官会信任他们的身份，不会对他们虚假的权力过分追究，从而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去劝诱额尔金勋爵到天津走一个签署协议的过场，随后以到朝廷换约为借口，让额尔金勋爵只带一小队卫兵进京，最后让勋爵乖乖地落入狡猾的僧格林沁设计的圈套。毫无疑问，这只是清政府的缓兵之计，不过多亏了我们可信的中国秘书和他的同事，将敌人的这个希望扼杀在萌芽之中。清政府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立即被上报给了勋爵，勋爵又立即将这一切告诉了霍普·格兰特爵士，并且要求他指挥部队挺进通州。他告诉中国特使，一旦皇帝赐予他们签署条约的特权，他将立即与他们在通州会见。第二天，霍普·格兰特爵士派了一支先遣部队前往通州，让他们在天津城外几英里处驻营，并

下令第二天开始行军。因此，8日早晨，轻步兵团乐队演奏的《家乡的父老乡亲》很早就把我从酣睡中吵醒，我探出头去，看见部队已经出发了。第1师在约翰·米切尔将军的率领下向通州开进。他们的翻译官吉普森先生因为病重不能随行，所以被留下，而莫里森先生，也是皇家领事中的一员，因休病假暂离厦门领事馆的职位，他向总司令毛遂自荐，因此被指定为米切尔将军此次的随同翻译。那天早上，吃过早饭后，我陪拿皮尔将军进城经过第1师的行李队时，看见他们还在拥挤的大路上艰难前行。我非常自私，因此嫉妒我办公室同事的好运，他被指定与部队一同赶赴前线，而我却注定要与第2师一起留在后方。因此，我到总部听说有更好的差事等着我时，可以想象我是多么开心。霍普·格兰特爵士将我分派给陆军上校沃尔斯利指挥的地形勘察部担任他们的随同翻译，他们的任务就是追随前进部队的踪迹，调查路况。韩府附近忙碌而混乱的场面可以想象，但很难描述。一排排的马车和货车停在路旁，每辆车上都插着标有号码的小旗帜，等待第二天出发。沃尔斯利上校好心地替我向辎重队要了一匹马，希望我第二天与他们一同出发，我满心喜悦地返回营地。

“小马还是大马？”第二天早上，我前去要马，那位身着白条纹军装的英勇军官、辎重队的格雷上尉这样问我。“我希望不是前一种，因为我们的那种马已经没什么可选的了。”一听说我要的是后一种马，他就打发一个马夫陪我到马圈里去挑。所有马用三四个木桩圈着，马夫把这些马圈门都打开，让我进去挑选，可是从这么多高大而憔悴的马儿中挑选出一匹好马真是一个难题。我在马圈里绝望地走来走去，差点就要放弃这个折磨人的差事儿，这时，辎重队一名士兵正好牵回来一匹灰色的马，他刚才骑着这匹马去跑了趟腿儿。这只牲口并不“英俊”，正如我们的美国同胞所说，但是比其

他马要肥壮一点，所以不会像其他马一样容易疲劳。我一眼就看上了它，在我的收据上盖好红印之后，我胜利地骑上它前往随从们帮我打包帐篷和行李的地方。他们已经雇了几个当地的挑夫，所有人都整装待发；所以，与拿皮尔将军和他的参谋深情告别之后，我策马加鞭赶上了我的新上司，开始了一份新的差事。

重新改组的地形勘察部由三个人组成——副总军需官助理陆军上校沃尔斯利、皇家工兵团的陆军中尉哈里森，还有我。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上，也就是9月9日，我们带着三辆马车和几个随从经过天津的街道，在法军的行李车后面开始缓慢前行。这是一项进展缓慢的工作，经过“永盛街”期间还出现了多次中断。经过这条街道时，许多小店主站在门口观看笨拙的马车队，走在马车旁边的人不同肤色、身高、体型，穿着不同的服饰，听见小店主们奇怪的评论感觉很有意思。“他们肯定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一个人说，“你看有的那么黑，有的又那么白。”“不是，”另一个人说，“他们只是两个国家的，法国和英国。那些黑人是他们的奴隶。”有些人惊叹我们的马儿高大，对我们骑在种马上的蛮勇极其迷惑。我们骑着三匹马齐头并进，而且都是灰色的军马，所以引得许多围观群众发出“哎呀”的惊羡。最后，我们终于走上通往浮桥的道路，经过这座浮桥就可以渡过白河和大运河（又名“御河”）的交汇点；再走过一条街道，经过西河或小（下）西河上面的小桥。这条路再连接着一座石桥，名为“红桥”，这座桥架在上（大）西河上，这条河别名“汶河”，之后又经过白河河岸上的一些房子，称为“西庄”（又名“西村”），再往前走一段路，最后来到“丁字沽”，这个村庄得名于这条河的“丁”字或是字母“T”的形状。村庄左面是一块草坪，是一个扎营的好地方，由于沃尔斯利上校不想在第一天走得太远，所以我们在这里搭起了帐篷。由于我是这个小阵营的翻译代表，

因此前去与村民们会谈，结果我们很快就得到了村民们供应的大米、家禽和水果，我们便用这些东西去款待霍普·格兰特爵士的军官和额尔金勋爵的参谋们，他们骑马追赶前进的部队时向我们欢呼称谢。

我们询问了这一带不同河流的名称和流向，但是中国人从来都不从整体上去认识一条河，一条河的每个河段都由其流经的小镇或村庄的居民赋予不同的名称，而且通常同一段河流被居住在相隔不远的居民赋予不同的名字。这一点非常令人费解。因此，天津下面的白河在两岸居民的意识中就是“北河”；在北塘，为了将其与北塘河——在当地被称为“北河”——区分开来，这条河又被称为“南河”。在天津，白河流入大海，所以又被称为“海河”；而天津之上往通州方向去的那段河道又叫做“北河”，或是“大北河”。

大运河，也叫“运粮河”或是“御河”，往南流去最后汇入“黄河”，流经许多小镇和村庄，我们已经获得这条运河的各段名称和距离，但是我担心这些数据不太可靠，所以不值得在此处展示给大家。运河大约有四五百英里、甚至更长的距离适于航行，但是这方面的资料很难获取。谁都知道黄河冲掉了运河的沟渠，使运河不再适于航行，但是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说出运河被毁坏的程度。

小西河或是下西河是一条往南流的小河，蜿蜒曲折，平底驳船可以在上面航行，一直到离天津约 150 英里的小城“宁青”。

大西河或是上西河，别名“汶河”，在红桥处流入北河，几乎是朝正西方向流入北京东面的大盐滩或叫“定海”，流经定海，河流继续往前流，直到最大的地方行政区“保定府”。

第二天清晨，我早早起床，沿着河岸往南朝一英里外的一堆桅杆走去。这些桅杆是停泊在一个村子前、汶河河面上的一些舢板船。其他的舢板船装满了盐袋子正沿河往下游驶去。尽管敌人在前

进，交通运输似乎还在继续。我被一条长满灯芯草的小溪拦住了去路，不能到达河岸，小溪最后流入一片不大的沼泽地。这条小溪里有许多野生鸟类，但是我在此地只能作短暂的逗留，估计没有机会再回来了，因此非常遗憾。

英国军队经过第一天的行军后停在“蒲口”，准备第二天（9月10日）前往杨村。法国军队落后我军一天的行程，尽管他们也是在9月9日与我部在同一时间出发，但他们刚到达“西庄”，并在我们后面不远的地方扎营。因此，为了让他们通行，我们必须推迟动身。我部的小营地由一个印度大帐篷和两个钟形小帐篷组成，大帐篷里住着上校和中尉，同时也用作我们大家共同的客厅；钟形帐篷一顶是我的，另外一顶里住着沃尔斯利的勤务兵和工兵连里的一位下士。中国随从和马车夫一般都用席子和高粱秆子搭个茅草屋住，而黑人随从则住在帐篷屋子里。在拴成一排的三四大马旁边，是六匹拉行李车的小马和马车，还有派来护卫我们的十一位锡克骑兵，以及他们的帐篷和马匹。我们这一小队人马常常引起路人的注意，以至于法国军官盘问我们许多问题，诸如，“你们是什么人？去执行什么任务”之类。其中，有一个俄国人在两个哥萨克人的陪同下策马来到我们面前，夸赞我们的阵营整洁，还说我们的马匹尽管经过如此长途的跋涉还这么强壮健康，真是令人惊叹。他说，让他印象最深的是我们骑着高大阿拉伯种马的锡克骑兵团。“等你们到了北京，会让人震惊的，”他说，“我告诉你，皇帝的坐骑也只不过跟我这匹小马一样大。”（他指了指胯下的本地马）“不过你们的锡克骑兵真是了不起。你们能从一个野蛮的黑人国家训练出一支如此精悍的骑兵团，真是不可思议！”伊格那替叶福伯爵（他应该受此称赞）的秘书也在他夸奖之列。确实，与法国军队里拙劣的阿尔及利亚籍骑兵相比，任何称赞这些锡克骑兵的训练和表现的英国军官都不会

被认为是骄傲自大。法国军官也承认，这些阿尔及利亚骑兵经常目无军纪，而且他们的坐骑都是些看上去饿得半死的、最差劲的马尼拉小马。

法军一走远，我们就拆掉了帐篷，开始执行在路上的任务。哈里森往白河方向去勘察，而沃尔斯利继续在这条马路上追踪先行部队的踪迹。由于我的任务是负责询问每个村庄的名称，获取所有必需的信息，所以我接受指示陪同沃尔斯利上校。据谢拉德·奥斯本上尉观察，白河两岸都有人工挖凿的壕沟，两岸的村庄比内陆的村庄更大且更富裕，村民主要靠种水果为生。但是，这个作者说天津和北京之间有一条铺砌的道路，我们之前还信以为真，结果发现那完全是子虚乌有。他肯定指的是通州和北京之间的那条石铺路，关于那条路其他作者之前已经作过评论了。

放眼望去，这一带方圆几英里之内的地面都被高粱地覆盖。倘若没有偶尔出现的砖窑和瞭望塔，我们很难对这条马路进行准确的勘察。事实上，沃尔斯利上校觉得，如果不是脚踏在路面上，很难确保勘察的准确性。后来，在返回途中，我们记录的道路距离被一个巡视队的数据颠覆了，而且他们的准确性得到了证实。我们在路旁一间名叫“桃花寺”的漂亮寺庙里歇脚，寺庙的方丈收拾了一个小房间来招待路人，形色各异的中国乡巴佬坐在里面的长椅上喝茶抽烟。我们在炎炎烈日中行路后，来到这个寺庙友好的屋檐下，坐在这些人旁边乘凉。除了令人提神的热饮料，锡克同伴还给我们拿来桃子和苹果。一直万里无云的天空此刻变得阴沉，我们上路没走多远，伴随着电闪雷鸣的滂沱大雨就浇在我们头上。我们赶紧跑到白河岸边一个全是泥巴房子的小村里去躲雨，直到闪电雷鸣渐渐平息才离开。哈里森中尉在这里与我们集合，忠实的黑人仆从坚持要给我们每人一件外衣。接过外衣，我们沿着泥泞的马路一步一滑地

往前走。这阵大雨把马路变成了一个泥巴的海洋，但幸好我们只需要再往前走几英里，因为我们的仆从已经往前去了。一看见天要下雨的样子，他们便在下蒲口村附近找了一个柳树林搭好了帐篷，这个地方比法国的驻营地——蒲口村——大概近两英里。因此我们很快就能舒舒服服地等待更糟糕天气的来临，可是在我们马车前面不远处有许多法国的行李车，由于道路泥泞，他们无法前进，只得停在原地，挑战令人愤怒的暴雨。一个法国人带着他的妻子——一个美丽的随军女小贩——在离我们不远的路上艰难前行。我们很抱歉，除了能收留他们在帐篷里过一晚之外给不了别的帮助。但是，那位太太没有接受我们的好意，因为没过多久一位法国军官就前来把她带到他们的营地去了。我们的锡克骑兵大部分都是伊斯兰教徒，所以很难为他们弄到吃的，因为他们不吃猪肉，可是村里最多的动物就是猪。最后，我们终于为他们找到了一些家禽和少量的小麦粉。

第二天，太阳又灿烂地升起，地面上的水分很快被蒸发了。但是，我们决定放松一下，到下午再开始工作，因此我得空在村子周围走走。“下”蒲口是一个规模不大的村庄，村里全是泥巴房子，村民就住在那些房子里。房子附近堆着各种各样丰富的草料。上好的干草和麦秆堆成一个个干草垛，木桩和高粱秆一起插进草垛将草垛撑离地面，草垛上面盖着泥巴做成的蘑菇顶，有的草垛从地面开始四周涂着一圈几英尺高的泥巴层。村里很多房子都无人居住，至少没有女人住，而且大部分的牲口都被赶走了。顺便提一下，我们好心帮助的两个落伍的法国人中的那个男人做了一件忘恩负义的事情来报答我们，他深更半夜解开驮运我行李的小马，骑着它到自己的军营去了，没给我留下任何找回那头牲口的机会。

我们扎营的柳树林里有几棵大树，在清晨令人高兴的阳光

树上的小鸟尤其活跃。潮湿的夜晚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清新、明亮的早晨。太阳冉冉升起，将它的光线和温暖投射在被雨水浸透的大自然，对我们这些凡人而言，也是令人高兴的一幕。那些湿透了、被雨水压弯了腰的树枝抬起了头，鸟儿拍打着潮湿的羽毛，将它们梳理整齐。我们漫步在阳光下，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快乐。啄木鸟（羽毛是杂色的那种）最先在此处亮相，它们在垂柳树的树皮上轻盈地跳来跳去；中国金莺的美丽黄羽在绿色的树叶中非常显眼。小京燕不断冲向空中捕捉路过的苍蝇，而灰喜鹊嘴里发出快乐的鸣啾，告诉我们它在空中也忙着呢。白颊鸟、燕雀和鹌鹑鸟的鸣叫声，还有笨重的布谷鸟笨拙地穿过树枝发出的窸窣声，像是在警告活跃在柳树林里的同伴，也让我们想起在中国南方认识的那些“老友”。它们为了发动昆虫之战，已领先我们一步到达，在它们夏日出没之地欢迎我们来到北方这个皇帝管辖之下的荒蛮之地。

几小时的阳光对这一带的泥巴路产生了神奇的功效，还不到中午，大马路的路面已经干到可以让我们的马车通行。跟之前一样，哈里斯去河道方向勘察，他和两个锡克勤务兵先出发，我和沃尔斯利及三个锡克兵继续沿着马路前行，其他六个人则留下来照看行李。但是，还没走多远，我们的一个黑人随从就出事了，他的马滑了一下，结果连人带马一起掉进了一个泥潭里。发生这个小事故后，他必须回到行李处去更换衣服，他的职位则被另一个人取代。

我们很快抵达坐落在河岸的蒲口村。我们沿着一条又脏又长的道路骑马前行，道路的一部分被法国特使和他的卫兵们占用，但是法军的营地则驻扎在离此处几里远的一块高粱地里。他们推迟行军，直到第二天接到霍普·格兰特爵士从杨村的英国营地送回来的传令才开始继续前进。

我们在离法军营地不远处，碰到两个法国人在狩猎，他们利用

这个逗留的机会去打一天猎。认出其中有一个是我的朋友齐尔先生，我很高兴。他们为了打鹌鹑而搜遍了高粱地，可是到最后仅猎获了一只鹌鹑幼崽。

蒲口——部队停靠的第一站——离天津约 12.5 英里。在这个村子和天津城之间，还有许多不起眼的小村庄，我觉得不值在此一一列举，因为一串串没有意义的中文名称不是我想要叙述的目的，再说想要了解这些村庄名称的读者可以在最近出版的《政府调查报告》中找到。这份报告就是我部工作的成果，它由不知疲倦、吃苦耐劳的沃尔斯利上校和哈里斯中尉策划，里面仔细地标明了所有村庄的名称。

我们从蒲口村出发再往前走了 7.5 英里，天快黑了才到达英军驻扎在杨村的营地，我们的行李兵已经在那里搭好了帐篷，布置得很舒适。杨村是一个富裕的大村庄，占据白河两岸的土地，村里有几间上等的砖瓦房。杨村隶属武清县辖区，村里住着两位文官，Che-Heen 和 Hee-ching，都是七品，他们官帽上的顶珠是镀金的。无须多言，这些知名人士早就在我们到达之前逃走了。我们在天津雇来几个马车夫拉运特使和总参谋部的行李，他们在下暴雨的那晚趁黑逃跑了，还赶走了我们许多拉运行李的马匹；所以，水手们弄了一些舢板船负责从水路运输这些妨碍我们前进的东西。

毋庸置疑，那些马车夫肯定是受到清政府走卒的威胁被吓跑的，我们听说有好几个车夫一直逗留在这一带的军营附近。虽然锡克骑兵一直留心盯着我们部门的那几个车夫，但是在杨村宿营的那晚，还是有三分之二的人设法逃走了。

第二天清晨，两个四品官吏送来一面免战白旗，他们声称刑部尚书载垣——主战派的主要成员——和兵部尚书穆荫被指定为与联军特使和谈的官员，并说这两位官员正在赶往天津的途中。在我们

到达通州之前，不会与清政府进行任何交涉，两位信使得到这个答复后便被打发走了。

第二天早晨(12日)，天刚亮部队就开始前进了，但是我部上午10点才出发。

我们经过几个村庄，发现这一带仍然保留淤积的地貌特征，跟之前一样，大片土地都被高粱和玉米覆盖，越往前走树越多。

傍晚时分，我们到达行军的第二站南蔡村，离杨村7.5英里，我们又在英军营地落脚。第二天早晨，大部队继续前进，我们跟在部队后面。这次，沃尔斯利上校去勘察河道——河道在此处突然拐了一个大湾朝北流去——而道路则留给哈里森中尉勘察。

快到河西务一带时，沙质土壤更为明显。河西务村坐落在河岸上一些沙丘或更确切地说是一些凹凸不平的沙堆中间，但是放眼望去，这一带仍然是一块大平原，随风起伏的麦浪里零星地点缀着树林茂密的村庄以及隐约可见的砖窑和瞭望塔。

总参谋部已经将他们的营地驻扎在村外一间涂着艳俗色彩的孔庙里，所以我们就把帐篷扎在附近的一座小山上。我沿着河岸走了走，此处河道只有三十码宽，许多士兵都泡在河水里放松，平均水深只到腰间，偶尔也有一两处水更深些，水流清澈。我抵挡不住诱惑，脱下衣服跳进河里，泡在清凉的流水中一时间忘记了路途中的炎热、尘土还有行军营地生活的不适，在凉爽的沐浴中陶醉。

第 9 章

随意扎营，

* * * * *

只有一个士兵守卫，

我们何不乘夜偷袭，

将他一举抓获。

——莎士比亚

中国供给委员会——掠夺——露营河西务——谈判——通州会议——设置圈套——中国逃亡者——清廷间谍——不祥的探险——喇嘛之墓——中国式猎狐——“黑人王子”——战争的喧嚣——马头村约定——侦察通州——沃克上校的勇气——巴夏礼先生的记述

我骑马经过河西务的主干道时，并不觉得这个村庄的外表有多迷人。村里大部分是砖房，可能比我们之前路过的那些房屋建造得好得多，但是房屋的大门都紧闭着，大部分居民都已逃走。

那几个由天津供应委员会委托向行军部队提供物资供应的人在

这里已经不太热衷于他们的使命了，甚至试图逃走。结果，他们的主要负责人被监禁起来，其余的则被打发去为军需处找一些马车夫。供应的物资根本满足不了需求，因此，为了寻找粮食必须撬开村里的房子，军需官承诺，除了生活必需品之外屋里其他东西一律不准拿走。他们立即找到大量的谷物，但是很难找到人把这些谷物研成面粉。留在村里的几个村民也不愿意费力把他们自己的口粮研磨成粉，尽管我军答应，他们的其他财物不会受到破坏。士兵被派去协助军需官，抢劫事件因此发生。典当铺显眼的招牌很快被士兵发现，因为这些店铺门口通常装饰着漆成绿色和金色的木雕龙头。抢劫的恶作剧一旦开始，哪怕宪兵司令的警戒心再高，棍棒使用得再频繁也无法阻止。

河西务小镇四面城墙高耸，只有一个非常体面的小城门，城门两端各有一个做工精巧的老式塔楼门廊。可是，马车行走的道路通向一个小沙丘，道路右边河岸上是一小片郊区。马车轴的一半都陷入沙子里，所以爬上这个小沙丘是一项艰难而缓慢的工程。不过，再往离村子稍远的地方去，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十分独特的景象。在远处，白河两岸点缀着翠绿的小山丘、漂亮的宝塔、涂着艳俗色彩的孔庙、带四方形院落的寺庙，还有一些外表华丽的建筑物，高大的树木、小树林和小灌木丛。额尔金勋爵下榻在那个寺庙内，我在前文已经提过，总参谋处扎营在孔庙里面和四周，而大部队则驻扎在我们前面那块平原上的小树林里。第二天，法军赶到，将营地扎在我们营地的旁边。毫无疑问，河西务是我们前往通州途中见到最好的村子，而且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一带高低不平的地势大大有利于敌人阻止我们前进。敌人最初可能有这个想法，因为我们在一个旧会堂里发现大量的弓箭和其他作战时的军需品，但是没有其他防御的迹象。我们获悉，有一个戴九品镀金顶珠的“芝麻官”

Seun-cheen和另一个戴水晶顶珠的五品文官 Tung-chee 住在河西务。

我们抵达河西务的当天，巴夏礼和威妥玛两位领事已经带了一小群卫兵前往马头村，那两个专员称他们在马头村等候额尔金勋爵对他在南蔡收到的信函答复。勋爵在杨村时也从这两个人手里收到一封信，措辞相当傲慢，信中对勋爵从天津继续前进的举动表示惊讶。敌人送出第一封信后除了看到我们继续前进的行动之外，没有得到任何其他答复。另一封信，语气稍微缓和一些，是特使在南蔡收到的。信中，清政府两位专员心平气和地建议，“倘若英国特使愿将部队撤回天津，亲王及其帮办大臣将尽力在天津召开会议讨论条约事宜。若特使大人担心往返路途浪费时间，也不反对他将部队驻扎在杨村，并在杨村和马头中间选一个地点讨论和处理条约事宜，当然完全以特使大人方便为宜。请特使大人决定地点选在河西务还是南平”，等等。

但是，勋爵不会再轻易上当了，所以他宁愿将部队拉到河西务，在那里派巴夏礼和威妥玛领事前去向中国专员传达他的答复。与此同时，亲王及其帮办大臣获悉部队前进，表现出中国人的小心谨慎，已经撤到通州。为此，两位翻译在破旧的马头村度过一个难受的晚上之后，追到通州去找他们了。在复函中，额尔金勋爵再次表达了让部队继续开往通州的决心，并表示倘若中国政府能够保证不做出任何过激行为，他可以让部队停在“离通州城较远的一个地方，然后只带一千名卫兵前往通州城签订条约，最后上北京去交换《天津条约》”。

14日中午，巴夏礼和威妥玛两位领事抵达通州，发现附近有大批军队驻扎的迹象。他们在城中道台家中下榻，下午4点前往东门外的寺庙与朝廷专员会面。威妥玛先生这样描述怡亲王载垣和他的帮办大臣：“前者身材魁梧，气质高贵，一副精明的样子，但是

眼神让人有些不悦。兵部尚书穆荫处事更为柔和、圆滑，但是也很精明。两人都非常客气，亲王更是如此，既不谦卑也不友好。”

亲王证实了自己具有行使全权特使的权力之后，领事给了他一份条约，他却使出中国政府臭名昭著的撒谎伎俩对条约视而不见，“尽管他在前面的两封信函中都承诺他会签订这份条约”，威妥玛先生这样描述。我方代表提醒他看条约时，他几乎对条约规定的每一款都提出了异议。整个谈话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从谈话中我们了解，原来中国现行政府并不只归属于三位满族亲王，即惠亲王、郑亲王和怡亲王，而是由具有汉族血统的其他王子与他们一起统治。怡亲王希望我们的军队能在张家湾村后 1.5 英里的地方驻营。我们在这一点上作出了让步，因此他答应按额尔金勋爵提议的方式——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及——在通州会见两位公使，这一点在他回复勋爵的信函中写得非常清楚：“关于两位特使所询问该采取怎样的安全措施以保障目前讨论的承诺如实地履行这个问题，亲王及其帮办大臣只得如此作答，朝廷授予他们的权力是其他可能承担谈判的使臣无法比拟的，这一点为其政府今后忠实地履行条约提供了切实的保障。”在叙述过程中，我们会慢慢明白“忠实”两字在中国是多么珍贵。巴夏礼和威妥玛领事带着这封复函回到河西务军营，途中看见张家湾有众多骑马哨兵，在马头也有“很糟糕的骑兵大队伍”。他们完全信任中国政府外交人员的好意，因此看见我方营地附近出现兵力时没有多想，只以为是僧格林沁在附近的“和平军”而已。与他们交谈的清廷将领都趋向和谈，对解决牵连两个国家的一些困难的举动非常高兴。就这样，障碍被扫除了，几天后我们的部队就会向他们的最后一站——河西务——前进，荣耀地护卫额尔金勋爵先去通州再上北京。

与此同时，这一带的本地人说我们进军成功不是一个好兆头，

用非常强烈的言辞告诉我的中国随从，僧格林沁正在精心布置他的陷阱，而且他手下的士兵都大肆吹嘘，他们将怎样在我们行军过程中包围我们，将我们粉碎，因为他们的统军大臣已经下定决心，一个“大盖帽”也别想活着回到天津。“大盖帽”这个名称通常是用来指法国和英国士兵，因为他们戴着一种用木髓做的奇怪而又扎眼的遮阳帽用以保护头部不受日照。带来这个消息的人当中有两个是僧格林沁军营里的逃兵，在河西务这个劳动力相对缺乏的地方，我们雇他们为我部备办食物。村民们由于害怕都逃离了这个地方，没有人像在行军途中其他几个停靠站的人那样愿意把物资拿到军营里来卖。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意识到我们这两个伙食备办者的可疑之处。有一次，我带其中一个去打猎，让他帮我背枪。他用猎枪的样子很熟练，而且非常机灵，所以我对那个家伙相当有好感。最后，我的仆从非常恐惧地来找我，并告诉我从村民和这两个人那里听来的消息。由于我带一个囚犯——此人为一个住在河西务的文官，给通州专员传信经过军营时被抓捕——到公使的总部去，我就把我听来的消息告诉了鲍白和威妥玛两位先生。两位先生听罢大笑，说这些都是下层人士之间的无稽之谈，他们惊叹我怎么会听信这种胡说八道的话。他们非常信任清政府专员的诚信，因为在最近一次会面中他们表现得那么友好，我们很快就能看到一切困难都会顺利地克服。听罢他们的严斥，我把那两个逃兵给解雇了，并且不再去想这件事。我们破译的那封信是上海的新任道台所写的，此人与上海口岸的外国官员交往甚密，因此被清政府选为间谍来监视我们的行动，并被悄悄地派到河西务，在那里安营扎寨。他好几次试图会见额尔金勋爵未果。在给清政府专员的信函中，他先是详述了我们在河西务的一切行踪，然后报告了我们手里士兵的人数，以及我们打算几天后继续行军并在张家湾附近驻扎，然后派一千名精兵

陪同额尔金勋爵前去通州计划。提到士兵时，用得都是“大盖帽”一词。送这封信的人被扣押，但是那位道台设法逃跑了。通常，一位官员与另一位官员写信时不会使用客套的言辞来谈论一支敌对的力量；但是，可能担心这份文件会落入我们手里，所以写信者未提及任何可能让我们看清楚双方现有关系中的不确定状态。

额尔金勋爵立即把他外交上取得的成功告知了法国特使和我军总司令，最后决定，部队应前往清政府规定的营地，离张家湾五里之地。在部队前往张家湾过程中，巴夏礼先生受命前往通州去安排当地接待特使之事宜，同时为两位特使和他们的参谋寻找运输工具。额尔金勋爵委托巴夏礼先生到通州之后转交给怡亲王载垣和他的帮办大臣一封信。

17日黎明，军队拆撤军营，向第一站马头出发，但是留了一个团在河西务，额尔金勋爵决定暂时留在河西务。巴夏礼先生天刚刚亮就提前出发了，与他一同前往的有“骑兵旅的总军需官陆军上校沃克、军需处的汤普森先生、额尔金勋爵的私人秘书罗亨利先生、布鲁斯先生手下的德诺曼先生——他主动提出要做巴夏礼先生的助手前行，以及鲍白先生，此外还有国王龙骑兵的五位士兵和费恩骑兵团的二十位士兵护卫，所有人都由安德森中尉指挥”。

我们部门在随后的几小时也动身了。和以前一样，沃尔斯利和我继续沿着马路勘察，而哈里森则沿着河岸勘察。这一带风景优美，出产丰富的玉米，村子周围环绕着茂盛的树木。路上有两块奇怪的墓碑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两块墓碑是一个很好的路标。墓碑立在瓦湖村外的一块草坪上，草坪四周都是种满作物的农田。这两块墓碑中最显眼的是一块窄长的大理石碑，约十英尺高，碑上刻满了藏文，碑顶呈圆锥形。当地人告诉我们那块墓碑标记的是一个喇嘛的坟墓。我们途经一个小村庄“南平”，村里的泥巴屋子密集成

群，庙宇到处可见，我跟村里几家还在营业的商店店主交谈，他们告诉我，一支一千人左右的清廷骑兵三天前驻扎在此地，但是那之后就撤走了。他们说，那些士兵言行上都不服从他们的将领，无视他们的命令，虐待和抢劫村民。他们大部分都是鞑靼兵，只有少数几个人略知一点汉文。这条道路的其余部分都被人遗弃，一些小村庄里的许多房子都清空了。因此，我们勘察过程中很难获取信息，因为村民一看见我们，即使是远远地看见，也会尽快走开。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追，所以我通常得带着一个锡克传令骑兵走在队伍的前面，一旦他发现某个当地人，我们就兵分两路去切断他的退路，一旦抓获，只要说三两句他熟悉的话，就可以轻易地从他嘴里搞到我们想要的信息。但是有一次，我累了，让那个骑兵独自去追一个当地人，结果等了很长时间也不见他回来，于是我沿着他的足迹去找，发现他在一所房子前用长矛的把手狠狠地敲门。他冲我咧嘴一笑，用混杂着印度语和帕坦语的口音告诉我，那只狐狸从这个入口逃走了，就在他说话的时候，我看见一个老百姓正爬上屋顶试图逃跑。我大声用中文告诉他不要害怕，他很快平静下来，并告诉我那个手持长矛的“黑人王子”的样子吓到了他。

联军的营地驻扎在马头村外一个树林茂密的地方，我们部门在一块玉米地搭起了帐篷，玉米地在一大片柳树阴下，地里的玉米刚刚收割。马头，或是“码头”（字面意思就是马的头）是白河的狭窄水流两岸一个贫穷落后的村庄。村里肮脏的泥巴小屋都无人居住。河西务与马头相距 12 英里，不过我们勘察这一带的速度比平时快得多，因此我被这一带明亮的天空和迷人的风景吸引，想偷空到处走走。这一带的玉米已经收割，但在玉米地里行走很不舒服，因为留下来的玉米秆有一尺半高，没人清理，玉米秆又硬又挺，脚根本踩不弯它们；然而，潜伏在这一带的众多鹌鹑引诱我敢于冒着擦伤

胫骨的风险前往。太阳快落山时，我经过的一个村庄呈现出一幅迷人却又令人伤感的风景。毫无疑问，最近这一带肯定充满了恐惧和混乱，老百姓纷纷逃往他乡寻求保护；而此刻村庄静静地躺在小溪旁，一条绿色的乡间小路穿过树篱蜿蜒在田野间。低垂的树枝在温柔的晚风中静静地摇曳，投射在泥巴小屋上的树阴令人愉快。我站在那里久久凝视，进入一个恬静的幻想世界，就在这时，一只吵闹的杂种狗——这些无人居住的泥巴小屋唯一的守卫者——发现了我，冲我一阵乱叫，提醒我天色已晚，得赶快回营地了。

第二天(18日)黎明，部队出发前往张家湾附近的营地，我们决定等大部队前进一段时间后再拆帐篷，开始我们一路以来做的工作。那是一个阳光明媚，天空晴朗的早晨，吃过早饭，我们正准备放松放松，这时国王龙骑卫队的一位军官骑马回来，告诉我们，将军下令让后续部队尽快把所有行李运往前线，因为前方有大队清军的骑兵。这位军官不知这道命令是否对我们也适用，但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告知我们。我们谢过他，但认为那可能是将军采取的预防措施，所以就没太在意。不久后，我们清楚地听到远处传来大炮的声音，并看见四个法国人骑着马沿着河岸奔回来。沃尔斯利上校让我装好马鞍，骑马去问问那几个法国人刚才炮击是怎么回事儿。他们若无其事地回答说，他们正从通州赶回河西务，刚刚路过中国军营和英法联军的防线，一路上仿佛行走在巴黎街道上，十分安全，根本没有听到有炮轰的声音。我让他们再仔细听听，因为我们说话的时候那轰隆隆的声音还在继续。令我吃惊的是，他们答道：“没听到，什么声音也没有。不过，如果真的有炮轰声，那肯定是联军和清兵之间开火了。”

听他们这样说，我就离开了这两位骑马的将领和他们的勤务兵，回到我们的帐篷，结果看见沃尔斯利和哈里森两人都在那条高

出地面的路上观看烟火的迹象。我们很快就看见天空冒出白烟球，那说明有弹片爆炸，此外还有尘云，这肯定是飞奔的战马掀起来的。这立即让我们确定，敌我双方又重新进入对抗局面，而且我们的处境极其危险，因为我们的白色帐篷成了敌人眼中显著的标记。我们立即拆掉帐篷，放在马车上。如果我们此时立即冲向交战场地，让行李落入敌人的手里，那就太疯狂了。于是我们决定跟着行李车悄悄地朝英军后方缓缓前进，我们估计英军的后方就在我们前面几英里处。我们提心吊胆地走过了漫长的四英里路程。有时候，骡子把我们拉到不同的方向；有时候，车轮子陷入车辙里拔不出来；而这个过程中，炮轰的声音越来越响，尘云也离我们越来越近。最后，我们终于赶上了大部队的行李队，他们停在一个村庄里负责保护大部队的后方。从他们那里我们得知，如果再早到半小时，我们就会被一支敌人骑兵切断退路；这支敌军刚经过村子后面的那条路，并从那里过了河。把行李扔给大部队的行李队，我们便沿着马路飞驰，沿着小河岸朝左前行，河岸上凸起的堤道是避开敌人炮火的天然屏障，沿着这条道路我们经过张家湾，穿过乡村来到一个地方，总司令正在那里的几棵树下乘凉歇息。霍普·格兰特爵士和他的参谋都下马了，大家都既兴奋又疲惫，显然有些筋疲力尽。将军对事态的转变非常恼火，敌人使用欺诈的手段在我方人员经过他们的营地时扣押了他们，将军对他们的人身安全非常担心。我们得知，巴夏礼先生和罗亨利还有其他几个人都被俘虏了。将军还说，敌人似乎人数众多，战场的人数不下八万。约翰·米切尔将军率部队占领了敌人在这一带的全部军营，这时正带人放火烧毁它们，我们先看见的反复飘入空中的弹药烟雾大部分都是他们放火时弄出来的。将军下令，完成这项任务后部队就撤回张家湾，将营地驻扎在那些无人居住的房屋里。我们陪将军回张家湾，幸好途经

一片果园，葡萄架下结着一串串的葡萄，我们可以用清甜凉爽的葡萄汁熄灭几乎难以忍受的饥渴。此时行李也已运到了村里，村里的房子分配给不同的团部和军官，我们很快就入住新的营地。

9月18日那天，一小队英法联军遇见一群在人数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敌军并展开了战斗，由于我没有亲眼目睹那场激烈的战斗，为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让读者详细了解此次事件，我从《北华捷报》上发表的一封信中抽出几段，并且补充一些我从在场的当事人口中收集的细节。从河西务出发的部队由约翰·米切尔少将统率，其中包括骑兵旅，即国王龙骑卫队、普罗宾和费恩的锡克骑兵以及由帕特尔旅长指挥的斯特灵炮兵团的一半人，德斯伯勒上尉指挥的两个野战炮兵团，以及萨顿和里夫斯两位准将指挥下的两个旅，即第2女王卫队、第15旁遮普团、皇家海军陆战队和第99团，及皇家工兵团和辎重队的分遣部队。一个法国兵团（温彻尼斯的第2追击兵团）和一个野战炮兵团紧随其后。部队于18日从马头出发，大约走了四英里的路程，“这时有人看见敌方的骑兵正懒散地撤回一英里外的一个大军营。部队停下来整队之际，几个骑着马的人送来一面免战白旗，这几个人后面跟着一位乘坐绿色轿子的官员，此人头戴粉色顶珠，帽子上插着一品头衔的孔雀羽毛，有人认出他就是前任广东总督，被派来与特使谈判的现任钦差。正当他在寻找中国人惯用的借口时，罗亨利先生到了”。

情况似乎是这样的，当天早晨巴夏礼和罗亨利两位领事在沃克上校和军需官汤普森的陪同下，带着几个勤务兵早早离开通州前往部队下一个驻营地作一些安排，但是途中遇到大量清兵正在排炮，显然是在准备一场战斗。起初，清兵表现得很谦恭，但是语气上似乎下定了决心。巴夏礼先生发现敌方军官回答他的问题时闪烁其词，因此返回通州去与清政府当局理论他们背信弃义的行为。沃克

上校和军需官汤普森继续骑马前行，在一位清兵的陪同下前往指定的驻营地查看，而当“罗亨利先生去找总司令报告事情的发展态势，总司令要求他立即去找巴夏礼和其他几位先生，提醒他们”立即返回大部队。皇家炮兵团的总军需官布拉巴宗上尉受命与罗亨利先生一同前往。“那位官员离开了，走之前他信誓旦旦地向霍普·格兰特爵士保证，我们看见的聚集在一起的几百名清廷骑兵只是在收集我军需要的物资。”我们看见大量的清廷骑兵往左面集聚，据那位官员说，这些人只是在为联军收集物资，但是其他往河道右边集聚的人却在汲水（他们都骑在马背上而且没有水桶！）。与此同时，部队整队进入相邻的队列，等候从通州返回的队伍，整整三小时。正当我在离营地约五百码的地方享受着树阴带来的凉爽时——清兵正在营地里忙碌地骚动着——我突然被敌人堑壕处传来一阵枪响和一连串的炮轰声惊吓（这位记者写道），几个骑马的人被飞扬的尘土包围。后来他们是沃克上校、骑兵旅的副总军需官、副总军需官汤普森和两个龙骑卫队的士兵。后来，我跟沃克上校聊过此事，从他的描述中我得知，他和那位副军需官被带到那个留给我们扎营的地方，那个地方正好在清兵阵营的中心，因此他向他们的向导摆了摆手，试图让对方明白必须靠近水边给我们选一个地方。他的向导是个头衔较低的“白顶珠”。正当他们六神无主焦急地等待我军前进时，中国士兵人数越来越多，把他和同伴们团团围住。他们并没有公然地粗鲁无礼，但是行为上相当傲慢，露出了中国人对外国人惯有的、无礼的好奇心。没过多久，一位头戴红色顶珠的官员骑马经过，后面跟着一班士兵，他们的向导竖起大拇指告诉他这个人就是长官，可能就是僧格林沁本人。这位官员经过时把头扭到一边，假装没看见在场的英国军官。不久，有个人来到上校身边，一把将他的剑从剑鞘中拔出。不过，此人的无礼行为立即受到责备，后来

剑又回到上校手里。最后，人群——都是武装好了的士兵，所有人都穿着类似的制服，大部分穿着都很整洁——开始骚动无礼，在不远处似乎发生了大骚乱，沃克上校骑马过去看看究竟，发现清兵正在殴打一位法国军官。这位军官的脖子周围被严重划伤，似乎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上校前去劝阻试图挡开那群攻击者，结果他们转而攻击他。一个人把上校的剑从剑鞘里拔出，上校试图夺回剑，结果几根手指被砍伤。另外几个人试图把他的双脚从马镫里拉出来。另一个人走到军需官汤普森身后用长矛刺向他，幸好他的皮带挡住了这一击，只受到了一点皮肉伤。

上校见事态发展得令人担忧，觉得继续待在这群危险的人物中间不再安全，便命令他们的人从敌人中间冲出去逃生。大家听到命令赶忙掉转马头，策马从清兵队列中间冲出去，清兵立即为他们让出一条道路。敌人对这些逃亡者动用了所有的枪支和大炮，不过幸好，除一位龙骑卫士大腿受了点皮肉伤之外，敌人的交叉射击未造成任何严重的人员伤亡。英国军队很快赶到，将军对事情发展的细节也很清楚。

毫无疑问，这次攻击的发生要比清兵统军大臣计划得要早，他们的野心昭然若揭，那就是诱使联军乖乖地在清兵阵营中驻营，然后攻其不备。但是，他们的图谋无论如何已经被挫败了，因为“巴夏礼先生和他的同伴们一直没有返回的迹象，霍普·格兰特爵士安排联军立即前进。军队的兵力分布如下：法军和费恩骑兵团与德斯伯勒和巴里的两个炮兵团在右路，国王龙骑卫队一个中队和第15旁遮普团在中间协助；第2女王卫队及骑兵和斯特灵炮兵团在左路，其余兵力留守。敌人立即以密集火力向我方开炮，这表明他们的位置是在一个战壕的后面，战壕在大马路对面有几英里长，由16门大炮防守。敌人的左路冲在前面，躲在一个隐秘于小树林的村庄

里；右路——在我们能看见的地方——都分布在玉米地里，玉米最近已经收割掉了，但地里仍留下约两英尺长的秆子，对军队尤其是骑兵的前进造成巨大的障碍。经过两小时的激烈交锋后，敌人抵抗不了我们渐渐推进到五百码以内的炮火，开始慢慢后撤，我们的骑兵乘胜追击。费恩的骑兵团从右路将敌人追到村子里，国王龙骑卫队和普罗宾的骑兵从左路把敌人赶到几英里以外，最后发现离大部队很远，他们才不得不停止追击。锡克骑兵在指挥官的率领下表现相当不俗。听说，一位老骑兵把中国军队比作一群家禽，很难追赶上，但是一旦抓获便毫无害处。第15旁遮普团和第99团把敌人追到了张家湾城内。据估计，与我们对抗的敌军数量约三万人，而联军士兵人数却不到三千五百人”。

由于当时作战范围太广，很难估算敌人的死伤人数。我们骑马走进敌军的排炮地，发现敌人的大炮巧妙地架在树阴中间，并用新砍伐的树枝作掩护，在这过程中我们确实很少看见清兵的尸首。那条高出地面的道路从右边的角上与主干道断开，沿着小河方向往前延伸，这条道形成了一条长长的大炮阵地，阵地上有几门上好的铜炮，其中几门已经被笨重的马车拖到了半路，经过一条浅水沟，结果被丢弃在那里。此次我们共缴获了74门加农炮，所有大炮都被摧毁。我军伤亡人数较少，但是法军在向清兵冲锋时损失了一名指挥骑兵的上校，冲锋时费恩骑兵的一支部队协助他们。蒙托邦将军为锡克骑兵的协助而向霍普·格兰特将军写信致谢时，对他们在战场上突出的表现大加赞赏，并且向荣誉兵团推荐了指挥锡克骑兵团的中尉。

额尔金勋爵在河西务已经听到了远处的炮声，但是到半夜才收到霍普·格兰特爵士的信函，告知他所发生的一切。第二天清晨，勋爵趁早赶往前线，一到张家湾就召集总指挥前往法军司令的军营

商讨要回人质的最佳对策。最后，“他们达成协议，先由英军骑兵团前往通州进行火力侦察。威妥玛先生与他们一同前往，携带一份通牒给通州道台(知县)官员，大意是，联军总司令要求英法两国所有人质回到各自的军营总部，倘若他们返回途中遇到任何阻挠，北京城将立即被攻占。另外，若通州百姓不参与抵抗联军的行为，通州城将不会受到任何困扰”。威妥玛先生起初尝试与通州东面的清兵营地交涉，但是他送过去的免战白旗被烧毁了。之后，他又尝试进入通州城会见通州知县，在回答威妥玛先生关于人质的生活状况时，这位官员镇定地回答说，他认为“18日那天，双方开火之前一段时间，一支二十来人组成的小队伍已经离开了通州城”。但是，第二天，普罗宾少校在进一步火力侦察过程中抓到了一个老百姓，他断言交战的当天自己亲眼看见几个外国人被一辆马车送往北京。

这一次，外交官们表现出来的愚蠢在军官中引起极大的反感，因为他们被奸诈的中国人轻易诱骗入局，甚至许多人对巴夏礼先生进行恶言谩骂，认为他不该乖乖地向僧格林沁俯首称臣，而应该信任保护他的同伴，冲出那群包围他的胆小如鼠的乌合之众。倘若他们相信自己手中的武器突围了，或许大多数人都逃回来了。可是，如今他们全部落入敌人的魔掌。与此同时，沃克上校受到大家一致的称赞，因为他不顾强大的敌人，英勇地从敌人的包围圈中冲出，以最小的损失把他部下一小群人带出敌营。大家的反感主要是源于对事件的臆想和猜测，外交官被俘的详细情况并没有人了解。民众一直都比较赞同巴夏礼先生自己的说法，从他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推断，他返回通州去与清政府当局抗议他一路上看到对方的战事准备，之后巴夏礼先生便按霍普·格兰特爵士的命令带着所有人马返回英国营地。“我们刚过张家湾，”巴夏礼先生写道，“并希望能在十分钟之内摆脱中国军队，这时中国炮兵沿着他们的前线开了一

炮，这标志着战斗开始了。一群清军骑兵发现我们，立即堵住我们的去路，我告诉其中一位军官我们是什么人，叫他给我们让路。他说等到上级下令后才能让我们通过。听他这么说，我建议亲自去见那位将军好节省时间。他同意了，于是我骑马前去那个地方，陪我一同前往的还有罗亨利先生和一位携带白旗的骑兵。其他人，也就是布拉巴宗少校、安德森中尉、德诺曼领事和鲍白，一位龙骑卫士，可能还有十八名骑兵都留在路上等我们，他们也拿着一面免战白旗。”巴夏礼先生与“红顶珠”会面后又去见了僧格林沁，结果他们把巴夏礼领事、罗亨利还有那位骑兵当成战犯押往北京去见怡亲王。

其余的人焦急地等待巴夏礼领事和罗亨利先生回来。“许多中国士兵，”霍普·格兰特将军写道，“团团围住他们，想夺下他们的武器。他们所处的位置排除了所有成功逃脱的机会，为此安德森中尉明智地决定信任免战白旗的保护作用，命令骑兵不要作任何抵抗。因此他们被卸掉武器带到后方，但是清兵允许他们保留各自的马匹。”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人是多么容易在未完全了解事情真相之前就作出判断。后来，巴夏礼先生的一个人人熟知的故事发表在《泰晤士报》上，估计许多人看了之后要改变他们对被俘这件事情的看法，他在完全被敌人控制的局面下对逮捕者所表现出的高尚行为会让人们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

第10章

勇敢的追随者！那边就是荆棘丛，
凭借上天的助佑和你的力量，
定能在夜晚前将它连根拔出。

——莎士比亚

张家湾镇——肆意破坏财产——被抛弃的中国女人——从张家湾挺进——再遇清军——龙骑队的勇猛冲锋——与敌军的多次冲突——运粮漕河——广东苦力的流氓习气——皇族的纪念碑——援军赶到

张家湾是一座古老的小城。高耸的城墙外表已斑驳脱落，长满青苔。城东小河的支流潘家河向北流往通州，连接起了白河和大沼泽（或名 Tunghai）。这些小河曾经可能是重要的水路，为小镇带来商业上的财富，不过如今这些河流已经萎缩成无足轻重的小溪流。我们的马儿经过一整天的长途跋涉，又热又渴，淌过及腹的溪水时，低头汲取凉爽的溪水。小河上架着一座石桥，穿过桥，走过一扇门，就来到了古老的小镇，而且几乎立即就到了小镇的主干道

上，街道两边都是商店。小镇被联军占领后，街道上一片荒凉。联军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对小镇的掠夺，因为小镇是在战争中获取的，所以是一个合法的战利品。掠夺而来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都交给军需处，但是其他抢劫来的东西都归发现者所有。有人在一间仓库里发现大量的砖茶，估计有五十万磅重。一些砖茶被拿来供士兵使用，因为，虽然这些茶很粗糙，但是比居民家里提供的那些东西要好得多；但是，这些砖茶中大部分都原封未动。这真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此事在军营里引起许多怨言；因为，如果日后有足够的运输工具，可以将这些茶运往天津，在那里可以将茶叶处理并为军队牟取利益。事实上，一位精力旺盛的年轻军官以个人名义装了几车茶叶发往天津，但是他的把戏很快就传到了总司令耳朵里，由于之后又宣布和谈，所以将军下令应将茶叶归还给它原本的主人。

像往常一样，广东苦力和一些游手好闲的人对小镇上的典当铺进行大肆劫掠。一家非常富有的典当铺里面陈列的东西各式各样、琳琅满目，包括大量的神像、一堆堆的铜钱串（中国的货币），还有大量捆在一起的旧衣物。这些衣服和其他的东西很快就被扔到街道上，苦力和黑人穿着颜色鲜艳和做工考究的服装互相攀比。几个长着厚厚毛发的老锡克骑兵穿上女人的服装，蹬着长筒靴，摸着胡子，在周围战友惊羡的目光下大摇大摆地走着。我并不介意他们破坏那些脏兮兮，闻起来跟鸡窝一样臭的商店，但是看见一些艺术珍品被人毁掉时，我就情不自禁地恼怒起来。有这么一座古老的房子，里面满是精致的雕刻品和幔帐，房间里的珍稀品太大无法抬走，结果这间房子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洗劫和摧毁，只留下屋顶和四面墙壁。把自己能拿走的东西带走，没有人会说闲话，但为什么要无情地毁掉那些花费主人多年心血和巨额资金收藏的东西？在这种

情况下，我们的人是毁灭者。但是最大的小偷都是来自邻村的人，他们整天往小镇上涌，见什么拿什么。战斗打响的那天，从骑兵那里逃走的几匹马在一间封闭的院子里找到了。而且，奇怪的是，附近一间屋子里躺着沃克上校珍贵的宝剑，前文我已经提过，有人将这把宝剑从那位英勇的军官身上拔走了。

我们部门住的房屋是一个老人的，我们一进屋就见这个老人还在守卫他的财产。起初，他不能理解我们有什么权利侵占他的领地，似乎要做出无礼的举动，我对他好言相劝，告诉他如果不做出任何过激行为，我们可以允许他住在自己房子外屋的房间里。如果他的房子被分给士兵使用，他们那里得不到任何好处，而且他的家具还有可能会被毁掉或是拿走。可是现在，如果他能答应我们的要求，听我们的话，我们不会让他受到太大的痛苦。听了这番话，他立即杀了几只鸡，开始为我们做晚饭，并且一直对我们保持非常友善的态度，直到我们离开的那天。在小镇被占之后，这个老人并不是唯一仍然留在自己家里居住的人。离他家没多远有间大屋子，里面显然有很多值钱的东西，因为许多广东苦力爬到屋顶上去窥探房子的院落。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也爬上围墙走了一趟，结果发现有苦力偷偷溜进这间屋子进行偷窃。我低头往院子里一看，见一个结实的中年男子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手持长矛，准备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他们已经在门口设了障碍物，情绪似乎非常激动。起初，我想到这家的女眷可能会遇到麻烦，于是我感觉自己被某种侠义心驱使，跟他们交谈，问他们害怕什么，为什么要如此武装。对方见我站在围墙上，以为我有什么险恶的企图，便冷冷地回答我说，他们在保护自己家的财产，并且会保卫到底；如果我敢跳进院子，他们就会用长矛刺我。我称赞他们勇气可嘉，告诉他们我主要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来到此地，想看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如果

他们的女眷处在任何被侮辱的危险中我愿意提供帮助。

可怜的人呐！他们的勇气只具有普通中国人的坚固性，尽管他们手执长矛保卫家园，可就在当天晚上，有人从围墙上闯进他们的家，敲碎了他们的盒子，将里面的东西撒满院子，所有的钱和其他珍贵物品都被抢劫一空。第二天早晨，部队的牧师姆吉先生前来寻求我的帮助，他想为小镇上被男性亲人抛弃的女性建立一个收容所。我们先去了隔壁的那家找那几个手持长矛的朋友，告诉他们，我们打算把他家的房子变成一个收容所，收留村里那些不幸的女人，而且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暂时给予她们一些照顾，直到她们的丈夫或是亲戚回来为止。姆吉先生之前已在发现那些被遗弃女子的地方做好标记，于是叫了一辆有篷马车去接她们到收容所。马车到了，他跳上马车坐在一边，邀请我坐在另一边，我们驾着马车离开了小镇。我们进去的第一间房子呈现一副着实令人恶心的景象。一群年龄大小不一的女子——从头发花白的五十岁祖母到口齿不清的两岁幼童——拥挤在一起，身旁放着小锡纸盒子装的水烟。有的女人双臂抱着脑袋，有的则四脚朝天地躺在地板上，样子极不雅观；她们的脸色黄得可怕，眼珠在眼窝里疯狂地打转，手上和嘴上都被鸦片汁弄得肮脏不堪，嘴里讲着令人震惊的寻死故事。意识清醒的几个女人见我们进屋便直勾勾地盯着，一边捶打着胸脯诅咒鸦片的效果太慢，一边哭喊道：“让我们去死，我们不想活了。”她们很快被送到收容所，由部队里主动提供帮助的好心军医们照顾，医生立即采取了救治措施以减轻鸦片的毒效。可怜的病人们脸上被洒上清水，身子不停地扭来扭去，没过多久，大多数人都开始清醒。这座房子的老主人非常卖力地照顾那些试图服毒自尽的女乡民，就连我们认为这个不信上帝的国度缺乏慷慨和仁爱的看法都差点被他改变。他端茶倒水，忙前忙后，而且热情地叫他的两个儿子来帮忙。

我们把这些半死不活的可怜女子留给这个好心的主人照顾，又出去寻找另一批需要帮助的女子。这次找到的女人要鲜活得多，包括三名妇女和八个小女孩，一见我们走进她们的小屋她们就歇斯底里地尖叫。最先恸哭的是一个身体结实的中年妇女，她大声问我们想干什么，而且直白地告诉我们，她们不想要我们中的任何一个。我试图跟她解释，让她们不要害怕，告诉她我们并无恶意，只是来把她们带到一个为她们准备的房子里去，在那里她们会得到自己老乡的照顾。她回答道：“滚开！要我怎么相信你们？你们没安好心，不怀好意。”说完这些话，她开始号啕大哭，其他人也跟着哭起来，大大小小的声音混在一起，俨然成了一首合奏曲。我们一次又一次安慰她们，但毫无用处。于是，我向姆吉先生建议，采取武力手段把这些女人送到收容所，到那里她们看见其他跟她们同样受苦的老乡心情就会平静下来。因此，我们抱起那个带头的女人，把她塞进马车，再把跟着她的两三个小女孩扶上马车，就这样我们装满了马车离开，全然不顾那些受惊吓的女人一路上在马车里叫喊“大人，祖宗！噢！饶了我们吧。我们都是可怜的女人。饶了我们吧，大人！”等等类似的话。

我们快马经过人群，士兵们被女人的喊叫声吸引，驻足观看女性的美貌，最后我们的马车终于在收容所的门口停下来。我想让那些女人在这里下车，于是上前去帮助她们。探头往马车里一看，我见那位年长的妇女用一根绳子勒住一个小女孩的脖子，使命地将绳子往两端拉，显然是想要勒死那个可怜的小家伙。我们立即上前把那个老畜生弄下马车，发现那个小孩——她一直默默地忍受着痛连哭都没哭一声——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我们把她扶下车后，又扶其他孩子下了马车。所有人都下了马车后，我们转身进屋，让我们惊恐的是，那个残忍的母亲又用绳子勒住了她孩子的脖子。我们冲

过去阻止了她，把她们都带进屋，交给房屋的老主人照顾。其余的女子被带到收容所过程中没有经历多少麻烦。很快，我们就收容了许多被遗弃的女子，交由房东和几位医护人员照顾。那些因吞食鸦片而中毒的女人被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得到精心的照料；而其他人则可以在这个大房子的不同房间里随意走动。有人给那些能喝茶的女人倒茶，慷慨的牧师——他真是一位尽职的牧师——为她们提供的丰富食物是痛苦中最大的安慰。事实上，为这些女人所做的一切真的已经仁至义尽了，但是即使这样，仍然无法减轻一些女子的恐惧。有些女人仍然整天以泪洗面，悲叹她们的命运悲惨，她们趁晚上天黑没人看见时逃出去；有几个女人，其中包括那个老祖母和那个孩子，逃走了，有人见她们沿着河岸走远了，但是至于她们是否自寻短见了或是最后命运如何，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多亏了医生高明的医术，那些吞食鸦片的女人只有一人丧命，其余的都痊愈了。

21日被定为我们下一次行动的日子，所以20日那天我们都骑马回到马头，完成道路和马头至张家湾这一河段的勘察，沿道路的总距离是9.5英里。我们用一根矮柱子在巴夏礼先生及其随行人马被抓的地点附近的村庄做了标记，那个村庄叫高坡庄，离僧格林沁防御工事的后方非常近，离张家湾约两英里。

两天的停留让法军有机会从河西务抽调一千名士兵和一个野战炮兵团到前线增援，因此将军下令21日拆除营地。黎明时分所有人都在镇上走动，很快一股不间断的人流向西北方向走去。普罗宾少校在两天前被派去进行火力侦察，在军需处翻译官迪克先生的协助下，成功俘获三个一直在僧格林沁军营附近流浪的当地人，这三个人被扣下来给我们带路。

在离张家湾约两英里的高乐村，部队暂停休息以等待法军赶上

来。我接到命令，部队出发之前去向霍普·格兰特将军报到，取代巴夏礼先生做他的陪同翻译，之前巴夏礼先生一直担任那个重要的职务。我去时，将军已经下马，正在树林里和他参谋部的几位军官说话，普罗宾的锡克骑兵也在那片树阴下乘凉。不久，额尔金勋爵和他的参谋在龙骑兵的护卫下抵达，和他一同来的还有许多不同的业余人士，其中包括罗伯特·格罗斯维诺勋爵。最后，法军终于赶到前线。由于他们在张家湾后面扎营，所以前进时被我们的行李车队阻挡，只得从右路通过。米切尔将军率领第1师向左路前进，骑兵旅和海军陆战队及女王第2护卫队从最左边前进。一切就绪，准备出发，还没等霍普·格兰特将军和参谋到法军阵营找蒙托邦将军协商有关进攻命令的事宜，法军的先行大炮就已经开火了。交谈几句之后，英国将军骑马在大部队前面缓缓地前行，显然是心有所思，甚至没有留意到一支清军骑兵在一座长形护堤的掩护下正向我军逼近。有人看见指挥官员骑着马在他的士兵前面跑上跑下，鼓励他们向前冲；当我们走到距他们只有两百码的地方，清兵一阵大叫，跳上河岸，愤怒地朝我们开枪，向我们冲来。将军和参谋立即一左一右分开，给阿姆斯特朗大炮让路。大炮正在炮车上飞速赶来准备行动，这给清兵留下一个印象，以为我军所有人都乱了方寸，准备逃跑。因此，他们更加勇猛地策马冲上来，欢呼叫喊，但是没走多远，弹片便落在他们中间，女王第2护卫队的来复枪又给了他们一阵连击。他们的欢呼顿时变成绝望的悲号，他们很快退到远处。霍普·格兰特爵士领着骑兵走左路边侧，给第1师腾出前进的空间。国王龙骑卫队立即抓住机会，跑去迎战一大队突然冲上前来的清军骑兵。两队人马都被卷起来的尘埃掩盖，从视野中隐退，除了偶尔能看见高举的剑的反光和卡宾枪或左轮手枪射击时放出来的灰色烟雾外，一个人也看不清。当时卷起的尘云很快就消失了，英

勇的龙骑卫兵也排成一队走过来了，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我们很快清理现场，发现一个老兵的心脏被火枪球击中而牺牲，龙骑卫队的一位上尉胳膊被严重砍伤而落在队伍后面，不过地上躺着的都是已死或是垂死的清兵。我和总司令的医生停下来看看那个牺牲的老兵。由于他仰面朝天地躺着，站在附近的一个龙骑卫士对另一个人说：“喂，比尔，那不是老查理吗？可怜的家伙！他已经回老家去啦！”几匹无人骑的小马在战场上乱跑，这些畜生被抓去当战利品。我们中有些人非常喜欢去检查敌人的死伤者，目的是从他们身上搜寻珍稀品。恰巧有这么一次，一个非常结实的人带着这样的目的下马，走近一个他以为死了的清兵旁边。他蹲下把尸体翻过来，这时那个所谓的尸体转过头，从一只眼角里窥视他，吓得这个人魂飞魄散，仿佛有人在后面朝他开枪似的跃上马，没命地策马飞奔而逃。这次小惊险之后，那个人后来再也不想去检查敌人的伤亡者了。实际上，许多从马上摔下来的清兵发现敌人在追捕他们，无法逃脱时，就装死以免被俘虏。这时，骑兵旅已经朝右边前进了一些，而且看不见第1师了。不过，我们还能不时地听见从他们那个方向传来炮轰的声音，而且可以看见骑着马的清兵在他们面前朝我们这个方向逃窜。敌人似乎不计其数，虽然他们犹豫不决，但也不让我们的部队前进到一千码以内的地方。在这个距离内，阿姆斯特朗大炮偶尔能够击中敌人，把他们打得人仰马翻。我们清楚地看见一块弹片在敌人的一群马中爆炸，将三人打落马背，另有两匹马被炸得粉碎。之后，普罗宾的骑兵队绕了一个大弯子来到左路，试图包围敌人。起初，我们看不见他们。不久，远处出现了一系列密集的悬垂物，以一种奇怪的动作在颤抖。他们越来越近，很快，我们看清楚了那是英勇的少校和他可信赖的骑兵，总共七百人。他们朝一大群在树下奋战的清兵前进，并朝他们冲锋。当锡克

骑兵再次出现并大范围地朝敌人开枪时，敌人在一片混乱中仓皇而逃，直到锡克骑兵停止追击为止。帕特尔旅长送来消息说，他已经朝龙骑卫队方向走近了，但是我们的左前方有一个战壕护守的敌营，没有步兵的协助他无法攻克。我们很快来到这个营地，第2女王卫队受命前去驱逐营地里的敌人。有几个敌兵还逗留在营帐附近，但是其他人都逃到邻村躲起来了。原来那个营地是清军骑兵将军胜保的总部。营帐扎在一个漂亮的雪松林中，里面收拾得整洁有序。帐篷都是上等的美国斜纹布做成的，用钉子牢牢地钉在地上，每个帐篷之间的间隔相同，指挥官的营帐搭在中央。从各方面都可以看出，这个军营是在仓皇中被丢弃的：帐篷里的衣物和被褥都没有叠好，将军帐篷里的一张桌子上还放着一盏油灯和他的碗筷，这些都表明他是情急之中赶往战场的。在这个漂亮的小军营后面，有几只膘肥体壮的骡子正在吃草，这些骡子连同几辆马车成了我们的战利品。

随后，我们骑马到了隔壁的小村庄，一些清兵躲在村中的房子里，不停从门缝里朝我们的士兵开枪。将军立即下令烧毁房屋，由于敌人试图跳过着火房子的围墙逃跑，我们的士兵便以放散枪的形式进行反击。寺庙和大门关闭的房子不在烧毁之列，但是必须进入这些地方的房间里搜寻可能逗留的敌兵。两个“剃着光头”的和尚被俘虏，他们也可能是士兵，因为中国士兵最便利的方法就是脱掉身上标有数字的上衣和解掉火药带，假装成一个普通老百姓温顺的样子，因为除了服装之外，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一些锡克骑兵受命去烧毁军营。我们所在的村庄名叫于家圩，在北京东南面约八英里处，在那遥远的地方，我只能隐约看见帝王之城其中的一个城门。这个村庄以胜保将军的名义贴了通告，告示村民对他在此地扎营不要恐慌，因为他的士兵已被严厉警告不得做出任何不公正行为

危害当地百姓，同时让村民知道他们提供的一切物品都会被照价付款。米切尔将军和萨顿旅长在这里赶上了霍普·格兰特爵士，带来消息说第1师已经占领了浮桥、收费桥以及运粮漕河这边一带的整个地区。因此，总司令决定撤离于家圩，在运粮漕河两岸扎营。于是，将军派我与一位军官在锡克骑兵的护卫下前去取军队的行李，行李车停在营地后面的一个村庄里。我们发现运输行李的人都非常害怕，因为他们在远处看见我们，以为我们是敌人的骑兵。不过，他们很快就打消了疑虑，最后我们安全抵达运河岸边的一个风景优美的小树林，我们的大部队将在那里扎营。

我们刚到驻营地，敌人就利用小树林作掩护在对岸用重型大炮朝我们开火。第15旁遮普团和两门榴弹炮受命过河歼灭敌军。他们遇到的对手是一个营的兵力，士兵都穿着御黄色的长袍，打着同一颜色的丝绸横幅。这些人很快被赶出营地，他们的营地也被摧毁。但是，我们的士兵在这之后又在一个村庄里与一群清兵短兵相接，给他们沉重的打击。一位英勇的旁遮普军官忘记使用带在身上的宝剑，赤手空拳把一个清兵打翻在地，这时一个旁遮普士兵用刺刀给那个清兵补了一刀。与此同时，法军在石桥——通过这座石桥有一条铺砌的道路连接通州和北京——正与敌人浴血奋战。这座桥就是著名的八里桥，此桥沿着那条石铺路从通州到北京全长为八里，相当于2.75英里，因此得名为“八里桥”。在桥的对面，敌人架设了重型大炮。法军英勇地用刺刀破坏了这些大炮，并且在随后的肉搏战中重创清军将领胜保将军，他被手下的士兵抬下战场。后来听说，在负伤期间，他下令将布拉巴宗上尉和阿拜·德·鲁克斩首，两位不幸的先生在免战白旗的保护下返回联军阵营时被中国人使诈抓捕。八里桥之战中国士兵损失不下三百，我们估计其全部伤亡人数为五百，不过实际人数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的估算。从整体上

看来，清兵在与法国人交战时似乎不如与我军交战时显得那么害怕，但这或许是因为法军几乎没有骑兵作战的缘故。

我听说，在一次锡克骑兵冲锋过程中，有个士兵的马失去了控制，冲到敌人中间，结果敌人先是用最残忍的方式把他的眼珠子挖了出来，后来把他的身体肢解成一块一块。但是，锡克骑兵对敌人也不手软。对于这些人而言，战斗结束后骑马到战场杀死那些负伤的敌人是很常见的事儿。他们骑马路过看见一个伤兵，先是用刺刀尖戳他一下，如果这个不幸的伤兵叫喊或是痛得打滚，就会有人下马故意把这个伤兵的脑袋锯下来。法军扎营在石桥两边，而英军扎营在他们的左边，运河的东岸，在他们占领的两座桥之间。搭起帐篷后不久，我看见一个穿着朴素的年轻小伙儿骑着一匹小马，后面拖着一个戴蓝色顶珠的官员。我上前询问小伙子的身份，得知他是一位海军将领的跟班，在战斗中和他的主人走散了，因此他骑着马试图悄悄地从一片玉米地逃走。玉米地里都是一个个独立的玉米秆垛。突然，那个俘虏从一个玉米垛后面跑出来朝小伙儿开枪，不过还好没有打中。随后那位官员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匕首准备自杀，但是匕首太钝，官员自杀未遂。这个小伙子立即跑过去抓住他的辫子，把他当俘虏拖回军营来了。官员称自己是胜保将军手下的一名副将，在战斗中失去了马，但是他坚决否认朝小伙儿开过枪。这个官员很快被释放，并被告知可以去做他自己的事。

这一带风景优美，经常可见高似圆顶塔一般的大树，附近还有几间大寺庙，不过都被废弃了。额尔金勋爵和总司令在离我们军营附近的一间破庙里扎营，而他们的参谋部则在附近树阴下扎营。蒙托邦将军占用了他们军营附近的另一间破庙。这一带的村民大部分都非常可怜，没有丝毫富裕的迹象。我们部门的帐篷搭建在普罗宾骑兵队附近的一片田野中，炎热而干燥，马儿飞奔扬起的尘土整天

笼罩在帐篷的前后，令人极不舒服。

22日，军营里因一阵枪声而引起骚乱，原来一个岗哨朝一队前来我营的清兵开枪，那些清兵听见枪声便停在远处，一位官员拿着一面免战白旗走上前来，送来一封写给额尔金的信。信是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写来的，他告诉勋爵，由于载亲王和穆（荫）对事情处理不当，所以他被指定为钦差大臣与“两位特使和谈，此外他建议停战，重建和平”。额尔金勋爵在复函中让恭亲王去看以联军司令的名义发给通州知县的通牒，除非释放被扣押在北京的英国人质，否则不可能采取军事行动以外的任何措施。

运粮漕河——我军在其两岸扎营——连接通州和北京。运河里的水是常年不流动的死水，水呈深黄色；毫无疑问，漂在水面上的众多清兵尸体的污染导致河水颜色更黄。沿岸的水里都长着芦苇和灯芯草，河面的平均宽度为二十五码，水深从一英尺到二十英尺不等，河道总长度可能有十三英里，流经不同的小镇。白河在通州支流的正下方，主干河道往北流经一段路程，其中一个支流环绕小镇一圈最后朝东北方向流去。但是，在离小镇北面约两英里处，这两条支流由一条弯弯曲曲的狭窄的运河连接起来。运粮漕河延伸到离通州支流的几码处，但是没有汇入这条支流。因此，从全国各地由水路运往北京的物资通常是在通州运河转运到大型平底驳船上。这些船通常停泊在石桥，即八里桥下，停泊的船只绵延几英里，一直到一座石头桥墩，这座桥墩横跨运河之上，成为一座桥。桥墩北面的运河水位要比南面的水位高出十英尺，因此货物需要在此处利用架在桥上的滚轴和滑轮再次转运到水位更高的驳船上。桥墩附近设了一个收费亭，征收在此处转运货物的税费。只要通过了这道关卡，货物就可以一路畅通无阻地运到运河的尽头——北京城下。

显然，在我们到这里之前，这条运河上的交通就已经停止了，

驳船并排地停在北河段水面，形成一座浮桥，这座浮桥和那座坝桥都落入第1师之手，对此前文已有提及。在接下来养精蓄锐的那段日子里，这条水路交通为我们的军营获取物资供应和其他必需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重型攻城炮都是由这条水路从天津运来的。主管水路运输的皇家海军陆战队上尉迪武轻而易举地把军需处和其他船只从河西务移到通州，因此河面上许多驳船都直接被用来为军运输物资。通州知县已经接到我们的警告，如果他不对我们表露任何敌意，他所在的城市将幸免于难，城中百姓也会受到保护，因此他命令市民在八里桥开设市集以示好意。

通州北门外的小郊区立即被四百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和同样数量的法国士兵占领，不过老百姓将朝我们开放的那扇城门把得严严实实的，其他入口也有城里的勇士把守。不过，这纯粹是一个预防措施，旨在防止军营里掉队的士兵或跟班进城抢劫，像任何时候一样，只要将军下令允许进城，城门就会立即向他们敞开。然而，有那么一班抢劫者很难阻止，那就是广东苦力。有些人投诉这些流氓无耻的暴行，以致最后镇上的居民决定报复他们。有一次，六个苦力一同进城，准备抢劫一家商铺，人们起来反抗杀掉了其中两个，并将另外四个交给英军当局处理，为了表示对这些行为的抵制，军方下令当众鞭打这几个苦力。

但是，另一方面老百姓滥用法律缺乏公正，将另外两个苦力杀害有些残忍，因此将军认为占领其中一个城门对我们有利，便命令海军陆战队占据北门。那几位守护城门的勇士在未受任何打击的情况下很快被驱逐，城门由海军陆战队士兵把守。苦力们已经养成习惯经常溜出营地，手持长棍，在附近的村庄四处巡游，物色可以抢劫的目标。看着强壮的当地人被这些来自南方——无论是在身高还是体力上都逊色于他们——的中国人欺负，真是觉得可笑。不过，

这一带的老百姓几乎被剥夺了所有防御工具，一直处在父权式的官府铁棒统治下，与中国南方半独立的种族相比——他们经常拉帮结派挑衅官府——这一带的人更为顺从、卑贱。

提到广东苦力的散漫行为，我要记录下其中几个苦力在军营附近所做的残暴行为以及他们受到的惩罚。一天，几位军官出去散步，听见附近田野里传来大声的尖叫，他们赶忙跑过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结果看见三个苦力正在强奸一位不幸的妇女。军官们抓住这几个罪人，把他们拖到将军面前。最后证明其中一个比另外两个罪行更为深重，所以那个人被判绞刑，而那两个教唆犯每人被罚一百鞭子。处决罪犯的当天，军营里所有苦力都被集中到一起观看。前两个人当着另外一个人的面在宪兵司令的九尾鞭下受到了他们应有的惩罚，之后便轮到那个人接受极刑。即将被处死的那个人在临刑前异常平静，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恐惧或是战栗，甚至当绳子套在他的脖子上时，他也丝毫不恐惧。

在这个营地逗留期间，我们部门有足够的时间对张家湾一带进行勘察，我也有更多空闲时间对这一带的自然现象进行观察和记录。我拜访了法军营地的地形勘察部，认识了杜宾上校，此人喜欢打猎，而且是个神枪手。我与这位军官还有法国的业余自然学家齐尔先生一起，进行过几次愉快的短途旅行。

离军营大概四英里往张家湾方向的地方，立了一块非常壮观的大理石墓碑，纪念保定府的一位总督将军。一座大理石桥的两边分别竖立着一根大理石柱子，这座桥把我们带到一片四面环墙的草坪，草坪中央立着一座大理石拱门，拱门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刻着汉字。穿过这座拱门，我们来到一片小树林，周围环绕着枝叶繁茂的小柏树。小树林的另外一头并排竖立着三座长满了草的土墩，分别是一位绅士及其妻儿的坟墓。小树林旁边有一幢像寺庙一样的

房子，里面住着受命看守这些坟墓的人。我正好和一位军医朋友来到这个地方，我到小树林里去记录此地特征时，这位朋友待在外面。突然，他惊恐地冲我喊道：“快出来，伙计！快点，拿出你的枪。我们得赶紧逃命。有个清兵正骑马飞快地冲到我们这里来。”我立刻跑出来，并且很快就弄明白了那个可怕的目标。医生是个近视眼，把一个包着头巾、骑在马上、旁遮普军官错当成我们“英勇”的敌人了。

战斗那天，清兵在这个地方停靠了一会儿，有八九匹小马的尸体和几具已腐烂的骑兵尸体躺在左边——

狂躁的战马，带着刺穿的伤口，
与它的主人一同漂浮在血海中。

我惊讶地发现，一个憔悴的当地人正坐在这些正腐烂的尸体旁，拔草充饥，仿佛死人中的幽灵。这个不幸的人已经基本上丧失了知觉，毫无疑问是因为身负重伤加上饥饿造成的。我上前跟他搭话，试图劝他离开那里，但他只是回敬我以空洞的目光和可怕的尖叫。这一带方圆几英里以内仍然保留着清兵营地旧址，似乎都是军队的营地，但是根据我们从帐篷里搜到的东西来看，他们的人数似乎已经达到了八万人，而且主要是骑兵。

9月24日，拿皮尔将军和他的参谋到达营地，经过霍普·格兰特爵士明智的决策，我们的部队新增了以下力量：第60来复枪团的一个营、第67团、两个皇家团、第99女王卫队的侧翼部队和第8旁遮普团；此外，还有攻城炮和几门八英寸口径的迫击炮已由水路到达河西务，很快就会到通州，因此，各种迹象表明我们很快会继续前进了，每个人对此都很满意。因为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营

地生活被可怕的西北风弄得苦不堪言；有时候，一连几小时呼啸的西北风吹翻我们的帐篷，卷起来的尘土几乎能覆盖帐篷内外的一切东西。北风过后，接着就是一两天的大雨，紧随其后的便是 10 月 1 日阳光灿烂的天气。因此，前几天在中午时分显示为九十、一百华氏度的温度刻度，如今突然降到四五十华氏度。军需处在这段时间的安排非常成功，所以士兵们个个身体健康，精神饱满。

第 11 章

太阳投下炽热的光线，倘若我们继续拖延
寒冷的冬天必泯灭我们的希望。

——莎士比亚

执拗的清官——旁遮普的信使——恭亲王的照会——联军挺进——巴夏礼先生的来信——中国的伊斯兰教徒——露营——清兵逃跑——中国人的谎言——法军向圆明园挺进——神圣的葬礼——当地人的友好——圆明园外景——皇宫太监——圆明园之描述——罕见的掠夺——圆明园

我们的摩根先生留在天津，为驻扎在那里的部队做翻译，他发现与当地的知县或治安官打交道非常困难。这位官员曾多次被邀请在不同方面履行他的权力，但是他总是推托，最后甚至变得傲慢无礼。因此，拿皮尔将军突然想到一个主意，把这位官员控制起来，把他当做俘虏关押在天津城外的军营里。翻译官带着一个强壮的卫兵前去看望他，要求他去军营一趟，但是他拒不听从。他立即被抓起来塞进轿子里，士兵不顾他的不断挣扎，把他抬回军营，给他在

将军附近的营帐旁边搭了一个帐篷，并且派了一个卫兵站在门口守住他。头几天他非常愤怒，不吃不喝，但是他发觉自己采用这种方式毫无益处，之后便变得更为乐观，无论什么命令他都依从。他告诉翻译官，他以前认为外国人都是一些未开化的蛮夷，而且先前也不知道还存在像法国和英国这些国家。他对英国部队先进的装备感到惊讶，而且非常羡慕他们的战马；但是，尤其让他感到惊讶的就是岗哨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他说：“那些人都非常守纪律。一个人守住我营帐门口，他就一直守在那里，直到换班。他更不会想跑开，除非是在我走出营帐时他才会走开来照顾我。唉，要是我们的士兵啊，长官前脚一走，他后脚就溜开去抽大烟或是跟同伴赌博去了。我弄不明白，你们怎么能把士兵调教得这么规矩？”

逮捕并扣押这个官员的消息传到京城当局耳朵里，后来恒祺向被关在监狱里的巴夏礼先生求证这件事，因此怡亲王认为我们对通州和谈没有诚意。最关键的是要为与天津方面的沟通开放一条道路，为了这个目标，第31团的先遣部队驻扎在河西务和杨村，这样往返军营与天津城的游客便能在这条路上找到一个安全的停靠点。通常，来往的信件传送都是由锡克骑兵负责，他们胆子大，而且不怕日晒，所以是最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选。有几个被派去做这些差事的骑兵，能在两天内轻松往返。有一次，驻扎在运河附近的营地被拆除之前，两名忠实的骑兵经过张家湾后面几英里的一个村庄时，受到一些村民的攻击。他们一到军营就将此事报告给将军，此事很快得到处理，第8旁遮普团受命去烧毁那个村庄。这件事给道路两旁其他村庄一个深刻的教训，从此以后再没有发生类似的愚蠢举动。

骑兵被多次派往京城城墙下去进行武力侦察，并带回来消息说敌人在北京东北角的筑堤内部占据着一个很有利的位置。

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从恭亲王处收到一封信函，宣布他被指定为钦差大臣，而额尔金勋爵的回复说除非释放人质，否则不考虑武力以外的任何处理方式。现在，我们在下文对这封信作个简要的概述。恭亲王在他的第二封信中承认，中国政府确实扣押了几个英国人质，但因其战争开始之后被捕，所以只有等签订条约及联军撤出中国之后，方可释放这些人质。对此信的回复是必须释放人质，否则联军将开进北京，其后果可能非常严重，有可能导致京城的毁灭甚至朝廷被推翻，但是勋爵对这一切后果概不负责；倘若中国政府愿意，释放人质和签订条约可以同时进行。勋爵给恭亲王三天时间考虑，三天后将明确联军的方向。这封信是25日写的，因此复函必须在29日送到，否则30日双方将重新开战。如果联军准备好，可以立即前进的话，期限还可以更短。但是，法军步兵的增援部队尚未抵达，而且我们的攻城炮还在从通州运来的路上。最后期限到达之前，恭亲王一次又一次地写信过来，用尽一切可能的理由来拖延联军的前进，但是他总是回避有关释放人质的问题。29日，我们收到巴夏礼先生亲手用中英文两种语言写的卡片，上面标的日期是最近的日期，随卡片附着恭亲王的信，这个证据告诉我们至少还有一个人质活着，为此我们都非常高兴。因为，在此之前，自从我们的人被捕之后，没有听到任何有关人质可靠的消息，我们一直都担心和怀疑他们被残暴地杀害了，因为中国人对待战俘一贯都采用这种方式。

如果三天期限已满，中国政府仍未给出任何令人满意的答复，联军就会立即开进北京，当然还要等法国步兵到达。但是，由于法国步兵一直没有出现，只得推迟联军的前进日期。然而，将军说话算话，他派了来复枪团的一队人马占领了运河对面河岸上靠近石铺路的一个村庄，大家建议在这个村庄里建一个军需补给站。

10月2日，威妥玛先生收到巴夏礼先生写的一张中文字条，字条上说他和罗亨利先生都很好，两个人关在一起。他们得到许可，让人给他们送几件干净的换洗衣服，他们急需这些衣物，但是对其他入质只字未提。中国人自己也从未提及过其他战俘，这方面的沉默自然让我们非常担心他们的安全。巴夏礼先生在信中高度称赞了恭亲王的善意和能力，但是语气勉强且缺乏诚意；而罗亨利先生在他的签名旁边用印度斯坦语写的几行字证实了这点。原来，这封信是中国政府命令巴夏礼先生写的。威妥玛先生当天用中英文回复了这张便条，并且给他们寄了一捆干净的衣物，在衣物中夹了一块手帕，手帕上写着印度斯坦语，每个首字母周围都印着罗马字，手帕上的内容大意是，三天后联军将使用重型大炮开火，打开城墙冲进京城；同时，他们还在一件衬衣的显眼处做了类似的标记。

10月3日中午，我们拆除了帐篷，渡过运河，开进长缨的一个回民村，这个村在来复枪团哨卡附近。额尔金勋爵和霍普·格兰特爵士以及他们的参谋部下榻在一个漂亮的清真寺里，而约六千名强壮的士兵则扎营在附近的田野周围。这个村庄很小，村里的房子都是泥巴小屋，但是这次并不是所有屋子里都无人居住。村民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从他们头上戴的奇怪的尖帽子——他们的辫子都塞在帽子里——就能把他们与当地的其他人区分出来。清真寺里面有许多阿拉伯字母和汉字的碑铭，几本印有阿拉伯文字的书籍和经本散落在四周。这位先知（穆罕默德）的许多中国信徒能背出这些书上的几句话，但是很少有人能解释其中的意义。然而，他们非常熟悉《可兰经》里的祷文和章节，经常复述给锡克骑兵听。村民反复诵念这些祷文，总能让那些疲惫的印度勇士感动得泪流满面，而且也经常能让他们从口袋里掏出银子，天朝的穆罕默德教徒更清楚他们最好是接受这种同情心。下午收到巴夏礼领事和罗亨利先生用英

文写的信，说他们很好，但是仍然未提及其他人质的情况。

法军的增援部队此时已赶到八里桥，因此定于5日出发，对北京城墙东北角附近的大筑堤内的清兵营地进行轰炸。所有的行李都收集在一起，放在那个贵族坟墓的大理石墓碑旁，士兵们轻装出发，每人只在干粮袋里带三天的口粮。

5日，法军很早便从他们的营地出发，联军总共一万多人的兵力踏上了追捕清兵的旅途；法军取左路，英军走右路。这支紧凑的小部队浩浩荡荡地从此地前进，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时而可见整个部队穿着统一的制服沿着种满作物的田野往前进；时而会发现一些部队从视野中消失，因为他们可能走进了某个村庄或是为躲避某个四面围墙的小树林而分岔到另一边。

看呐，可怕的行军和恐怖的军队
漫长的队列形成了他们的道路。

我们走了大约四英里的路，来到一些杂草丛生的砖窑附近，这时才听见休息的号角吹响。站在砖窑顶上，我们第一次得见天朝帝国那遥远的京城。那座城坐落在一块平原上，方圆六英里左右，几乎完全隐蔽在长长的城墙内，但是在晴朗的天气里可以清楚地看见城门口的塔楼和更大的城角塔楼。将军和几位参谋聚在土墩上商量详细的进攻计划。对战斗的渴望，加之潮湿阴冷的早晨之后出现的明媚阳光，鼓舞所有人加快了前进的脚步。就在这时，法军总司令派人送来消息说希望推迟到明天再前进，因为他们的士兵已经比我们多走了四英里，很疲劳，需要休息。因此，将军下令英军立即就地露营。这个地方只有几间破烂不堪的泥巴小屋，几位享受更大特权的军官在屋里扎营，其余的与士兵一起用他们能找到的稻草和高

梁秆尽量做一个舒服的露营窝。不过，法军要比我们幸运得多。他们行军时带上了大部分重装行李，所以很快就可以支起帐篷，享受营地生活中一切能够享受得到的舒服。与所有地方的情况一样，这些稻草和泥巴屋的主人早就丢下几只鸡和其他家禽跑了。有人可能会想，在所有不舒适之中，至少有资格借用这些家禽来做一顿美食，安慰一下心情沮丧的大伙儿。可是，绝非如此！宪兵司令已经开始工作了，许多不幸的“黑仆”在寻找他们主人餐桌上的伙食时被当场严惩。这里草料非常充足，马儿可以放心地食用，不用担心会落入粗鲁的宪兵之手。沃尔斯利上校选了一间破旧的小屋安顿自己和他的部门。小屋唯一的主人是一位年龄很大、双耳失聪的老太太。她似乎太愚钝，完全没有留意到我们。那天下午，几个误入军营的中国人说城墙东北角的清兵正在撤营，准备迅速逃离，但是他们不愿意告知我们或者根本就不知道清兵要逃往何处。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来到田野。田野里又湿又冷，将军正在下令部署部队前进，我们骑马走在他后面。霍普·格兰特爵士召见我，命我跟随已经走在右前方的骑兵旅。因此，我策马朝那个方向奔去，在一片开阔的树阴下找到了正停下来等候将军发令前进的骑兵旅。我向帕特尔旅长报到，骑兵旅随后在树木林立、风景优美的地区前进，而我则一直骑马走在旅长身旁。步兵团在我们左面的不远处，我们经常能看见他们，除非小树林或是小村庄挡住我们的视线。上午 11 点，旅长让大家停下来休息，一位参谋骑马前来通知帕特尔旅长说将军召见他。暂停休息的地方靠近一面颜色鲜艳的红墙，墙里面是皇帝的一位姐妹的陵墓。这个建筑还未完成，而且看不出此建筑有多少品位。几口肮脏的池塘让我们的马儿饮足了水，士兵们也从干粮袋里拿出点心来充饥，还有几个人在优哉游哉地抽烟斗。

旅长很快回到队伍，传达将军的命令，队伍休息半小时后往北方前进几英里，再往正西方向前进，然后在通往德胜门（即京城北面的第二道门）那条宽敞的往北的马路上找一个方便的地方停靠，因为一旦英法步兵从东门进攻时，清兵很有可能沿着北门这条路撤退，因此将军给骑兵旅一个机会中途阻止清兵，切断他们的后路。骑兵旅正往西北方向前进时，哨兵报告说有大队清兵朝北而去。骑兵旅暂停休息，普罗宾骑兵团的一个中队被派去监视逃兵，但是清兵一见他们过去便逃走了。

我们终于走上了将军指定的那条宽敞的马路，在路对面一块高地上的一片树林里停下来，这个位置可以控制这一带左右两边的空地，非常适合藏身，因为茂密的树林可以掩护我们，不让任何路过的敌人发现。我们看见远处几棵杉树中有几个骑着骡子的人，正往四周急速逃散，但是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怀里都抱着包裹，看上去像是带着金银财宝逃跑的村民。我们发现一辆马车经过，里面好像装着一门大炮，于是旅长立即派了几个锡克骑兵前去拦截他们。结果，那个看起来可怕的东西原来只是一些私人的动产——是一个老百姓从附近一间屋子里运出来的。此后，旅长打发我陪费恩上尉和一个卫兵沿途询问京城所在的方向，从而判断清兵营地的大致方位。我们走了大约两英里的路程，听到枪声，后来我们从一个路过的老百姓那里获悉，联军已经进入了敌人军营。

我们带着这个消息回去见旅长，他决定朝联军所在方向前进。在路上，我们遇见一个相貌羞怯、赤膊的中国男人，他试图躲避我们。我受命前去向他打探情况，这人一听我的声音就停下脚步，当我问他是否看见或听见联军的消息，他坚决否认。但是，他不是静静地站在原地不动，也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相反，我朝他走近一点儿，他就一直往旁边躲闪，最后索性拔腿而逃。一名军官立即前

去追赶他，抓住他的发辫在空中摇晃，最后把他四脚朝天地扔在地上。这个可怜的家伙立即爬起来，拔腿就跑，但是他两脚最终敌不过那位军官的马。军官第二次抓住他的辫子时用的力气更大，最后他被带回来时比之前老实得多。他强烈抗议自己受到的粗暴待遇，发誓说他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而不是清兵。可是，卷在他胳膊下面的衣服上面印的士兵徽章和挂在腰带上的团牌说明他在撒谎。他坚持说，这些东西和他手上拿着的一卷细火药管子——中国士兵穿着中的另一样常见配饰——是自己在路上捡来的，这更加证实了此人厚颜无耻的大谎言。我们把这个家伙交给后方一个卫兵看管，便继续前进。我们来到北亭大寺，离德胜门约三英里。我们发现法军就在那里不远处停歇，就焦急地询问英国轻步兵的情况。旅长与蒙托邦将军交谈时，蒙托邦将军说他怀疑霍普·格兰特爵士已经进军圆明园了，他们约定落日前两军在圆明园集合。之后，他向旅长坦白，表示自己希望立即朝圆明园进军，并且请求我们旅不要挡住他们前进的道路。旅长觉得很奇怪，法军只是在左路的一点儿，怎么会看不见英国部队，即便如此，他怎么会认为英军已经开进圆明园呢，于是他立即下令让他的旅也往圆明园方向前进；但是为了避免阻碍法军前进的道路，我们沿着北面那条路走，此后再穿过田野往西北方向的圆明园走去。

我们突然遇到一群赶路的中国人。中间的主要人物是一位脸色苍白的年轻人，他跷着二郎腿坐在一台由两头骡子拉的大轿子里，一前一后两根横杆分别架在这两只牲口肩部上。一口用蓝布盖着的大棺材被另外两头骡子用相似的方式拉着。如果这两只牲口要惹麻烦的话，这种交通工具就会很不舒服，但是每头牲口都有一个马夫照料，只要它们稍微不老实，马夫就会立即纠正。那个年轻人看见我们非常害怕，不停地对着椅子底部冲我们磕头。他求我们让他过

去，因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百姓，正护送他父亲的灵柩到自己的家乡去。旅长让我告诉他不要害怕，因为他不会让手下伤害他。这位英勇的军官相信没有哪位军官会趁火打劫，抢劫这么一个手无寸铁、毫无害处的人。然而，让我惊讶的是，我后来听说，有人为了抢拉棺材的骡子，把棺材扔到水沟里，牵走了骡子。

这一带树木繁多，风景变化多端，以致我们迷失了方向。就在这时，恰好有个中国人非常激动地跑上前来，说刚不久有几队流氓清兵在撤退时抢劫了他家，朝圆明园方向跑了，他求我们替他报复那些抢劫他家的清兵。他继续说，如果我们能把他们痛打一顿，他会非常高兴地为我们带路。可以利用他做向导，我们再高兴不过了。我们跟着此人走了几英里的路程，看见一些打着蓝色横幅的军营。向导带我们到这些军营前，说：“那些士兵都在里面，你们去把他们都杀了。”之后，他就跑了。这些军营是由一大片矮房子组成的，被一堵八英尺高的墙围着，要经过一扇大木门才能进入，我们从门缝里看见有人正盯着我们。在大门右边，围墙外面有几间屋子，几个穿着体面的村民集聚在屋子四周饮茶、吃点心。我和骑兵旅的总军需官沃克上校走上前去，问这些村民什么人住在这些军营里。他们说，里面只住着一些士兵的妻儿老小，壮丁都被僧格林沁征用到战场去了。我们把情况报告给旅长，他要求那些人打开军营的大门好让我们进去查看这个地方，但是遭到他们的反对，理由是我们的长相可能会吓到里面的女人和孩子。因此，为了让他们顺从我们的意思，旅长命令悄悄地从马车上拉下一门大炮，对准军营的入口处，然后让人给军营里面的人送去消息说，如果里面的士兵不立即出来与我们商谈的话，军营的大门将被轰开，我们会强行冲进去。这一威胁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很快，由一群老人组成的代表团前来拜见旅长，这些人都穿着白色的长袍以示敬意。他们主张

与我们建立深厚的友谊，祈求我们不要伤害他们。于是，我们问他们是否见过一群英国步兵经过这边。他们说，当天只见过许多清兵经过，但我们才是他们遇见的第一批联军。由于我们需要继续赶路，所以根本没有打听到有关英国步兵团所在地的消息。

因此，旅长决定向法军所在位置前进，他们正在朝圆明园开进。不出所料，我们在路上遇见他们，因此旅长提出与他们合作占领圆明园。法国将军同意了，而且恳求旅长，在法军攻打中门时，我们旅要等在圆明园围墙外面的右边截断清兵的退路。于是，法军从圆明园前面的一个大村庄海淀村的中央大道上前进，而我们则从右路向四周移动。我们路过最外面几座破败的房子时，看见前面有几个散兵。

夕阳西下，黄昏将近，
暮靄沉沉，笼罩万物；
万籁俱寂，
天地静息，
道路旁，
堂皇宫殿，赫然显现。

我们到了圆明园的围墙下，但是我们的后面被一个人口稠密的大村庄完全包围着，而且根据消息来判断，这座皇家花园一定有众多清兵把守。况且，天快黑了，骑兵在此找不到安身之处，因此，旅长决定明天再进入这座花园。暂时只能让当地百姓带我们到一个有水的地方过夜。有人把我们领到一块干净的大草坪上，草坪呈长方形，由圆明园围墙向后倾斜的边线围起来。但是这个地方不适合军人的口味，因为整个地方只有一处是开放的，倘若清兵趁夜偷

袭，我们便会穷途末路。因此，我们转而去右边，到村外的田野里找了一块空地露营。我和沃克上校走在前面，突然看见一支大约二十人的骑兵队，他们也在块高出路面的地里。那些人看见我们立即逃走了，于是旅长就选择他们丢弃的那个地方作我们的露营地。士兵们受命站在各自的马旁，在 11 点月亮升起之前不准点火。

那是一个月色明亮、空气凉爽的夜晚，要是有人能给我们提供一些食物安慰一下内在的自我，那么这样的一次露营不会那么不愉快。由于那天上午我被派去给人送信，所以没有时间吃饭。不过，多亏旅长及其参谋的大口袋，我才在睡觉前得到了一点点吃的。我们发现，附近一块地上有一堆谷壳，可以做一个非常舒服的垫子。我们的军医搬来很多谷壳（出于职业的习惯，他总是能留心到他人的需要），给了我一大堆作为“皮大衣”，我很快带着一天的疲劳进入甜美的梦乡。

凌晨 1 点，有位军官带来一个俘虏，结果把我们都吵醒了。月亮已经爬得很高，向四周洒下柔和的月光。军营里到处闪烁着微弱的火光，加上一种嗡嗡的声音，让这个地方看起来一副生机勃勃的样子。在我们的营帐附近，一堆大篝火欢快地闪烁着，我们一眼看见篝火旁站着旅长和几名军官，他们身旁那个不幸的当地人吓得浑身发抖，一个劲地用手势向逮捕他的人解释。被捕的是一个憔悴的老头，一身管家仆人的打扮。他告诉我，他是皇帝的一个太监，受命留在这里看守圆明园。皇帝在大约十五天前已经带着他的十三个嫔妃和一大堆随从逃往热河了。他们走得非常匆忙，但是恭亲王一直没走，直到昨天晚上传来消息说联军正进军圆明园，他才离开。恭亲王突然离开圆明园，临走前命令三百名左右的太监留守抵抗。日落时分，法军已经敲开了圆明园的大门，太监试图抵抗，阻止他们进入龙殿，结果两名太监被杀，其余的都受了重伤。一看没有希

望保卫皇宫，这个俘虏便骑上小马试图逃跑，就在他拼命逃跑时遇见了我们。

他说，皇帝已经重病缠身，而且最近一条腿浮肿，走路都要用拐杖。他只有十三个妻子。前五个妻子或是嫔妃都未能生育，但是最后两个年轻的妃子给他带来子嗣，一个妃子生了个儿子，现在四岁；另外一个生了个女儿，今年五岁。他的孩子和妻子都和他一起逃到热河去了，离京城大概几百英里。皇宫里总共有太监四百八十多名，他们分配在不同的宫殿和皇家领地。通常，太监是从有三个儿子的人家选取，一般最小的儿子会被选来担任这个荣耀的职位。他本人就是一户有三个儿子的农民家里的幼子，十八岁那年他被迫离开温暖的家，人家给了他痛苦的父母十五两银子的赏钱作为安慰。那个年纪的他就被彻底阉割了，然后被安置在皇宫药膳部工作，一直到最近几年才被提拔来服侍皇帝。他已经做了二十七年太监，还有三年就可以升为金顶珠级别的太监了。金顶珠之后就是白色顶珠，通常只有表现好的人才能得此殊荣。太监总管就是从白色顶珠的太监中间选出来的，太监总管的帽子上镶嵌的是蓝顶珠；太监总管是太监中最高的头衔，他们的任务就是服侍皇帝本人。戴金顶珠的人为数众多，但是皇宫里只有二十来个太监是戴镶有白顶珠的官帽。以前，太监是一个非常有地位的阶层，比现在地位高多了。那时，他们能参与朝政，而且能够获得红色顶珠最高级别的官位头衔，但是由于他们经常明目张胆地参与密谋，所以后来被贬抑为一般的仆人。

天刚亮不久，我们就被重型大炮惊醒，起初我们以为进攻北京城的战斗已经打响了，但是炮鸣声一直持续，没有任何变化，直到我们数了二十一下才停止。我们静下来，但是没再听到炮声，也没有其他任何武器的声音传入耳朵，因此我们确信刚才连续的炮声是

一种皇家的礼炮，要么是北京城投降了，要么是给迷路的骑兵旅暗示英国军营所在的方位，后者的可能性更大。此后不久，沃尔斯利上校找到了我们，告诉我们将军已经带大部队到德胜门外的郊区扎营了。在攻打敌人的防御工事时，霍普·格兰特将军好像将他的进攻路线稍微往右偏了偏，并且派人给法军司令送信让他也这么做，但是法军司令早就下定了决心要往右走，他们横穿过英军的纵队，跟在英军的后面；法军司令总以为在英军的后面，结果他们直接来到了圆明园。英军看见一大群步兵往后退，但是没能赶上他们。不过，他们在德胜门郊外与一支清兵交锋，我们前面听到的连续炮声就是因此而起的。在这个郊外，他们把清兵赶进城门，由于士兵们都疲劳了，再加上天色已晚，将军认为就地露营对士兵更有利。沃尔斯利上校跟我们交谈几句之后，回到将军身边。早上7点钟，我和几位军官陪同旅长前去圆明园拜见法军，带着那个被捕的太监随行。

北京城内一条铺砌的道路在圆明园处中断，之后又重新出现在西面的西直门，一直蜿蜒曲折通往一个由不同名称的村落组成的名叫“海淀”的地方。这条石铺路经过许多丑陋的小破屋才连接一条宽广的马路，马路中间部分也是铺砌的。石头垒起来的花园围墙竖立在道路两旁，把皇亲国戚的领地都圈起来。我们沿着下面的人行道前进，穿过一座石桥，踏上左边的道路，这条道路把我们带到两座大水景中间，水景的后面就是圆明园宫殿宏伟的入口。法军前一晚就是在这个地方扎营的。

占领入口之后，法军在门口派了一个卫兵，露宿在门口的树下。法国将军为英国骑兵留了一大块空地，他希望他们在追逐撤退的清兵之后能回到他身边。法军营地的四面都围着高墙和房屋，士兵们看起来很疲劳，情绪也很低落；因为，夜里发生了两次恐慌，

而法国士兵几乎两次都失控，不听他们长官的命令。蒙托邦将军领我们进入宫殿，一路上郑重地强调他严格禁止手下的士兵进入宫殿，因为他决定，在英军进入宫殿之前不应该抢劫，这样大家才有机会均等。我们沿着一个堆砌着假山的大庭院由中门进入了宫殿，花园里躺着两具中国官员的尸体。法国人告诉我们说这两个人是清兵，前一晚他们阻挠法军进入宫殿，而且还刺伤了两名法国军官。结果，这两个所谓的清兵实际上是两名太监。他们穿着一般的官服，头上的帽子也装饰着红缨。在正对大门的这条铺砌的道路中央屹立着宏伟的会客厅，一座大型的中国式建筑，建筑的表面用颜料和镀金装饰，久经风雨的屋檐下拉着一个铁丝网防止鸟儿栖息此地。我们由中门进入大殿，站在皇帝的乌木御座前，脚踩在光滑的大理石地板上。御座上雕刻着各种形态的龙，是一件非常精致的艺术品；但是，仔细一看，材料只是一般的木头，被漆成乌木的样子而已。宝座下面的地板上铺着粉红色的布，宝座前面有三级台阶，中间那级台阶最宽，是给臣子们叩头用的。宫殿左边挂着一幅巨大的图画，是圆明园的平面分布图。殿内的边桌上放着用黄丝带捆着的书籍和各种古董。这个简朴而整洁的大殿内有一种威严的气氛，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种威严，它是特意为激发那些被拣选的少数人而营造的，他们在重大节日得到特权前去参拜万人敬仰的天子。

想象一下这幅画面。皇帝坐在他的乌木宝座上，身穿金线缝制的黄色龙袍，头戴镶满金子和宝石的圆形皇冠，面前悬着细金链穿起来的珠帘。太监和臣子们穿着朝服跪在大殿两边，仪仗队和乐师们在外面的花园站成两排。太监宣读被皇帝接见的某位杰出人士的名字，乐队响起，此人缓步向前走去。快要走到那可怕的御座前时，他谦卑地低着头，眼睛看着地板，双膝跪在中间那级台阶上。他摘下头上的官帽，把它放在御座前的地板上，帽子上的孔雀羽毛

朝着皇上。皇上挥挥手，此人便谦卑地叩头三拜，前额贴着第三级台阶。皇上用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吩咐“平身”时，此人抬起头，但仍然温顺地低垂着眼帘。皇帝的声音落下后，此人又叩头，喊过“皇帝万岁”之后才能退下。此处描写的这一幕并非想象，而是从当地人嘴中听到的。可是，此刻的场景真是天壤之别！大殿里挤满了外国士兵，宝座前的地板上堆满了皇帝最好的古玩，不过这些古玩最后要作为礼物送给两位更为称职的君主。“你们看这儿，”蒙托邦将军说，“我已经挑了一些最好的东西分别送给大英帝国女王陛下和法国皇帝。”

大殿后面是一座假山庭园，假山后面是一个大池塘，一条用鹅卵石铺成的小径通到一座小桥上，小径呈半圆形环绕水塘，必须穿过这条小路才能进入下一座宫殿。小路长约五百码。这个殿比第一个殿小，而且也不值得关注：宝座两旁立着几顶黄色的轿子和一把石椅；大殿两侧都是毗邻的小房间，里面放着佛像。这个大殿后面是另一个会客厅，而在这个会客厅后面又是一个会客厅。皇帝的私人房间摆设漂亮，房间左边的桌子上放着各种各样的珍品，许多来自英国或法国。这间屋子不大，主要由一个大小适中的房间构成，房间里有一张双人大宝座，宝座上盖着颜色鲜艳的布，后面是红色的帷帐，形成一道门帘与服侍的下人隔开。一盏树枝形的大玻璃灯吊在房间天花板上，房间里到处装饰着钟表和小雕像。房门的正对面立着一块木制雕花壁板，壁板将会客厅隔开，形成一条狭窄的通道，通道的左边是两个小房间，小房间后面有一个螺旋上升的小楼梯，小楼梯又把我们带到楼上另外两个小房间，从房间里摆设的书架来看，这两个小房间是皇帝的书房。每个小房间里都有一个大玻璃窗，从玻璃窗可以看到下面的会客厅。通道的右边是皇帝的两个休息室。房门口的卷帘卷起来时，我们可以走到房间里面，两个房

间由一个过道连接起来，彼此相通。过道里挂着另一个卷帘，后面的那个房间便是皇帝的卧室。墙壁上有一大块地方，上面拉着帘子，地板上铺着丝质床垫，这就是皇帝的龙床。床前放着一个小台子，是给皇帝上床时垫脚用的。皇帝的枕头下面放着一块丝质小手帕，手帕上用朱砂笔写满了各式各样有关“夷匪”的批文，烟斗及其他中国式奢侈品都放着旁边的一张桌子上。1858 年与英国签订的条约装在信封里，也放在桌子上。大量用朱砂笔写的批文都打包好了，其中大部分都是有关联军的批文。绝大部分的珍稀物品都放在这些房间里，我们边走边仔细观看，仿佛走进了一个博物馆。让我们惊讶的是，法国军官这时就开始动手拿他们喜欢的东西。金表和小件贵重物品被这些先生以惊人的速度攫取，迅速消失在他们的大口袋里。

任由手下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尽情装入口袋约十分钟的光景，蒙托邦将军便坚持让他们跟他一起出去，且一再重申严格禁止劫掠，而且他也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尽管他的手下在他眼前明目张胆地这么做。然后，他告诉旅长，在霍普·格兰特将军到来之前他们不会碰任何东西。正当我们从大门走出来时，一位官员对蒙托邦将军说，他们抓到一个中国人从皇宫里偷了一双旧鞋子。“把他带过来！”将军愤怒地说，“我们不是说过严格禁止抢劫吗？”那个犯人战战兢兢地走上前来，将军用藤条使劲抽打这个倒霉的替罪羊的肩膀以泄其愤。此后，旅长和蒙托邦将军及其参谋一起去吃早餐，我便趁机去地形勘察部找我的老朋友。法军在营地抱着丝绸和珠宝首饰狂欢。每个人都给我看一些稀有的古玩，让我估价，因为我是一个翻译，而且身边还带着一个太监，他们觉得我肯定是个内行。一位军官拿到一串精美的珍珠，每粒珠子大小都和弹子一样大（后来他在香港愚蠢地把这串珍珠以三千英镑廉价出售了）；有人拿

了镶钻的笔盒子，有人拿了镶有珍珠的手表和花瓶。实际上，从圆明园里拿走的贵重物品根本无法枚举，然而法军司令却一再声称，没有拿走任何东西，因为抢劫被严格禁止！

早餐后，《箴言报》的记者获得准许让我陪他再次进宫，我们进去没多久霍普·格兰特将军和他的参谋就赶到了。蒙托邦将军迎接霍普·格兰特将军，并且肯定地告诉他宫殿里一样东西也没少。然而，霍普·格兰特将军走进法国军营时，他自己的眼睛清楚地告诉他蒙托邦将军这个说法有误。劫掠仍在继续，只是更为秘密。提及蒙托邦将军的禁令时，一位法国军官说：“它使我们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将军一方面说你们不许劫掠，一方面又允许这样的事情在他眼皮底下发生。”接着，额尔金勋爵也到了，他对劫掠表示强烈抗议，直言不讳地说：“我喜欢这个宫殿里的许多东西，但我不是小偷。”

我和《箴言报》的记者还有那个太监继续在宫殿里漫步。最左边是皇后的两个房间，另外还有几个更小一点的房间是嫔妃们的，但是在风格上没有一间能与皇帝的房间相比。几篮子水果和蜜饯还摆在皇后房间里的桌子上，这说明她刚离开此地不久。大殿的右边是一排排的房子，里面藏有丝绸、古玩和各式各样的奢侈品，如：燕窝、茶叶、烟叶、干果等等。这些房子后面就是太监们住的房间。皇宫里所有的房间都被狭窄的彩色游廊连接起来，仿佛一个“错综复杂、令人困惑的迷宫”。

在这座主建筑后面就是颐和园(夏园)，这个花园的总占地面积大约十二英里。小鹅卵石铺就的小道带我们穿过一片片小树林、湖泊和一座座奇妙的小桥，来到风景别致的凉亭。我们在花园漫步时，成群的小鹿摇晃着他们满是茸角的脑袋，从我们面前缓步溜走。此处一座建筑物神话般地从湖心升起，倒映在碧绿的湖水中，

仿佛漂浮在水面一般；彼处一条斜坡路领你进入一个人造假山的神秘山洞里，然后又将你领入另一个湖泊中央的洞穴里。别致的风景变幻无穷，美妙绝伦。真的，中国最美丽的景色似乎都聚集在这些令人愉快的地方。在这些地方，艺术设计试图把大自然的随意之作改变成令人迷惑的风景。设计者的灵感似乎永无止境，而且不遗余力斥资将他的作品完美化。凡是在上等的中国画中常见的美丽风景以及任凭艺术家的想象力设计出来的景色都在这里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了。然而，我不敢对此进行细致的描写，因为那对读者而言肯定是枯燥乏味的。这种地方适合想象而非描写。

在圆明园的围墙内，左右两侧都建着漂亮的大喇嘛寺，上面盖着黄色的琉璃瓦顶。

下午，旅长叫我离开，我们又回到了露营地，还得在这里再待一个晚上。但是这次，我们偷偷在一间破旧的茅草屋的门口过夜。茅草屋的主人似乎是个爱鸟者，他的小屋顶上挂着两个鸟笼，一个鸟笼里装着一只蜡嘴鸟，另一个笼子里装着一对金翅鸟，这两种鸟都是我们童年时常见的。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德胜门找到了英军营地，旅长占用在那里为他们安排的营帐，而我又回到了地形勘察部的老职位上，继续忍受与沃尔斯利上校的相处。

第12章

伪证，肮脏的伪证，肮脏到了极点；
谋杀，可怕的谋杀，可怕到了极点；
一总的罪行，每条都被运用得淋漓尽致，
群集到牢房，一齐呼喊：“罪人，罪人！”

——《理查德三世》

巴夏礼和罗亨利两位领事获释——圆明园大劫掠——英国人对
圆明园的洗劫——发现机密文件——准备进攻北京——安定门投
降——释放其余人质——复仇的心情——遇害人质的葬礼——额尔
金勋爵摧毁圆明园的理由——火烧圆明园——圆明园及周边环境的
总体描述

部队前进的第二天，威妥玛先生收到巴夏礼前一天(10月5日)
写的便条，便条附在恭亲王从圆明园写来的信中。便条上说明了清
政府当局打算在8日释放关押在北京的人质。不久后，威妥玛先生
会见了被指派为钦差大臣恭亲王助手的恒祺，向他转达了两位将军
的要求，即北京城中的某个城门必须向联军投降。这位官员自然先

是一口否定了这种行为的可能性，但最后答应将此事告知恭亲王。当问及那些据说不在京城的人质时，他说会尽最大的努力确保他们安全回到京城，但是他不知道那些人被送到哪里去了，所以他不敢作正面的承诺。

10月8日，巴夏礼、罗亨利两位领事和他们从普罗宾手下抽调的骑兵卫士，以及法国科学团的乐斯凯拉克·德·劳涂乐伯爵和四名法国士兵都被释放了。中国政府正面肯定这八位都是人质，而且他们就被关押在北京城内。因此，我们自然非常担心扣押在他们手里其余不幸者的命运，尤其是当我们确信他们已经被交到清兵手里时。

因为没有人像清兵那样残忍，
习惯死亡，在悲哀中成长。

巴夏礼和罗亨利两位领事很幸运，他们被当做政治犯关押，尽管起初清朝官员对他们极其残忍，但是后来事态出现危机时，他们身上的链子被解除，同时被安置到房子里加以适当的照顾。这两位先生的冒险经历都在他们写给额尔金勋爵的信件中讲述了，已经向公众公布了，由于他们的故事非常有趣，因此我在此稍带提及一下，不作详细叙述。被关押期间，他们不屈不挠和英勇无畏的精神，以及他们坚决不向任何有损国家荣誉的行为屈服的坚定意志都值得尊崇。然而，虽然我们非常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但是对于他们所提供的有关北京监狱系统的内部运作消息，还是非常满足的；考虑到那些对中国话题感兴趣的读者，我在此省略这两位领事所受的虐待。

10月7日，星期天，凡是得到离开军营许可的人都会到圆明园

去，因为现在将军不反对劫掠了。吃过早餐后，我立即骑上马，独自穿过村庄，答应要在圆明园那里与几位军官见面。那是个阳光明媚，空气宜人的上午，阳光照在道路两旁的树林里，给快要枯萎的树叶带来一线蓬勃的亮光。几位村民站在自家房屋门口观望，一见我便立刻消失。法军营地还在宫殿前，法军哨兵仍然守在宫殿门口，但是进去的人不需要通行证——这个地方向任何、所有的蹂躏行为开放。里面被破坏成什么可怕的样子了！先前那些陈列着各种古玩静止不动的房间如今受到怎样的骚扰！军官、士兵、英国人、法国人以极不体面的方式横冲直撞，人人都想捞一些珍贵物品。大多数法国人手里都拿着大棍棒，将他们拿不走的东西敲得粉碎。在一个房间里，你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几名军官和等级不一的士兵的脑袋都挤在一起，所有的手伸进同一个盒子去拿里面的东西。另一个房间里，大家争相抢夺一些精美的龙袍。有些人为了争一面大镜子而掷骰子，有些人拿一些树枝形的装饰灯玩套环游戏自娱自乐。完全看不见对地位的尊重，完全是一盘散沙。

对财富的热爱极具感染，拉丁文“煽动魔鬼”一词将此表达得淋漓尽致。这时候没有人能静静地欣赏艺术作品，所有人都一心想获得最珍贵的东西。那一幕充分证明了，在没有法律和舆论的约束下人性本恶的一面。获得许可的偷盗行为展示了每个人内心贪婪的天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恶习——嫉妒和争吵。右边丝绸储藏库的门被敲开，人们蜂拥而入，争抢那一堆堆的丝绸卷和刺绣旗袍。这些东西很快被大家抱出来。一堆堆的丝绸，尽管被抢劫者用马车一车车运走，而且地上扔得到处都是，但仓库里还有更多。霍普·格兰特爵士组建了一个战利品代理委员会，目的是把劫掠而来的古玩收集起来处理，得来的资金归军队所有。委员会的军官们整天都忙着挑选那些还没有损坏的古玩，但是其他几百名军官则忙于为自己而

劫掠。随着掠夺者展开搜索，不断发现新的房间，还有许多没被碰过的房间里满是古老的青铜器、钟表、釉瓷花瓶以及数不清的玉石古玩。掠夺者们贪婪地冲向这些东西。获得的战利品非常丰富，但是运输工具缺乏。附近的中国人也涌入圆明园，加入了快活的掠夺者行列，成百上千的老百姓整天满载着赃物在圆明园里来来往往。掠夺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可以轻便带走的珍稀物品越来越少了，当地百姓很快被抓来充当脚夫搬运大件古玩。有人见一位军官正哼哧哼哧地拉着一些旧花瓶、皮毛大衣和刺绣旗袍等重物，这时他看见一个当地人也拉着同样的东西，于是令此人打开包裹，从此人包裹中挑选出来几件东西放到自己的包裹里；这个当地人被迫扔掉其余的赃物，帮这位军官拉货物。很快有谣传说发现了宝藏，于是大家兴奋地四处奔走去寻找这个藏宝地，但是幸亏将军们明智，派了一名士兵守卫这个地方，最后那些钱平分给了英法两军。

一天的掠夺结束之后，军队不同成员之间产生了不满的现象——这是在意料之中的。许多军官和几乎所有的士兵由于工作职责的原因没有参加掠夺的机会；而对于那些参加掠夺的人而言，有的抢到了好几件价值连城的珍宝，而有的只是捞到了一些没有价值的便宜货。此外，拿皮尔将军参谋处的几位军官剥下了一个被人忽视的小屋的屋顶，起初他们以为是铜，后来证实这个屋顶几乎是纯金做的，大约值九千英镑。他们慷慨地把这件东西交由将军处理，结果有人建议将屋顶敲碎分给每个士兵。霍普·格兰特将军获悉此事后，担心在一小部分士兵中间进行这样的分配可能会引起不满，为了公平对待那些因执行任务不能参加掠夺的人，他下令收缴军官们获得的所有掠夺物，呼吁他们为了军官和绅士的荣誉要诚实地上缴他们拿到的所有掠夺物品。当然，这种方法引起了另一方的极大不满，毕竟他们花了相当大的气力才把这些东西弄到手。其中有一

位军官，他把抢来的所有财宝都放在马背上驮着，自己则牵着马徒步走了五英里地回到军营。所以，当将军颁发这道命令时，他便成了许多人戏谑的对象。然后，在10月11日那天对战利品代理委员会收集来的物品进行了拍卖，其中包括上缴的那些东西。但是，上缴战利品的军官都可以按委员会的定价将自己上缴的东西赎回。法国人摧毁宫殿内的东西之后，一把火烧掉了皇帝的私宅，然后离开了圆明园，将他们的营地搬到了安定门前的一个村庄。锡克骑兵和几个龙骑卫士是唯一自己找到进入皇宫道路的人，因此他们的营帐里，尤其是锡克骑兵的营帐是那些想购买丝绸的人常去的地方；通常一匹丝绸的平均价格是一元（相当于四先令六便士），但是丝绸的真正价格可能在三英镑至五英镑之间。那些随军营而开设商店和餐厅的店主们得到了大量的丝绸，因为他们卖给士兵商品或饮料时士兵们就按那个比率支付给他们丝绸。但是，几天来法国军营里的小饰品和小宝石成了最大的诱惑。你只要随便问一个士兵他有没有什么东西卖，他会立刻拿出金表、珠宝首饰、玉器或是皮毛。许多英国军官身上有可自由花费的美元，因此他们很快能找到方法用这些钱到法军阵营里换取价值更大的东西。几个星期以来，无论在英国军营还是法国军营里，大家谈论的都是从圆明园里盗取的珍稀物品以及他们还想回去拿的东西。许多法国军官获得了不小的财富，而他们的士兵则沉溺在金钱中，这让他们的军营一片混乱，并导致严重的骚乱。他们从前一个露营地返回之后的好几天，士兵们仍然处在一种陶醉的状态，保留着他们掠夺和抢劫的习性，在附近的村庄四处骚扰。

英国人抢来的东西都放在总司令参谋部驻扎的大喇嘛寺里展示，那真是一个不错的展览：色彩不一的白色和绿色的玉石饰品、形状古老的珐琅广口瓶、金银铜质的雕像和佛像等等；上等的皮

毛，其中许多都价值连城，如黑貂皮、海獭皮、白貂皮、俄国羔羊皮等等；朝服，其中有两三件是皇帝的龙袍，鲜黄色的丝绸面料，金线绣成的龙，袍子的裙边用精美的乱丝刺绣而成，龙袍里面铺了银皮或是白貂皮，领子上镶了柔滑的黑貂皮。大厅的尽头堆着无数的丝绸和不同颜色的绸缎，其中还有几匹是漂亮的御黄色，按照中国的法律，这种色彩只能用来制作皇帝的服装。

拍卖持续了整整三天，军官和士兵是主要的出席人员。竞争的狂热似乎支配着每一个人，导致有些物品的成交价格高得惊人。最小的物品都要售到两三英镑，其中有一件龙袍竟然以 120 英镑的高价成交。倘若中国皇帝在场看到这些外国人对任何一件物品所出的价钱，仅仅因为那曾是他的东西，他一定非常满意。想象一下，一代帝皇的财物就在他帝国都城的墙角下被拍卖，而且拍卖者就是那个被他轻视为羸弱蛮夷、要被他赶进大海的民族！拍卖得到的收益达到 32,000 美元，而被保留下来的物品总体估价 61,000 美元，总价大概有 93,000 美元。这些钱的三分之二平均分给士兵，另外三分之一分给军官，为犒赏他们在占领圆明园当地的积极表现。霍普·格兰特爵士慷慨地将他的那份给了手下的军官，作为对他的尊敬，军官们送给他一个纯金质地的紫色水壶，壶身上有各种各样的雕镂花纹，是战利品中最漂亮的一件物品。

我们在圆明园偶然发现一些有趣的文件，其中许多都是皇帝的亲笔信，我们之前也引用过其中的一部分。在一封奏折中，僧格林沁报告要塞失守，他将此事归咎于两个火药库的意外爆炸，继而他告诉皇帝说他又在通州附近扎营了，让皇帝不要害怕。在后来的一封奏折中，他告诉皇帝说夷匪正在前进，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走不了多远；他建议皇上到热河去打猎巡游，等事情出现满意的转机再回宫。有几位大臣在他们的奏折中强烈反对此建议，声称近四十

年内皇帝没有打猎巡游过，而且当前形势危急，这样做会让百姓认为皇上胆怯，况且，去热河的路途上匪徒滋生，这样做既不安全也不符合皇室传统。而且，皇帝要去巡游的话至少要带四千名卫士随从，但是在当前京城危难时刻，恐怕很难腾出这些兵力。相反，他们建议皇上留在北京，在援军到来之后他们或许可以在北京集结三十万大军；而夷匪只有一万人，因此皇帝无须害怕，而且这样做可以鼓舞士气。他们更加竭力主张的办法就是让皇帝率领士兵前去迎战夷匪，他们确信只要皇上威严出场，那些未开化的蛮夷一定会吓得惊慌失措，轻易成为朝廷勇士的阶下囚。“朱砂笔”对这些建议作了非常优柔寡断的回复，批文说皇帝陛下会做好一切准备派他的士兵上战场；这样百姓可能会士气大振；等到需要他率领士兵上战场时，他会悄悄地带领侍卫前往热河。一位大臣启奏陛下，他听闻蛮夷军队大部分由广东招募来的新兵组成，因此，他建议，既然这些唯利是图的小人只是为了财富的缘故而加入蛮夷军队，那么只要答应给他们巨额的贿赂金，就能将他们争取到中方阵营。因此，他认为，与其答应给蛮夷八百万两白银的赔偿金，不如从中拿出一百万两用来争取蛮夷军队的广东兵力，这样一来敌军力量必会削弱，到时他们只能听任中国政府开具的条件。大多数呈递奏折的人都不太关心入侵的力量，而将造成巨大恐慌的原因归咎于北京城内的暴动力量，认为这些人会煽动百姓起义，为蛮夷打开城门。他们似乎非常担心联军阵营内的中国人会勾结城里具有反抗意识的百姓。许多奏折都表示了即使大沽陷落之后仍要抵抗联军的决心，这就核实了我们先前的猜测，从头到尾都是中国政府的计谋，他们企图引诱额尔金勋爵只带一小支兵力从天津前往北京，然后将勋爵和下面的一小队人马控制在他们手中，从而达到他们最终的目的。

中国政府被通告必须在 12 日交出京城西郊的安定门，即法军

扎营的地方。清政府当局先前一直都找借口推托，因此我们觉得他们不会轻易交出这个城门，必定要佯装反对。城门左边，正对着城墙不到两百码的地方有一堵大约二十英尺高的围墙，围绕着一大片空地，大概有几百英亩的面积，围墙里面就是地坛。我们的工程师认为，这面高墙的后面是架设炮台的理想位置，我们可以在这个炮台上安放攻城炮以攻破北京城墙，于是他们立即开始准备搭建炮台，炮台搭建好了之后，便掀掉了城墙上的砖块。进攻计划是先在城墙上打开一个离地面有十五英尺高的缺口，士兵从缺口进城后向右转，沿着城墙前进从而占领安定门。法军在我们的左边，在地坛围墙的前面，很快就在离城墙一百码的地方挖了一个战壕，他们也忙着准备搭建一个炮台。联军两位总指挥威胁说，如果在12点以前清政府不交出安定门，联军就在12点准时发起进攻。这一天到来了，两军的炮台都准备就绪，12点很快就要到了。皇家兵团已经进入地坛，守在攻城炮旁边，第67团的一翼也已经准备好开炮。与此同时，巴夏礼先生和将军的副官斯蒂文森上校也赶到安定门等待中国政府可能给出的任何建议。拿皮尔将军站在大炮旁边，手里拿着表进行倒计时。12点差5分。所有人都迫不及待而又异常兴奋，英勇的将军正要开口下令，这时，斯蒂文森上校策马赶到，说城门已被交出。

第67团一支兵力和第8旁遮普团立即被派往城门。他们从城门走进城里几码的距离，驱散了围观的群众，然后占据了城门，在城门右边扎营。随后，法军敲锣打鼓、旗帜飞扬地走进城，沿着城门口的大马路往城里走了一段路后折回城门，在城门的左边扎营。随后，马路上拉了一条绳子阻拦群众，并派了卫兵把守城门，暂时严禁百姓入城。

这个所谓的城门实际上是一座雄伟的建筑。沿着那条朝南通向

安定郊区的道路往前走，再往前看，只见高耸的城墙上有一座巨大的方塔，共四层，每层都有一排瞭望孔，每排十二个孔；塔顶是斜坡形的，上面盖着琉璃瓦；塔顶的脊梁每端都向上翘起，与普通的中国建筑风格相似。你肯定会以为这座塔是在城门过道的上面，但并非如此；它是建在一面墙半圆形的那部分上，并且比原来的基墙更为突出；基墙上建了另一座形状相似的塔与第一座塔相对而望，但是这座塔没有瞭望孔，只有窗户和走廊。在第二座塔的下方是一扇拱门。经过这扇拱门，便来到一座石桥上，石桥下面可能曾经是一条护城河，但是现在已经干涸。站在石桥上，你又发现自己来到第一座塔前。然后，你沿着围绕突出的那面墙而延伸的一条石头路往左走边进入了第一道门——一个拱形通道下巨大的可折叠式入口——通过这道门，你进入了半圆形的基墙围成的空地（在墙的两边都是一些小岗哨和寺庙），然后沿着折往左边的石桥前行，你又来到了第二个拱形入口，经过这个入口便来到了京城宽敞的马路，这条马路一直往南延伸，一眼望不到尽头，马路两旁都是飞扬的尘土和聚集在旁边攒动的人海。走进第二道门，在左边靠着墙的地方有一个长长的坡道，走上坡道你就可以爬上第二座方塔，站在塔上的这一边可以将城里的一部分景色尽收眼底，站在另一边则可以看见远处农村的景象。在右边的角落里，一条宽敞、不规则而又满是尘土的马路从城门一直往南延伸，马路两旁延伸出数不清的小路，小路的旁边并排竖立着许多低矮的小屋，大多数又脏又破，根本不能居住，风格与南方城市里见到的房屋差不多。但是，偶尔也能看见一些两层的大建筑物，大部分都是庙宇，给千篇一律的单调景色带来一些变化。除了城门附近的房子之外，城门之外方圆约两英里的地方都是空地，偶尔能看见一些树木。从在岗哨周围围观的人群来看，城里的百姓似乎毫不畏惧夷匪，而且他们很快就学会向我们

兜售水果和家禽，并在城门附近开设了一个小集市。我们的炮兵团通过那条坡道运了几门大野战炮到城门口，阿姆斯特朗大炮的炮口很快对准了京城。我们在城墙上找到了中国人安置的几门大炮，那些大炮正对准我们的炮台位置，其中一门铜炮约十一英尺长，上面装饰着一些小部件，刻着满文。另一门大炮是木制的，但是套着铜外套，乍看起来让人以为它全部都是金属制造的。北京的城墙大约有四十英尺高，城墙顶部约六十四英尺宽，城墙从下往上逐渐变窄。城墙内部是用泥土造的，外面是保护性砖墙。我军在沿着城墙往右离安定门约一百码的地方开辟了一条通道，通向城墙上面，同时用土建造了一个炮台，控制沿城墙通往德胜门方向的通道，这是非常必要的一个预防措施，因为那个城门还在清兵的手里。

12日下午，交出安定门之后，八位锡克骑兵和几名法国人被释放回到了联军营地。他们瘦得可怕，胳膊上和手腕上都被捆绑他们的绳子勒伤了。14日，又有两名锡克骑兵被带回军营，中国人称这两个人是最后一批幸存的人质。这两个可怜的人非常痛苦，其中一个当天被送回来没多久就死了。

我陪沃尔斯利上校和一队骑兵出去勘察西面的城墙，恰巧碰到一支约二十名清军骑兵组成的小部队，他们一见我们就逃跑了。然后，我们就前往最北面的城门，在那里我们遇到五辆马车，每辆车上都装着一口棺材。我们走近检查了那些棺材，本能地认为里面装的是我们遇害同胞的遗体。结果证实，我们猜测正确，每口棺材的前面都贴着一张纸，上面用汉字刻着躺在里面的人的名字。汉字只能勉强翻译出外国名字的读音，但是我们一致认为那个标记为“Ponape，9月25日死于疾病”的人就是指《泰晤士报》的记者，倒霉的鲍白先生。在我们的质问之下，那个负责运输这些尸体的人告诉我们，这些棺材是从北京城北面大约四十英里的一个小镇运来的。到

17日，所有的尸体都被运回，他们早已经腐烂得面目全非，丝毫无法辨认。最后，检查遗体的医生们只能通过尸体身上的碎布辨认出这些遗体分别是隶属于皇家公使馆的德诺曼先生、费恩骑兵团的安德森、国王龙骑卫队的老兵约翰·菲普斯、《泰晤士报》的记者鲍白先生以及八名锡克骑兵。唯独炮兵团的布拉巴宗上尉和阿拜·德·鲁克的情况没有得到说明，但是听幸存的人质说，9月18日逮捕的这群人被转移到北京那天，那个阿拜和布拉巴宗上尉便同他们分开了，被带回到中国军队。而且俄国人从几个中国人那里证实这一点，他们肯定地告诉我们，这两个人当时被胜保将军手下的士兵扣押，当那位官员在八里桥被法国人严重刺伤后，出于愤怒和痛苦，这位中国将军下令将这两个人斩首。一段时间之后，有人看见两具无头尸——显然是欧洲人的尸体——漂在运粮漕河上。尸体被发现时，没有人怀疑这样的谋杀，只是以为可能是皮肤白皙的清兵的尸体。后来，有人怀疑此事，准备对此进行调查，但是尸体不见了。

从幸存骑兵所说的话中，我们得知，他们在张家湾被捕后，就被卸掉武器跟在中国军队后面走，但是允许他们继续骑在马上，并且沿着那条石头铺砌的路前往北京。到达北京之前，有人叫他们下马，在路边一个寺庙里过夜。第二天，布拉巴宗上尉和阿拜·德·鲁克就被带往通州，而其余的人则带往北京，到北京后他们又被带到圆明园，关在监牢里。他们到圆明园后大约一个小时，就一个被叫出去，推倒在地，手脚都捆在身体后面。骑兵们是用单股的绳子捆绑的，而欧洲人都是被双股的绳子捆起来。他们把捆在人质身上的绳子使劲地拉紧，这样还不满意，无情的逮捕者还用水把绳子打湿，好让绳子缩得更紧。那些不幸的受害者又被带到一个花园，暴晒在太阳和寒冷中，三天三夜没有进食，没有喝水。白天，花园的门开着，挤在门口看热闹的人可以走进花园，看他们痛苦的

样子。如果他们说一句话或是要水喝，就会挨打，或是拳打脚踢。倘若他们要东西吃，那些人就会把土塞在他们嘴里。第三天结束时，他们吃到了一点点食物，但是他们的脖子、手腕和脚踝上都戴着铁链。第四天，他们被分成四组，塞进马车，但是手脚仍然捆绑着，被拉到离北京约二十到四十英里不等的四个小山上的树林里。霍普·格兰特爵士写道：“他们死亡的原因非常明显，每个组的幸存者都讲述了同样悲惨的故事，他们是如何手脚被捆绑着，直到身体组织开始坏死，最后死去。如果他们身上的绳子不是在第九天或是大约那时候被割断，所有人都会经历同样的命运。”

当大家获悉我们的同胞遭此厄运时，军营上下愤慨不已，不过中国士兵还算幸运，没有再与联军发生正面冲突，否则他们会发现联军要比先前残忍得多。但是，锡克骑兵的愤慨却不是那么容易平息的，它深藏在每个人的内心，其中发生了一件典型的事例表明，他们甚至要将此愤慨发泄在无辜的满族人身上。在被虐待的人质被释放后不久，一天傍晚，一个中国人来到正在静静漫步的牧师姆吉先生面前，鞠了几个躬之后，他示意让牧师跟他去。这个人把牧师带到费恩骑兵团岗哨亭附近的一所房子里。一个锡克骑兵从那个房子里溜出来，跑了；牧师一进屋看见两个不幸的中国老百姓趴在地上，脚踝和手腕都被绳子绑着，与那些残暴的清廷官员对待我们可怜的朋友的方式一模一样。报复的心情被实施在细微之处，因为绳子不光是紧紧地绑在他们的手腕上，而且也被打湿了。显然，那个锡克骑兵对这些不幸的中国人所受的痛苦非常满意，而且肯定为他有这么一个报复的机会而偷笑，他可以把中国的统治者折磨他同族人的手段同样施加给这两个中国人。

俄国公使伊格那替叶福伯爵一直为联军提供帮助，而且不遗余力地打探和传递有关中国政府意图方面的消息，此时他又前来向我

们提供俄国公墓埋葬我们哀悼的战友。17日，炮车把遗体送到公墓，士兵和军官们组成长长的送葬队伍，来复枪团奏响舒缓的哀乐。俄国公墓位于北京城外，安定门的右边，离北面的城墙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地方不大，四面围墙高耸，侧面有一扇门正对着北方。围墙里面还有一块不大的地方，被另一面四方形的墙围着。坟墓就挖在门右边、两面墙之间的空地上。葬礼由英国的随军牧师姆吉先生主持。俄罗斯使团的神甫穿着象征我们信仰的大祭司祭袍出席了葬礼。此外，出席葬礼的还有蒙托邦将军和几个法国军官，以及英国军队和领事馆的大部分官员。棺材并排放进坟墓，然后连发三响大炮。那天天气异常寒冷，刺骨的寒风刮在出席葬礼的人身上，但是那一幕非常感人，许多饱经岁月、粗糙的脸上都闪烁着泪花，因那些为了祖国而舍生者遭受的残酷命运而悲伤，然而等待他们的亲朋好友的痛苦绝非如此，通过下一一次的信件他们就会获悉亲人的离世。凛冽的寒风吹过，头顶的树枝前后摇曳，发出大声的呻吟，仿佛为这个共同的悲伤增添了几分大自然的哀悼。

被害的锡克骑兵交给他们的同胞处理，他们按照自己的传统，把尸体火化了。

法国人不需要接受俄国人的帮助。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当耶稣会在北京非常活跃的时期，他们就在西墙内建了一个古老的罗马天主教公墓。因此，他们把遇害者埋在那个地方。

听说人质遭受的残忍待遇之后，额尔金勋爵像大家一样愤怒，但是他的愤怒是一张更棘手的牌。在谋杀人质事件揭露之前，霍普·格兰特爵士已经传达了勋爵的命令，如果清政府立即交出安定门，北京城可幸免于难。寒冷的天气很快就来了，将军坚持部队必须在11月1日之前撤离北京。但是，完全有必要在这一带留下一个永久的标记，对当局的欺诈与残忍的行为表示我们的愤怒，并且

作为给后来的统治者的一个警示。由于圆明园是残酷暴行最先开始的地方，而且这些罪行都是皇帝专门教唆臣子犯下的，因此最后决定将皇帝这个罪行累累的田园静修宫殿夷为平地。而且，清政府还必须向我们的受害者赔偿三十万两白银（相当于十万英镑）。在毁坏圆明园的申辩中，额尔金勋爵这样写道：“……从人的理智来说，摧毁圆明园会遭人反对，但是关于对清政府的罪行施以特殊惩罚的最好模式，我有义务来说几句，虽然我的行动方式具有一定局限性，而且我本来可以采用其他方法来替代这种方式。

“或许，我可以要求清政府赔偿一大笔钱，不是作为对受害者的补偿金而是作为对中国政府的一个惩罚。但是，且不说将这种性质的重大罪行变成一个纯粹的金钱问题有悖于原则，我坚持一个观点，而且我相信所有人都会这样考虑，那些调查过这个问题的人也不例外，那就是在中国政府目前无组织的状态下，想要获取大笔的金钱补偿根本是不可能的。况且，在这件事中，实质上能做的一切就是从海关税收中拨出一部分款项来兑现，这样留给清政府处理的海关税收中仍有足够的利益让其鼓励老百姓继续与外国人进行贸易。经过计算，遵照勋爵阁下和法国政府的要求，要获得我和葛罗男爵要求赔偿的赔偿金，必须抽取中国四年的总海关税收中的百分之四十。

“或者我可以要求他们交出那些对我们同胞施暴或是背叛免战白旗的人。但是，倘若我以泛泛的条件提出这样的要求，或许他们就会交出几个痛苦的下属，而这些人很难原谅，同时又不可能惩罚。倘若我指定由僧格林沁来承担背叛免战白旗的罪行，而且我们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让军事法庭定他的罪，那么我敢肯定，中国政府不会让步，而我的要求也无法实现。我必须补充一点，在我看来，以这种方式把政府行为的责任推脱到个人身上，无异于中国政

府发动战争以证明其实力的行为模式。因此，权衡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通过我最佳的判断，最后我认为摧毁圆明园是我想到的几个方法中争议最小的一个。除非我不顾自己的责任感，甘愿让清政府不为自己的罪行接受惩罚。而且，我有理由相信，这个行为对中国、对皇帝的影响要比对那些站在远处观望的百姓大。

“圆明园是皇帝最喜欢的行宫，那么摧毁这个地方将沉重打击皇帝的傲气，挫伤他的感情。我们从锡克骑兵的证词中了解，皇帝派人把我们不幸的同胞带到这个地方，就是为了让他们在这里遭受极刑。就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被捕骑兵的马匹和他们的衣物，还有从一位英勇的法国军官胸前扯下来的勋章，以及人质们的其他财物。由于宫殿内所有贵重物品基本上都拿走了，所以部队进驻宫殿不是去掠夺，而是通过一个庄严的惩罚行为替我们被滔天罪行激发出的愤慨和恐惧留下一个标记。这个惩罚不是针对无辜的老百姓，而是专门针对皇帝，他个人要为所犯的罪行负责，不仅是为其虐待关押在圆明园的人质，更为他颁发告示重金悬赏外国人的人头，而且他还不惜重金企图雇人暗杀联军。”

第1师在米切尔将军的率领下执行详细的摧毁任务，他们18日一大早就出发前往圆明园，到了那里，将军把不同的建筑物分配给不同的团队去摧毁。法国人拒绝合作，他们认为这是一种野蛮行径并加以谴责，忘记了主要的坏事还是他们干的，他们不仅用阴谋手段盗取和毁坏圆明园里的所有东西，而且还让他们的人放火烧掉了皇帝寝宫中最漂亮的厅堂。

不久，一股巨大的浓烟直冲云霄，表明行动已经开始。天色暗淡下来，烟柱越来越多，越来越浓，形成一大片乌云飘荡在北京上空，仿佛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即将到来。我们走近圆明园，听见大火发出骇人的噼啪和呼啸声。太阳穿透浓密的烟雾，给四周的花草树

木涂上了一层惨淡的色彩。暗红的火光映照在忙碌的士兵脸上，使他们活像一群魔鬼，正在为那举世无双的珍宝的毁灭而欢呼雀跃。夜色温柔，屋顶一个个地坍塌下来，压倒了燃烧中仍然挺立的墙壁，喷出团团浓烟，仿佛一个征兆预示着这个古老帝国的悲哀命运：帝国内部因自相残杀战争而消耗，而它却迫使那些本可以成为其友邦的国家加快了它的灭亡，在内忧外患的时刻却无处寻得援助，以致最后化作一团烟雾消失在前朝的灰烬中。这似乎只是一个征兆，可能不是事实，因为中国政府仍有重生的机会，通过与外国建立友好关系，向他们学习在当前紧急的情况下，如何维持百姓内部的秩序，如何保持发展的步伐。

圆明园很快呈现出一片混乱和劫后的荒凉，但宫中仍有大量可以抢走的东西，既然现在抢劫是允许的，大批无所事事的士兵便涌入废墟，把抢掠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每一个隐蔽的角落。有人在外面的—间房子里发现马卡特尼勋爵当年送给道光皇帝的两辆马车，马车原封未动，保持完好。皇帝似乎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些马车，宁愿坐当地那种毫无弹性的马车或是轿子。同时，还发现了两门装备齐全的榴弹炮，也是马卡特尼勋爵送的礼物。有人在一堆数量庞大得无法估计的不同种类的科学工具中，找到了英国制造的双筒大炮，以及几罐弹药和几盒依莱帽。第15旁遮普团负责摧毁最重要的花园，他们偶然发现大量黄金，其中一位军官据为己有的金子竟相当于九千英镑之巨。

一条铺砌的道路从圆明园左侧城墙延伸出去，经过另一个封闭的花园围墙下，这个花园名为万寿园。万寿园面积不大，里面有一座长满树木的小山，以及一些大寺庙，其中包括可辨认的三种中国宗教，即孔庙、道观和大佛寺，此外还有一些盖着黄色琉璃瓦的大殿，那是藏传喇嘛寺。此处的寺庙和尖塔建造得美轮美奂，许多都

是精美的艺术典范，品味高尚，涂着鲜艳的色彩。中国统治者指定，每年“寿星”的生辰，君主要到这些寺庙里向中国宗教家认为统治人类命运的众神祇跪拜和祭献。站在这个花园的小山坡上往下看，富丽堂皇的寺庙和周围一带的景色浑然一体，形成一幅最为完美的画面。一群群古雅别致、富有品味的建筑物坐落在一起，围墙外面西南方向有一个大湖泊，湖中央伫立着一座寺庙，一条大理石拱形桥通往寺庙。一片平坦的原野往南延伸，平原上点缀着零星的树木和村庄。右边是层峦叠嶂的小山，北京的塔楼在远处隐约可见。

沿这条铺砌的道路继续行走——这条曾经只供皇帝专用的御道，此刻却间或堆着沙子和石头等障碍物以阻止马车通行——你会路过一个叫“青龙桥”的村庄，村名来源于村里的一座小石桥，此桥建在连接万寿园的人工水域和白河支流的一条小溪上。石桥经过道路向左蜿蜒而去，然后优雅地拐弯连接着下一个花园——金明园。这座花园里有两座小山，被一面高墙围绕，位于最南面的那座小山山顶上立着一座石砌的高塔，可从塔内螺旋形的楼梯登上塔顶，塔楼的每一层有瞭望孔，光线透过这些孔射在壁龛内的小神像上。这座高塔名叫“雅青塔”，塔楼高耸，在很远处便能看见，因此形成一个明显的地标。所以，摧毁它将会更引人注目，但是将军被它简洁的美丽打动，便将其作为一件艺术品保留下来了。最北面的小山顶上建了一座尖顶喇嘛寺，穿过仿真岩石建造的隧道可以进入寺庙，隧道的内壁上都雕刻着令人惊叹的浅浮雕和佛像。然而，寺庙却被人遗弃了，成了一片废墟。进入这些花园的正门朝南，门口的马路都被拓宽成一个户外庭院。在这个区域里，有几个会客厅里设了御座，其中有一个带沐浴房的小湖泊，雕龙画凤的平底船，品味高雅的小尖塔，凯旋门以及几座漂亮的寺庙，但是整个地方都

被人冷落，大部分的房间好像只是用作仓库，储藏被抛弃的服装和过时的文件，皇帝一定很少来这里。从整个花园来看，中国人的习惯似乎就是把皇帝可能会看见的地方收拾整齐，而其他地方，如那些小桥或其他建筑物，花费了那么多心血建起来却对它们不闻不问，任其腐烂。那些供应人工湖泊的水道都被泥土堵塞，原本是一个漂亮的湖泊因无人打理，变成了一个被灯芯草和水草覆盖的山泉。

一座雄伟的喇嘛寺伫立在花园假山的西面，黄色的琉璃瓦顶上立着巨大的佛像。有人在寺庙后面的房间里发现了几个大箱子，里面装着珍贵的古籍画像。站在花园的小山上，可以越过峰峦起伏的群山，看见约三英里以外的地方另有一群气势宏伟的建筑物隐没在树林中间。建筑物四周被一堵蜿蜒曲折的高墙围着，这堵墙一直沿着群山的正面延伸，山顶围了一圈后又下到平原。这就是所谓的香山，就是皇帝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花园。一条平坦、坚硬的石铺路直通香山正门，但是抵达围墙之前要路过石铺路两旁的几个大村庄，村庄建设得整齐划一，村里住着皇家八旗军队中满洲士兵的家属。这些村庄附近是白旗兵的阅兵场，一个四面高墙围着的封闭式操场，占地面积大约两英亩。旗兵在此练习骑术，并且检阅他们的军事发展状况。住在这些军舍的居民非常惊恐，担心接下来就要烧毁他们的住处，于是竭力取悦我们。女人和孩子手里拿着茶壶和茶杯站在家门口，希望士兵们能喝点水休息休息，而其他则端着点心盘子走来走去。香山花园的设计要比先前参观的另外三个花园更为完美。石头台阶连成的楼梯从一个宫殿通往另一个宫殿，花园里有田园式凉亭，树阴下的凉亭，风景优美的露台，这一切让此处显得非常独特，是一个具有独特魅力的去处。一群小鹿跑上假山，停在一座假山上，用好奇而专注的目光凝视着闯入者。许多人在这里

找到大量稀有而珍贵的珐琅和铜器，价值连城。不过，大部分珍贵的东西都庞大笨重，最后它们只有被毁掉，因为没有人能把它们拿走。

一天时间不足以完成摧毁圆明园的行动，部队当晚必须就地宿营，准备第二天完成任务。我两天都在那里值班，所以有机会粗略地看看上文简短描写的几个地方。但是，我承认，我感到——所有人肯定都有这样的感觉——任何描述的文字都无法帮助读者去想象我亲自目睹——哪怕只是匆匆一瞥——的景象。

19日太阳落山之前，每个地方都被烧毁了，士兵们回到营地。我们在最后一批离开的行列，一处处熊熊燃烧的大火和一堆堆瓦砾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大火已经殃及附近众多的农民房屋。我们走出圆明园的大宫门，兴奋中带着一丝哀伤，回首望去，只见飞舞跳跃的火苗像一个个奇异的花环，点燃并吞噬了一扇扇大门。与此同时，一股巨大的黑色烟柱从大宫门坍塌下来的屋顶处直冲云霄，清晰地衬托出这幅火焰构成的生动画面，火舌呼啸，噼啪作响，仿佛在毁灭中歌唱。“下地狱”是人类必须汲取的严酷道德定律。虽然我们对如此华美的建筑被残忍地摧毁而深感痛心，但同时我们又情不自禁地暗自高兴，因为此举击中了中国人的要害。杀害我们可怜同胞的刽子手和幕后怂恿者，已经受到了我们的惩罚。

第13章

前进，尊贵的主人，
打着你的横幅，
进入我们的城市。

——《雅典的泰门》

哎，可是形势已经改变。

* * * * *

不知如何利用大使的你
怎能统治王国？

——《亨利六世·第三幕》

额尔金勋爵致恭亲王的信——进攻北京的准备——中国叛军的靠近——城墙周围的侦察——签订条约——通州——奇怪的捕鱼方式——北京之描述——“天坛和地坛”——喇嘛寺——“转经筒”——中国的宗教——北京城的交通工具——中国的单峰骆驼——放鹰狩猎——资源与出产——耕作——北京居民的贫穷——被忽略的教育

此时，通过烧毁皇帝的豪华的皇宫，对人质所犯的罪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得到了补偿，但英方代表幸存的受害者和被杀害的同胞向中国政府要求的赔偿金尚未得到支付。因此，额尔金勋爵写信给恭亲王，通知他“20日上午10点以前，亲王必须以书面通知落款者，英国受虐待者或被谋杀者所要求的赔偿金必须在22日准备好，而且亲王应作好签订条约的准备，并在23日交换《天津条约》，否则落款者将号召英军司令去占领北京的皇宫，并且采取落款者认为比较适合的其他类似措施迫使中国政府同意大英帝国所提的一切要求。不过，他认为应该让恭亲王知道，倘若中国政府拒不服从而迫使他采取这种措施，他将任命自己为英国皇家海军司令以及陆军司令。他必须提醒恭亲王，虽然广州已被联军占领，但是广州征收的关税仍归清政府所有。正是长期驻扎在上海的联军军事力量，才使那个城市未落入叛军之手。联军舰队虽然控制着海域与河道，但是向北京运输粮食和物资的船只一直畅通无阻。

“倘若不能立即签订和约，这种状态将会结束，落款人将与大英皇家海军司令调整措施，迫使中国政府赔偿因其背信弃义导致大英帝国政府蒙受的损失。”

由于担心中国政府可能再一次临时推诿或反悔，将军已经作好一切准备，进攻北京城内的皇宫。大炮已经从我们占领的那个城门运到下一个城门——德胜门，准备从那里向北京城开炮。士兵们已经了解详细的进攻计划，这时又下达了撤销进攻的命令。额尔金勋爵的通牒已经得到了满意的答复。20日，早上7点，勋爵收到来自恭亲王的复函，声称答应勋爵所提的一切条件。据说，俄国公使向中国政府指出继续与如此强大的敌人对抗是愚蠢之举，因而在促使中国政府让步中助了一臂之力。此外，京城里的两个天主教神甫也

进行了劝说，不久后，皇帝封他俩为六品文官作为报酬，但他们明智地拒绝了。

在恭亲王对最后通牒作出答复之前，我们从俄国人那里打听到起义军已经向京城推进，而且离京城只有一百英里。起初，我们以为他们是太平起义军，纳闷他们怎么这么快就从南京赶到这里来，而且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因为，倘若清政府继续坚持，那么这件事将不可改变地推翻清王朝。后来我们才了解，那些起义军只是山西的几个造反者，他们趁此危急时刻扩充他的抢劫范围。不过，他们接近京城毫无疑问促使清政府企图尽快解决与我们的争端，以便更好地集中精力镇压叛军，以免将来带来同样可怕的麻烦。我们还听说，僧格林沁正准备阻止他们继续向京城挺进。

倘若中国政府坚持不肯让步，联军也将出现无法预料的困难，很有可能让我们无法实现攻打皇宫的诺言。法军似乎已经确定他们的最后期限是 23 日，他们声称，在最后期限之前，法军不会参与任何攻打北京城的行动。不过，还好清政府作出了让步，因此任何潜在的困难都迎刃而解了。

冬天很快就来了，枯萎的树叶一天天凋零，每天早晨地上都是大霜冻，半圆形的山脊覆盖着优美的白雪。尽管，每天太阳照样从晴朗、明净的天空升起，但照在人身上的阳光丝毫没有暖意，寒冷的空气开始侵袭中国南方人和印度马匹。因此，得知即将签订和约并可以尽早结束贫乏的营地生活，大家都欢呼雀跃。

尽管清政府无条件让步，但我们对中国政府的诚意毫无信心。俄国人提醒我们，要当心清政府再次对我们使诈，因为他们怀疑有诈。为了证明这点，他们说，倘若清政府使诈成功，僧格林沁就会在我们军营附近兴风作浪。尽管我们一再质问，还是没有打听到清兵逃往了哪里，因此说他们就在附近让我们非常惊讶。据说，他们

就在北京西城墙附近。22日，普罗宾和费恩受命带着部队前去西城墙勘察，试图核实有关清兵营地的更多细节。锡克骑兵在城墙西面的转角处拐弯，路过第一道城门，在那里遇见一个清廷哨兵，哨兵一见他们立即逃跑。我们的骑兵两个两个沿着一条长胡同前进，突然发现他们进了清兵营地。清兵见到他们立即聚集在一起排成一排，我们的非正规军被这突如其来的邂逅吓懵了，亮出了一面免战白旗，所以清兵没有动武。清兵军官走上前来，问他们想干什么，他说这些人只是京城的守卫部队，最近刚接到命令在城外驻营，而且僧格林沁不在这个营地。这个军营占了一块很大的空地，似乎里面住着一支大部队。锡克骑兵要求那位军官回英国军营走一趟，他毫不犹豫地跟他们走了，一支清军骑兵也在他们后面远远地跟着。恭亲王回到京城后似乎就住在这个军营附近，但听说我们的骑兵正在接近军营，他就逃到五英里外的一个地方去了。意外发现敌人的军队离我们这么近，大家都非常惊讶，这让我们怀疑恭亲王在复函中声称和谈欲望的诚实性。不过，大家都认为，事态正朝令人满意的结果发展，联军不可能仅因为一个怀疑就新生事端。不过，这件事让将军更加慎重，促使他每考虑一步都要预先采取措施避免敌人再次使诈得逞。

关于赔偿金，恭亲王兑现了他的承诺，在指定日期（23日）将全部赔款付清。法方规定那天签订他们的和约，但由于一些必要的文件没有准备齐全，所以推迟了此事。

英方指定24日为换约和签订新条约的日期，用于签约仪式的大厅选在礼部——朝廷六部之一。巴夏礼和威妥玛两位领事负责安排接待特使的房间，并解决一些礼节问题。由于担心敌人会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沃尔斯利上校和其他几个军官陪同两位领事仔细检查了选定的地点周围。

在指定的当天下午3点，陪同额尔金勋爵前往签约大厅的队伍进入安定门。一支骑兵先遣队在前面开路，紧随其后的是不同步兵团的先遣部队，另外还有两个团的乐队，他们一路上交替演奏。跟在乐队后面的是步行的各级军官，而军官后面则是骑马的军官（那些被优先选择的可以指挥部队的人），紧接着便是将军和他的参谋。额尔金勋爵坐在绿色轿子上，由16名身着红色制服的苦力抬着，他的两个参谋官骑着马走在轿子两旁，后面跟着更多的步兵和骑兵。队伍进入城门时，驻扎在城门左边的法国卫兵站出来行礼，开始演奏《上帝拯救女王》。主干道的两旁都站着英国步兵，大约有两千人左右，队伍走过时他们便跟在队伍的后面，形成了一支八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走进京城。主干道中间，有一条高出地面的泥巴路，大约二十英尺宽。这条道路的两旁集结着许多中国人，在城门附近的人群中，我们看见几个俄国使团的成员，骑在他们的小马上观望。这条马路上满是车辙，只有一小段由分散在道路两旁的喷水器洒水，因此队伍经过时，扬起的尘土像乌云一般使天空昏暗，让人看不清几码之外的景色。我们沿着这条路朝正南方向走了大约三英里，来到南墙（又叫中华墙），到那里后我们向右急拐弯，经过围绕皇帝宫殿的黄顶围墙，又拐了一个弯，才来到把守礼部大厅入口那个破旧的大门前。在这个大门上方悬挂着两个赫然大字：“礼部”。走进大门是一个大庭院，签约队伍一进门便分成左右两排站在院子里，留出一条通道让额尔金勋爵的轿子通过。院子的左边是中国人的仆从和坐骑，右边是英国人的。恭亲王和许多官员已经在位于庭院另一端的大厅里恭候。勋爵大人沿通道走上前去时，士兵们展示武器，乐队奏响国歌向他行礼。勋爵走到大厅的另一端，在为他准备的上座就座，一边示意恭亲王在右边的一个下座坐下，那个座位离他的大约十五英尺。两个人的前面各摆着一张桌子，桌子

上铺着华丽的红桌布。霍普·格兰特爵士坐在额尔金勋爵的左边，大厅左边一排桌子的后面坐着或站着出席签约仪式的其他英国军官。右边，同样一排桌子的后面则排列着清王朝的亲王及各种头衔的官员。特使随员及翻译官则站在两位最高代表中间的一张桌子旁，桌子上放着公文箱、纸及其他文书用品。恭亲王身旁侍立着恒祺和另外两位官员。

两位特使各自展示其全权后，开始签订条约。此次条约通过了在天津条约中未通过的两项条款，一条是苦力移民合法化，另一条是向大英帝国割让香港对面的九龙半岛——此地先前是从广州总督手里租来的，本书第一章有所提及。签订条约后，就是交换《天津条约》。交换条约的整个过程只花了一分钟，两位全权特使在一分钟内在两个副本上签字画押，一份交给额尔金勋爵，另一份交给恭亲王。

当时，场面非常有趣，在一个巨大的东方帝国的首都，在她所有王公贵族相聚一堂的场合下，未表现出任何大家可能期待的那种富丽堂皇。这个古老的大厅是北京一千多所公共建筑物里年久失修的一幢，未装天花板的屋顶上悬挂的挂毯价格便宜而且已经褪色。中国王公贵族本身的穿着也十分肮脏而邋遢。不过，可能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这么糟糕，只是路途上的灰尘掩盖了他们锦衣华服上的光彩。这尘土当然也不会让我方各位出席者的外表好看到哪里去。恭亲王，是一个年仅二十三岁、脸色苍白的年轻人，长脸蛋，不蓄胡须，整个签约过程中他都是一副胆怯而阴沉的样子，回答翻译官的提问时，非常急躁。他穿着一件紫色的缎面长袍，披着一个圆领，圆领的肩部及胸前背后都绣有龙的图案。头上戴着一顶冬天的官帽，但官帽上的顶珠是用红丝带结成的，而不像其他官员头上的各种矿石顶珠。脖子上戴着一串雕花朝珠项链，袍子的下半部分是黄

色的，脚上蹬着一双绣花官靴。毕托先生企图拍下这个场景，但是信号出现故障。恭亲王曾提议签约后举办宴席，但被我方婉拒，因为害怕中国人在食物里投毒使诈。事情一结束，额尔金勋爵就像先前一样在队伍的陪同下离开现场，架在安定门的大炮鸣响，向世界宣布中国与大英帝国达成了和谈协议。

法国人第二天交换了条约，据说恭亲王的精神要比前一天好得多。法国人接受了签约后举行宴席的提议，他们那天的气氛要比我们那天更愉快。

条约签订好的第二天，额尔金勋爵下榻在位于一大片小房子当中的满人镇，据称那是怡亲王宫，离东北城门不远，皇家军团护卫陪同他。

同一天，我受命前往通州协助迪武上尉安排船只，把重型行李运往天津，恰巧齐尔先生和一名法国军官也要去那里，因此我趁此机会与他们结伴同行。通常，行李兵来往的路程有十四英里。我们的补给站建在这两个地方的中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歇脚处。补给站是个经过精心挑选的地方，四周树木环绕，而法军在通州附近的八里桥有一个小驿站或是“岗哨亭”。

通州是个大镇，由新城和老城组成，一堵 35 英尺高的厚围墙将整个城镇围起来。一条从白河分流出来的小溪流经此镇，因此好几处都架有桥梁，但是镇上没有一个地方值得第二次游览。房屋又小又脏，而且破旧不堪，寺庙也都是二流的。海军陆战队驻扎在北城墙外面的郊区，即在白河的支流两岸。小溪的两岸呈现出一幅繁忙而有趣的画面。成百上千条大平底驳船并排停在水面上，所有船只都编了号，做好标记。有些船上装满了辎重马车从前线运来的重型行李，而有的则正在卸载行李重新装上马车。穿着蓝色夹克的海军在迪武上尉的指挥下负责这种水路运输，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

这附近的河岸上还开设了一个物资丰富的集市。这个郊区的后面静静地流淌着一条运河，运河两岸长满了灯芯草，河水蜿蜒流经北城墙，在运河岸上竖立着通州最美丽的风景线——一座十二层、约一百五十英尺高的尖塔。在这个郊区，最令人讨厌的就是乞丐，他们光着膀子走在巷道或躺在房屋门口，身上携带着各种各样令人恶心的疾病。

我客居在海军陆战队营地期间，特拉伍兹上校对我非常关心。我很开心，可以通过我的语言以某种方式报答他的好心。这个镇上的地方官前来投诉几个不知名的士兵，说他们从南门走到镇上，闯进一户人家抢劫，杀死一个人，打伤了好几个。上校知道，肯定不是他的人干的，因为他们被严格管教。经过询问，那个中国人指出他们是一些穿着红色裤子、戴着红帽子的士兵。因此，这件事闹到了负责岗哨处的法军司令处，结果证明，掠夺者是几个从河西务去八里桥岗哨处的法国士兵。

返回京城之前，我和迪武上尉骑马经过通州城的一座小桥，沿着河的对岸走到两英里外与运河交汇处。在这条浅河的一段河道里，有几个渔夫正忙着从溪里打鱼，由于他们捕鱼的方式非常独特，所以在这里简要描述一下。一个柳条编制的栅栏以锯齿形状横在河中间，形成一个用两个角围成的开口漩涡，栅栏的每个角上放着一个大篮子，篮子的形状跟我们在家捉龙虾的篮子差不多。然后，渔夫们脱光衣服，拖着一个又大又重的滤网从河道上游一个地方往栅栏方向横着走。各执渔网一端的渔夫走到柳条栅栏围起来的角落附近相会。几条大鱼跳出了渔网，但是大多数从网孔里逃出来的鱼都落到挂在两个角落的篮子里了。

通州下面，在白河两条支流交汇处设有一个双向渡口，来来往往的人群让镇上的交通非常繁忙。我们走近渡口，群众似乎非常害

怕，牵着他们的牲口、马匹和山羊急忙跑走，好像我们会强行占有那些东西。为了建立良好的感情，我们简单地跟大家交流了几句之后就回去了。5点钟后，我陪同迪武上尉一起去了北京的军营。

沃尔斯利上校和哈里森中尉很不幸，还没完成对北京的勘察就受命到通州去指挥行李的转运，因此我们的部门解散了。

京城现在开放了，军官们可以到城里去闲逛，他们想去哪里都可以，但是皇宫附近的区域除外。不过，首先为了安全起见，军队有令，凡进城参观的人一次不得少于三个，而且应全副武装。

北京古城，顺天府的中心，中国的大都市，一直以来被耶稣会的传教士及其他外国人描述得天花乱坠，结果它只是一个非常乏味的地方。太多的细节描写一定会让读者失去耐心，因此我们只记录一些在城内看到的景点。五个世纪以前，著名的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游览了这个极其古老的城市，他将这个地方称作“汗八里”，当时还在伟大的蒙古君主大汗忽必烈的统治时期。他对城里一些地方的描述那么真实，经过漫长的岁月流逝，那些东西竟然一直保存完好，真是太奇妙了。他对忽必烈宫殿的描述也适合今日君主的居所，至少一眼看上去是如此。他真实地告诉我们，“宫殿屋顶的外表涂着红、蓝、绿以及其他颜色的油漆，透亮得跟水晶一般，从远处一眼就可以看见”。不过，有些建筑物年久失修。此外，马可记述的那个“大湖泊”已经不存在了，如今成了一块水草生长的“温床”。朝南的大门及大理石铺砌的道路和大理石狮子和柱子都刻上了岁月的痕迹，变成了棕色，长满了苔藓。在忽必烈建造的御花园中，人造假山仍然赫然伫立，假山顶上有一座宝塔，这座宝塔立即吸引了陌生人的眼球，因为城内都是一排排的矮房子。沿着东面Kefa门延伸出来的大马路走，经过怡亲王宫（额尔金勋爵的临时住所），再穿过八道拱门，朝安定门方向延伸出来的主干道去，你会

看见一座令人赏心悦目树林茂密的小山——小山独自矗立在皇宫高墙内闪闪发亮的屋顶和茂密的树林中间。让我们听听马可·波罗如何描述这座小山：“……往北去，离皇宫大约箭步之遥，忽必烈堆了一个土墩，高约百步，周长约一英里，土墩上种满了四季常青的树木。只要他听说某种漂亮的树，就会叫人连根带周围的土一起把树挖起来，然后用大象运到他的宫殿里，因此这座山丘从头到尾都成了翠绿的，因此得名为绿山。山顶上有一座宫殿，也被绿色植物覆盖。这座宫殿和树木都非常可爱，令所有抬头观看它们的人都感到心旷神怡。”

大家都知道，北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北城或满人城区和南面的一大片郊区。北城被一座高耸的巨大直角形围墙围着，城内有巨大而壮丽的方形角塔楼以及九道城门。南郊是后来扩展围墙时添加进去的，被称为汉人城区。这座古城的南墙上有三道大门，也被分成两部分。城墙外的郊区很小，而且主要限制在城门附近的范围内，京城周围一带人烟稀少。城里两个部分的主干道都非常宽敞，大部分都是南北走向或东西走向的笔直大道。但是，中间的街道狭窄而曲折。所有的街道路面都不平坦，满是车辙，天晴路上是令人讨厌的尘土飞扬，下雨则是可怕的烂泥。在满人城区的中心，有一块用围墙围起来的四方形区域，那是划分给王公贵族居住的地方。在这个区域里划出另一块封闭的地方供皇室使用。在古代，满人城区只能由旗人使用，但是现在种族差异很小。京城被划分成不同的区或片，指定给蒙古族人、满族人、汉人和回民。每个区有它们自己的治安官负责它们这几个区的治安问题。官员下来视察的时候，必须用鞭子来维持民众秩序。满人城区的大部分房子都是民宅，但是主干道两旁都是店铺。

然而，城里繁忙的部分是汉人城区，军官们都挤到那里去买珍

稀古玩。通往汉人城区的中门右边有一条小街，街上有几家上等的古玩商店。大家都拥挤到那条街上，结果店铺里拥挤得令人难以忍受。军队里所有人都想在这个伟大的中国城市买一点纪念品回去。因此，我们待在北京期间，出售大帝国生产的各种珍稀古玩的那六七家商店生意非常兴隆。中国人对我们非常友好，而且总说他们非常遗憾“我们的陛下”很快就要离开。他们曾经希望，我们会占领这个城市，成为这里的主人。在南面中间那道门前面，是通往皇宫的大门，有一条铺砌的道路沿着大门一直从皇宫延伸到宽阔的中央大道，这条大道将汉人城区一分为二。大道两边都是商店和摊铺，当地老百姓都前拥后挤地在街上，忙着买各种东西。

我们从这个大门往南骑了大约一英里半的路，没再看见商店、房屋以及忙碌的人群，这一切都消失了。道路继续向前延伸，但道路的两旁都是荒地。我们在一种相对孤独的气氛中继续前行，后面跟着几个衣衫褴褛的小男孩，他们为了一点赏钱跟着我们，替我们牵马。中华墙的中南门映入眼帘，道路两旁各有一大片用围墙围住的地方。左边是天坛，右边是地坛。只有皇帝和他的高官们才能踏入这两个圣地，其他任何人都无权进入。即使是胜利的联军起初都很难获准入内，但是经过我们一再坚持，最后终于打破惯例获准入内。因此凡是在场的人都被允许入内。我们从一道边门走进第一个圈地“天坛”的一座废弃的大花园。天坛里的草都已枯萎，树木大部分都已落叶，所以这里看起来非常荒凉。天坛的大门和墙顶都盖着绿色的琉璃瓦。几棵雪松下的一条车行道通往一块小的封闭地，这块地上有几座建筑物——其中包括一个休息大厅——中间有一个圆锥形的建筑物，顶上盖着紫色的琉璃瓦，并放了一个金色的球。这个小塔楼建在一个宽敞的圆形大理石露台上，露台在下面又被分成另外两个窄一点的露台，向台阶一样直接通到地面。朝南的台

阶，正中间的每一级上都被一块大石碑分开，石碑表面雕刻着龙凤的图案。天神就是从这块石碑上降落到寺庙的。右边的一级级台阶是专供皇帝使用的，而左边的台阶是供陪同皇帝的大臣使用的。寺庙的三个入口以同样的方式建造，正中间的大门是供神灵进入，而两边的边门分别由皇帝和大臣使用。寺庙的地板上铺着黑色的大理石，正中间通道上，一块凸起的平台是白色大理石铺成的，平台有台阶通下来。平台后面放着一个黑色的宝座，据说天神就庄严地坐在那里。宝座前面立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香炉，香炉前面则放着一个大大的供品台。寺庙的右边有四个宝座，左面也有四个，每个宝座前都设有香炉。这些宝座是为当朝已经仙逝的八位君主设立的。

大年初一那天，皇帝坐着他的十六人抬的黄色大轿，后面跟着一班挑选出来的随从，沿着那条铺砌的道路从皇宫前往寺庙，场面非常壮观。队伍经过时，沿途的百姓都要温顺地下跪，低垂着眼睛。皇帝走上右边的台阶，从右边的门进入寺庙，另外两扇门敞开着，让天神和地上的受宠幸者进入。每个祭坛都烟雾缭绕，一头被宰杀的小公牛放在祭品台上当供品。天子上香后，往后退，下了台阶，匍匐在地，磕了九个头，承认存在一位比他更大者。这种仪式每年举行一次。感恩祭拜结束后，小公牛祭品被拿到外面在一个铁栅栏的枯井上面烧毁，被烧毁的灰烬落入枯井里。随后，被挑选的那帮随从都退到宴会厅，那里为皇帝和大臣准备了点心，取悦皇帝的心。宴会结束后，队伍又浩浩荡荡地返回宫中。

这个地方无人照看，大理石的露台上长满了野草，尘埃布满了天坛寺。但是，我们的向导不怕麻烦地向我们保证，在新年到来之前，一切都会收拾得整整齐齐。

随后，我们穿过马路，从另一扇边门进入地坛。这里也有一个

废弃的大花园，花园里有几棵树零星地立在四周，花园的左边是一个面积更小的、用围墙围起来的圈地，圈地上有些建筑物，大部分都年久失修。在这个地方的中央竖立着一块方形的大理石露台，高出地面五英尺左右，四面都有台阶。露台前面有一块地，被皇家的犁耕了一年又一年。公园的右边，在一些树丛中，有另一个大理石露台，露台前设有香炉，后面是休息厅。清明节期间，即阴历的第三个月，皇帝会驾临此地。祭台上烟雾缭绕，皇帝走上前去用他的御手“扶住那把用旧了的犁，贡献出他的肩膀，开始劳作”。然后，在场的人用喇叭和欢呼声向世界宣布皇帝的这一壮举。据说，皇帝要犁三分之一亩地。之后，他从中间的露台走下来，在一个专门为他准备好的宝座上坐下来，注视王子们的耕作，因为他们每个人也都要耕同样面积的地。这种农家乐结束后，皇室的人便有说有笑地到宴会厅庆祝，随后便离开这里回到皇宫。“然后，播种者走在翻好的土壤上，将种子自由地播撒在土地忠实的心窝，再用耙把种子盖起来，结束了这一幕。”通常，种在这里的是小麦和玉米，而这块面积不大的土地上出产的作物都储存在皇家粮仓里。

作为一座漂亮的两层建筑，孔庙值得一提，但是风格上与在南方城市所见的那些悬挂着崇尚博爱精神的牌匾的孔庙差不多。

我们一定不能忽略中华墙第三道门附近，由耶稣会传教士建造的罗马天主教大教堂。这座建筑物已经被废弃很长时间，因为北京城内禁止举行天主教弥撒礼仪，教堂顶上的十字架也不见了。居住在京城的两位神甫也都打扮成中国人的模样，在法国的施压下，这座教堂恢复使用，教堂顶上重新竖立了一个十字架。这个地方完全整修好之后，联军的军官都被邀请去参加那里的第一台弥撒。带着对万能的造物主感激的崇拜之情，感恩赞美诗再一次在这个被长期废弃的教堂里吟诵。

北京大约有三百万人口，但从宽敞的街道、被废弃的房屋、满人城区和汉人城区里大片荒废的地方来看，我们大胆地估计，这里的实际人口不会超过一百万。

俄国使团住在满人城区的一个小屋子里，位于两个小镇分界线的附近。一个哥萨克哨兵穿着灰色的大衣，戴着皮毛帽子，在门口站岗。

离北城墙和东城墙约两英里的地方有一道长长的护堤，三十英尺高，与城墙平行，护堤偶尔被通过的大路截断。这个防御工事如今已杂草丛生，第一眼看上去就像是大自然的杰作，但传统上将这个护堤作为几个世纪以前汉人征服蒙古族的边界标记。据说，京城北面的那条道路可以通到位于四十英里以外的长城，但是我们谁也没走到那么远去看一眼长城。

朝北的两个大门之间的城墙外是清兵的大阅兵场，占地面积约两平方英里。在这个阅兵场外面，并排地建着一排排的喇嘛寺，寺庙黄色的琉璃瓦顶在高大的树木中间闪闪发亮，非常醒目。僧格林沁最近刚占用了其中的一座寺庙，但那座寺庙如今有幸成为法国领事馆的总部。与这座寺庙毗邻的寺庙是最大最漂亮的一座，里面有色彩鲜艳的大佛像，以及满是瓷瓶和漂亮的珐琅镶嵌饰品的神殿。我们刚到这里时，将军认为有必要在这个寺庙安置一个卫兵以保护里面的贵重物品不被盗窃，但后来这个地方分配给辎重队作营地，卫兵撤走了，同时所有值钱的东西也都被拿走了。这座寺庙是皇帝为西藏的精神领袖班禅喇嘛建造的，寺庙的一个花园里竖着一块约三十英尺高的纯白色大理石纪念碑，碑顶镀金，碑身都是浅浮雕，这块石碑是以 Ka-tang 或 Pan-ching-fay 的名义献给这位精神领袖的。那真是一件巧夺天工的手工艺品，总司令一直派卫兵守卫这块纪念碑才使其不像周围其他东西一样惨遭厄运，将军这一举动值得

称赞。位于花园的上面有一条长廊，长廊里面有一排涂着蓝绿色的雕像。男性雕像的头都是可怕的九头怪蛇，歌颂对大自然伟大的男性和女性法则的热爱。通常是一些不能生育的女人才信仰这些笨拙和粗疏的神像，她们定期来寺庙里祈求这些邪神赐给她们子嗣。寺庙的另一个部分是专门供班禅喇嘛打发到朝廷来面见皇上的特使居住的地方。隔壁的寺庙要小得多，是专门用于接待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使节团，这座寺庙的喇嘛全部都留在里面，大部分喇嘛都是藏民，几乎不懂一句汉文。他们的服装就是一件黄色的袍子，腰上束着一根红色腰带。他们的头饰是一顶帽子，帽檐上覆盖着羽毛，黄色的帽冠，上面有一个用红丝线拧成的节。他们的头都剃得光光的，身上有一股很浓、很难闻的气味，跟羊身上的味道一样。汉人认为那是因为他们每天吃大量的羊肉造成的。另一个寺庙也摆放一些难看的大佛像作装饰，另外还有从屋顶上悬垂下来的染色布料，屋顶上覆盖着被剥掉皮的人体牺牲品的头骨和人皮。然而，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摆放在房间四周的祈祷箱，他们把那称作“嘛呢”，人们小心地把用藏文写的经卷卷起来放在盒子里面，盒子绕着一根枢轴转动。信徒们转动盒子，每转一圈就重复一遍咒语。信徒们认为，每次旋转盒子，里面的经文就奉献给了神。小盒子里同样塞着经文，绕着枢轴旋转，枢轴加长留出一个把手让信徒们握住。盒子的四周从里到外都写着咒语，盒子上系着一根绳子，绳子上系着一个砝码，以增加力量促使经筒转动。按照寺庙里的和尚教给我的，那经文听起来是这样的：“唵嘛呢叭咪吽”，是对主管“天、地、人、伤、火和苦”等神祇的一种祈祷。

有人告诉我，每尊佛像里面都塞入了类似的经文，我们检查了一些小佛像，发现果真如此。佛像竖立的金属底座里都塞入了一些卷起来的小纸片，纸片上写着藏文，每一块纸片都单独卷起来并用

红丝线绑着，而所有卷起来的小纸片都用一块有香味的黄色丝绸小心地遮起来。

大多数喇嘛寺都建在城外，而且大部分都规模宏大，要比用于供奉中国本土三种宗教的场所精美得多。慷慨地资助喇嘛教并且允许他们在京城附近建造宏伟的大寺庙，这似乎是中国帝王的一贯政策，为了更好地控制西藏一带的领土，佛祖的化身在这个地方找到他的温床。

穆罕默德教(伊斯兰教)在京城也有牢固的根基，而且其信徒数量绝对不在少数。他们的清真寺——尽管不如喇嘛庙那么宏伟——到处可见，有一些甚至建在城墙里面。前面我已经提过，这位先知在天朝的信徒，与穆斯林锡克骑兵之间存在兄弟情。要区分他们，常见的办法就是伸出右手，迅速握紧拳头，只有拇指明显地竖着。不过，任何一个希望表达诚心的当地人也都会做出类似的手势。他会指着天，指着地，然后指着自己的心，最后竖起大拇指结束这个手势。意思就是说，他呼求天地见证他的诚实之心。军官们声称，这些相互信任和诚实的标记是肯定地证明了团结友爱的美德早就存在中国的文化中。

在帝国忠诚的国民中，大多数都认为有责任承认已经在中国确立了的三种宗教，即孔教、道教和佛教，因此在这个大都市的城内城外都建立了许多供奉这些宗教的寺庙。但是，凭我的经验来看，物质化的中国大众对这三种宗教的相对区别认识相当模糊。大多数人全部敬拜。我经常看见书上的一些人物，他们自己是坚定的孔教信奉者，但也在佛教徒供奉的木头或石头雕刻的偶像前面烧香敬拜。此外，一个农民或水手，他日夜向主管他的阶层的神——被具体化并涂抹着粗俗色彩的神像——吟诵祷文，但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到孔子墓碑前跪拜，认为它肯定代表某位神圣的人物，因为比他更聪明、更有学问的人都敬拜这块墓碑。

在北京很少见到轿子，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我在前面描写过的那种没有弹力的小马车。那些高官坐在这些马车里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颠簸。私人的马车座位上都放有靠垫，前面挂有帘子，恭亲王自己也乘坐这种马车出访。我们经常看见穿戴整齐的官员，跷着二郎腿坐在马车里路过，从帘子上一个便于观看的洞里往外窥视。在这种场合下，通常与南方一样，都没有敲锣打鼓的随从人员跟着他们。只有皇上以及职位最高的官员坐马车在这个城市里行走，才能享此殊荣，除马车夫外还有一两个骑马的随从跟在后面。但是，最贫穷的阶层只能使用独轮手推车。就是那种用两只手推的车，跟我们在家里使用的普通手推车一样，但是后者的车身更大，而且车身在更中间一点的位置。车轮高出两边的车身，给两边的座位形成一个现成的靠背。这种独特的发明既可以用来载人——旅客背靠背地坐在车上——也可以载物。与他们胆小的南方同胞相比，北京人更热衷于骑马，你经常会遇到男人们骑着高大的骡子。不过，他们的马很小，不值得夸耀。

单峰骆驼，尤其是在汉人城区里，排成一条长长的队伍，昂首阔步地朝前走，摇动系在脖子上的驼铃，陌生人见此情景一定会留下深刻印象。所有的骆驼背上都安着驼鞍，驼鞍固定在驼峰上，由一条双层肚带固定，骆驼的鼻子上套着一根环，环上系着牵骆驼的绳子。最前面的骆驼被人牵着，跟在后面驼队里的每头骆驼都系在前一头的尾巴上。它们非常温顺，很少有不规矩的，但是陌生人太靠近它们并不安全。这些畜生一旦受到惊吓或是情绪上来，就会发出一种介于大声尖叫和打喷嚏之间的声音。骆驼是一种任劳任怨的动物，既能忍受北京夏季的酷暑又能承受当地冬季的严寒。夏季，它们身上的毛几乎掉光了，而在冬天它们身上又长起了一层厚厚的毛，仿佛一件大衣。中国人非常珍惜这种动物，因为与轻松背负的

重担相比，它们消耗的食物非常少。我想说的是，它们也可以作为我们国家另一种用来驮重物的动物。在平原地带，他们既经济又实用。

马可·波罗提及的猎鹰是伟大君主大汗忽必烈的娱乐项目之一，如今北京人当中仍有许多人热衷于此类消遣。不过，现在主要是贫苦阶层的一种谋生手段，颓废的王公贵族通常更喜欢待在家里，享受舒适的奢侈生活，而不愿意到野外去从事对健康有益的运动。我经常看见，有人手里拿着戴头巾的猎鹰。红腿猎鹰和灰背隼是用来打猎的主要物种，但也有人训练大秃鹰去抓野兔及更大一点的羽毛类猎物。小猎鹰大多数被放去追捕鹌鹑，在这一带，秋收后的田野里存在大量的鹌鹑。主人通常使用一种带有流苏的兜帽将猎鹰收回，这种兜帽跟荷兰使用的兜帽形状非常相似。起初，用来追捕鹌鹑的猎鹰脚上绑着一根长绳子，绳子的另一端绑在主人的手腕上。一看见老鹰在空中盘旋而来，鹌鹑就非常害怕。老鹰抓住鹌鹑后就被拖回到主人身边，主人会奖赏它一块捕获来的猎物。这是告诉它一捕捉到猎物就要回到主人手腕上。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就可以去掉脚上的绳子，它也可以飞得更远。我怀疑，秃鹰就是马可·波罗提到的忽必烈驯养的鹰。这一带野兔非常多，而且很温顺，因此常常成为这种大老鹰的猎物。这里的野兔如此温顺，以致冬天许多野兔从山上跑下来时会轻易在树桩上撞死，市场上的野兔价格低廉。过度的寒冷把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冻僵了，因而变得相对温顺，所以捕捉野禽的人，使用火药枪或是网，就能轻轻松松捉到许多野禽和美味的鸟类并拿到市场上出售。

这一带的出产非常丰富。与南方人相比这里的人吃更多肉，你经常能见到肉店里挂着上好的、看起来健康的羊肉，每磅只卖 2.5 便士。在顺天府内，老传统禁止屠杀耕牛，但是在附近的地区并没

有这样的法律，因此那些可怜的牲口被拉到邻村屠宰，它们的肉便拿到北京出售。北京的牛肉每磅只要两便士。京城里的饮水大部分从路边的水井里就能取到，水井旁通常放有水槽，是给过路的牲口饮水用的。凡在水槽里饮水的牲口，主人会扔一个铜板（相当于半便士的十分之一）到水里，作为对一旁从井里打水倒满水槽者的酬劳。

煤可以从位于西面约 30 英里之外的 San-Kia-tecn 山上获得，通常是用单峰骆驼运回京城。这种煤是无烟煤，每吨只卖十六先令。买来的煤被碾碎成煤粉，然后与黏土和在一起做成圆的煤球，用于烤火炉，因为这种煤具有产生白热同时又无烟的优点。

用来建房子、盖屋顶和铺地板的砖块在附近的砖窑里大量出产。用从坑里挖出来的黏土做成砖坯，排放在砖窑里面，用火烧上三天。然后，用水将火浇灭，等砖冷却了就可以出窑。

吹制的窗户玻璃及玻璃器具通常都是从广州运过来的。北京使用这种材料作窗户玻璃比南方的城市更为普遍，但是主要限于富人阶层的住所。

松木或冷杉木板是当地造房子主要使用的木材，也可以从不远处的森林里获取，此外那个地方还出产大量的木炭。用来做家具的上好木材通常都是从中国南方或是海峡两岸经由天津运到北京的。

这一带的土地都是开放式的田野，偶尔有一些沟壑围在某一小块土地周围作为界限。冲积的土壤肥沃而多产，老百姓不会让土地休耕时间太长。这一带的主要作物就是高粱，出产的高粱被酿酒厂大量使用，酿造成酒精，此外还用作人和牲口的粮食。这里的播种季节是 3 月，那时冬季的严寒稍事退却。地里铺着草木灰作为肥料，耕种前这些肥料会被翻进土壤。收获季节是 9 月。约八至十英尺高的高粱秆被割断，只留下两三英尺的秆竖在地里。剩下的高粱

秆被晒干，变硬后成了坚硬的木桩，这一带的地表上都是这些东西。棉花和小豆子通常在4月种在一行行高粱之间，直到年末才成熟，等高粱收走后才出产。

此外，这里还种植另外三种粟米作为粮食。

黄玉米3月播种，白玉米5月播种，两种玉米都在9月收割。

高株黄麻3月播种，10月收获。黄麻籽磨成面粉，而黄麻皮则搓成绳子使用。

鸡冠花与黄麻的生长期相同，它的种子用来蒸馍馍。

烟叶3月栽种，6月就能达到一定的高度。当大大的叶子露出即将枯萎的迹象时，就该采摘了。叶子卷起来，串在绳子上晾干，干透后，就可以使用。

蓖麻3月栽种，蓖麻籽7月就开始成熟。蓖麻籽可以榨油，主要用于润滑作用，它的医用特性在这里尚不为人知。

有芒的小麦在春天种在低洼的田野里，像灌溉水稻一样灌溉。另一种小麦在10月播种，经过寒冬的霜冻，在来年的五六月收割。但是，这里出产的小麦不多，主要从山东和其他地方大量购买。

红薯、茄子、花生和荞麦也都是这一带农民种植的作物，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可以榨油或制作扫把的农作物，但其中文名称我不熟悉。

人粪用于种植蔬菜，而田野里主要使用草木灰作肥料。老百姓倾注许多心血种植蔬菜，冬天许多种类的蔬菜以及苹果、梨和葡萄等水果都保存在密封的地窖里。天气好的季节，空气可以通过瞭望孔进入地窖；而在寒冷或是潮湿的季节，地窖都被小心地密封起来。

这里的老百姓与南方人相比，更穷，穿得更寒酸。村落和小镇的人口也相对稀少，尽管这里的居民不喜欢水，却似乎更加适应这

种有益健康的气候。这一带的主要流行疾病就是发烧和肠胃不适，我们的军医认为这两种疾病在英国士兵身上具有顽固而持久的特性。偶尔也会发生霍乱和小范围瘟疫。

教育在这个地区被严重忽视。我敢说，在这一带的老百姓中，最多只有二十分之一的人能够写出自己和村子的名字。

第14章

至今，我一直躺在
你权力的阴影之下，
曾佩带着反对的武器漫步，
徒劳无功地显示我们的忍耐。
如今时间已被挥霍，
忍耐者身上蛰居的强大生命力，
呼喊道，——“够了！”

——《雅典的泰门》

宣布和平——劫掠者——汤普森医生之死——公告——广东苦力——第2师撤退——女王的公使——中国陷入混乱——寒冷季节——剩余部队撤离——军队登船——寒冷加剧——战争结果——中国人的自负——快速传递的消息——我们与中国未来的关系——中国的现状——结语

11月1日，法军动身前往天津，把他们的特使葛罗男爵及其卫兵留在北京。同一天，英国军队从德胜门前的村庄转移到安定

门——法军先前驻扎过的地方。此时，两国已经宣布和平，因此不再需要粮草征收队。但是，一支军队通过许可获得的习惯需要时间和严厉的警告才能彻底根除。宪兵司令需要有极高的警惕性。我们必须称赞那位英勇的军官，他和手下的军士们不断到这一带巡逻，以防有人偷盗。当地百姓自身的警惕性也很高，他们分组到田野里巡逻。这段时间里，来复枪团六名不幸的士兵神秘地失踪了。一天早上，他们没有佩带武器就离开军营，打算到圆明园附近去弄一些珍贵物品，所以很有可能被杀害了。由于他们不顾已颁发的严禁掠夺的禁令，公然出去掠夺，因此没有人去追究他们的下落。清政府官员已经张贴告示，命令私藏皇宫流失的掠夺物品的百姓交出赃物，一经查出将以死罪论处。但是，许多人没有照办。因此，政府对各个村庄进行严格搜查，一经发现私藏皇宫财物者，立即拖出去斩首，而且尸体就丢在路旁任其腐烂。我们走在路上，经常看见腐烂的无头尸被乌鸦和野狗撕碎拖走。安定门郊外的房屋主人开始陆续返回，有些人去请求恭亲王，要求将房屋归还给他们。因此，恭亲王请求将军归还其中的一些房屋，居住在那些房屋里的士兵只得住在营帐里。

11月4日，第2师的P.M.O.，可怜的汤普森医生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在为他哀悼。好几个星期以来，他都在抱怨肝脏有病。他的遗体被隆重地安葬在俄国公墓，与那四位被残忍的中国人杀害的遇难者并排葬在一起。

皇上送来上谕，确认恭亲王签订的所有条约都已按时收到，并于11月6日将布告贴满了京城，向天朝子民公布和平条约。联军认为，最后这个伟大的行动非常重要，所以委托军队的翻译官陪同负责此事的清廷官员，将内容相同的布告贴在这个城市的显眼处。一捆捆的布告准备好，我们一路前进将布告张贴在沿途重要的位

置。如今，额尔金勋爵与恭亲王之间关系更为融洽，双方互访频繁。恭亲王第一次来访时，去掉了先前那种紧张的克制情绪，似乎表现出一点点冷幽默。他还愉快地坐在毕托先生的照相机前拍照，因此我们才得以让读者目睹他那张并不清秀的脸孔。据说，他和皇帝长得非常像。确实，有位军官从圆明园里拿到的一幅给皇帝精心描摹的画像，让我们立刻想起恭亲王的樣子。如此相似，让我们毫不犹豫地认为那根本是恭亲王的画像，但是画像上面一行中文题字表明，那是皇帝的画像。

清政府对联军雇用的广东苦力一直怀有强烈的怨恨，所以抓住一切机会除掉任何一个落伍的苦力。他们尤其反对这帮人入城，甚至在交出城门时竟然将此作为一个条件，不允许这帮人进入城门。联军虽然允诺了，但是根本做不到，因为城门口的哨兵根本无法区分出苦力和当地老百姓。许多广东人偏要违反禁令进城闲逛，他们真应该后悔这么做。有一次，我们恰巧保护了其中一个唯利是图的南方人，让他免遭法律的严厉制裁。那天，我们正陪将军骑马走在街上，听到有人悲伤地大声叫喊“英国的苦力”。我们四处观望，看见一个脏兮兮、瘦弱的中国人被另一个中国人用链子牵着。将军上前去询问事情的原委，结果发现那个用喊叫声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个广东苦力已经被政府关押了十天左右，现在一位军官奉刑部命令前来将他押赴刑场执行死刑。将军下令将二人都带回军营，结果那个苦力是法军雇用的，于是此事便移交给葛罗男爵处理。

第2师在拿皮尔将军的率领下于7日离开北京，往南撤退。军队其余人员准备第二天启程，但是普鲁斯先生的到来将行程推迟到9日。额尔金勋爵认为，在他自己离开之前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将皇家使者引荐给恭亲王。到那时为止，已经没时间去为大英使团在北京寻找一个合适的住所，而且让皇家代表入住由中国政府随便指

定的地方也是有损尊严的。因此，最后决定，引荐和简短寒暄之后，全权特使便离开北京到天津过冬，第二年春天再回北京，并入住他在北京的长期居所。然而，军队离开后，必须有人留下来负责为使团准备一个适合的住所，而且同时确保中国政府的诚信，以及他们今后对居住在北京的英国人的态度。阿德金斯先生被选择留下来负责此事，除了几个中国佣人之外，没有人陪他，他只有独自去面对北京人的粗暴。

北京陷入一片糟糕的混乱局面。我们居住的郊区，滋生了大批的流氓和流浪儿童，他们在附近出售水果和其他东西，但真正的目的却希望能撞见任何偶然掉在他们面前的珍贵物品。

天气越来越冷，早晨的温度已经降到 29 华氏度，地面整天都是厚厚的霜冻。我们被迫住进脏兮兮的、用纸糊窗户的小屋里，开始意识到在这样的温度下生活的痛苦。我们已经尝遍了城里的新鲜劲儿，看遍了凹凸不平、脏兮兮、贫穷的街道上所有的景象，开始觉得很无聊。因此，当 9 日早晨来临时，大家都禁不住欢呼。那一天，剩余部队（包括来复枪团、第 15 旁遮普团、普罗宾和费恩的骑兵团以及巴里的炮兵团）开始启程撤回天津。所有人的行李都必须早上 8 点集中放在城外地坛寺，并从那里直接出发。这样，行李车可以走在几小时后才出发的部队前面。额尔金勋爵及其参谋部在第 99 团、第 75 锡克骑兵团、第 25 旁遮普团及巴里炮兵团的两门阿姆斯特朗大炮的陪同下从北京的东直门出发，沿着那条石铺路向通州方向出发，勋爵再从那里由水路前往天津。与此同时，法军也离开京城。联军留在京城唯一的代表就是阿德金斯先生，虽然有俄国使团的成员同情他，但是他的孤独决不令人羡慕。

我们从军需补给站接走了驻扎在那里的来复枪团的先遣部队，继续前进，通过八里桥，到河的对岸宿营过夜。当我们住在当地的

房子里时，无论多寒冷、多不适，都敌不过这种寒冷的天气里在帐篷下面度过一晚。第二天早上，额尔金勋爵的卫队和驻扎在通州的海军陆战队加入我们的队伍。路过张家湾时，驻扎在那里的一支费恩骑兵团也加入了我们。我们在马头村过夜，总司令从那里坐船赶往天津。第二天，我们行军到河西务，第 31 团仍然占据那个地方。第 15 旁遮普团、费恩骑兵团和巴里炮兵团必须在这里停留几天，等待开往天津的大部队都到了再坐船前往天津。部队其余兵力往前走，两天半之后安全抵达天津。总军需部正忙着遣送部队，不到两周，整个部队全部安然无恙地被遣送。来复枪团、第 67 团和费恩骑兵团都留守天津和大沽要塞，由斯达弗雷旅长负责。关于从大英领事馆借调过来的翻译官，摩根先生独自留下来担任留守部队的翻译，达温珀特先生归入海军纵队——他们接到命令去苗头群岛，离芝罘岛不远。其余几位从陆军和海军服务名单中划除，并且受命自己去向女王陛下的使者报到。

天气日渐变冷，好几天温度都停留在 15 华氏度。河上很快结冰，最后一艘战舰试图过河未果，还差点被堵在河面，只得返回。因此，我得知要重新回到南方的岗位上，一点也不觉得遗憾。总部的参谋部已经完成了他们在天津的任务，已经向大沽前进了。将军打算 29 日启程，提议让我做他的随同翻译，我很高兴又能获准与他随行。

我们在葛沽度过第一晚，第二天下午就到了大沽，在那里我收到了普鲁斯先生转交给海军上将的信，命我乘坐“闪电号”蒸汽船前往香港。那是一个非常寒冷的早晨，空气中笼罩着浓雾，我们离开葛沽，沿着果园中间的道路前往要塞。大自然的外表呈现出一种可爱的现象，在安博罗斯·菲利普斯以下几行诗句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夜晚沉寂的黑暗渐隐，
红润的清晨立即映入眼帘。
大自然的脸戴着丰富的装扮，
照亮我眼前的万物。
一草一木，
甚至一根刺，似乎都是镜中花；
红红的山楂仿佛珍珠和琥珀，
深红色的浆果在冰雪中闪亮。
沼泽湿地里的芦苇，
仿佛战场上磨光的长枪。
枝叶繁茂的橡树、桦树还有挺拔的松树，
在寒冷的阳光中闪闪发亮。
远处阳光中摇曳闪烁的树枝哗啦作响，
惊飞一群小鸟。

战争结束了。这个短暂的事业曾经确实光荣，但是却因一个黑点玷污了美丽的面容而变得悲哀。我军付出沉重代价寻求的目标，如今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胜利。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对自己的利益视而不见，让人践踏在脚下，被一个颓废的政府贴上蛮夷的标签。尽管清政府重视贸易带来的财富，但他们长期以来针对西方国家的政策警惕而吝啬——担心西方文明的进入将侵蚀他们的领土，而这领土就是如今在位的皇族通过欺诈和卑劣的行为侵占而来的——将我们与这个因贪财和热衷于商业行为而臭名昭著的民族进行贸易的权利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哪里允许这样的贸易，哪里就不会失去在中国百姓眼前挫败贸易促进者的机会。这次远征开始了中国对外关

系的新纪元。在当地人看来不可接近、无法攻克的京城已经完全屈服，联军未放一炮，还未进入京城，就迫使老谋深算的皇帝应允了让任何国家都可能为之自豪的条件和特权。

住在南方的中国人，如此肯定我们在北方的征战要以失败告终，所以科顿·基尔特在广州以五万美元为赌注打赌联军拿不下要塞，他们同意将这笔钱暂时存在香港的东方银行作为风险金。奇怪的是，英国商人对我们的当局缺乏信心，不敢占用这笔赌注。几个美国商人却前来支持联军，但是他们将赌注降到一万美元，否则拒绝下注。基尔特先生拒绝这个金额的赌金，说他们只愿意以最初承诺的数字打赌。广东人，无论政界还是商界，都对北方的战争兴趣浓厚。其中，有一家大公司总是密切关注联军的进展。这个公司的领导有一个兄弟在天津附近的一个小镇上，这个兄弟向他汇报了北方发生的所有事情。只要北方发生的事件都会在 12 天内传达到该公司，包含这些消息的信件经由信使传递，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竟然能传到 1300 英里以外的地方去。就这样，许多中国人在消息通过蒸汽船到达香港之前已经知道了联军的许多行动。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的翻译官佩德先生与这家公司的关系很好，所以能够定期从他那里获得第一手的消息。在其他渠道的消息传来之前，他通过广州领事馆将消息传给外事办，进而传给普鲁斯先生。起初，许多人嘲笑他，消息不可能以这种闪电的速度传到广州，但是通过这种方式传来的每则消息都与后来经由蒸汽汽车从上海传来的消息吻合。最先报道的是联军船只聚集北塘，报道者还给出了船只的数量，并且对美国人的出现表示惊讶。

然后，是部队的登陆及联军在北塘的会师，以及联军第一次火力侦察时的交锋，当然夸大了这次失败。接着便是在新河、塘沽的战斗及最后北要塞的陷落。信中还提到了爆炸事件，那位作者还补

充说，他不确定到底是军火库爆炸，还是被包围的清兵故意踩响了地雷。他也谈及到双方惨重的损失，但是说中国的损失要大得多。几名广东苦力在战斗中遇难。其他的要塞似乎没有反抗就投降了，但是原因他不能说。然后，他也谈到联军进军天津，并说中国人并不打算保卫天津城。联军能够占领要塞，主要由海军构成的联军兵力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拿下天津城，因为由水路很容易进入这个城市。僧格林沁已经撤退到北京附近的一个据点，他在那里有足够的时间重整旗鼓，因为文官们正利用各种借口拖延联军进军北京的时间。最后给联军留下双方已和谈的印象，从而诱骗他们只带一小队人马进京。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携带大炮和其他装备，而且不能再使用水路交通，从而轻易地成为清兵司令的俘虏。

除了提供这些细节之外，由他们的委托人提供给这家广州公司的有关北方的战争，还有很多后来发展的情况都非常准确。倘若当时我们知道他们的报道如此可靠，联军也就无需费那么大的功夫和周折向香港传递消息了。其实，这些信息也提供了另外一个证据，证明清政府对联军展开的欺诈手段是蓄谋已久的。也表明，这件事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了。中国人丝毫不怀疑他们的诡计能否成功，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对付的蛮夷只具备强大的海上作战能力，但在陆地上的战斗力要比他们勇敢的清兵差多了。

我们的军队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都得归功于我们开明政府的适度坚持。除了原来的几个口岸，这次我们又获得进入其他几个口岸的特权。要不了几年的时间，这些口岸可能要发展成更大的贸易商业中心，而额外的财富也将吹送到大英帝国的海岸。同样，我们相信，基督宗教以其文明化的影响力也将逐渐进入中国，并牢牢地控制中国百万大众的心，引导他们去祝福这场在他们国土上蹂躏数月的战争灾祸，放弃对外国人先入为主的敌意，坚持可以让外国人

获得进入中国的权利。通过开放牛庄口岸，我们获得了与暗中侵占中国的俄国人进行自由贸易竞争的特权。通州和天津的开放，使我们占领了通往京城的要道。汕头打开了横跨广东和福建两省边界的水路，并且为我们打开了鲜为人知的海南和台湾群岛的广阔天地。这些贸易口岸的开放，也确保了我们一直以来想进入中国心脏地带的愿望。从那里，我们可以进入盛产上等茶叶和丝绸的广袤土地。然而，那里最大的阻碍就是破坏性的起义军，令所有对这支起义运动队伍感兴趣的人失望的是，最近才得以证明他们根本就是以一群偷盗抢劫为营生，奢侈享乐至上的乌合之众。不过，最近他们在上海遭到联军严重打击，他们从中吸取教训，明白若要生存，就必须对促进贸易有良好的态度。像这样无异于强盗土匪的起义，在任何国家都是令人害怕的事件。但是，无论是持严格的中立立场或是对大清帝国一方的干涉，都不应由我来指明其中的缘由。毫无疑问，中国的力量暂时被严重削弱，但是由于前些年她也经历过同样的风暴，倘若她的历史没错，那她也许能够重新获取力量，一鼓作气熄灭这堆几年来缓缓消耗其生命力的火花。赛场已为我们打开，现在是我们“进去并获胜”的时刻。通过坚守我们祖国的荣誉，并且立即消除任何敌意的表现，我们或许可以在一个令人满意的立场上保持长期友好的关系，并逐渐开发这个国家丰富的资源。如今，我们已经赢取的立场主要归功于最近一次的远征。这都是相关部门努力的结果，正是他们的努力，不畏遥远的距离，才能形成一支如此完美的部队。任何一个分支都是如此完美，才能在战场上获胜。尽管每个英国人都会抱怨对此次远征花费的开销，但是他仍然会情不自禁地对这次显著的胜利感到满足，尤其是在他对我们的远征打开的这个国家的辽阔版图，以及从这个国家可能获取的巨大利润有所调查的情况下。